

不同的世界 | 不同的梦想

日常生活批判系列



生活的暗面

The Sociologically Examined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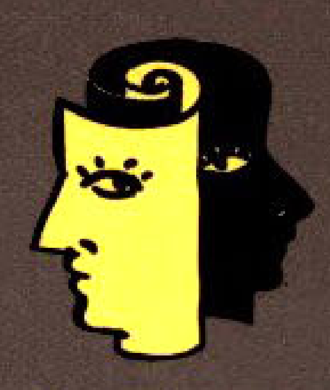
日常生活的社会学透视

[美] 迈克尔·施瓦布 著 汪丽华 译









The Sociologically Examined Life



ISBN 978-7-301-14580-7



定价：30.00元





不同的世界 | 不同的梦想

日常生活批判系列

生活的暗面

The Sociologically Examined Life

日常生活的社会学透视

[美] 迈克尔·施瓦布 著　汪丽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279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的暗面：日常生活的社会学透视 /（美）迈克尔·施瓦布（Michael Schwalbe）著；汪丽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培文书系·日常生活批判）

ISBN 978-7-301-14580-7

I. 生…　II. ①施…②汪…　III. 社会生活－研究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9484 号

Michael Schwalbe
The Sociologically Examined Life, 4e
ISBN: 978-0-07-338011-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生活的暗面——日常生活的社会学透视
著作责任者：[美] 迈克尔·施瓦布 著　江丽华 译
责 任 编 辑：徐文宁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4580-7/C·0509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36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前 言

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入门教科书，都会传授许多事实与理念，但在教给学生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去思考事物上，做得却并不怎么让人满意；而这一点，则正是我尽力想让我的学生做到的——超过其他别的所有目的。也正是这一原因，促使我来写这本书。我曾半开玩笑地称它是本“反教材”，意思就是说，我想让它具备所有那些沉闷的硬皮教科书所不具备的特色：易读、具有启发意义、个性化，以及在伦理上具有挑战性。通过这本书，我想尽力温和地但也是坚定地交给读者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去思考事物。为了遵循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社会学的邀请》（*An Invitation to Sociology*）和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开创的优良传统，我相信，需要我们作出的不仅是意识上的改变，更是要在我们如何生活上作出改变。

标准的入门教科书，都会包括一章关于“社会学视角”的内容，这一章的根本问题在于，通常不是一系列概念的罗列，就是对社会学中常见的“三位一体”（功能主义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冰山一角式的展示。在我看来，这一标准做法，即使有的话，也极少能让多数学生开动脑筋去想：从社会学角度去看，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之前没学社会学时会有什么不同？在这本书中，我尝试通过不重点强调社会学中那些制度性的学科规范来实现这一点。我不会去人云亦云地说些“社会学家对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是这样或那样想的”，好像学生必须非常在意社会学家想些什么似的，我会简单明了地从社会学角度把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世界拆散开来。我不会罗列我们那闪闪发亮的“老祖宗”传下的社会学工具箱中的内容，我会尽力教给你如何去使用那些工具。

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一些社会学老师可能不会喜欢我选来拆分事物的方式。考虑到有可能带来这一风险——我看不出我如何既能避免它，同时又能写出一本诚实的书来——是我一直将这本书视作一本“反教材”的另一个原因。多数教科书都是四平八稳，没有将社会学想象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推动到会让人引起一些不舒服感觉的地步。我的目标当然不是为了引人注意而故意去挑衅，但我也绝不会为了明哲保身而追求四平八稳，迎合所有人的政治口味。书中的许多分析都是针对美国社会，而且极具批判意味，我相信这肯定会让一些人感到厌烦。

我的希望是，这一厌烦将会是富有成效的，最好是能激发出一些热情来。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出师生间及学生间的对话。我所选用的案例和分析，想要激发出能够推动对话深入讨论下去的思想和情感。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本书非常适合那些想要与学生进行严肃互动的老师，即使这意味着需要面对一些不同的声音或不一致的地方。对我来说，那正是对话互动所包含的，不管我们从这样的对话中会获得什么样的收益，都会提供我们一个机会，朝向更好地去理解、最终则是去改变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

如何使用本书

如果你阅读本书是为了学习如何进行社会学思考，你已很清楚如何使用它——只需接着往下读即可。不过，我觉得我也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就像那句流传至今的俗语所说的，“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除了这一点，没有更多的建议是必需的。顺着我的句子读下去，保持合理的小心，你会做得很好。如果你使用本书是为了教别人进行社会学思考，你的任务就会稍微复杂些，下面一些建议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首要的一点是，我强烈推荐这本书应被用作在课堂上激发思考和对话。邀请大家主动说出或是提问大家这本书里什么是有意义的，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除了这一点，我建议进行带有指导意义的对话，这要求实践和扩展这里所教的思考方法。作为这样做的一个扶助，我已经创造了我所称的“三思而行”，每章最后都会有三个问题（三个步骤）。每一步都会设置一个特定的情境、难题或是复杂

难解的谜题；然后提出两到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来组织课堂讨论（或者是写论文，或者是记日志）。如果你想按照其他方法进行思考，可以考虑以我的为模型，创造你自己的。

我的其他建议是，要将对这本书的思考，转化为有效的应用。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出现快乐和兴奋的反应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对这些反应，我当然是希望越多越好，至少希望不至于太少，希望它们能够产生好的结果。不论怎样，可以预期的是，不习惯带着批判眼光看待美国社会的读者，可能会对书中部分内容感到烦躁，或是会产生戒备心态。我不认为这是件坏事，因为在学习过程中，如果能将情绪处理得很好的话，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习推动器。

接下来，我的建议是，希望能够教会读者按照从社会学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去考察他们的情感。读者首先应该自我追问，确认自己正陷入其中的麻烦是什么。例如，我对“个人选择”（第 4 章）和“暴力体育运动”（也在第 4 章）的评论，肯定会惹恼一些人。但是到底我说了什么或是暗示了什么，会引发这种不满的情感呢？停下来思考一番回答这个问题，能够清除一些误解。这样做也可为读者进行下一步做好准备，即去看一看他们的情感是怎样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生活之中。

为了了解自我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读者需要对一些问题有所准备。我建议，应该鼓励他们扪心自问：我珍视的什么信念或习惯在这里受到了挑战？我是怎样学会珍视这些信念或习惯的？如果放弃这些信念或习惯，有可能失去什么样的关系或权力？这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答案的真诚寻求，能够将愤怒或烦躁转化成一种激发进行社会学思考和获取自我知识的资源，进而帮助读者学习将他们的情感看做一种数据资料，而不是不能或不必分析的事物。

通过一种我所说的防卫性反应，一个人可能会这样说（如果肯于明白说出的话）：没错，我明白你想用这一看待事物的社会学方式达到什么，但我并不想付出太多努力让我的脑子围着它转（去做这件事），它会让我因为自己身为白人 / 男性 / 中产阶级 / 异性恋者 / 已婚者而感到有种负罪感。这一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批判的社会学视角，能够在享有特权群体的成员身上投下一束让人窘迫尴尬的亮光——要是让他们的特权变得一览无余、人人可见的话。因此，当诸如此类的思考让一个人产生负罪感并且看上去像是某个人自己的错时，是很难教会他进

行社会学思考的。

如果出现这类反应，应该记住的一点是：责备个体是违背社会学思考的，后者将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视作历史和集体行动的产物。另一点需要记住的是：种族主义、性别偏见与资本主义，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产物，而社会学则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如何被这些令人苦恼的压制性制度（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塑造和裹入其中的。也可以说，一种批判的社会学视角，会使我们看到为什么不公正的社会安排会持续存在和如此难以改变，尽管一些统治集团的成员也有人道的、善良的和开明的、进步的意图。

这些观念能够帮助叩开被特权和个体主义所阻塞的知识的大门。但是这样一来，也会产生一种抵抗的愿望，即回避伴随意识到一个人是如何被牵连进再生产压迫性社会安排而来的道德困境。其内在逻辑有点像是这样：噢，我知道了，为什么我不用为不是我创造的情况感到有负罪感。我也理解了，当享有特权的群体成员仅仅是简单地接受提供他们享有特权的这一制度，不平等就会持续存在。但对这一切我都无能为力。我仅仅是一个个体而已。并且因此我不能将社会学太当回事，否则我就会对按照我已规划好的方式过我的生活不断地感到不舒服。

当良知与个体主义和担心害怕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类似这样的反应。作为回答，你可能会指出，社会学拒绝接受这种观念——一个人可以单枪匹马地杀死压迫制度这条大龙。如果我们能从社会学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我们就能意识到，变迁（改变）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因此，严厉指责我们自己没能做到那一点也就毫无意义。你可能也会说，社会学思考有助于我们看到，权力不是来源于金钱或枪杆子，而是来自组织和合作。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想改变，最好的策略并不是激励我们自己采取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是与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和奋斗目标的人一起努力。

第二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单独行动的个体不可能改变社会，但是一个人完全可以促成变迁的发生。历史与社会学都告诉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即便是极小的反抗行动（小到说一个“不”字），也能因其他人被激励去思考、感受和行动而产生巨大的后果。把这一点牢记在心，对于容易让人产生绝望的信念（没有一个人是必不可少的，或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解毒剂。

可能需要再次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反抗行动更有可能通过他人的支持而作出。

最后一个建议是，尽可能将上述关于个体行动的原则应用到社会学教学中，尤其是当进展看起来比较缓慢时。有时想到我们毫无进展和做什么都没用，会是一种冒险。考虑到与其相对的力量，批判社会学思考可能不会在某些地方深入扎根。但是由于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这些地方是在哪里，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栽种。希望书中的对话片段，能够成为发芽生长的种子。

关于对话部分

过去当我告诉我的一个朋友，一直有人要我写本书第3版时，她笑道："那很好。你是否打算将所有最新的重大进展都包含进如何从社会学角度来思考？"我知道她是在跟我开玩笑。我们都知道没有这样的重大进展，也都知道出第3版的真实原因是为了让这本书在图书市场上继续存在。但是，尽管我对朋友的玩笑一笑置之，可我心里却也在想："要出第3版的话，我该怎么做？"

这里我想解释一下"让一本书在图书市场继续存在"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教材出版商在卖一本教材时不能卖出足够多的新版本，这本书就会停止印刷。当老版本在底下被买卖，出版社不会得到任何收益，因此他就有压力去推出新版本，人们通常都会假定新版本在某些方面比旧版本做得更好，因而人们也就会喜欢新版本胜过老版本。对一个作者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么对自己的书进行更新推出新版本，要么就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书从此消隐无踪。

不用说，我自然希望自己的书能继续存在下去，并希望学生和其他读者能够买得到。如果人们无法找到一本书，它也就不会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如果我在如何具有社会学意识这方面没有一点新东西好说，我又能做些什么呢？一些评论者建议增加图表和数字，或是更多的参考书，或是卡通图片，或是对当前事件的讨论。这些主意都很好，但对我来说，它们显得有些像是骗人的东西。

当我尽力想要弄明白如何使新版真正更好和更有用，一个学生通过邮件给我提了一个关于宗教的问题。在他的班上，他一直在读这本书，让他感到疑惑的是，是否科学没有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像他对上帝的信仰那么多。在本书初版问世以

来的这么多年里，读者向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总是会尽最大可能去回答，即便这样做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在我回复过那位学生之后，我意识到我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怎样写新版的办法。

本书的副标题是对话片段。我使用这个短语是想暗示，从社会学角度来思考，意味着与那些以分析方式看待社会生活的人一起进行思考。本书是我的方式，即与比我可以亲自面对面谈话多得多的人进行对话。不管怎么说，问题是，一本书一旦写出就是静态的——当读者提出问题或提出异议，它不能作出回应。但是，作者所能做的是将问题与异议记在心里，等到机会出现时，利用新版予以回应。

因此，本版的新颖之处就在于，里面出现了更多的对话片段，这些片段都是受到师生对上一版回应问题的激发而产生的。我称这些回答为“对话”部分。在新版中，在每章结束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如果本书能够继续被大家广为使用，未来的版本可能会包括更多的“对话”，以回应大家提出的更多的新问题。尽管新版肯定会有它的问题，但它将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与读者的对话，是他们帮助我弄清楚如何让本书继续存在下去和变得更好。

关于新版的一个注解

过去我曾教过一门“社会互动理论”的课。我在这门课上指定的一本阅读书是乔尔·查农（Joel Charon）的《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这是一本很好的关于符号互动领域社会学视角的入门书。我不仅在我的课上使用这本书，我还为出版者写了一篇书评。我评述了第1版，并对第2版应该作出哪些改进提出我的建议。我评述了第2版，并对第3版应该作出哪些改进提出我的建议。依此类推。每次出新版，这本书都会变得比上一版厚一些和贵一些。最后，当出版商请我为第5版写书评时我拒绝了：“不！这本书已经够好了！不要再往里面添东西把它弄得一团糟了！”现在再回头去看，我意识到我在教材出版如何运作上太天真了。顺便说一下，查农的书现在已经出到第9版。也许它9倍好于第1版，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就像我在上面关于本书第3版评论中所说的，我已学到的关于教材出版的经

验教训之一就是，要想让图书在市场上继续存在，出新版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而且我也确实想看到学生能够很便利地买到这本书。但我不喜欢仅仅是为了卖出新版而做一些表面改动这一主意。因此，在每次出新版时，我始终都会尽力添加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一版中我增加了对话部分，它们是基于这些年来师生的反馈。在新版中，我想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不能增加太多，否则就会增加书的厚度和成本。

在阅读书评和浏览我的反馈文档里收集的笔记的过程中，我看到人们经常让我就确定的社会学概念多谈一些。一些人甚至建议我提供一个术语和定义表。我不想通过增加那类材料来使本书“教科书化”。概念是思考的工具，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增加更多有可能帮助那些想要尝试用社会学意识方式（sociologically mindful way）看这个世界的读者的内容呢？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去做，因此我列了一个概念清单，对这些概念我会详细论述，每章一个。

最初我想到的是称呼这些附加的东西为“概念箱”，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它看上去显得太过笨重，与本书的批判精神不太适应。最终我还是决定称呼对每个概念的讨论为“注解”，这个词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非常友好的标签。这样一来，例如，在第1章最后就有了一个“关于偏见的注解”。其他“注解”则讨论了常识、未来、盲点、情绪、偏差、理论、运气、被动时态、非暴力、共同财富，及教育别人。我希望读者会觉得这些东西既有趣又有用。注解部分确实应该提供更多有益于进行对话的东西，不仅是在课堂上，也包括课外。

每章的“注解”栏目长度都是一页。因此，总的来看，新版中我增加了约一章有价值的新东西（我一直要求出版商把价格降下来）。除了增加注解部分，我还改动了一些句子，更新了一些数据，补充了一些每章最后参阅书目的新资源。

我要再次感谢老师、学生、书评人，以及其他花费时间发给我评论和问题的读者。每一个这样的信息，都是我最初希望本书谈话部分会是的那个样子的一部分。尽管我对出新版这种商业行为有所抱怨，不过看到对话仍在持续下去，我还是感到很高兴。我希望新版能在让对话继续进行下去这方面好过上一版。只要读者持续反馈他们的建议，这本书就有持续存在的理由。

鸣谢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所得到的许多帮助，还在我坐下来写它之前就已到来。我可以就帮助过我的人——在教室里、在印刷厂、在谈话中——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并且这一名单就是我列得再详细，最终也会是不完整的（参见第4章关于个体生活的社会本性）。或许所有我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宽泛的、对所有心智——社会学世界之内及之外——的感激之情，是它们影响了我的思想。

本书前两版由Mayfield出版社出版，我对仍在那里工作的我的编辑，Serina Beauparlant，仍然抱有极大的感激之情，感谢她愿意冒险出版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教科书。如果不是她的支持和编辑过程中流露出的智慧，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抱怨教材出版的经济问题。2001年麦格劳-希尔出版社买走了这本书的版权，在这里，负责我这本书的编辑一直是Sherith Pankratz（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工作）和Gina Boedeker。他们为这本书所付出的努力，正是我一直以来所希望的。我也非常欣赏麦格劳-希尔出版社一流生产团队的优秀工作。我还要感谢大量的评议员，他们的评议帮助我使本书能以更好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第4版的评议员有：

Willow Aureala，夏威夷社区学院
Charles Edgley，阿肯色大学
Sydney Hart，东北伊利诺伊大学
Ken Kolb，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
Sarah M. Pitcher，圣迭戈城市学院
Gary D. Wilson，匹兹堡州立大学
Michelle Wolkomir，森坦那瑞大学

第3版的评议员包括：Peter Adler，University of Denver；Cynthia J. Bogard，Hofstra University；Lynda Dickson，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Colorado Springs；Rosemary F. Powers，Eastern Oregon University；Jane A. Rinehart，Gonzaga University；Thomas L. Steiger，Indiana State University；Yung-mei Tsai，Texas Tech University；Stephen Zavestoski，Providence College。第2版的评议员包括：Cyn-

thia J. Bogard, Hofstra University; Peter Callero, Western Oregon University; Russell Crescimanno, Piedmont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 Raymond DeVries, St. Olaf College; Charles Lawrence, Seattle University; Kathleen E. Miller,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Yaw Oheneba-Sakyi,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Potsdam; Harry Ann Pearce, University of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avid L. Preston,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Barbara Katz Rothman, Baruch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aroline Schacht,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Martha E. Thompson, North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第 1 版的评议员包括：Peter Adler, University of Denver; Chet Ballard, Valdosta State University; Conrad L. Kanagy, Elizabeth-town College; Donileen Losek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Claus Mueller, Hunter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Laura E. Nathan, Mills College; Samuel M. Richard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Rik Scarce,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Rhonda Singer, Smith College; Clifford L. Staples,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Vegavahini Subramani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Becky Thompson, Simmons College。

我应该与那些通过邮箱发给我问题或是对我在上一版中所说的话作出回应的人保持更好的联系，如果不是他们的帮助，我会对在这里该怎么说仍然犹豫不决。对于认真看待就社会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这一主意进行对话的师生，我要感谢你们的想法。你们都知道你们自己是谁，我对你们所有人都表达我的真诚谢意。

我内心最深处的感谢要献给我的亲密爱人，Sherryl Kleinman，是她帮助我在书中保持前后一致的声音，在写作中保持一种明晰的目的性。我也非常感谢她在构成作为社会动物的我们的生活，以及把我们的生活联结到一起的伴侣关系上，变得更加有意识的帮助。

目 录

1
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

在鞋子用品部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多的事情。在大型百货商店的其他地方，人们正在忙着选购旅行背包、帐篷、橡皮独木舟和其他户外旅行器具。两个卖徒步旅行靴的年轻人，正在享受难得的一阵空闲时光。我站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正在看帽子，完全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对话。他们中的一个，后背依着柜台，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正在跟他的同事讲他上大学的事情。

"上大学还是挺有趣的，"他说，"但在那里，我没有学到任何我以前已经知道的东西以外的东西。"

"是吗？"他的同伴回应道，话语中带着几分惊叹。

"一点没错。商务沟通课讲得不错，我们学会了如何写事务信函。但是剩下的课，可以说剩下所有的课，都没什么新意，全都是些老生常谈。要不是为了最后拿到学位，可以说大学四年整个就是虚度光阴，浪费时间。"

听到这儿，我的心思离开了眼前要买的帽子。我真想走过去盯着他的眼睛问问这个年轻人，他是怎样在18岁时就变得这么聪明，以至于听了四年大学教授的课，看了四年的书，竟然什么新东西都没学到。我真想走过去打击打击他的傲慢自大，为那些教授为了教给他新东西而花费的那些时间而狠狠地训斥他一顿。换作其他教授听到这些话，我想他们的第一反应应该与我的反应相去不远。

当我意识到这位自我夸口者可能并没有明白他自己所说的话时，我的愤怒开始减弱并慢慢消失。实际上，可以肯定地说，他在他的大学生活中肯定学到了某些东西。那么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他如此贬低或看不起他所受的教育，是因为他对大学毕业没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感到愤怒。或者也可能是他想要告诉他的同伴："虽说我上了大学，可我并不比你强到哪儿去。常识才是最关键的。"如果这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这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太坏的意思。

可是，即便他的本意是这样，我仍对他所说的他的教育是一个浪费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即使他已经学到的远多于他所意识到的，他也会错过许多。他没有学到如何去看待自己、如何了解自己是谁、自己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是如何与他人紧密相关。如果他学到了这些，可能他就会向他的同伴解释他的教育如何让他受益匪浅，而不会让他的同伴为他感到遗憾。

我并不期望像事务信函写作或其他技术性很强的课程，可以激发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原本就不是开这些课的目的所在。但是其他课程，以及整个研究领域，则确实应把这一目的作为它们存在的理由。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社会学，经常都是以这一事实，即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身和社会，从而能够过上一种更满足、更能自我决定、更负责的生活，来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解释。如果社会学（或其他任一学科）能为人们做到这些，我想它就有很好的存在理由。

可是，比起社会学答应兑现的，社会学课程有时也会激发较少的自我觉醒意识与对社会的洞察力。在我看来，当课程目标主要是为了传授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像"看到我们有多科学了吗？看到所有这些理论、概念和发现了吗？你应该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这一失败很可能会发生。当然，没有哪位老师会以这种方式直截了当地这么说，但是有时他们所说的话的弦外之音就是这个意思。很可能你自己就曾听到过老师这么说。

当社会学按照许多有名的、对学生来说却是陌生的人所写的大量著作的形式来教时，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带有异国情调的想象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去留自如，

取决于社会学家所说的听起来有多么有趣。如果社会学就是这样被人理解的话，多数人要不了多久都会弃之而去。毕竟，社会学家相互间所说的，远没有社会生活本身有趣。如果足够敏感的话，所有人都更愿关注社会生活，而非对社会生活进行学术研究。

这样一来，同样经常发生的是，当一个人偶然遇上社会学，社会学能够留给他的印象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一些零零散散的事实和概念被记着了，但是思考事物的习惯和看问题的眼光却没有丝毫改变，也没有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世界的方法。看上去这就像是，在讲述了如此多的别人勾画描绘出的图景之后，我们已经忘记了问题的关键是，教给人们如何去自己描画出自己眼中的图景。

如果你喜欢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书面图景，你可以在许多地方找到——但却不是在这里。本书描述的不是社会学的概念、理论和各种各样的发现，尽管里面也会间接地用到它们。本书所要讲述的是如何进行社会学思考，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是值得的。它讲述和展示了如何从社会学角度集中注意力和理解社会世界。我称这为具有社会学意识的练习。一旦你掌握了这一练习，你就可以为自己勾画出你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的图景。

社会学意识

你是否意识到本书所用的字体？它是照什么格式组到一起的？它是用什么纸张印刷的？如果这样的问题看上去有些奇怪，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学会练习一种针对书本所应具有的特定的意识。我们身边许多事情，许多熟悉的、深深地影响我们的事情的情况，与此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没能看到它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缺少这种必要的意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学习。

意识远非注意。意识到某物，就是去看和欣赏理解其所具有的独特特征。例如，意识到一个人，并不仅仅是感知并注意到那个人。意识到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意味着尽可能地了解和欣赏理解他 / 她作为一个会思考和有感情动物与众不同的特性。当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意识到一个人，我们就可以超越定型（思维定式）和偏见。

儿童经常会用一种让人惊奇的能力去看周围事物，因为他们的心智是明净的，对他们来说，世界是新的和美好的。不管怎样，一个孩子的意识是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和判断的，就好像用一种方法可以理解所有事情。作为成年人，我们是按照与我们所遇到的事物相适应的方式意识到它们的。例如，我们学到，人必须按照使其成为人的东西——观念、情感、欲望、身体和习惯等去理解。同样道理，书本必须按照使其成为书本的东西——词语、纸张、设计、装订等去理解。具体到每样事物，我们都会学到一种不同的方法去理解掌握它。

社会学意识是一种理解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练习。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可以单从作为社会的成员来理解。但要真正意识到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世界，我们必须学着按照它之所以是它那样去理解它。换句话说，为了看清什么使社会世界成为一个独特的现象，我们必须学会所必需的观念。这是一些关于如何注意社会世界的观念。社会学意识就是按照这些方式去注意的练习。

如果我们践行社会学意识，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例如，我们会看到，人们是如何创造社会世界的，婴儿是怎样社会化成功能人的，我们与他人如何相互依赖，人们的行为怎样成为他们生活其中的环境的一个反映，社会生活怎样由一个又一个模式组成，偶然性如何塑造我们的命运，表象是怎样策略性地制作而成的，权力是怎样得以行使的，不平等是怎样创造出来并得以维持下去的，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创造关于社会世界合理的和可以信赖的知识。

社会学意识的一个正当理由

为什么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具有社会学意识？所有这一关于社会生活的分析性思考方法的重心是什么？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基于以下三个信念。

首要的是，一个好的生活——即那种能够激励人的、热情的、愉悦快乐的、有价值的、关心体贴人的、有尊严的、自尊自重的生活——只有在一个平和、互助合作、人人平等、较少死板（最低限度的管制）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存在。我的第二个信念是，每个人都有过上好生活的平等权，因此没有人应该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享有权力和特权。我的第三个信念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都有责任去考虑我们的行动会如何影响他人，尤其是会怎样影响他人过

上好生活的机会。

我希望你能发现我们把这些信念作为起点的合理性。如果你想认真琢磨一下它们，这里就是一个思考的角度：想一下你爱的人和你期望他们能够过上的那种生活。它是否是一种充满暴力、剥夺、痛苦的生活？或者它是否多多少少有些像我所说的那种好生活？如果是后者，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社会学意识作为为多数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是有用的”这一可能性。

社会学意识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怎样彼此交错缠绕在一起，我们的言行怎样以种种看不见的方式在帮助或伤害他人。具有社会学意识，在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言行后果经常超出我们想象上尤其重要。

例如，讲一个关于种族主义笑话的人，也许其本意只是觉得好玩。然而，他的这一无心之举，却渲染了有些人是愚蠢的、自命不凡的或是低人一等的这一刻板印象。即使笑话里没有歧视伤害哪个人，从长远来看还是会有人被伤害。笑话中所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可能会降低对他人的情感和帮助他人的同情心。或者也有可能是，笑话让他人看上去不值得获得友谊，从而把人们彼此分割开来。换句话说，伤害有可能是间接的、不易察觉的、延迟的。伤害是无意的，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是伤害确实会发生。

即便是在我们的行动看上去比较高尚时，伤害也有可能发生。例如，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通常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去做的好事。但是，当人们为那些制造武器、香烟或色情产品的公司这么干时，或是当他们为那些宣传、售卖或保卫类似这样的产品而工作时，其最终结果将会是暴力、死亡、疾病和苦难。没人会想要他人受伤害，但这却正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且使得这一切发生的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是他们那样玩命地认真工作，原本是不会有伤害出现的。

这种由社会学意识产生的警觉，可能会让人内心不安，因为它有时会强迫我们去注意那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但若不这么去做，我们就会在无意间危及或毁坏我们希望保存的那些东西。或者我们也可能会由于一些短视行动，减少我们自己和他人过上我们想过的那种好生活的机会。通过帮助我们看到超出我们意图之外我们的行动的后果，社会学意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开类似这样的陷阱，虽然要

避开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具有社会学意识，也意味着要关注别人面对的困苦和机会。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别人所处和面对的环境是如何有异于我们的，我们通常也就更容易对他们抱有同情。承认他们作为人类一员应该享有的尊严，我们也就较少会不公平地为他们作出的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而指责他们。通过帮助我们理解他人行事的背景条件，社会学意识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这个世界上的仇恨和冲突。

因为经常深陷在我们日常喜好的小圈子内，我们经常看不到和意识不到，我们所有人都是与他人——与那些为我们做衣服的人、为我们种粮食的人、为我们收拾卫生的人、为我们上学付费的人、享用我们付费的学校的人、从我们所选政治家的行动中受益或受害的人、将我们作为榜样的人——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意识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构成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线团，以及它们是怎样得以维持下去和迫使我们听从的。这一意识的主要益处是，它能使我们成为人类共同体中负责任的成员。这看上去是一个学习任一门智力实践很好的理由。

社会学意识的稀有性

如果社会学意识非常常见，我也就不需要去为它进行辩护。你只需简单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需要意识到和认真思考社会世界是如何运作发挥作用的。你可能会奇怪，竟然还会有人在这么做上花费这么大力量。但是，看起来，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社会学意识是极其稀少的。

事情之所以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社会学意识并不怎么有趣好玩。在如何思考上谁会想要更多的建议呢？只要有建议存在，我们势必就会担心采用这一建议是对还是错。因此，我们可能还是更喜欢说："够了，不要再交给我什么有趣的智力密谋了！谢谢你，单是常识就够我用的了，而且我也生活得很好。另外，我更喜欢去体验生活，而不是一直不停地分析个没完没了，甚至是一直分析到死。"在一个我们经常被提供怀疑主义传统的观点的社会，出现这一情绪反应也不能说是不合理的。

社会学意识比较少见的另一个理由，可能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它不会起什么用、派不上什么用场、有它没它都一样。如果这样做并没有带来太大差异，为什

么还要费心费力去分析思考社会生活呢？一些精明谨慎的人会从这个世界上退缩回来，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能够作出哪怕是一件事来改变这个世界。他们感觉自己手无寸权、身无寸力，就像我们这个社会中许多人所感到的那样。我觉得，这是真正阻碍社会学意识生根发芽的地方所在。我们往往趋向于意识到那些我们负有责任和我们多少能够控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感到自己无力改变一种情况，我们可能也就不会往深里分析。我们可能会为仅仅是避开了那一麻烦而感到庆幸。

美国的个体主义也阻碍了社会学意识的生根发芽。作为美国人，我们学会了自我依赖、通过自己努力来取得成就、自己照料自己是件好事。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确实是一些对我们很有帮助的观念。但是，它们也有可能遮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我们与他人是紧密相连的，并会阻止我们看到，我们与他人的联系，如何导致我们按照一定的方式去思考、感受和行为。像那种导致我们将我们自己仅仅看做是相互竞争的个体、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的观念，也使我们意识不到我们深陷其中的社会世界。

也有可能是对金钱和地位的渴求如此深刻地占据了我们的身心，以至于我们未能多些去考虑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或者他人是如何体验它的。也许是我们担心质疑伴随我们成长而来的那些信念，会让我们丧失安全感。也可能是我们会非常恼怒那些指责我们对比我们穷的人失去同情心的人。也可能是我们不想看到自己是如何参与进压迫他人中去的，因为这会使我们产生一种负罪感或是感到不快活。

人们抵制具有社会学意识有许多原因，但却不是因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私的、相互竞争的或者是胆小鬼。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情绪出现并阻止了社会学意识，那是因为人们就是这样成长的。在一个好工作人人可得、较少竞争的社会，人们会感到更安全，并且更有可能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当看上去生活就是一场竞赛，极少会有人想要停下脚步，分析这场竞赛到底是关于什么的竞赛、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以免他们掉到这场比赛后面。

具有社会学意识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它也与一直灌输给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许多动机格格不入。如何才能克服这些抵制力呢？首先就是从观念入手，因为人们必须认为践行社会学意识是值得的。我希望到此为止我所提供的观念已经说服了你，至少是部分说服，如果你需要被说服的话。

这里有一个可能会推动你朝向具有更多意识的观念：即使你现在很年轻，你也有可能在 40 岁或 60 岁时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你岁数比较大，你可以活的时间就更少了。时光飞逝不等人。你想在自己的一生中怎样去利用它？你可以攫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和名声。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大多数人主要的雄心；但是尽管这样，在人性的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其他目标存在——毕竟人不只是为了名利而活。你也可以尝试着通过传授知识或技艺、创造艺术品、恢复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促进健康、抵制暴力，或是组织起来进行变革，来丰富充实他人的生活。关键问题是：你想要在你已生活过的这个地球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如果你想要让地球变成一个比你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更好的地方，社会学意识将会帮助你了解需要去做些什么。

持续交谈

无论我们如何细心地去研究社会世界，我们对它的知识总是残缺不全。即使你能读到所有的一切，它们仍然是一些对你来说陌生的体验。而且即使你能读到和体验到远远超出一般人的地步，你仍然可能是从你自己特有的视角——这种视角是由你在特定地点、时间、文化和共同体或社区内所受的养育形塑而成的——去理解你所看到或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关于我们知识上的这一限制，没有办法可以避免。

因为人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和体验到不同的事物，并且会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看和所体验的方式，所以人们很可能不会在社会世界如何发挥作用及它应怎样发挥作用上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这可怎么办呢？如果意见分歧是关于个人喜好问题（“你喜欢歌剧？哟！”）或是一些家庭琐事，那么可能我们可以简单地不把它们当回事。我们可能嘴上会说“没啥大不了”，心里则会想他人怎么会接受这么奇怪的观念。

但在其他一些时候，事情就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一个人可能会认为民主会通过选举（在选举中，赢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可以获得政府中的一个职位，失败者则可以下次接着再来）得到确保。另一个人则可能会觉得这种体制是不民主的，因为它意味着有 49% 的人最后在政府中处于失声状态。类似这样的争议，当它涉

及许多分别支持一方的人时，很可能会导致暴力冲突。

具有社会学意识，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关于大大小小事情的争议带来的潜在的、具有毁灭性的后果。如果我们是有意识的，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他人会从他们所处的地位出发去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声称我们独占真理。因此，在最低限度上，我们应该想到并做到去倾听他人的心声，尽力理解他们是怎样看事物的，以及为什么他们看事物会有一种不同的视角。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回头看看我们自身，尽可能弄清楚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包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来自哪里。

因而，具有社会学意识，也就是让我们尽力参与到谈话中来，目的是尽可能理解一些重要的事情——社会世界是怎样运作的、他人是怎样及为什么不同于或同于我们、我们怎样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尽管也有不同）。只有我们积极参与到这样的对话中——只要我们肯于思考、对话和尽力相互理解及理解我们自身——我们就不会控制他人让他人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他人也不会这样来对待我们。

我所说的这一对话，可以包括许多人在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像印刷、其他媒介，以及直接对话。它也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像数天、数周、数年。实际上，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这一对话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这是我们避免暴力、团结一致创造使得尽可能多的人过上好生活的社会安排唯一的方法。践行社会学意识是进入这一对话的一个方式，也是使这一对话一直持续下去的一个方式。

这本书也是对话的一部分，在关于社会世界如何运作，或是如何最好地理解它的严肃对话上，不可能会没有异议地一直进行下去。因此，我敢保证，你肯定会对我在书中所说的一些东西持有不同意见。当这发生时，请质疑书本，在你心里或是向他人提出问题。如果我们将其视作一个更深入地去了解为什么他人看世界与我们那么不同的机会，持有异议就能推动对话向前。我希望，不论这本书会引起什么样的异议，它都能以这种方式得到应用。

在每章最后，我都列出了一些你可能会想要一看的资源。这些不是“证明我是正确的”资源。它们是相关的对话片断——我借用的片断，如果你努力去查阅它们，你也会从中受益匪浅。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会看到我的思想的一些来源出处、

它是怎样成为对我前面所说的一个回应、我的思想又是怎样走自己的路的。这会让你拥有一个更大的对话视角。

所有我在书中所能做的，就是邀请你去考虑一种看事物看问题的思考方式，这种方式，我相信，对于更好地理解社会世界、更人道地生活其中，可以提供极大的保证。我希望你能同意，社会学意识对实现这一目标是有益的。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我也就不会来写这本书。但是，不论你可能会想些什么，如果你愿意让对话持续下去，我都会感到非常满意。有时，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大的限度；有时，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终结的对话——标签及其根源

我已经听到过不喜欢这本书部分内容的学生宣称："施瓦布是个自由主义者！"好像是要以此来反驳我说的任何东西。相同的事情，有时也会在课上发生。那些称呼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的学生，和那些被教科书中的辩论给弄烦的学生，有时会试着给它或是它的作者贴上一个标签，像"自由主义者"，来对争论置之不理。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我会追问："给一场辩论贴上一个政治标签，是否就会使辩论变得正确或错误？"我用这个问题，来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回到辩论本身，以避开那些会分散学生注意力的标签。

问题并不是像"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样的标签没有意义。问题在于，它们经常是以一种过于随意的方式被运用。如果我们在使用它们之前能停下来先给其下个确切定义，它们就会比较有用。

在古典政治理论中，所谓一个保守者，是指一个把传统视作一种逐渐积累起来的智慧化身的人。因而，保守主义者相信，我们应该维持现有的社会安排。就像你可能猜想到的那样，保守主义对拥有特权的集团比较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从现有的各种安排中受益最大。但要注意，从原则上来说，保守主义在支持削减税收、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在学校祈祷、或是被迫为人之母上什么也不会去做。

在古典政治理论中，所谓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指一个相信我们应该利用人类理性的力量来持续不断地改进社会的人。一个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说："只要它不

出问题，就不要试着去修补它。”与其相对，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说：“我们应该总是努力改进我们的社会机制，不管它是否看上去有毛病。”因而，自由主义比较合乎对人类进步抱有坚定信念，以及相信传统经常是进步的阻碍的人的口味。这里要注意的是，从原则上来说，自由主义在支持福利、政府开支或是生育权利上什么也没做。

由此看来，与保守主义者相比，自由主义者对传统抱有更多的怀疑态度，更喜欢进行变革。即使如此，自由主义者通常与保守主义者一样，也赞成社会的基本构架是好的。如果有问题，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不用对社会进行彻底检修就可以解决。激进主义的看法则与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都不同。但是，激进主义并不意味着标新立异或是不合情理。

“激进（radical）”一词来自拉丁语“radix”，意思是“根源”。因此，严格来说，一个激进主义者就是一个寻找事物根源的人。所以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一个激进主义者经常想要看看，那些问题是否植根于社会被组织起来的方式。

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假设我们看见很多孩子在学校学习不好。再假设所有政治信仰各异的人都同意，这是我们应该尽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个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说，我们不应该假定问题出在学校身上。毕竟，我们的学校教育方式是许多年成功经验的结果。这一学校教育方式在过去一直运转很好，而且对多数学生来说现在仍然运作很好（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因此，我们不要太急于抛弃已被证明的方法、改用新的教育时尚。可能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鼓励学生用功用功再用功。

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说，随着社会发生变化，老方法需要接受再检查。或许今天的学生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学生，因此，学校应该调整自身以适应这一新的现实。是的，学生应该再多用功，但是我们也必须确信，老师被训练得能够与有着不同背景的学生合作愉快。或许，学校也需要更多的资源来保证所有的学生，尤其是那些不属于特权集团的学生，得到很好的教育。

在这一例子中，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把了解学校是怎样运作的排除在外。它首先不往那里考虑。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把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或努力排除在外。它首先往别的地方考虑。但不管怎样，这两个看法都没有对学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

们怎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运转的，或者它们怎样服务于有权力集团利益的提出疑问。

激进主义的看法与上面提到的两种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应该说，没有一个激进主义的看法。实际上，可以说，有多少关于根源起因的看法，就有多少激进主义的观点。因此，对学生在学校学习不好这一问题，有一些替代性的激进主义分析。简而言之，下面是对这一问题一些可能的激进主义看法。

要追问的第一件事是，谁在学校里学得好和谁在学校学得不好？（我们需要定义什么是“学得好”，但在这里我们暂且将其放到一边。还应指出的是，我说的是公立学校。）就像研究结果显示的那样，学校倾向于为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背景的白人学生工作得好，为有工人阶级背景的有色学生和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工作得不怎么好。这是一个线索，告诉我们需要把种族阶级考虑在内。但就本质而言，这并不是使得一个激进主义分析成为激进主义的东西。激进主义的内涵要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

一个激进主义的看法可能会说，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加强不平等和为不平等作出辩护。在激进主义看来，想要期望它们反过来行事，是一种太过天真的想法。没错，是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教育这种方式爬到了阶级阶梯上更高的地方。但在很大程度上，学校仅仅是作为归类机器在运转，为工人阶级的孩子提供工人阶级的工作、为中产阶级的孩子提供中产阶级的职位，等等。为了看到这一点，你必须做的就是要看学校产生的结果，不要把鼓舞人心的修辞（“教育可以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与现实混淆起来。

一个激进主义分子可能还会指出其他事情。例如，在一个有着巨大经济不平等的社会，许多孩子都没有充足的准备——相比那些家中有着巨大资源的孩子而言——可以让他们在学校获得成功。由此可以推测出，许多孩子都会在学业上以失败告终。一个激进主义分子可能会说，如果工作机会是如此有限，以至于很多学生怀疑学校将会遣散他们，他们可能并不愿仅仅是为了获取一个好分数，而去接受学校施加到他们身上的失去尊严和厌烦无聊。如果学生觉得有可能因为种族主义而受到歧视，也会降低其学习动机。

一个激进主义分子可能会同意，学校可以被调整得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比如对老师进行更多的反种族主义训练，为资金不足的学校提供更多的资源），

并会赞成有些学生可能会受益于“学习再努力些”的鼓励。然而，孩子在学校学习不好这一问题，只有通过了解周围社会的基本特点（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经济、普遍存在的白人种族主义）才能得到理解。一个激进主义分子会说，问题的根源就在我们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上。因此，除非我们消除这些根源，否则问题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哪种分析是正确的？我们不可能去说，无需研究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或者说那是一个个孤立存在、彼此毫无关系的事情。然而，我可以说，具有社会学意识要求考虑更大的社会背景，尽力看清社会世界中的一部分（例如经济）是怎样与其他部分（例如学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我们就不会看到有关我们的社会怎样运作方面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也可以说，如果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补救不起作用的话，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怀疑，问题的根源要远比这两种观点所能看到的深。

在说了所有这些关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视角之后，结果就是：给一种分析贴上一个标签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分析是否基于确凿可信的证据和严谨细致的思考。想要仅仅是通过给一种分析贴上一个不受欢迎的标签来败坏其名声，并不是一种智力上负责任的表现。当然，所有的分析都应公开接受挑战。但是，一个值得平等考虑的智力挑战，必须采取一种公平辩论的形式。

在最低限度上，对社会世界的分析，或是对其任一部分的分析，必须具有社会学意识，否则就会丢失一些重要的东西。至于书中展现的视角，我要说，如果你想贴标签的话欢迎你贴，但别忘了，标签本身并不是一种智力评断，更不用说是一种平等的辩论。一种视角，应该基于它所起因和强化的价值及其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洞见——不论我们是否对此感兴趣——来进行判断。只要你有这些充分的理由，我举双手欢迎你对这里所说的视角和争论进行评价。

关于偏见的注解

一次，一名选我开的社会性别课的学生告诉我，他认为社会学存有偏见，因为它忽略了女人和男人行为的生理差异。我说，社会学并没有忽视关于生理差异

的声明，只是多数社会学家都发现，这些声明建立在错误的逻辑、可疑的证据和对人类如何为社会所塑造糟糕的理解之上。但他仍然坚持认为，社会学在关注社会原因上存有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正确的，但却不是因为任何与社会学有关的事情。

所谓存有偏见，也就是有一种心理倾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和事物。在这一意义上，所有学科的从业者都有偏见。比如，生物学家的偏见在于，他们主要看有机体之间的关系。心理学家的偏见在于，他们主要看知觉、记忆和认知相互作用的方式。物理学家的偏见在于，他们主要看物质和能量具有某种原理的行为。社会学家的偏见则在于，他们主要看社会行为是如何被模式化，以及这些模式如何塑造我们（作为个体）。

如果你看世界的方式与你周围的人相当一致，你的观点看上去就不会有任何偏见。实际上，你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可能看上去就像他们的观点在你看来一样客观。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或者说“不同的观念透镜”来理解这个世界时，经常会出现对偏见（或不够客观）的指责。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定义为客观或没有偏见的看法，经常是最接近我们自己的看法。

因而，偏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我们需要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我们自身，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每种视角都会包含一些偏见或者偏向性，尽管通常只有当我们遇到不熟悉的看法时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什么时候偏见会成为一个问题呢？首先，当我们意识不到它会影响我们所有人从而错误地想象我们的看法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而他人的看法则是带有偏见的。其次，当偏见变得僵硬不化到阻止我们去考虑新的证据和新的观念时，它也是一个问题。因此，问题不在于有偏见，而在于受其限制无法自拔。

三思而行

1. 考虑一个你了解较多的群体。它既可以是你所属的一个小圈子、一个俱乐部，或者一个小团队；也可以是你现在或过去一起工作的人们；还可以是你的家庭。不管是哪种情况，想象你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名专家。现在想象一个局外人快

速扫了一眼你所在的这个群体并说："这些人看上去都像傻瓜。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荒谬可笑的方式行动呢？"你很可能会认为这个局外人是无知的和不公平的。但是假设这个局外人真的想要理解你所在群体的人们。你会怎样引导这个局外人去帮助他实现这一目的？或者这位局外人需要拥有什么才能变得有意识？

2. 一些人认为，教育始于学生被送到学校并开始听讲时。另一种思维方式反映在下面这句老话中："只要学生准备好，老师就会出现。"这意味着，除非我们在智力上和情感上准备听进某些信息，没人能让这些信息进入我们心中，当我们准备好虚心倾听接受教育时，我们就会找到我们需要的老师。这个想法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去理解本章开篇那位年轻人所说的在大学里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假定我们已经准备去学，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更好地改进我们与能够教给我们东西的人相互联系的机会？

3. 使用本书的一位教授，要求她的学生回答我提出的他们想要在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印迹的问题。当她让我看她的学生写的东西时，我注意到，许多人都说了类似这样的话："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想要作为一个关心和帮助别人的人被人记住。"这是一个美好的志向；我们全都可以很好地做事，努力作为一个关心和帮助人的人为人所知。但是，关心他人如何看我们，与关心我们可能会怎样通过我们的行动影响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在我看来，我朋友的学生误解了我的问题。我猜想，很多人可能都会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怎样解释这一趋向？是否有一些我们文化方面的因素，使得人们像我朋友的学生那样去回答这个问题？

参阅读物

Berger, Peter.(196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New York: Anchor Doubleday.

Krause, Elliot.(1980). *Why Study Soci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Lee, Alfred McClung.(1978). *Sociology for Who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s, C. Wright.(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hat Hanh, Thich.(1975). *The Miracle of Mindfulness*. Boston: Beacon Press.

2

创造社会世界

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虽然它经过了精美的印刷，但它并不是一件珍贵的艺术作品。那么，一美元钞票怎么会有价值呢？为什么一个人应该用一张纸来交换一杯咖啡？这只可能是因为，用咖啡来交换的人，相信纸币可以用来交易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人们不相信纸币可以交易自己想要的东西，像这样的纸币将会一钱不值。

金钱的力量和现实，源自一种共享的信念，而非别的什么东西。拥有许多金钱的人之所以既有权势又有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自己手里的钱让别人为他们工作。如果没人去用金钱交换物品和服务，拥有金钱并不会给人带来权力。要想让金钱带来权力，人们必须创造和共享一个对其价值的信念——然后，他们必须就像那一信念是真的那样行动起来。

考虑一下你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的毕业文凭。你心里可能非常希望，这张纸能帮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为什么一个人仅仅因为你拥有这张纸就应该给你一份工作呢？一纸文凭并不能证明你是能干的、诚实的或勤勉的。如果一纸文凭可以帮你找到工作，那也只是因为雇主相信，在得到文凭的过程中，你获取了能够使你成为一个好员工的技能和习惯。如果雇主不再相信这一点，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样会一钱不值，并且许多学校都会立马人去楼空。

战争不可能在没有共有信仰的情况下发生。如果老师对你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学生是邪恶的，你必须在他们杀害你之前先把他们杀了。"你很可能连

动都不会动一下，更不用说走过去攻击别人。但是，假设总统站在电视里宣称："海湾人民是邪恶的，他们想要毁坏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前先轰炸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你是否会志愿去当飞行员投下炸弹？当炸弹爆炸时你是否会欢呼雀跃？许多人都会这样，哪怕他们对海湾人民的具体生活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为了让战争得以发生，一个国家的人们必须相信，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对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必须相信政客讲的是真相；必须相信如果由选举产生的官员说必须这样那就必须去杀死对方；必须相信没有和平方式可以解决双方间的冲突。当这些信仰被直截了当地陈述出来时，它们看上去是这样不可能是真的，以至于看到战争最后却发生时，不能不让人为之吃惊。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涉及成千上万人的战争发生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仍会发生。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享的信仰将会产生许多重大的结果。

谈论共享信仰的力量，也就是谈论观念的力量。在美国——许多人都喜欢认为自己是非常现实的人——观念的力量经常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社会学意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充分地去意识到并理解这一力量。就像上面所说的金钱、文凭和战争的例子表明的那样，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当一个人说"观念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无关紧要"，她或他正在为一个危险的想法所误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金钱、文凭和战争并不是几个特殊的例子。社会世界中的每个部分之所以存在，都仅仅是因为那些人们所乐意接受并赖以行动的观念所致。

社会世界由什么组成

说社会世界仅仅是因观念而存在，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幻觉。身体不是幻觉，它们按照某些方式行动的趋向性也不是幻觉。家庭、学校、银行、教堂、俱乐部、公司、城镇、政府、军队和国家，也都没有一个是幻觉。你不可能期盼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是由按照反复出现、井然有序的方式一起做事的人们组成的。这才是社会世界得以组成的东西——活动模式。

不过，我们往往并不会那样去说。通常，我们会谈论家庭、学校、银行、教

堂、俱乐部、公司、城镇、政府、军队、国家等。但这仅仅是涉及许多人在内的活动模式的一些名字而已。这些模式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人们共享如何一起做事的观念。

观念让我们一起按照熟悉的方式，一天一天完成事情。没有观念来引导、激励、证明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也就不会有社会存在。当然，观念并不是长在树上，可以在我们感到混乱不堪、计划不周或是与他人发生冲突时，随手从树上摘下一片，就可用来帮助我们。如果缺少我们需要用来解决某些问题，或是激发或证明某些行动是合理的观念，我们就必须创造那些观念。人类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有时则是吓人的能力。我们可以解释、想象或证明几乎任何东西。

社会世界并不会因其存在取决于人们发明的观念这一点而变得不真实。不过，其实际情况与星星、树木和细菌也有所不同。人类不会创造星星、树木和细菌，这几样东西早在原始人类在地球上演变之前就已存在很长时间。另一方面，在人类出现之前，也不存在家庭、学校、教堂、政府等事物。这些事物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很多年前人类为了生存而构想出的观念和做事情的方式。

说社会世界是人类的一个发明创造，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这使它显得有些武断和站不住脚，并且这也不是我们通常感受到它的方式。社会世界通常看上去显得坚不可摧、持久存在，就像它远离我们而存在，并能被我们触摸到。而且至少是在多数时间，它看上去也是不可抗拒的和实实在在的。

社会世界是持久存在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拒绝怀疑将其结合成一体的观念。例如，假设你认为你的父母是异性换体人。如果你告诉任何人你的这一信念，你会给人一种发疯的感觉。人们不会相信你，因为要是相信你的话，他们就必须怀疑他们的现实感所赖以存在的许多观念。多数人，即便是那些偶尔会作出一些疯狂举动的人，也不会喜欢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每个人的心智都会往相反的方向——往可以理解的方向拉伸。

人们也会紧抱着那些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观念不放。“不可杀人”仅仅是一个观念，但它是一个指导行为的好的观念，因为它使得与人和平相处成为可能。威胁到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也就是威胁到社会本身。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类似的关于道德行为的观念，人们将这些观念视作是维持社会团结必不可

少的东西。因此，毫不奇怪，人们会抵制改变这些观念，甚至会坚持这些观念应该受到神灵般的尊敬。

像这样的观念，也会使人们自我感觉良好。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因为你学会了一套判断自己和自己行为的观念。例如，你可能已经学到了，仁慈、宽厚和宽恕是一个好人应该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这些品质，你就会在自己眼里和别人眼里感到受敬重。我们所有人都会从这些自我价值感中感到乐趣，并会抵制改变这些感情赖以存在的观念。

使得社会保持团结一致，或是帮助人们感觉自己是个好人的观念，经常会受到其它观念的保护。例如，某些人也许会说："我们的社会赖以存在的这些原则，来自上帝，永远也不能改变。"其他人则可能会说："古时候的智者设计了这些原则，我们一定不能改变它们，否则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珍视的东西就会遭到毁灭。"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所做的尝试都是为了使社会持续存在。因此，对生活其中的人来说，只要社会持续长存，它就会显得坚不可摧和实实在在。

观念也会形塑人们的情感。当人们习惯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后，他们往往也会习惯一种关于它、关于他人、关于他们自身的情感。这些感受，或许是宜人的，或许不是。不管是哪种情况，当他们的观念受到挑战时，人们都能感到，好像他们在情感上被推向前进——也许是被推向一种他们不喜欢的情感。因而，人们会拒绝放弃熟悉的观念，并尽力保持世界仍是他们完整地了解的那个样子，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习性和隐性观念

你也许想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所有这些熟悉的观念。它们是否会在书里？有些是。但是多数都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或是具体体现在一些习惯中，而且它们从来没有被说出或写下。这是因为，我们的许多观念都是如此深地陷入理当如此的假定中，以至于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去质疑它们。

例如，你可能会认为这本书不是一台可以发送电波，把信息传入你的大脑的无线电发报机。你可能也不会怀疑这本书纸上涂有药物，通过皮肤进行吸收，会使你的耳朵里嗡嗡作响。你可能也会认定，这本书不会在你看到第 66 页时突然

爆炸。然而，你很可能一点也不会意识到要去作出这些假设，因为它们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你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我们的很多行为都是这样，深深地扎根于我们从来不会去留意的地方。

将社会世界结合在一起的观念的不可见性，是使其看上去是真实的部分原因。社会世界就像是通过无数将我们包裹缠绕在一起的看不见的线团结合在一起。只有当我们尽力想要摆脱，或是想要以某种方式打破它时，我们才会真切地体验到这些线团的真实性及其有形的力量。如果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在围绕这些线团不停地旋转。

将社会世界结合在一起的许多想法都是无形的，因为它们早已随着时光流转固定为习惯。例如，当你还是一个孩子时，大人可能会教你睡觉前要刷牙。或许你会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父母则可能会跟你解释，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得龋齿和去看牙医。等你长大后你仍然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你现在刷牙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我应该刷牙，以免到时候得了牙病治起来痛苦不堪"这一想法，已经固定成你的习惯；你不会去回顾最初那些导致后来形成习惯的想法。所有的习惯都是这样。在从前的某个时候，我们被告知为什么必须做某件事，或者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琢磨明白的，现在，我们做它从来都是不假思索。具有指导意义的观念仍在那里，尽管可以看见的仅仅是习惯。

刷牙是一个有些乏味的例子，但它提出了一个有用的观点：一些表面上看像是个人习惯，实际上则是文化的一部分。在你出生之前，有人设计了牙刷作为避免蛀牙的一种方式。这是解决在你之前就已存在的问题的一个办法（或是部分办法）。今天，几乎所有的孩子从小都会被教导要刷牙。刷牙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人们现在都会在每天固定的时间去刷牙。

文化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创造出来的。某人发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他人看到它挺管用就也跟着采用，最终，解决的办法也就成了"大家都这么做"。有时人们会偶尔记起实践背后的观念，但是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忘到脑后。"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他们会开始这样说。当孩子们逐渐长大逐步进步时，人们会教给他们事情就是这样的，而极少会去解释这些观念最初起源于什么。这就像是，实践——解决问题的行为——变成了构成文化的一部分沉积物。

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课上谈起她的职业规划。她期望毕业后努力工作，得到快速提升，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她说，等到该有孩子了她就会放慢脚步。我问她，既然她有这么大的热情想要追求职业上的成功，那又为什么要让生孩子这件事来阻止她向上爬的脚步呢。她看着我，有一阵什么也没说。然后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我从未考虑过我这辈子会不结婚和不要孩子。"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强有力的文化习惯！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许多人甚至都不会去想到自己还可以有不同的行为。

面对现有的社会世界

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去上学的经历。在那里，你会发现一套在你到那儿之前运转良好的安排。没人会问你是否喜欢老师、校长和身边的其他同学；没人会问你是否喜欢家庭作业、测试和分数；没人会问你是否喜欢室内聚会、坐在硬板凳上和每半天仅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不论你喜欢与否，所有这些——学校这一社会世界——都在那里等着你，并且你也必须学会应对它们。你所面对的，是其他人惯常的一起做事情的方式。

当你参加一份新工作时，情况也是一样。你的上司会说："这是我们这里做事的方式。这是你的工作所包括的内容。"你的同伴会说："你可以稍微改变一点规矩，但不能改动太多。"在这里，你再次面对一套安排，并且必须调整你自己以适应现有的似乎将你排除在外的现实。我们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度过的，不断地调整适应由在我们之前出现的人形成的习惯和期望。不断体验这一情况，使得社会世界看上去非常真实——当然，只要大家继续坚持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就是真实的。

社会世界看上去显得如此真实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作为孩子，我们被教导我们的父母和老师觉得有用的观念和习惯。对此我们没有太多可以选择的余地。尽管我们可能也会质疑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但大部分我们都还是接受了，因为不这样做很难过活。

每个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套惯例上，通过这些惯例，人们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需要。改变这些惯例，尤其是改变那些看上去非常有用的惯例，要冒很大的

风险。人们通常并不情愿放弃一种年代久远但却非常管用的体系，去承受对他们来说不能给他们提供生活必需的风险。从旧体系中受益最多的人，当然也不会想要主动改变它。任何想要尽力改变它的人都会发现，社会世界不仅是由影响心智的观念来维护，也是由影响身体的诸如枪炮子弹等工具来维持的。

让人消失

意识到社会世界是人们创造的并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点，并不容易。有许多原因使得社会世界看上去“就在那儿”，但却没有人对创造它负责。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如果我们遗忘了社会世界是一个人类的创造物，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差异呢？它所造成的差异，就像带着一种知道它们适宜派上什么用场的意识去使用一种工具，和让这些工具（就好像它们自身有意识）来掌握人之间的不同。

没能看到社会世界是人们创造的，被称作物化（reification，使某些抽象的东西呈现为物的形式），它也可以被定义为，趋向于将人们创造的世界看做有其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例如，某人也许会说：“计算机技术是我们当今经济变迁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一声明中，计算机技术就被物化了，因为谈论它的口吻就好像它有自己的意志、独立于人类而存在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技术使得事情得以发生一样。

然而，所谓的“计算机技术”，仅仅是一些金属和塑料。人们制作这些材料，把其转化成计算机和其他设备，然后决定如何让其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一直都是人们在选择怎样建造和如何使用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谈论技术就好像它是一种有本身能力的力量，作出建造和选择的人就会消失。因而，看上去技术就变得像万有引力或风——一种我们对其无能为力的自然力量。

物化会阻止我们看到，技术的力量实际上来自选择按特定方式一起做事的人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可能就会忘记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是谁作出选择要建造什么样的设备？为什么？怎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社会？伴随这些改变而来的利弊得失都会由谁来承担？我们是否可以避开这些变迁的发生？如果这些变迁伤害到了人，谁应对此负责？我们是否应该决定按照其他一些方式来使用

技术?

这里是物化的另一个例子:"市场带着热情回应今天上涨的利率，尽管经济学家预期这可能会对就业产生不好的后果。"很可能你早就听过类似这样的论调。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关于洪水或某一其他自然灾害的一个报告。然而，市场仅仅是很多人用某一特定方式一起做事；利率则由人确定；并且就业源自雇主作出的决定。物化使得这些人和他们的选择全都消失了。

在一个大的复杂的社会，物化的倾向还是很强的，因为人们很难看到决定是在哪里、何时及由谁作出的。因此，相比之下，人们也就更容易说是技术、市场或神秘的"他们"使得事情发生。甚至那些理应对此看得很清楚的人，有时也会身陷其中。当社会学家说"市中心区工业发展的趋势正在导致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他们也在犯物化的过失。类似这样的话语，再次使得看上去没人会对选择一种会伤害或帮助他人的方式去行动负责。

这样一来，物化也就阻止我们看到谁在对他人做着什么及怎样在做，以及会出现什么后果。这使得我们很难抓住任何人，让其对伴随其行动出现的好的或坏的结果负责。通常都是有权势的人行动隐蔽并可以逃脱责任。

物化也可能会使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因为社会世界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超出人类控制的地方。如果我们将独立的力量归因于一些抽象的东西，像"技术"、"市场"、"政府"、"趋势"、"社会结构"或"社会"，那么它看上去显得如此没有中心，以至于甚至无法介入其中使得事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发生。我们可能也想尽力阻止浪潮，但是按照这种方式思考的人，很可能会保持消极被动的状态，即使他们看见他人失业、生活在贫困中，或是陷入战争的泥淖，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对此什么也不能做。

当我们物化社会世界时，我们就会将其与星星、树木和细菌等现实混淆起来。作为物质个体，这些事物的确存在，独立于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之外。但是，社会世界没有一部分会这样存在。所谓物化，也就是忘记这些；忘记意识到社会世界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地方。结果，我们也就忘记了，我们内在的集体力量可以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再创造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意识到，像现在这样存在的社会世界，仅仅是许多可能的社会世界中的一个。

创造分类和创造人

即使我们相信学校教育、教会或政府是好的，我们仍会承认，这些一起做事的方式，取决于人们发明的观念和习惯。要接受将相同的原则应用于必须解决我们认为我们是谁的社会结构，是比较困难的。

例如，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属于某一"种族"，并认为种族是一种可见的、生物学上的现实。但是，种族同样是人类的发明物。当人们谈到区分种族时，就好像在人类群体中存在极其显著的基因差异导致产生不同的智力和行动，实际上有这种想法的人是被误导了。像"白人"、"黑人"等这些词,必须经过界定才能存在。这样的群体在过去被创造出来，主要是政治原因所致。

种族当然是一种社会现实。基于肤色和祖先起源的地方，人们被定义为归属于不同的种族，像这样的标签能够影响到人们会受到怎样的待遇、他们会与谁生活在一起、他们学到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但是，再一次，所有这些都来自于把人类归人不同群体的模式创造。我们可以把人们按照眼睛的颜色、身高等进行分类。如果我们基于这些新的图式来行动，它们将会像我们现有的关于种族的观念一样真实、一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就像一些人认为当他们看到一个人的肤色他们就能看到种族一样，也有一些人认为,当他们看到一个婴儿的性器官时他们就能看到性别。人们常常会说:"啊,这个小家伙有个小鸡鸡——它是男孩。这个小可爱没有小鸡鸡，它是个女孩。"但是，将生殖器与性别等同视之是错误的。阴茎和阴道仅仅是人体的一部分，社会性别则是人教的。

如果我们没有分配我们对阴茎和阴道的意义，如果我们没有用不同方式去对待这些器官持有者的文化习性,我们就不会产生出"女孩"和"男孩"、"女人"和"男人"这样的名称。这样的创造物是许多人乐意接受和按照熟悉的观念行动的结果。如果有其他得到大家认同的观念和行为，就会产生不同种类的人。"男人"和"女人"，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仅仅是无限多的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

将种族和性别看做社会构建物也会带来一些麻烦，因为这样一来也就显得我们作为个体没有什么基本内容或事实依据，就像我们感觉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融化在空气中。在这一担心中也有一丝真理，尽管人们并非如此容易地就会消解。

一点不假，如果你当初是出生在一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你就会变成一个与现在的你不同的人。比如，你可能从来都不会想象自己是一个男人或女人，一个黑人或白人，一个欧洲人或非洲人，一个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所有这些特征都源自已经创造出的分类，他们并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实际上，所有你的关于你是谁和你是什么的观念，都来自你生养其中的社会世界。

也许你能在这里看到为什么人类创造的世界是真实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内在于我们身心之中的。将社会世界连接在一起的观念，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如果我们不能一直相信社会世界这一现实，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个体我们真实的感受。因为不愿面对这一情况，许多人都拒绝去研究社会世界是怎样形成的，相反，他们更愿相信它有一个超自然的起源，遵循着天国里设计的蓝图在运行。

创造真理

如果我的任一观念与你持有的截然相反，你可能会想知道谁的是真的，你的还是我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是，我想让你自己得出自己的结论。这里我想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社会世界的构建。其关键在于：我们用来决定哪种观念是正确的规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

比如，你可能会遵循这样一条规则，“书中所写被广为接受的东西是真实的。”或者你可能会遵循这样一条规则，“只有那些你能亲自核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或者你的规则也可能是，“只有由科学证明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你可以找到欣然接受这些或其他规则来决定什么是真实的人们。

不管你更喜欢哪条规则，它都将是你在特定地点和时间成长起来时所学到的一个事实。与其他任何关于最好怎样去做的观念一样，它也是一个由人们发明、变革、传递给你的规则。想要理解什么是真实的和现实的，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一种文化习惯，就像刷牙。我们几乎可以在想都不用想的情况下去完成它，而这在有些情况下确实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但在有些情况下就会伤害到他人。

下面就是它是怎样变成这样的：首先，我们制定我们相信的规则，然后，我们遵循我们的规则，将其作为一种习惯安顿我们的信仰，并假装知道事情真正是什么样子，就好像真相毫不费力就来到了我们面前。例如，月亮不是用绿色乳酪

做成的，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要将这一看法当做真实的接受下来，我们就必须对“月亮”、“乳酪”、“制造”有着共同的看法。我们也必须对什么算作支持或反对的证据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月亮的样本？如果样本是99%的矿石和1%的奶酪组成的呢？）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情上达成协议，我们就可以像创造关于其他事物的真实想法那样，创造一个关于月亮的真实想法。

如果我们能够践行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不仅关注世界是如何被社会化地构成的，也会关注我们是怎样创造方式来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和现实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抱持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他人是怎样对什么是现实的和真实的得出不同的观念。我们也就可能会较少坚持他人一定要接受我们创造的世界图景是唯一真实的图景。我们甚至也能以更宽广的心胸去考虑他人创造的世界图景。

意识到真理是创造的这一点，并不是要去揭示决定什么是真实的最好的规则。世界上并不存在最好的规则，只有相对于我们的目标具有更多或较少适用性的规则。因此，关键不在于得出真实的真理，而在于更好地去理解社会现实是如何创造的——通过留心人们是如何决定什么是现实的和真实的——如果你留心到了这一过程，你就会看到两件事情：在决定什么是现实的和真实的上面，并不是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话语权，真理经常会偏向于拥有权力的人。

怎样看到被创造的社会世界

我们怎样才能看到被创造的社会世界？所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正确的方式去关注我们周围所有时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关注现实世界的社会构建的方法，可以采取告诫和提问的形式。它是一个知道想要找寻什么和询问什么的问题。

首先，寻找能够一起解决问题的人。在这里，你会看到已经形成的习惯和惯例。当两个或更多人面对同一个问题，得出一个相似的看法，并设计出一种解决办法，他们就是在创造一种社会现实。当他们的解决办法传给其他人，并逐渐变成一种习惯，文化的一部分就已形成。如果这一常规的做事方式被许多人都用来协调他们的行动，那么日复一日，一种制度就会形成。

询问谁会从做事的特定方式中得到好处。某些人的解决办法可能会给其他人带来问题。例如，公司瘦身裁员，可能会增加留下员工的收益，但却伤害了下岗工人。组织学校的某些方式也许对老师来说是好的，但因学生处在学校的控制之下，对学生来说就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因此，在了解任一社会安排时都要询问一下：“谁会从中受益？谁会受到伤害？”你会发现，在社会世界的构建背后，经常存在大量冲突。

留意一下标签和分类的创造，特别是那些被用到人身上的。注意质疑贴在这些标签和分类上的意义，它们经常会成为人们特有的偏见。观察人们是怎样被放入一个类别或别的类别，他们怎样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贴上标签，以及他们怎样接受或拒绝某些特征。赋予这些标签、类别和特征的意义，决定了人们是否会受到尊重、被忽视或是受虐待。如果你看到了这些意义被创造和协商谈判的过程，你也就看到了社会现实是怎样被构建的，以及人们的生活是怎样被形塑而成的。

意识到标签和类别，你也可以用来了解你自己和他人。询问是谁发明了这些标签和类别。询问谁从中得到了好处、谁受到了伤害。询问这些标签和类别的意义怎样影响了人的行为。答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如果你想成为创造社会世界的一个有责任的参与者，你就必须寻找它们。除此之外，你还能怎样去理解你正在做的和你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现实呢？

留意当人们声称社会世界中的某件事物是现实的时他们所作出的假定。看看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什么。看看他们拒绝怀疑的是什么。了解了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人们确立其现实感受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也是审视你自己的基本原则一个很好的实践办法。

另外也要留意人们是怎样在他们自身之内创建真理的说法。要看到这一点，你必须看清楚，当真理之事正在被决定时人们内心发生了什么。谁说了什么？哪种争论被接受、被视作是有道理的和有说服力的？什么样的证据被接受、被视作是不可抗拒的？什么样的假定被彻底否决？如果你能识别出这些事情，如果你能学会了解它所展现的过程，你就有能力看到不同的群体是如何创造不同的真理和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世界的。

重建（构）社会世界

虽然我说社会世界看上去像是存在的，就像它是一个坚实的、可以持续存在的事物一样能够独自生存，但那只是它看上去所是的样子。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每天都去重建它，社会世界不可能持续存在。我们都是它的一部分；正是我们的想法、感觉和行动，使得它得以维持下去。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要留意我们是怎样去做这些的。我们在有意无意间会将什么样的观念传递给别人？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支持了哪些习性、惯例和制度？我们又反对哪些习性、惯例和制度？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社会世界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是怎样促成它的形成的。

对社会世界的构建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看到改变它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认可不同行动的可能性，选择不去支持那些是有害的或不公道的社会安排。不一致的后果也许是严厉的，但是我们不应假装我们没有一个选择可以作出。唯一我们真正没有选择之时，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可以作出选择。一旦我们意识到采取不同行动的可能性，再去说"我别无选择。我只能那么去做"就是不够诚实的表现。实际上我们真正想说的是，"因为选择X行动的后果是我不能承受的，所以我宁可选择行动Y。"我们往往很难这样去说，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负起责任。

我们作为个体所做的，并非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影响。我们的抵制行动通常看来似乎并未被人注意。但是，这个世界正是通过无数个小行动被重造起来的。

假设你意识到有些文化习惯（比如，丢掉还能用的玻璃瓶）会危害环境。那是你的一个问题，你可以寻找一个解决它的方式、一种不同的行动方式。如果你为那些与你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循环利用。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人都开始按照这种不同于先前的方式行动起来，这样一来，社会世界也就被改变了，即使它是循序渐进的和一种小的改变方式。可能在某一点上，平衡会突然被打破，发生倾斜，这时就会发生急剧的变迁。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展开的。

社会世界的形成，始终是一个集体的产物；单是我们自己，我们既不能造出

也不能再造出任何社会。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解决办法多与他人交流沟通，以使其为他人所欣然接受并乐意采用。只有通过关注他人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展示给他们看可以如何不同地行事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才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变迁。换句话说，我们的力量在于通过我们的言行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以便能让他人看到采用不同方式做事的益处。

这里看上去可能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我说关于社会世界的每件事，都是共有的信仰及按持续不断的旧有方式一起做事的人们行动的结果。这看上去几乎没有个体主义的立足之地与容身之处。可是在谈论世界形成和变迁时，我却又强调了个体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它怎么会是两种方式呢？如果人们必须调整自身以适应已经确立的文化习惯和其他社会安排，如果他们如此深刻地为这些习惯和安排所塑造而成，他们又怎么可能会作出反抗呢？

首先，人的心智是难以控制的。他们不像计算机，你让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心智会产生想象、期望和陌生的、预料之外的冲动。这些心智的产物，是不满情绪、抵抗、创造性和变迁的种子。毫无疑问，你可以在脑子里想起你渴望得到的东西、情景和经历——那些在你现在的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你的心智随时都可能飞出日常生活之外，创造更多的对某些东西的期望——像比你现在所享有的更快乐、更有挑战性、更满足。你的心智，以及所有其他人的心智，都倾向于对现存的东西产生不满，就是因为你能想象出一些更好更完美的事物。

当人们分享他们对现有事物的感受时、分享他们对什么应该存在的想象时，他们经常会意识到在这之前他们没有看到的问题——或许是因为此前他们一直将其视作是理当如此。这类对话能够创造出一种大家普遍认为问题早就存在的认识，即使以前没人将其看得那么清楚。如果人们能够接着说“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否能解决这一共有的问题”，并开始设计一种大家一起做事的新方式，社会世界其实就已重建起来了。

因此，这是真实的，即大部分时候我们必须调整我们自身去适应跑在我们前面的社会世界，但即便是在我们学习调试——部分是通过发展心智和与人和睦相处的能力——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培养一种再造世界、让它来适应我们的意愿和能力，哪怕一开始只是少许。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人类既是社会的

产物，也是社会的推动力。虽然我们是由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塑造而成，但我们，我们每个人，仍然是在人世间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观念和情感在一个能够采取行动影响他人的身体里发生冲突。并且那就是变迁是怎样促成发生的。

一个学生曾说："把世界看做是人类创造的，会消解掉这个世界所有的魔法和神秘之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毫无什么特殊之处。"在他看来，要是有超自然力量隐藏其后，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充满奇迹和特殊感觉的世界。我说，我很想知道某些人为什么需要相信超自然的东西。我说，我对人类创造诸如此类事物的能力感到惊奇。我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奥秘，即在一个科学时代，人们怎么可能仍然相信鬼神的存在。其实我真正想要说的是，社会世界完全可以通过采用新方式变得引人入胜，如果我们留意它的形成过程，尤其是留意那些将人们卷入其中的不合情理之处及自相矛盾的地方。

也有可能我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社会世界是怎样形成的，但却仍然没有看见所有应该看见的东西。在街道拐角处、在我们的背面、或是在我们的脚下，总是会有一些新东西。我们经常是急急匆匆忙于生活，以至于没有看到我们正在促成发生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够花费明天的时间来试着理解我们今天所做的。关于社会世界，总是有更多的分析思考要去做，因为生活永远跑在我们理解它的能力前面。

因而，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不是一种用来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就好像所有事情都很容易被一眼看透一样。更深入地了解世界形成的过程、更好地理解社会世界作为一项人类成就的本质，是一条可取的道路。即使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理解、弄清真相，但是通过这样去做，我们能够过上一种更开心、更有责任感的生活。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怎样再造这个世界，使其变成一个大多数人都能过上好生活的地方。

没有终结的对话——克服单向度思维

我听说，有些人非常厌烦社会世界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这种观念。有人告诉

我，一名学生甚至拒绝考虑性别是社会构建物这一观念。我猜想，这一抵制来自一种期望，即相信我们的社会安排——尤其是那些关于性别、性、种族和社会阶层的社会安排——是由上天决定的。我确信，对某些人来说，想到他们关于超自然物的观念与他们关于衣服、电影、音乐的观念同样是由社会构建的，确实会吓一大跳。

上面所说的，都会在本书其他地方提及或暗示到。这里我单就为什么某些人很难看到社会世界是人为创造的这一点作出解释。同时我也提出了一个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

假设你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单一文化之内，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如果事情一直都是这样的话，那么看上去人类文化就是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很难去理解和接受人们创造出来帮助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的多种多样的信仰和实践。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看到或了解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范围，那么看上去这个世界也就没有多少多样性。这一信息缺乏，很可能会使人们更难将自己的文化看做是一种创造物，就像所有其他人的一样。

古往今来已经出现了多少人类文化？对此我们尚不能太确定，因为有许多文化都没有被记载下来。而且答案也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定义“文化”。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已知的人类历史，一个比较保险的答案是“上千个”。今天我们拥有大约 300 个确定的文化的信息，这些文化一直由人类学家在现代进行研究（你可以在图书馆或互联网上查阅“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单是知道存在或者说已经存在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就值得那些认为他 / 她自己的文化代表了全部可能的人类文化的人认真反思。

有些人可能会为信息或经验缺乏所引导，而低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但是，有时权力也会低估文化多样性。考虑一下美洲印第安人的例子。

如果我让生活在美国的多数非印第安人告诉我，在前哥伦布时代他们眼里的印第安文化是什么样的。他们大概会提及用羽毛装饰的头饰，挎着弓箭，骑在马背上追捕野牛，生活在圆锥形帐篷下。对许多非印第安人来说，这一想象就是他们知道的所有的。然而，这却是一种狭隘的刻板印象，源自好莱坞电影对 18 世纪平原印第安人的描绘。甚至是那些宣称尊重印第安人环境及精神智慧的白人，

往往也错误地把所有的印第安人视作一个集体混为一谈。

实际上，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文化多样性（不仅是过去的，也包括现在的），要远远超出多数非印第安人所能理解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定是，在前哥伦布时代，生活在今日北美这一广大地区的当地人们所讲的不同语言约有 300 多种。可以说，每种语言都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文化。我们也知道，横跨整个大陆，土著人民的经济、宗教、政府和其他风俗也都相当不同。这一多样性，至少像欧洲人内部的多样性一样多，然而，在“印第安人”这一标签下，它们全都消失了。

假设我问今天存在多少印第安部落。许多非印第安人也许会说“12 个”，即使他们说不出其中的几个名字。其他人也许会猜得更高，或许是 20 个。一些人甚至会高估到 100 个。但即便是 100 个，也还是太少。美国政府正式承认的部落有 560 个，另外还有 400 个未被识别出的团体和民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部落都很大，但是，截至 2000 年人口调查，有 30 多个部落拥有超过 8000 名成员。

我曾在课上提出这些问题，因此我知道许多非印第安人猜测的都太低。甚至是那些声称其祖先有可能是土著印第安人的人，往往猜的数目也低。那么，所有这些都与权力有什么关系呢？

在第 10 章，我将会谈论更多关于权力的问题，这里只需简单指出一点，即我所说的是群体的政治及经济权力。欧洲人民，那些共同定义自身为“白人”的人，要比美国历史上其他群体有力量得多得多。这一点在前面的例子中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属于占主导地位群体一员的特权者，并不必须去对那些属于弱势群体的人了解更多。因而，在历史上，白人经常不会注意那些不被归属于“白人”群体内部的差异。

因此，多数白人很少了解存在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的多样性，也就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除了无意间从电视或电影里学到的那些东西，白人并不愿去过多地研究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这并不是因为白人个体比较懒惰。这是一个群体支配另一个群体时通常都会发生的事情。弱势群体的人性经常会被涂抹掉，整个群体（其内部像其他群体一样充满了多样性）被缩减成一种刻板印象，并且因为占据主导地位群体的文化趋向于将社会当做一个整体来塑造，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不仅仅是白人，都对北美土著居民的文化

多样性仅有这么一点少得可怜的知识的原因所在。

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要说明，为什么一些人很难看到社会世界是人们制造出来的。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结果就是，有权力的人或特权集团，因为他们很少有动机去研究自身之外的人们，经常会对人类多样性仅有很有限的认识。在他们看来，每个人（或者他们关心的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结果不只是缺乏关于他人的知识，更缺乏一种关于自身文化的视角。正是这一视角的缺乏，支持了一个人自己的文化是上帝赐给的礼物、而非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人为了生活而设计出来的这一幻想。

北美印第安人的例子，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不论什么时候，当我们在群体内部看到巨大的权力差异时，我们都应怀疑有一个与此相似的过程在那里发挥作用。考虑一下美国人通常对第三世界国家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了解得多么少。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权力（或是处在权力帝国的核心）是怎样滋养助长了无知。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意识到这一倾向并会努力弥补它。这样做，我们就能要求拥有我们的权力，去创建一个不同的社会世界。

关于常识的注解

我以前曾听人说过——并不是一种赞扬——社会学不过是些常识。其声明是，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怎样进行社会学思考。在我的观察中，这并不是真的。人们能够具备这种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其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的实践智慧（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某人具有常识的意思所在），但却并没有以一种社会学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

例如，许多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人都学到这样一个常识观念：机会应该对每个人都是均等的，并且所有的成功都应靠智力与勤奋来获得，因为个体的优点将会被识别出来予以公平奖励。当我讲授不平等课程时，在开课伊始，我经常能从学生那里听到这样的说法。

但是，当我们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不平等时，学生们就开始学会，儿童们是怎样在极其不同的资源条件下（这些资源条件取决于他们的家庭所处的社会阶级

地位）开始步入生活的；就业市场的金字塔形状如何使得每个人都力争超过别人成为可能；权力集团如何占有许多机会；网络怎样限制了对超过别人的信息的获取；以及开发一个人的能力、展开竞争和被人记住的机会，如何取决于那些我们对其没有什么控制的先决条件和过程。

用社会学术语来说，考虑不平等，就是对常识的一个挑战。了解一下社会世界的构建，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社会学思考和常识既有重叠之处，也有相互冲突的地方。如果给其下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对任何事物具有意识，就意味着超越常识性的知识。

从前，常识告诉我们地球是平的并且位于宇宙的中心。今天，我们则知道得更多（事情并不是这样）。但要取代根深蒂固的常识并不容易做到，因为常识经常因其令人感到安慰的价值而非其真理性而为人们所乐意接受。这也就意味着，不论何时，当一种实证主义、分析性的视角——像社会学——把常识放到检验台上时，出现压力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三思而行

1. 前面我引用“不可杀人”的观念，作为一个使得与他人一起生活非常安全的准则。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即便是在人们声称赞成这个想法的社会，也会有杀人的事情发生。有时这会发生在出现危机的时刻，当人们感到他们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或是在极其痛苦的片刻，当人们失去他们的理智时。在美国，当一个人因为犯罪而被判处死刑时，它也会以一种冷酷无情和精心策划的方式出现。什么样的观念可被用来为破坏“不要杀人”的诫命进行辩解？为什么一些人会相信政府杀人是好事，即使他们的宗教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去做？

2. 许多人仍将性别看做自然地扎根于男性和女性身体之间的区别。当然，身体上的不同，确实会导致功能上的不同——只有妇女能生孩子。这一人类生物学上的基本事实，很可能会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些部分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考虑一下这一情况怎样与具有社会学意识不相符合。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点，因为许多有关生物学与社会行为之间可能的联系的观念，都有可能被用来为统治和

剥削进行辩解。关于性别（或性、种族）的生物学基础的流行观念，是怎样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的？谁会从类似这样被广泛接受的观念中得到好处？

3. 科学家过去曾相信，物体燃烧时，会释放一种叫做“燃素”的物质，可以看见火焰。医师过去曾相信，疾病是由情绪失衡造成的。生物学家过去曾相信，物种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有新物种出现。地质学家过去曾相信，大陆没有移动。多数人过去都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现在知道，所有这些过去曾被许多人包括许多有知识的人所接受的想法，都是不真实的。现在流行的关于“人性”、社会行为或社会世界的观念中，有哪些有可能会在 100 年后被放弃？你觉得这会怎样发生？

相关读物

Becker, Howard S.(1986). *Doing Things Togethe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erger, Peter, & Luckmann, Thomas.(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uglas, Jack.(1970).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Chicago: Aldine.

Fausto-Sterling, Anne.(2000). *Sexing the Body*. New York: Basic.

Fenstermaker, Sarah, & West, Candace, Eds.(2002). *Doing Gender, Doing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Kuhn, Thomas.(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tour, Bruno, & Woolgar, Steve.(1986).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rber, Judith.(1994). *Paradoxes of Gend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Omi, Michael, & Winant, Howard.(1994).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Schutz, Alfred.(1932/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3
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

有一次，一个学生说："我相信传统并认为在家里应该是男人说了算。"

在这之前，这名学生说她想当一名公司律师，因此我问她是否期望在工作岗位上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那还用说。"

然后我问她："如果他们习惯于在家对待女人就像一个附属物一样，你不觉得让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平等对待你会很困难吗？"

她一脸困惑，但是另一名学生明白了我想要说的意思，就对她说："想想你的丈夫。如果他习惯于在家将你当附属物对待，那就也会是他在工作单位对待女性的方式。"

另一名学生说道："如果你在一个男人说了算的家庭中喂养男孩子，等到他们进入外面这个世界，他们就会认为凡事应该自己说了算，这样就可能伤害到女性。"

另一名学生则尽力作出总结："如果妇女安于家中的不平等，她们就永远不会在工作上、政治上获得平等。"

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理解我们在生活中某一部分的行动，怎样是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起因和后果。在上面的例子中，第一名学生没有理解接受家里的不平等怎么会阻止她和其他女性在工作中获取平等。她没有充分意识到，家庭生活与工作生活怎样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她在一个领域的行动会在其他领域产生未预期的后果。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基于不同的原因，一些人不想缴税去支持那些帮助穷人的计划。因此，他们投票支持那些说要通过削减花费在福利、教育、公共住房、学校午餐计划上的开支来降低税收的政客们。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认为削减对穷人的帮助是一项卑鄙和自私的政策。但是，无需用那些道德术语来评判它，我们可以问一下这样做是否出于有意识。

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件事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设定利率，以便失业率（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保持在约5%的水平上（实际情况是其两倍高）。这意味着，将会有数百万人，在他们自身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没有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分配给每个人，公共帮助又被取消，极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可能会有更多的犯罪、更多的病症和更深的绝望——所有这些都要付出代价：为更多的警察和犯人支付更高的税收；更高比例的健康保险，以覆盖针对穷人的急救室照顾的成本；更高比例的保险，以弥补更多的抢劫成本；在穷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出现更大的怨愤与恐惧。这样一来，节省下了什么呢？由于我们的社会运转方式，很可能什么也没节省下来，对每个人来说——那些特别富有的人除外——在很多方面都会以很多方式出现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痛苦。

社会学意识并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去制订税收政策。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社会中不同部分间是怎样被连接起来的，我们也就更不可能在如何收取和利用我们共同的财富上作出浪费性和破坏性的选择。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当我们为某类事情支付较少时，我们很可能正在创造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最终会迫使我们为另一类事情付出更多。

社会学意识意味着，采取一种更大更广泛的看问题的视角。例如，在税收和公共资助（public aid）的情况下，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看看我们的联邦预算在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上的花费有多少，这通常仍被称为福利（不到2%）；再看看联邦预算在军事上的开支有多少（约30%，具体数字取决于什么被算作军事）。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是每年把数十亿美元都用于建造军事武器上，实际上有充足的财富来提供可以供所有需要它的人所使用的食物、住房、教育、健康医疗及其他东西。

除了对有时研究问题有所帮助，看到问题是怎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也很重

要。考虑一下学业失败的例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孩子和少年在学校学习不好或是中途辍学？通过了解学校内部发生了什么，仅能找到问题答案的一部分。要理解学生为什么在学校学习不好，我们必须看一下学校是怎样与更大的社会联系到一起的。

处于饥饿或疲惫状态的学生，不可能在学校做得很好。为什么他们会处于饥饿或疲乏状态？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负担不起充足的食物，没有安静的住处。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那里找不到足够的好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雇主想要保持高失业率以少发工资多赚取利润。缺乏工作可能也会挫伤人的动机。如果学校让人厌烦并且上出来也不能找到一个工作，为什么还要待在学校呢？另一方面，也存在另一种联系——学校让人厌烦，也许是因为老师工资太低、劳累过度、疲惫不堪。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或许是因为那么多的钱都花在了制造杀人武器上，而不是教育上。

学业失败问题，远比我在这里分析的要复杂得多。但是关键一点在于：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它产生于一个相互连接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把学校、学生、老师、家庭、企业和政府全都连到了一起。要想彻底了解问题，我们必须追踪这些连接。简单地将问题归因于学校内部发生的一些事情，或是像一些人做的那样，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学生内在的缺点，都不会对解决问题有太大帮助。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就是发现我们想要理解和解决的不论什么样的问题的根源。

这里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工作中的平等和家庭里的平等之间的联系。如果老是在家里做一些清洁、干洗、儿童抚养之类的次级工作，妇女不可能在工作单位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一个他的妻子替他做这些家务杂活的男人，或是一个不做他分内应做的家务杂活的男人，可以更加自由地把自己投入工作中。随着这一自由转换成更高的收入，一个男人就会期望并会在家里获得更多的权力，因为他的工作已经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连接现在开始以两种方式发生：在家里稍稍多占一点权力（源自关于性别分工的旧观念），能给一个男人在工作中一种优势，这一优势，随着时间发展，又会反转过来增强他在家中的权力。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事物，暗示着，要想减少两性间的不平等，我们必须解决在不同的但却又有很深联系的生活领域中的不平等。

意识到未预期的后果

或许你会认为,"家庭不平等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两个人都忙于追求自己的事业并都干得很好，他们完全可以雇个人来帮他们做家务活。"这是一个很好的不是解决办法的办法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否能意识到未预期的后果是怎样出现的。不过，在看这些后果之前，我们必须先看一下这里面存在的联系。

显然，在夫妇的收入和雇用佣人这一行动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只有高收人的人才能这样去做——雇得起人。在缺乏工作机会与佣人的可得性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间的联系。如果有能够提供好薪水和工作环境的许多工作，很少有人会愿为了谋生而去清洗他人的厕所。这是一些比较明显的、容易看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其他一些内在的联系，则更难看到。

要看到这些联系，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多数佣人都是妇女；其次，当一对夫妇决定雇用一个佣人时，通常都是因为夫妇中的妇女不想做那么多的家事。就像前面说到的，因为夫妇中的男人拒绝做家务活中本应由他承担的那一份，所以这种情况通常更有可能发生。如果他做了他应做的那一份，也就没有需要佣人的机会。

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呢？是否有真正的变迁发生？并没有太多。这里并没有对"家务活主要都是女性应干的"这一观念发起挑战。仅仅是换了一位不同的女性来完成工作而已。这对夫妇只是用他们的一些收入来把不平等的重担转嫁到经济上更贫穷的女性身上。结果可能是，这对夫妇在家事方面有更多的平等，但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不平等却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加深。如果这对夫妇是白人，佣人则不是，事情就更是这样了。

如果清洁工（收拾房子的人）是一个男人，情况也并不会有太多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家务活是女人的责任"这一观念，没有被明显地强化（不过，通常都是夫妇中的女性决定雇用一个清洁工）。但是，仍然得到强化的却是不平等是好的这一观念。这里，事情又一次重现：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的人来清扫他人的卫生间，他人则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去做更多的充实或丰富自己生活的事情。

通过这一安排传达的消息是："我正忙着挣钱，没工夫清理我自己的垃圾。其他人，那些钱不多的人，应该替我来做那项工作。"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一套使不平等看上去可以为人接受的观念的联系。一个这样的观念是：有钱人有资格雇用他人来为自己干一些脏活累活。他们会利用这一观念（哪怕是隐蔽地）来为雇用清洁工进行辩护，来肯定不平等的正当性。这也就好像是说："财富决定人的价值，因而一个有着我这样的财富和价值的人，雇用一个价值较低的人来为我干些清洁工作，是很好的。"雇用清洁工的父母会把这一原则教给他们的孩子，孩子们则会学会家里非常富有的人不必承担清理他们自己造成的混乱不堪或不整洁的责任。

男人们可能会使用这些同样的想法争辩说，他们不应该去做这些肮脏的工作，而是应该腾出更多时间去做一些"严肃的"工作和出去游玩，因为他们挣钱更多，因而也要比其他人（通常是女性，她们挣钱较少）更有价值。这里的联系是两种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不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一种是性别上的）的持久化。这两类不平等被联系到一起，是因为有一个相似的信念——什么决定人类的相对价值——构成它们的基础并支持它们。

社会学意识可以把这些联系揭露出来。我们努力想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用来证明其正当性的观念，是如何因为社会世界的运作而可能产生预期和未预期的后果。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充满如此多的不平等，雇用清洁工的意义和后果也许就会与现在大为不同。

分析道德问题

当近在身边的问题激起强烈的情感，意识到彼此间联系的需要就会增加。堕胎是一个好例子。为了更好地看到这一点，我将尽力阐释社会学意识，如果你能——哪怕只是暂时地——把你对这一问题的情绪放到一边，它就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尽可能地把问题放入一个心智的分析框架。

反对堕胎的人相信，胎儿是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并认为堕胎是一种谋杀。支持者则相信，直到胎儿能在子宫（它是妇女身体的一部分）外生存，才能算是一

个孩子。依照这一看法，堕胎是妇女具有控制其身体和生活权利的体现。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堕胎并不仅仅是关于作为个体的妇女控制她们身体的权利。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是怎样运作的，我们就能看到这里面有更多的风险：限制堕胎并不可能使妇女达到与男人平等。

如果妇女被迫成为母亲，她们不可能竞争到与男人一样的平等，男人不需要担心自己会怀孕，或是有扶养孩子的义务，而这则会妨碍女性在工作和政治上获取成功。缺少决定是否要孩子的自由和照看孩子，使得妇女处于一种不利地位。通过禁止堕胎迫使妇女成为母亲，也强化了成为一个母亲是女人最重要的角色这一观念，并暗示：女性最好是老老实实生孩子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制定法律或经济政策。

这里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联系。如果妇女不可能得到安全、合法的堕胎，她们就会冒着受伤和死亡的风险，在不安全的情况下得到它们。当堕胎被禁止时，实际情形一直都是这样。当禁止堕胎时，这不仅意味着女性的意愿而且也意味着她们的安全被漠视了。像这样的一个政策，就传达了关于女性地位和价值的信息。实际上这也就是在说，女人不应该抗拒成为母亲，对社会来说，比起她们带来的胎儿，她们更不重要。

否认女性有终止妊娠的选择，以另一种方式与不平等联系到一起。限制堕胎的政策，暗示妇女在这些事关个人生死的事情上无法作出明智的抉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妇女确实无力处理男人关心的更大的生死之事，例如决定是否发动战争和杀害成千上万成年人。限制堕胎不仅妨碍了妇女与男人竞争的能力；它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在处理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时，妇女在道德上和智力上不能与男人相提并论。

或许这听起来有些像是为堕胎作出的一个辩护。但实际情况并不必然如此。我们是以堕胎为例来说明实践社会学意识的一种尝试，以便看到更多的事情的正反两面或成败得失。这一看问题的方式，并不必然导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堕胎就是对的。例如，你也许会相信，堕胎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措施，因为它强化了一种不便的生活（像一次性尿布），并且这样一种态度从长远来看将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价值观上的差异，也会导致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你也许会相信，比起一名成年妇女，胎儿不需要顾及道德；并认为限制妇女的自由，是保护胎儿“生活权利”应该支付的合理成本。如果这样，你可能会认为禁止堕胎或宣布堕胎为非法是件好事。但是，不管是通过哪种方式得出任何合理的和负责任的结论，一个人必须意识到堕胎和女性的自由及平等间的联系。

在寻求道德问题的解决办法时，社会学意识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更多必须被考虑进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主要是我们要尽力看到我们的行动——考虑到社会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和行动的后果之间的联系。堕胎的例子表明，以这种方式具有意识，需要具备一种意愿，即不论我们喜欢与否，都应带着一种客观的态度去看待社会世界是怎样运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作出道德判断时可以忽视我们的良心。它意味着也要利用我们的头脑。

理解标志

社会世界里充满了被称作标志的各种符号。像所有的符号一样，标志暗示、指示或代表了其他一些事情。学会看标志和读标志，是学会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要从社会学角度来阅读或解释标志，就是看它与社会世界如何运作某些方面的联系。

例如，想象在一个许多穷人居住的区域有一条未铺砌的路。这条路就是一个标志。它暗示了生活在附近人们的贫困和手无寸权。当然，这只是许多解释中的一种；我们可能会想要检查一下看看这是否是真的。但是按照我们的社会运作方式，它却是一个有道理的解释。我们知道，人们通常都会喜欢拥有走起来很好走、铺得非常好的路，并知道管理修路的官员通常都会对那些有钱人反应热情。这样来看的话，没有铺砌的路也可被看做国家政府如何运作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去阅读标志，这条路还能暗示我们许多别的事情。

有些标志则与人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学会将汽车、衣服和房子视作一个人拥有财富多少的标志。我们学会将人们的行为视作其性格的标志。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拥有关于社会怎样运作及人们为什么会照他们做的那样

去做的观念。这些观念允许我们看到标志与其他情况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我们拥有这样的观念越多，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联系。如果人们看不到与我们相同的联系，那就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有着不同的观念。

社会学意识并不会直接告诉我们一个标志是怎样与其他情况联系到一起的。它也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的标志。具有社会学意识仅仅意味着，尽可能看到情况、习俗或事件是怎样成为指向其他事物的标志。我们可以通过养成一种提问的习惯来做到这一点，即询问“这一情况、习俗或事件意味着什么？它暗示了其他什么样的现实？它能说出关于我们社会本质的什么？”我们得出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世界怎样运作的知识。

不明显的标志

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都会学会阅读他人的行为、外表和拥有物，将其作为他们性格和财富的标志。这是一个基本的解释性技巧。但是，社会学意识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看得更远。过去看上去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事物，可以得到近距离的考察并追问它们的意义。通过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社会学意识可以放大我们所做解释的力量。

这里是一些可被视为标志的安排、习俗与情况的例子。我的解释，是在我对社会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基础上作出的。你对社会世界怎样运作的想法也许会与此有所不同。如果那样，我的一些解释将会显得非常奇怪。这是件好事。你不必按照我所赞赏的方式去理解一个标志。关键是养成一种习惯，把组成社会世界的部分视作一种标志。

前面我曾提及，我们共有财富的巨大份额，都被花费在制造杀人的工具上和训练人们去使用这些工具上。你会认为这一境况是残暴的、仅仅是不幸，还是相当好？在这里，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并不重要。我仅仅是要求你考虑一下，我们使用我们共同的财富去杀害或准备杀害其他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它表达了关于我们所处社会的什么见解？它表达了关于我们作为人的什么见解？

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一种见解，即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富人和有权势的人，通过创建有良好装备的军队，来让自己变得更富有更有权势，

掌控获取原材料的门路，使得交易市场一直处于开放状态。它表达了这样一个见解，即认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许多人都感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是强烈地抵抗压迫和剥削。它表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某些人感觉他们有资格去剥削其他人，只要他们有权力这样去做。我认为，它也表明，我们大多数人都害怕抗议使用我们共同的财富去创造巨大的暴力工具。

“军费”可以从不同方面去理解。你也许会不同意我所认为的它代表了什么。我要再次说，这是好事。关键是不要将其视作理所当然，而是要将其视作我们的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一种标志和后果。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可以将“军费”看做理解其他社会现实的一个入口。一旦打开这扇大门，我们就可以追踪彼此间的联系、谈论它们将会引领我们看到其他别的什么。

这里有另一个例子。今天我们许多市中心区的情况都是很悲惨的。许多工厂都已搬迁到更加有利可图的地方。因而，好工作比较缺乏，失业率很高。由于许多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市中心区的住房条件正在恶化，吸毒和街道罪行频繁发生，婴儿死亡率极高，学校情况非常糟糕，并且好的医疗保健难以找到。居住在这些区域的许多人，都是少数种族群体的成员。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市中心区的背景条件是一个我们的经济如何运作的标志。当在别处开设工厂更加有利可图，事情就会照着那样发生，不管对被留在原地的人们会产生什么后果。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不同的标志。如果我们能够超越城市本身置身其外，我们就能看到它。考虑一下多数美国白人会对市中心区的条件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最显而易见的反应就是责备穷人，坚持认为他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去工作，并会中断公开援助。但是在美国白人中出现的最普遍的反应则是漠然置之。多数美国白人都不会呼吁，应该作出更多努力帮助生活在市中心的穷人。多数美国白人似乎都仅仅是期望问题会自己产生又自己消失。

这种缺乏同情的意义是什么呢？它表达了关于美国白人的什么？它可以被视作种族主义的一个标示，但是我认为它比那暗示的要更多。它也暗示了美国白人对他们自己经济地位的不安全感；表达了他们渴望相信他们的成就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并表达了他们的无能为力感——当轮到需要花费大量我们的共同财

富去解决问题时，在这些共同财富的使用上，我们并没有采取民主控制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标示就是没有采取的行动。如果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某种事情的缺失也可能是一种标示。

作为标志的社会组织

我们组织自己完成任务的方式，也可被视作一种标示。换句话说，我们做事情惯用的方式，把关于我们的消息进行了编码，它们可以被理解成我们所珍视的和我们所担心的种种迹象。比如，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学校教育方式。

我们给每个学生都打分，并坚持认为每个学生都应干好自己的工作。我们把学校同家庭生活区分开来，使老师作为可以替代父母和老板角色的人，把学校的日子拆分成一段一段的时间，给学生课间休息时间和假期，使学生遵守秩序规则（如果你想发言先要举手）和惩罚违犯这些规则的学生。这些实践告诉了关于我们的什么呢？我认为，它们表达了，我们（或者至少是组织学校的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把学生变成一个好的工人。

学校教育所做的，远多于传输知识和基本技能。我们的学校教育模式，教给学生要成为有竞争力的个人主义者，要接受阶层制和权威命令，要遵循规则，每天都要早早起来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工作。学会接受这些生活规则的学生，能够迅速适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采取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作世界。如果学校是按不同于现在这种方法——如更少的阶层制和专制主义控制、更少的按照钟点行事的生活规则和管制、更少的竞争、更多的对学生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的关注——组织起来的，学生可能就不会对雇主的要求适应得这么好。

我们是否真像我们所宣称的那样重视创造性、独立的道德评断和批判思考呢？已经被编码成我们学校教育模式的答案是“否”。即使一些人（包括许多老师）会比雇主重视不同种类的知识、头脑技能和思维习惯，多数学校教育都是被组织起来创造好的工人，而不是艺术家、社会批评家和政治活动家。这一事实，一般来说，可被看做雇主（说得更广点就是商业）权力如何影响我们安排我们的社会中那些看上去是非经济活动的一个标示。

让我提出其他一些可被看做标志的事物。你可以试着按照自己的看法去理解

它们，追问一下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所暗示的其他现实是什么，以及它们表达了关于我们所处社会的什么本质。

- 暴力电影和体育运动的流行性
- 财富 500 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妇女所占的百分比非常小（1%—3%）
- 电视台拒绝刊登避孕套广告，甚至是在艾滋病泛滥期间
- 许多人都有的对演员和其他名人生活的强烈兴趣
- 电视新闻节目的模式
- 持续广为传播的宗教信仰
- 许多中产阶级人们使用的改变情绪药物，例如酒精和尼古丁
- 竞选期间政治候选人相互“辩论”和互相回应的方式
- 45% 的美国人不读书

你可能会将这些条目仅仅看做是一种好奇，而不想赋予它们别的意义。不过，如果践行社会学意识，你就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入门，在其背后存在着与社会世界中其他方面有趣而复杂的联系。

与过去的联系

如果你喜欢沉思过去，或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你不一定非要去博物馆。实际上，你已经置身在一座博物馆中。过去已经凝结成所有围绕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衣裳、我们说话的语言、我们居住的房子、我们欣然接受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生活习俗，全都是过去遗赠给我们的。当然，我们确实也可以改变这些事，但我们并不是从最初起源的地方开始。

当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时，我们会尽力看到过去如何把我们带入现在这一时刻、现在这一时刻又告诉了我们关于过去的什么。我们可以把这称作“尽力看到历史联系”，或是“回顾过去看看今天的事情是怎样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这也就像是把现在的事物看做是过去的一个标示，尽管现在的事物并不只是暗示或指向过去——它们承载着它与自己同行。

如果我们考虑物质对象，例如衣物和建筑，这一点看起来似乎非常明显。我们穿的衣裳和我们穿衣服的方式，显然是一个传统问题。我们的建筑以及我们建筑它们的方式的情况同样如此。食物也是一个好例子——每顿饭，我们都会接触到过去。这些对象将过去与现在紧紧地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着它们说："这是很久以前完成这些事情的方式。并且看见了没？我们今天仍在用同样的方式做着这些事情。"在这些事例中，过去存在的证据直接就可看到。

知识本身就是生活在我们头脑和习性里的过去（的再现）。今天的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和做我们所做的，是因为在我们之前数千年前的其他人已经了解了这一些。这一点现在就可得到证明——我在写，你在读（稍微晚一点）。我们的语言——每个词、每个语法规则——不仅把我们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我们与一个共同的人类过去联系起来。

现在与过去相联系的想法，也许看上去非常显而易见。不过，人们经常看不到这一历史联系——有时则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例如，许多美国白人会说："种族主义是过去的问题。现在歧视是非法的。现在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点。因此，我们不需要为少数民族提供平权行动或特别计划。"像这样的声明，就抹掉了与过去的联系，就好像美国白人在奴役黑人数百年间积累形成的权力和特权，从来都不存在一样。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过去，妇女一结婚就会放弃她们原来在自己家的姓，改采她们所嫁丈夫的姓。这一实践表明，一名妇女，作为财产的一部分，从一个男性（父亲）转移了到另一个男性（丈夫）。男人则没有更改他们的名字。男人是所有者，而不是财产。

今天，我们反对将妇女视作财产的观念，可是这一改随夫姓的实践仍然持续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是因为许多年轻女性没有看到这一实践与过去的联系。如果这样的话，她们也就不会看到更改她们名字的意义所在。她们没有看到，放弃她们的名字——极少会有男人这样去做——会使一个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相同的观念得以持续存在。这一观念是：女性的身份确认，取决于她与一个男人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要肯定女性的价值和平等，拒绝现今依然存在的那些具有压迫性的旧实践，似乎是一种比较明智的做法。

改随夫姓这一例子表明，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上如何具有社会学意识。它不是说上一句“过去形塑了我们今天如何思考和行动”就足够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但是我们必须走得更远。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应该询问：“这一实践源自哪里？它是为谁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些问题可以通过了解过去作出回答。寻找答案，不仅仅是满足关于逝去时间的好奇心。它也是为了尽可能更好地了解现在正在持续进行的事情。

深入现在

对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具有社会学意识，也能引导我们提出更好的关于现在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询问任一传统观念、习俗或社会安排——“它是否在今天还服务于它最初的同一个目的？它是否在某方面有些功能失调？如果那样，这一传统为什么会一直被保存下来？谁会受益于这种传统的延续——是与过去一样的那些人吗？这些年来传统都是怎样发生改变的？为什么会发生改变？”

提出这类问题，使得现在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有趣。发现答案也能帮助我们接受社会世界的构建。通过了解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人们最初想要构建的，会随着时间变化发生极大的改变。回望过去，也能帮助我们看到，意外情况（一种对未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情况的混合）会怎样影响社会世界的形成。

在前面早些时候，我曾使用了奴隶制和白人拥有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巩固的例子。我曾说过，这一过去形塑了我们的现在，否认它是愚蠢的和错误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争论的余地——这一过去如何形塑我们现在的哪一部分。进行这类询问和对话，是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

另一个意识到现在中包含着过去的方式，涉及倾听过去和现在他人的声音。特别是，我们应该明了过去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激发的情感。问题不在于人们关于过去的观念是否正确，而在于，人们对过去的情感——无论这些情感可能是以什么为基础——怎样影响他们现今行为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奴隶制的例子。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它是怎样影响到当今美国

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权力平衡。这是要做的一个重要分析。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奴隶制作为我们过去一部分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过去中的这一部分对今天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些意义会影响黑人和白人怎样和平相处。如果我所属的民族被你所属的民族奴役上百年，然后——大约 150 年后——你告诉我："噢，那没什么大不了，它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你放心，这肯定会影响我对你所抱有的情感。

理解人们怎样定义过去，以及他们对过去的感受，是理解过去与现在之间联系的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是要我们看到另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过去（的事情）在我们内心存活，并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某些东西将会持续下去。下面是另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谈起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当时，很快我们就要去那里参加一个会议。每个人都说这座城市怎么怎么好。一个人说："它在内战中着火 (it burned) 后，他们重建这座城市是件让人惊奇的事。"我们几个人中的另一个人，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女士接道："亲爱的，亚特兰大自己并没有在内战中烧毁，它是被烧毁的 (it was burned)。"她的意思是想提醒我们，一个可怕的事件并非简单地发生，而是一支北方联军部队凶猛地攻击了她的国家的一部分。她的评论使我很是惊奇，因为我是在这个国家北部长大的，从未遇见任何人带着这么强烈的情绪去谈论内战。在这一场合，我们的交流沟通，无疑受到了源自赋予 120 年前那一事件意义的情感的影响。

为了保存过去的某些特定部分，我们可以争论它是好是坏、有用没用。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在没有意识到他人赋予过去的意义如何影响他们赋予现在事物的意义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很好地与人共处。我们一定也要意识到，人们是怎样得知过去并像他们做的那样去定义它的。要了解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把一个人与其过去联系起来；要了解我们自己，同样需要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能或没有看到这些联系，现在看上去将会仅仅是直接跌入未来。现在的一切，可能看上去就像是环境的一种随意配置。实践社会学意识，是打消这种幻觉和发现现在与过去之间正确联系的一种方式。它是避免重复过去犯下的

错误和看到什么时候旧的危险又以新的形式出现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

没有终结的对话——小事和大事

一直有人跟我说，女性结婚后改随夫姓是件“小事”，一个人不应该为此不安。在性别语言上，我也听到了同样的论调。例如，当我反对用“新生”(freshmen)这个术语来称呼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的大一新生这一群体时，一直有人告诉我，这是件小事，不值得当回事。毕竟，没有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会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呢？

为之烦恼的主要原因曾一再被提及——惯常的做法可能是有害的，不管人们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因此，使用带有性别歧视术语的人们是否并未打算伤害他人，并不是真的很重要；多数人都不会故意想去伤害他人。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惯常做法是否极有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应该为之担忧。

你可能想要知道，改随夫姓或男性商标的使用——比如，用人类(mankind)、主席(chairman)、新生或“伙计们(you guys)”去指一个混合的人类群体——为什么会导致伤害？在本章前面，我曾说改随夫姓这一习惯是父权制的一种遗留，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被当做财产来对待，即使在今天，这一习惯仍然带有这种隐含的意义。我也认为，那种否定这一习惯的做法，将会是一种象征性地肯定妇女平等的方法。但是，你会想了：“如果一些旧的习惯持续存在，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没人会再真将妇女当财产。”

然而，没人将女性视作财产，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许多男人仍然将妻子和女朋友视作是他们的。如果另一个男人表达了对这个女人的兴趣，就会被看做是一种侵犯，即侵犯了第一个男人的财产权。有些男人甚至会使用暴力手段，来尽可能地强制执行他们想象中的所有权声明。

你可能会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头条新闻“一名男子杀死妻子后自杀”。这些故事经常涉及一名想要尽可能地逃脱一种坏关系的妇女。什么样的观念使得有些男人会采取如此暴力的行动？观念很可能是这样：“如果她不再是我的，如果我

不再能拥有她，那么谁也别想得到她。”这种观念是怎样长期存在下来的呢？可能它们就是被改随夫姓这一习惯做法所微妙地强化而成的吧？

针对妇女的暴力，并不仅限于一些悲剧性案例。性骚扰、性胁迫、性攻击，以及强奸，在美国社会非常流行，而且这些问题也不会在短时间内轻易消失。为什么不会？一个完整的答案可能会相当长，但要说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男人感到自己有权控制妇女、一些男人想要把妇女当物品对待，以及男人使用恶劣手段对待妇女后经常能够逍遥法外这一事实，则是一点不会有错。非暴力的歧视行动，在男人的想法和感觉上与此有着同样的起源。

为了清楚起见，我应该说明，不是所有男人都会对女性采取暴力或是进行虐待，或是将妇女视作物品，或是想要在虐待妇女后尽可能地逃脱惩罚。但是，许多男人的情况都符合这些描述，并且许多男人都是以一种自身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侮辱或不尊重的方式去对待妇女。然而，主要问题是，这一切是怎样变得可能的——在经过数十年的为妇女平等权利奋斗之后，暴力问题和歧视依然普遍存在。为什么妇女拥有充分和平等的人性，没有根深蒂固到对其施加暴力和歧视是难以想象的地步？

再次，一个完整的答案可以写成一本单独的书。这里我只想提个建议，性别歧视语言，那些小事中的之一，与它有关。要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联系的存在。

我会在整本书中一再提及，观念对于形塑好的行为非常重要。我不会宣称任一观念会引致任一行为。那样说未免显得太过简单。像下面这样说则会有更多意义，即一个得到广泛认可和分享的观念指导着人们行动和互动，只要这些观念保持稳定，结果就是稳定的行动模式。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它指导着我们的认知，经常是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引领我们采取特定的行动道路。

由此要问的一个好问题就是：世界观是怎样定型的？部分答案与我们每天使用的语言有关。我们使用语言去表达和定义现实的方式，反映了一种特定的视角。但是，这些说话和写作的方式，不仅仅是反映了一种世界观。它们也把我们与它连接到一起并强化了它。

因此，要是我们日常的讲话和书写方式，使得特定群体的人变得不可见，又会怎样呢？要是我们的讲话和写作方式，暗示某些人（男人）是标准的和正常的——所有人类的代表——其他群体（妇女）则是不同的、异常的或等级较低的，又会怎样呢？或许你能看到我在把你往哪里带。语言并不仅仅是一扇性别歧视世界观的窗户；它是世界和看法不断重建的主要工具。

回到前面举的例子，改随夫姓这一习惯和使用男性泛型，使得妇女变得无形。提到大一新生这个群体（里面有半数是女性）使用“新生”（freshman），就是说（在象征意义上）女性的存在无关紧要。它也是说，同样是在象征意义上，人类＝男性。这一语言习惯由此强化了女性没有男性重要、没有男人那样发展充分、没有男人那样平等的观念。伴随这种观念而来的会是什么样的行动呢？前面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女性不被看做充分的人类、与男人平等的一员，就很容易忽略她们、虐待她们、歧视她们，等等。

这里更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意识到存在于“小事”与多数人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所谓的“大事”）之间的联系。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许多大范围的行动模式对女性都是有害的。这些行为模式通过一种性别歧视观念得到维持（反过来，后者也得到前者的维持）——每天数百次，通过性别歧视主义的惯常做法。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习惯并非小得无足担心。它们是促成更大的问题持续存在的一部分。

当要求人们改变他们的语言习惯时，某些人会充满戒备心态。“你不应该用那来烦我，”他们会说，“那不过是件小事。你应该担心更大的事。”但是我想知道，“如果它真的是件小事，为什么要抵制改变它呢？实际上，为什么不首先改变小事呢？难道这不是最容易做到的吗？”

或许这种防备心态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人们感到自己会被指控故意压迫。如果那样，他们就不会看到，在一个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社会，以一种反映和强化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方式，来补救这种不自觉的说话和做事的惯常做法，有多么容易。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时，没有谁会为染上这种习惯而受到指责，它是一个充满不平等的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一部分。因而，只要我们愿意对这些一直被灌输接受的习惯和这些习惯的后果进行批判思考，我们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有负罪感。

因此，如果我们对社会世界的各个部分是怎样联系的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

就会注意到，看上去很小的一件事，是怎样强化了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渴望改造社会世界，我们可以从容易改变的小事上人手（像我们的语言习惯），然后在更难改变的更大的事情（像对女性的性暴力）上人手。同时在这两方面努力工作，也没有什么矛盾的。我们也应该记住，小的变化，如果它们挑战了一种将不平等视作常规的世界观，就能导致更大的变革。

关于未来的注解

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联系，始终都是存在的，并且任何想要研究它的人都可以对它进行研究。但是，如果未来还没有发生的话，我们怎样才能看到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做不到；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推测或想象那些联系可能是什么。在另一方面，这是我们无法避免会做的。

在日常生活中，不论我们何时作出一个选择，我们都应尽可能地看到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这是尽可能地展望或想象我们的行动后果的意义所在。当我们考虑“做 X 还是 Y 将会带来最好的结果”时，我们就是在尽力弄明白现在的一个选择将会导致未来的一些后果。不进行这种思考的人，则会被说成是“易冲动的”或“缺少远见”。

就像前面章节中建议的那样，具有社会学意识，包括超越算计作为个体什么能使我们受益最多这种方式，去考虑我们的选择后果。具有社会学意识意味着，要考虑我们今天作出的选择，可能会在未来怎样影响其他人、甚至是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根据土著美国人的民间传说，易洛魁族南部联邦的一项治理原则是，在作出决定时，部族理事会应该考虑到决定可能会对七个世代产生的后果。诚然，在现今社会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快节奏的变化意味着，我们几乎没有时间预测哪怕是一代人之后的事情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如此，这一原则看上去非常明智。

作为个体，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意识到，我们当下的行动是如何与我们自己及他人的未来联系到一起的。易洛魁族人的原则走得更远，认为我们的决定应该为更多人服务。它表明，这种意识应该成为社会是怎样运作的一部分。由此我们也

许可以看到我们的政府，或者我们的经济形式，怎样鼓励或阻止考虑未来。如果缺乏远见看起来可能危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或许某些事情就可以完成。最需要的是一项共同的努力，即大家应该意识到，我们今天创造的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的生活。

三思而行

1. 几年前我上了一堂诗歌课，课上，老师要求我们查寻自己名字的意思。他想提高我们对把我们与我们自身联系起来的语言意义的理解。我已经知道“Schwalbe”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燕子”（即，鸟）。但在那节课上，我获悉“Michael”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似神的”或“与上帝同在”；我的中间名，“Louis”，在法语中的意思是“战士”。对我来说，这项任务非常有趣；我喜欢看到我的名字怎样与古老的文化联系到一起。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学生可能会对这一任务有不同的体验？一个学生对这一任务的体验，是怎样与我们社会中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联系到一起的？

2. 希特勒是二战期间德国的领导人。战争过后，随着在他的命令下犯下的暴行逐渐明朗化，希特勒被定义成了一个古今中外历史上最邪恶的人和必须被阻止的一个人。即使希特勒在战争临近结束自杀身亡，当时红军已经包围了柏林，但却仍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希特勒仍在活着。在何时何地，“希特勒”——作为一种象征或想象——今天仍在被应用？其他历史人物或事件是怎样一直不停地转化成象征符号，被引用来塑造现在的？

3. 在本章，我谈到一项活动怎样被组织起来，可被视作一种标志。我使用了美国的学校教育怎样典型地被组织起来的例子，并且这一例子说明了美国社会是怎样运作的。这一相同的原则可被用于任何有组织的行动。比如，可以考虑一下学校中任一节课。注意课堂时间是怎样被划分利用的、被指定的安排的种类、考试的类型和频率、使用的课本和其他阅读书籍、上课学生的人数、上课学生的类别、学生学习表现的反馈。这些事情说明了其他什么社会现实？你对这些标示的理解，为什么可能会与你的老师或同学不一样？

相关读物

Anderson, Elijah. (1990).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rabasi, Albert-Laszla (2002). *Linked.* New York: Penguin.

Duneier, Mitchell.(1999).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Gottdiener, Mark.(1995). *Postmodern Semiotics: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Forms of Postmodern Lif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Kleinman, Sherryl.(1996). *Opposing Ambition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an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stman, Neil.(1986).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w York: Penguin.

Schwalbe, Michael.(1996). *Unlocking the Iron Cage: The Men's Movement, Gender Politics, and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nnett, Richard, & Cobb, Jonathan. (1972).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Vintage.

Snow, David, & Anderson, Leon.(1993). *Down on Their Luck: A Study of Homeless Street Peop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关系、群体和相互依赖

有时我会跑步穿过一个区域，那里有着巨大的房子、一家不轻易吸收新会员的乡村俱乐部和一个私人高尔夫球场。这个区域的道路非常宽广，来往车辆非常稀少，房子之间的空地上树木繁茂，绿意满目。高尔夫球场上有一个很大的池塘，里面有鸭子和白鹅随意浮游，嘎嘎直叫。在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宜人的地方。但是，它可能也是令人焦虑的。

当我继续在路上跑步时，我在心里琢磨，为什么我们会允许某些人住在如此豪华的地方，而让其他人居住在棚子或廉价公寓或是街道上。我对我所看到的反映在远远超出一个人需要的住房上的这种放纵和浪费很是生气。当我看见这个区域的孩子，我想到了他们将会怎样成长，他们将会习惯于这种我们社会中极少有人知道的舒适和特权。并且，当我看见旁边正在新建的房子时，我想到了修建这些豪宅的工人们，是他们亲手修建了这些住宅，但他们自己却买不起这些房子。

有一次，当我在一个大热天跑过这个区域时，我冲两个正在前院剪草的拉提诺男人问了声好。他们冲我点点头，但却没有热情地回应我的问候。我想到了自己的特权，以及他们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在工作天中间，他们在修剪草坪，我则出于自己的乐趣跑我自己的五英里路。当我跑回家，冲过澡，躺在可调式躺椅上看东西时，他们很可能仍得弯着腰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挥汗剪草。

跑过几个街区，两个开着高尔夫球车的灰发男子超过了我。我们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我在人行便道上，他们在我左边一点的街道上。他们刚超过我就拐弯往高尔夫球场开去，高尔夫球场正好在我的右侧，我不得不赶紧停下奔跑的脚步。他们一边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一边看也不看就从我身旁开过，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差点撞倒了我。我心里有些恼火，就冲他们嚷道："长眼了吗？瞧瞧你们这是在往哪儿开！"他们回头望了我一眼，先是一脸吃惊，跟着就是一脸愤怒。这些有钱的白人可能并不习惯为其不好的行为而受人指责。

我又跑完一英里，正好停在一个十字路口，面对过往的人流。这时一辆汽车朝我驶来，跟着慢下来，靠着坐人一边的车窗开始打开。我完全想象得出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去乡村俱乐部怎么走？"一个人准会这样问，甚至不会为打断我的跑步道声歉。不管我是在来的方向还是回去的方向，一句话就够打发这个问题。"一直往前走。兰卡斯特一拐弯就是。"我会一边这样答道，一边继续跑自己的路，脚步一点都不用慢下来。

我不喜欢跑步时被人打断，更不喜欢险些被开着高尔夫球车的两个男人给撞倒，我不想让自己对那些去乡村俱乐部打球的会员感到宽容。因此，当汽车慢下来时，我只是挥了挥手便继续跑自己的路。"你们不会真正迷路的，"我在心里想，"只要一直往前开，要不了一分钟，你们就会找到你们那烦人的俱乐部。"

司机看出我没有停下的意思，就开走了。与汽车交错而过时，我瞥了一眼车里面，看到司机是位中年黑人男子，乘客是三个穿着打扮极其平常的黑人妇女。看上去他们不可能会是乡村俱乐部的会员。我开始为自己没能帮助他们而感到羞愧。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我看上去很像是又一个那些用不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白人，这让我的心情变得很是糟糕。

当我回到家中，我开始思索我的情绪是怎样随着在我跑步中间所发生的事情而变化。我在跑步中的体验，受到一路上这些简单互动的影响。我意识到，不论什么时候我外出，都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不论是去邮局、杂货店、咖啡馆、电影院或其他什么地方，互动总是会影响并塑造我的情

绪。毫无疑问，我的行动——一声你好、一声指责、一种冷落的举动——同样也会影响他人的情绪。反过来，这一切又会怎样影响一个人一天中余下的时间呢？在很大程度上，结果可能都会取决于陌生人之间这些简单的互动。

在我跑步中间发生的互动，并不是人们个性或性格的产物。在每种情况下，都有不平等出现。拉提诺人之所以对我有那样的反应，部分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部分则是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中，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开高尔夫车的人也许仅仅是粗心大意，但我则怀疑，是他们所处的社会阶级，使得他们期望别人不带抱怨地老老实实让出道路权。我指责他们的冲动，以及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所体会到的乐趣，则可以追溯到我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

当我没有为需要指示方向的人停下自己的脚步时，不平等则有所不同。如果车里的人都是白人，或者我是黑人他们是白人，或者邻近的街区一直是不同的，我的挥挥手就跑开去就不会有同样的意思。但是，因为我是白人，因为在美国社会中白人歧视或虐待黑人，我的行为很可能会被解释成另一个无礼的事例。意识到我的行为可能伤害了车里的人，是我感觉很糟的原因所在。

社会学意识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情绪如何依赖于像我跑步中那样的偶然遭遇中发生的事情。它也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对这些遭遇的情感反应，是怎样受到历史、文化和当前社会安排的影响的。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在其中做事的背景，我们必然会与他人发生联系。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不与他人发生联系，不管有时我们会感到自己有多孤独。甚至孤独也是一种依赖于我们与他人关系状态的感觉。

就像我已告诉你的，我跑步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情感相互依赖的故事，尽管它也说明了其他种类的相互依赖。如果我不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跑步有益身体健康，我是不会一直坚持跑步的。我也依赖我的鞋子，是它们让我不至于在跑步时受伤。我的内裤、短裤、袜子、T恤、眼镜、吸汗带和我戴的手表，以及人行道和大道，也帮助使我的跑步得以成为可能。并且如果没有后来来自我的水龙头出来的清水，我也许再也不跑了——谁会想让自己浑身湿淋淋黏糊糊的？尽管我的跑步是我自己愿意去跑，我仍与其他人有很多联系。

我们能做我们想做的，是因为他人创造了供我们使用的东西。不仅是我们的特有活动，就是我们的每日生存，也都取决于通过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获得东西。甚至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行动，也是建立在或者说是利用了我们从他人那里得到的想法和材料。同样，为了生活和发展，他人也要依赖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注意这些联系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伴随而来发生了什么。

超越个人主义

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经常看不到他们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我们喜欢想象自己是自力更生的个体，通过我们独有的天分的力量来闯荡世界。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这一观念是相当愚蠢的。如果我们想要在现代世界像人一样生活，没有他人，就像没有空气一样，我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成就问题。一般说来，我们认为成就是个体努力的结果。我们关心那些努力去做大事情的人，然后将这些人取得的成就归之于这些人特殊的品质。这种思考方式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使得我们可以去创造英雄，去赞扬我们的成功，去指责他人的失败（而非注意到我们应对这些失败所负的责任）。但是，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看到，所谓个体成就，不过是一种幻觉。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一些我们称作个体成就的事例。但是，成就并不真正是个体的；它总是源自一个人与他人的联系。假设一个来自贫穷家庭的人努力工作，克服许多困难，最终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是否是一个个体成就的例子呢？并不真是。它是许多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许多幸运事件的结果.

为了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那些非常明显的事实：每位穿黑长袍的法官，都曾是一个裹在尿布里的婴儿。如果没有那些当我们还是婴儿时照顾我们的大人，我们都不会活到今天。因此，这是对个体成就幻觉的第一个打击。同样，我们也必须记住，作为孩子，我们依赖成人来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为我们树立榜样，并帮助我们养成好习惯。如果他们没有为我们做这些事，我们也不会成为一个聪明、亲切、勤勉的民族——有时确实是。

成就也依赖于他人为我们提供机会，去开发和展现我们的能力。它依赖于他人能够和愿意认识到我们所做努力的后果。它有赖于有权力的人不会故意把我们压在下边。另外，它还有赖于哺育我们、为我们打开大门和给我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时间的人。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发生，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获取一个高的社会地位，也需要制度的存在。对于任何一个成为法院大法官的人来说，必须经过小学、中学、大学、法学院、联邦政府、刑事司法制度等等，否则就不会获取这样的位置，也不会有通往那里的道路。这些制度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许多人按照有条理的方式继续一起做事。因而，任何个体成就都有赖于许多其他人完成属于他们的部分，以便让整场演出得以持续进行下去。

成就也取决于集体创造的观念和价值。例如，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为权力和地位奋斗是头等大事？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看重这些东西？人们是怎样知道做什么可以获得这些东西的？这些观念和价值必然是在以前的某个时候被创造出来并被逐渐灌输给个体。远大的志向和诡诈的手段，同样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获得成就和地位的人，经常没能看到是什么使得他们取得成就。可能他们会认为，"是的，我想在我成功的道路上确实得到了一些机会，但我获得成就，主要是因为我比别人更聪明、更坚定。我真的是一个杰出的人类代表。"这是一种由个人主义促成的幻觉。它就像是在说："看我爬这根绳爬得多好！我可以自己爬上去！"——而没有意识到是谁教你爬的、是谁做的这根绳子、是谁让它垂下让你去爬，或者是谁修建了这个地方让你从那里往上爬。

或许你愿意相信，天才作为一种力量，来自神秘的个体内心。确实有一些人的心智，会以特定的方式发展得较快。例如，莫扎特在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写了交响乐，并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作曲家。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惊奇，但也仍有必要看到超出莫扎特之外的东西。如果莫扎特的世界没有钢琴、音乐，以及音乐教师，他也就不会成为他所是的人物，不论在任何年龄。

这一点适用于所有天才的事例。如果背景不能促进它的发展，任何表现出的能力都会转向虚无。毫无疑问，许多有潜力的莫扎特们都已来过这个世界并已悄然离去，在他们平凡的一生中，甚至连台钢琴都没能看到，更不用说去碰了。

相互依赖意识

努力奋斗力争成功的学生，如果仅仅是为了在完成学业后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经常意识不到他们对他人的依赖。有时他们会说："我在这里是由于我自己的优点，并且由于我的这一优点，我可以达到任何我所想要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具有自信是件好事，更好的事情则是，既有自信又能看到我们如何依赖他人——既包括过去的也包括现在的——培养、认可和奖励我们的优点，不论它们可能是什么。

意识到成就的社会基础，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变得自负、自私和令人厌恶。它也能帮助我们对那些过上好生活的机会非常有限的人感到同情。如果我们能看到自己的成就怎样依赖于与他人（父母、老师、朋友、生活伴侣、导师、老板）的联系，我们应该也能看到，并非每个人起步时都能拥有相同的联系，从而也就未能发展、展示其能力并为其所具有的能力而得到奖励。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下一步就可以去寻找模式，即尽可能去了解，群体成员是如何被拒绝给予可以做得很好的机会。

稍后我会谈到"理解模式"，这里我更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生活如何让我们成为人。那是本章和下一章将要谈到的——我们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何让我们成为我们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甚至理解相互依赖这一原则，也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考虑一下你对你正在看的这本书的反应。你很可能会喜欢其中一些部分而不喜欢其他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困难，但它一定是因为你对这本书所产生的想法和感觉。而这些想法和感觉的来源，一定是你与他人的关系，它可以一直追溯到你的童年。其隐含意义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地方——我们对本书的反应或试着理解世界所来自的立场——是我们先前及当下与他人联系的结果。

哲学家用这样一种说法来表述它："所有的知识都是一种观点。"这意味着我们只能从许多不同的视角去了解这个世界。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在于设法了解我们的观点怎样是我们与他人互动关系的结果。如果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也能看到这些关系是因为我们成长其中的家庭、学校、社会阶层、工作场所、

种族和地方社区、性别群体、国家、历史时期所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我们知道的和我们怎么知道的，都是我们与他人相互联系的结果。

由于我们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知识都源自我们的生活中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关系，除非我们能够多少“移动”我们，否则，在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上，就会有很大局限。我们既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移动”——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遇见新的和不同的人，了解他们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头脑“移动”。我们也可以阅读或听闻他人的经历和观念。从这些不同的观点来回顾我们自身，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从未想象到的事物。

视角和群体

社会学意识意味着，不仅要意识到存在许多其他看问题的视角，也要意识到这些视角与群体，以及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地位相联系。例如，想想老师们。他们因为做着相同的工作（教书），在做这样的工作中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而逐渐形成一种共享的观念、一种相近的说话表达方式、一种大体相似的思想观念。老师们也会彼此相互学习如何应对学生、父母、秘书、校长、校务委员会等。

老师们面对相似的问题，是由于学校怎样被组织起来，以及老师相对其他群体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所致。如果学校被组织得由老师来主管，不仅会改变老师这个群体相对其他群体的方式，而且无疑也会使得处在这一体系中的老师和他人发展出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因共性（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老师们之间）和差异（在教育体系中的老师和其他人之间）而成形。

可以考虑另一个例子，只要医生能够按照医院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这种方式了解病人、护士、管理员以及彼此，医生就会倾向于面对相似的问题和形成一种共有的视角。并不是所有的医生——远多于所有的老师——在每个细节上都有相似的想法。关键是做着相似种类的工作、解决相似种类的问题、按照相似的方式赚取金钱，以及按照相似的方式与他人相连，就会倾向于发展出关于社会世界一个共有的见解。

当我要学生考虑男子气概的危险时，我会说：“可能咱们教室里的每个男生都能想象出一种情景，在这种情境下，他会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而感到必须杀

死另一个男人。"教室里的男生一脸严肃，并点点头。然后我问女生："你们能想象出自己必须杀死另一个女性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女性吗？"她们只是回头向后看看，因为考虑到我们的文化中如何定义女性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意思。在这里，相互依赖表现在哪里呢？就在女人和男人之间。如果我们认识到男人是被构建成不是女人那样，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

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被假定为有暴力能力；女性则不应有暴力倾向（实际上，有些女性相当具有暴力倾向）。要成为"男人"这一分类中一个受尊敬的人，在某些条件下有必要威胁使用或采取暴力行动。男人知道——即使他们不会明说出来——必须采取暴力以免被人当做女人对待——这意味着被其他男人主宰。当我追问，什么时候男人必须与人打斗以证明他是一个男人，通常都会有人说："有人说你像个娘们时。"

在这里，重要的是看到性别分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一分类带来了不同的视角。"男人"和"女人"是互补分类，通常作为对立面出现。在这一意义上，分类是相互依赖的——哪一方离开了对方都没有意义，并且也都不会存在。如果我们没有创造出"男人"和"女人"这样的分类，并强化下面这种看法——即要成为一个男人，一个人一定不能显露出那些被认为属于女性特质的软弱、温柔和被动——男人也就不会知道他们所知道的所谓男人的荣誉和杀戮。

如果我们没有创造一个叫做"男人"和"女人"的群体，如果我们没有把它们截然分开教给他们不同的成人方式，他们之间并不会有太多不同。但是，我们的社会偏偏就是按照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以至于女人和男人通常会体验到不同种类的任务、困难和乐趣。由此，男人知道并会感受到女人不知道和不会那样感受的事，女人则知道并会感受到不同于男人的事。这些知识和感觉上的差异，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更多的是"男人"和"女人"这一分类如何被定义的，以及处在这些分类中的人被教给怎样去思考、感受和行动所致。

再次，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会有相似的想法、相似的感受，或者相互认同对方，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彻底与女人完全不同。像这样的事情，显然是不真实的。然而，这却是真的，即了解自身是一个男人、从男人的立场去看这个世界，可能只是因为相互依赖的"男人"和"女人"这一分类，以及这一分类对男性和女性的分配。

在这个例子中，社会学意识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个体视角（作为男人或女人），其实是我们学习如何理解他人的结果。

通过了解他人来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与他人紧密相连这一本质，也会阻止我们理解关于我们自身及他人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美国黑人和白人的例子。哪个群体可能知道更多关于对方的信息？看上去，似乎是黑人知道的关于白人的，要多于白人知道的关于黑人的。为什么？因为白人一直都比黑人更有权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因此，仅仅是为了生存，黑人就必须仔细观察白人。

具体来说就像是这样：如果你是一名工人，你必须注意你的老板在想什么及感觉怎样，因为你的工作取决于能够预料到他的行为。好的老板会注意到工人在想什么、感觉怎样，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老板手里所拥有的权力，工人研究老板喜好与言行的动机，要远多于老板研究工人的。毕竟，工人摸不准老板想要什么，老板可以开除他。反过来，工人则不可能开除老板。

在美国历史上，黑人一直不能“开除”奴役、虐待或歧视他们的白人。黑人没有权力那样去做。而且，为了生存和避免陷入麻烦，黑人要比白人研究黑人更密切地去研究白人。因而，与一般白人知道的关于黑人和“黑人文化”相比，一般的黑人可能知道更多关于白人和“白人文化”的东西。这是一个群体间的不平等如何塑造或限制群体中的人可能拥有知识的例子。

放下这个例子，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黑人了解白人的，是否比白人了解他们自己的还要多？答案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了解我们自身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能够像别人看待我们那样去看待我们自身。如果我们拥有很大的权力——相对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而言——我们就很可能不会从别人会怎样看我们这个角度去考虑我们自身。

多数白人都不会设法通过黑人的眼睛来看自己。这并不是说白人是故意忽略黑人的视角。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因为白人没有强制原因非要这样去做不可，所以多数白人也就从来没有站在黑人的视角去看自己。同样，多数美国人也很少通过他国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允许美国人忽略其他

国家的人在想什么。

这里的第一个原则涉及权力和知识。如果群体之间彼此不平等，就会影响那些群体中的成员有可能了解对方什么，以及他们会有多大的意愿付出多大的努力去了解对方。一般说来，那些更有权力的群体对那些较少权力的群体了解得会极少。而且在某些方面，那些有权势的人对自身的了解，甚至还会少于那些处于劣势群体的人的了解。这看上去容易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权力的代价就是对他人和自身的无知。

不平等关系也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一个群体可能会比别的群体更强，但它也仍然要依靠他人。主人需要奴仆，就像资本家需要工人一样。随着处于主导地位和从属地位群体的成员为生存而奋斗——这一奋斗对一个群体的成员要比对另一个群体的成员来说艰难得多——他们会创造出情境和经历，引导一些人知道他人不知道的。个体获取的知识，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依赖于他们属于哪个群体，以及他们所在的群体如何与其他群体相互合作和竞争。

因而，第二项原则就是，"个体"的知识总是社会的产物。我们所知道的，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这一本质。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在于，超越个人主义并接受那些使我们成为我们现在所是的关系。通过这样做，我们就能发现我们拥有知识的局限所在，并能看到如何以那种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更负责任地生活的方式去增加它。

"个人选择"

如果你有弟妹，你的父母可能会敦促你为他们树立一个好榜样。在告诉你这样做的同时，你的父母也是想要让你意识到一种相互依赖性。他们想要你知道，你的行为可能会影响从观看你的言行中学习的人。否则，你也许会认为你的行为纯粹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会意识到你的选择会帮助或伤害他人。

相反，社会学意识意味着，关注我们的行为怎样影响他人和被他人所影响。由此我们也许就能看到，我们所作出的许多选择，并不是那么个人的，实际上，它们会对他人直接或间接地产生许多重要的影响。当然，要看到这些并不那么容

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很可能连看都不想去看。

前面我已说过，意识到我们的行动后果，并不意味着尽可能设法想象所有可能的后果。真要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我们所能做得最好的，就是在明了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情况下，想象有可能出现的后果。社会学意识不会规定也不会禁止任何特定的选择。具有意识，就是在我们行动之前考虑更多的事情。如果能那样去做，也许我们就会作出很好的决定，采取不同的行动——具体取决于我们所珍视的是什么。

在第 1 章，我使用了在具有破坏性的工作中上班的例子。我说，社会学意识能帮助我们看到参加这些工作可能出现的害处，可能会引领我们采取不同的谋生手段。下面是那类工作几个更多的例子，尽管并不完全是关于工作的。在每个例子中我都会指出，如果意识到我们与他人相互依赖我们可能看到的。

抽烟

如果你是个吸烟者，你可能会用那是个人选择来为你的行为进行辩护。或许你还会认为，就算吸烟会毁坏你的身体，但那是你自己的身体，你想怎么使用就可以怎么使用。可能你会认为，只要你能承受得起你的抽烟上瘾的代价，并且不把烟气喷到别人脸上，那就不关别人的事，而是你自己的事。这是一种为个体主义所鼓励的看问题的方式，个体主义禁止对你的习惯会怎样影响他人进行有意识的评判。

作为一个吸烟者，你为你的孩子和那些尊敬你的人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你的行为等于是在告诉别人说，抽烟是好的、并非真的有害，要不你怎么会一直这么做呢？如果你在外面抽烟，并把烟头随手扔在地上，就像多数抽烟者都会做的那样，你也是在传达一种对公共空间和地球的不尊重。如果你在任何密闭的空间抽烟，像飞机场或餐馆，即使那里允许抽烟，你也会伤害他人的健康，即使他们并没有指责你。

需要考虑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当你买烟时，你就是在帮助或促使他人上瘾，这不仅是因为你所设立的榜样，而且是因为你还提供给烟厂做广告的基金。这就像是把钱捐赠给毒品交易商，帮助他们劝告孩子，尤其是十多岁的未成年人，吸

毒是性感的、有诱惑力的，以及是成年人的一种象征。因此，你抽烟的选择，作为其中一种结果，同样会对那些上当受骗成为使用者的他人产生有害的影响。

即使你在吸烟室吸烟，你也不能避免伤害他人。考虑一下每个人付出的更多的健康保险，因为吸烟者要求额外的照料去治疗他们各种各样与抽烟相关的疾病。你吸烟的选择，硬把这些费用分摊到他人头上。并且，如果由于肺癌或心脏病发作而引起肺气肿变成残废或早死，你的家庭和朋友可能会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你迫使他人为你的选择支付费用，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吸烟就一点也不是你个人的事。

如果你觉得我认为抽烟是一个坏想法，你是正确的，尽管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反对抽烟的论据。它是当我们决定作出个人选择时社会学意识要求我们考虑什么的一个例证。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是可能的。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尽可能地关注那些因为我们与他人相互依赖而出现的影响或后果。

暴力体育

这是另一个有害选择的例子，一个可能会打击你、让你感到奇怪的例子——看橄榄球比赛。或许你会认为，“橄榄球怎么会是有害的？这人真是，做得未免太过火了！橄榄球能有什么错！它又不会让人得肺癌或心脏病。它不过是一种乐趣，好玩而已！”确实，它不会伤害运动员，也不会得什么身体上的疾病。但它确实是社会生活中几种病症的原因——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性别歧视。

如果我们说橄榄球“仅仅是运动员相互竞争获取奖金的一场比赛”，我们就会忽略问题的关键所在。橄榄球并不仅仅是一种比赛，而是号召大家使用暴力，从而重视大小、力量和权力。是的，它也讲究战略和技巧，在这一意义上，它与许多其他比赛一样。但是然后我们就要问了：“投入橄榄球比赛中的战略、技巧和力量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在于比赛本身：目标是突破到对方球队防守区域最远的地方（达到触地得分或射门得分）。不需要采取什么解释技巧，就可将此视作战争行为的隐喻。

那么，这样一来，当我们看橄榄球比赛时，社会学意识能引领我们看到什么

呢？我们可能会说："啊，我们看到战争的隐喻。"但是说得更简单点，我们可以说，我们所看见的是，强壮的男人群体互相控制对方。然后我们可以放宽我们的视线，我们也看到女人站在边线上为那些男人欢呼，当他们进行严肃的闪躲拼抢时；当"他们的部队"摧垮另一方时，我们可以看到球迷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听到球迷狂喜的尖叫和叫喊；并且我们还会看见，这一行动是由一些男性司令员——教练和四分卫——指挥的。

按照这种方式来看，橄榄球不仅是战争的隐喻；它还是我们星球上社会生活的一个微缩景观。男人们为权力而奋争，少数精英男人命令其他男人去做这些充满暴力的肮脏的勾当；女人则站在一旁，为球队助威和起装饰作用；并且多数人，因为自身缺乏权力，只有站在一旁观看和欢呼的份儿。

你也许会认可这一切，并仍能从观看橄榄球比赛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乐趣。实际上，这能有什么害处呢？答案是，观看橄榄球比赛的场面，如果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偶然的观察者，确实会强化隐藏在战争和男人控制女人背后共有的价值观和冲动。它是通过展示男性权力的暴力争斗是件美好的娱乐，做到这一点的。人们可能并不打算暗示任何类似的事情，他们也许仅仅是想从比赛中获取快乐。但不管怎样，他们的行为却表明了对编码进比赛中的价值观的接受。

反过来想象一下，一个公正的橄榄球反对者也许会说："我不会理会这一运动，甚至不会通过去观看来赋予它合法化，因为橄榄球比赛使得暴力和男性主导、轻视女人，显得非常正常和可以接受。"因为像观看橄榄球这样的行为传递的信息，反对者意识到了行为怎样会强化观念和价值观。因此，反对者选择了不去向他人传递这一信息，即被编码进橄榄球比赛中的东西是好的。

要孩子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它把我们通常视作"个人选择"的领域推向更远——女人要孩子。我不打算考虑妇女选择要孩子的所有情况。我头脑里想到的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女子，可能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已婚，并已参加工作数年，然后退出工作去生孩子，主要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在美国异性恋的女性间，这是一种极其常见的模式。

如果这样一个少妇想要结婚，工作上一段时间，放弃工作，待在家里养育孩子，这是否是一个她应该自由作出的决定？当然是——就像人们应该自由地抽烟和观看橄榄球——如果在充分考虑过所有可能的后果之后那就是他们想要做的。社会学意识仅仅要求意识，而不要求任何特定的行动。

因此，如果一个少妇考虑要孩子，她应该意识到什么呢？考虑一下她的情况可能会怎样展开。因为妇女倾向于被分流去做一些与男性相比有着低报酬、低地位的工作，因而，首要的一点就是，她的工作比起她丈夫的不会有太高报酬。她的工作也不会让人感觉特别有意义。在这些条件下，培养孩子的选择也许是有吸引力的。它是一种避免工作场所烦恼的方式，一种做一些有意义事情的方式，一种作为女人获取承认地位的方式。它可能也是一种结束父母唠叨的方式："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要孩子？"

如果她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决定要孩子，伴随而来的结果会有以下几种。一个是她的老板（很可能是一个男人）将会认为，"嗯，这就是我所担心将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培训这些女人上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没过几年，她们就放弃工作去生孩子。我猜这就是她们的天性。以后在这些岗位上我要尽可能招收男人来工作并尽快提升他们，因为男人更能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一个雇主只要有部分这种想法，就会对工作场所的其他女性带来不好的后果。

一个女人一旦放弃她的工作，也就可能失去在家里的权力。这之所以会发生，部分是因为她在经济上变得要依赖于她的丈夫。现在她的丈夫会说："我每天都要出去挣钱养家。我毫无怨言地忍受外面的一切。因此，我认为，在轮到做决定时，我的喜好应该优先考虑。"即使他不会这样一字不差地去说，如果他不相信这一点，那也是很令人惊奇的。并且，不论我们认为这一信念是对或错，优先考虑其收入支撑整个家庭的人的需要，并不是什么不理智的事情。

这样一来，现在她就开始待在家里洗衣做饭照顾孩子。他也许会偶尔伸手帮一下忙，但是，因为他是养家糊口的人，他必须工作非常卖力。因此，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注意那些被他视作家庭小事的事情。他可能会在心里想："难道那还不应该是她对家庭作出的一点贡献吗？我挣钱养家，她就应该收拾屋子照顾孩子。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呢。"妇女接受这一安排，或许是因为它能帮

助她的丈夫在工作上获得领先地位，这意味着家里可以有更多金钱。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其他代价的安排，但她则将其看做她的个人选择。

为了看一下这一选择的未预期后果，可以考虑一下她丈夫工作场所的竞争者。谁是那些不大可能得到家里支持的人？妇女。因为女性缺少妻子，妇女较少能够充分投身工作。因此，上司就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男人是更好的雇员，特别是在高级岗位上，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热忱与投入——更愿意“加班熬夜赶活”。因此，一个女人待在家里、养育孩子和照顾丈夫这一决定的一个后果，就是工作场所性别不平等的持久化。换句话说，一种后果就是，限制女性得到提升的机会。

你也许会认为，“如果一个妇女不想因为有孩子而影响她的职业生涯，或许她只要不要孩子就行，或者一直保持单身也行。然后她就能与工作场所的男人并驾齐驱了。”她当然可以那样做。然而，与一个单身或不要孩子的女性一起工作的多数男子，都有在经济上依赖自己、待在家中的妻子。如果这些男人习惯于对待他们的妻子作为“低层伴侣”，他们是否能够接受工作场所的女性与自己平起平坐和比自己职位更高呢？或者，这些男人是否会想，一个女人的地位应该是在家里，在那里，她的工作就是为男人服务、满足男人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男人也许会假定工作场所也应该是男人说了算，由男人来主导。他们可能也会假定，他们在家中从他们的妻子那里得到的服务和顺从，也是他们在工作场所有资格从女性职员那里得到的。

显然，丈夫和妻子不仅在情感上，也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这一点很容易看到。不太容易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的相互依赖，如何使得在家生养孩子这一女性的“个人选择”，会对那些在工作场所努力奋斗寻求平等地位的女性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是怎样运作的，我们就能看到，当女性放弃她们的经济独立并把自身押在与一个男人的关系上时，她们也就使得其他女性所处的不利地位得以持续存在下去。并且当一个女性出于谋生需要或对工作的渴望而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她将会发现，那些不利的东西正在等着她。

我听过一些女生说：“我真的挺讨厌那些女性主义者说，如果你待在家里养孩子，你就是在做坏事。”当我问她们，为什么认为女性主义者会说这样的话，这些学生说：“因为他们将家务事看得微不足道。”这种看法是相当错误的。实际上，

是男人将家务事看得微不足道和有失体面，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想去干的原因所在。没有哪位女性主义者会说，照看家庭和孩子的女性是坏的——实际上，女性主义者争论说，照看家庭和养育孩子是有价值的和重要的。

女性主义者所做的是，敦促女性意识到，她们的选择怎样影响到其他女性。仅仅是因为那是人们期望女性那样去做，或是因为停止工作而选择要孩子，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它将会被拽回一条深深的刻板乏味的道路，这条路很可能会离我们社会中女性平等的目标越来越远。再次，对这些事情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不是要阻止女人选择要孩子。它只是意味着，要认识到这种相互依赖性，这一相互依赖性，使得这一选择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社会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后果。

科学家的困境

假设你是一个需要金钱去做一个研究项目的科学家。假设一个基金会愿意为你的项目提供资助。假设这一基金会与一家烟草公司有着密切关系，以至于它的资金都来自卖烟。你是否会接受这笔资助？在作出决定之前，你大概会考虑一下基金会为什么会提供资助支持研究，以及它这么做想要获得什么。

为什么公司会“捐出”一些它的金钱？答案是，为了让公司和它的产品看上去合法。实际上，这是做广告的一种形式。如果你接受这笔捐赠，你就是在帮助公司看上去显得可敬。接受金钱将会意味着，即使它来自贩卖会伤害和杀死人的毒品，也没什么大不了。实际上你会说，这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通过有助于它所声明的成为一个有用的“企业公民”，帮助公司继续呆在商业大潮中。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下的那个科学家，你可能会发现，很难具有社会学意识。你可能会倾向于夸大你的项目可能的好处和合理使用这笔金钱：“如果我不接受，就会有别人接受。至少我还可以拿它来做一些好事。”那也许是真的；一些好事可能确实会来自你的项目。

但是，期望这一可能的好处去抵消可能会对数万人造成的伤害，他们的健康将会受到损害，并会因被骗吸烟而可能早死，这是否是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呢？使得烟草公司看上去显得合法和受尊敬，是这一把戏的一部分。真诚地意识到这一

点，你也许会更加努力工作，去找到你的项目资金的另一个来源。

反思我们的选择

当我们把抽烟、观看橄榄球比赛、要孩子、接受来自合法渠道的资金称作“个人选择”时，我们也就掩蔽了我们与他人的相互依赖。它就像是否认这些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就好像是说没有人有权挑战这些行为。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再次反思我们的选择，特别留意我们的选择会怎样影响他人，并会给他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面临选择时，人们有时会考虑他们喜欢的机会并说：“为什么不选它？我没发现有什么不好的原因可以让我不去做 X，因此，我想我会那样去做，因为 X 对我来说最合我意。”但这经常意味着，“我不想或不知道如何去反思做 X 的后果，因此我就选择做 X。”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持续做事的方式。

无论如何，我们总是会有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这时我们已经考虑了所有我们知道应该考虑的。如果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它将会使我们花费更长时间才能作出最终决定，因为我们将会考虑更多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我们也会尽可能地从不同的、广泛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选择。这也需要额外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与他人谈话，或是阅读他们写下的东西，学会如何从新的视角考察我们的选择。

具有这种意识会让我们的行动慢下来，但它不会减少我们的选择。实际上，它可以引领我们看到我们先前错过的选择。它也使得我们可以在经过周密考虑后作出能够反映我们价值观的选择。因而，意识到联系和相互依赖性，能够帮助我们作出真正的“个体选择”，而不是那类仅仅是看上去像个体的选择（因为它们便于定义为“个体”）。

然而，个体不单单是要对其行动后果负责。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因为社会世界是怎样运作的，还会对他人产生一定的后果。妇女应该能在不用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下要孩子。科学家应该能够无需出卖自己的良知就找到资助他们研究项目的资金。如果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并不是因为个体是不道德的，而是因为他们行动的背景条件所致。具有社会学意识，是一种看清这些背景条件是什么，以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采取负责任行动的方式。

没有终结的对话——情感投资和观点

我的关于“个人选择”的评论，已经为我带来了不少麻烦。就像我所预料到的那样，当我说抽烟、观看橄榄球比赛和要孩子（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有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的有害结果时，有些读者非常生气。有一次，当我观摩一堂使用这本书的教学课时，一个学生说，如果我使用较少煽动性的例子，读者会“更认真地对待我”。一位老师告诉我，她的一名学生驳斥了我关于抽烟、橄榄球和要孩子的评论，称它们为“不过是施瓦布自个的观点”。这两种评论我都听到过不止一次。

没错，我是可以使用较少煽动性的例子。许多其他行动都有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有害结果。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屋子里让灯一直亮着，或是随手扔掉本可回收利用的瓶罐，是一种大手大脚的资源浪费，并会造成污染和全球变暖。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后果。但是，即使我写到了灯泡和瓶罐，又有谁会记住它呢？

现在，多数人都不再像过去那样极力抵制去考虑大肆挥霍的消费习惯的环境后果。在这一领域，许多人都愿意——在一定的激励与督促下——具有一些生态学意识，并愿作出与以前不同的行动。回收利用瓶罐不会让人神经紧张。不过，当人们在实践上愿意投入更多情感，其意识和行为上的改变也就会更加深刻。

看上去让人奇怪的是，在美国，许多人都把情感花费在观看橄榄球比赛上。他们依靠观看比赛来获得与朋友在一起的乐趣。或者他们会在他们支持的球队获胜时获得乐趣，甚或是一种权力。男人可能会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到橄榄球比赛上，因为作为一个球迷，这是一种表示一个人与被定义为坚忍不拔和有男子气概的事情有着密切联系的方式。

我也可以按照同样这一方式来分析抽烟、要孩子和从可疑的渠道获取金钱。在每个例子中，都有一些从情感上来说对人很重要的风险：想象自己表现得很酷，为群体所接受，承认地位上的成就，或者是职业上的成功。由于人们经常都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很难去批判思考产生这些感觉的实践。不过，准确说来，在这些地方我们需要小心提防提高警惕。无意识地采取“阻力最小路径”，就像社会学家阿兰·约翰逊所说（在其2000年出版的《特权、权力和差异》一书中），确

实可以使我们过得比较舒适，但从长远来看，这样做经常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这里，社会学的要点是：有害的实践经常会因人们被教导从中获得乐趣和自我价值的感觉，而得以持续存在下去。具有社会学意识，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怎样运行的，以及我们怎样逐步陷入其中的。但是，我们在某一事物上的情感投资越深，我们也就越是难以批判性地去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所作所为。因而，再一次，如果我们可以学会在这些比较艰难的事情上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也就肯定可以在比较容易的事情上做到这一点。

一个进一步的建议是：反思一下你为什么不愿批判思考某些特定行为，像抽烟、观看橄榄球、要孩子、打暴力电子游戏、听性别歧视的说唱音乐、支持美国军国主义、化妆，或是穿衣着暴露的衣裳。如果你不愿批判思考这些事情，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你可能会怎样在这些通常的做法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它们是否在某个方面是你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来源渠道？在你回答这些问题之后，再试着考虑一下因为你的选择而可能出现的未预期的后果。然后，可能你就会被引导——通过你自己批判思考的力量——作出不同的选择。

* * * * *

我所说的关于“个人选择”的话，是否仅仅是我个人特有的看法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可以说上一句：“我知道了，施瓦布不喜欢抽烟和橄榄球。他有权发表他的看法。但是我的看法与他不同，因此，可管他呢！”然后对我的说法不予考虑。我则会猜测，基于我从有些老师那里听到的，这是一些学生如何理解我对吸烟、看橄榄球等事情所做的评论。有这种认识的读者，我认为，错过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我的核心并不是谴责任何特定的惯常做法，而是想要说明我们可以怎样对我们所有的惯常做法更加具有社会学意识。如果说在我所说的关于个人选择的话语中有一个中心主题的话，那就是：请想一想你的行动可能会怎样对他人造成未预期的有害的结果，只有这样做，你才能作出道德上负责任的选择。因此，我的观点并不是关于吸烟、观看橄榄球比赛、要孩子或是接受可疑来源的资助。它是关于如何意识到，作为社会创造物我们是相互依赖的，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

一个坏脾气的读者也许会说，认为人们应该按照我所描述的那样具有社会学意，仍然仅仅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是真的。它确实仅仅是我自己的看法，不过它也是我与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传统共有的一个看法。因此，它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独有的。我仅仅是在敦促大家以一种社会学的方式去考察自己的生活，包括个人的选择。

这里我应补充一点有关观点的本质。你可能已经听说过，观点是便宜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暗示，所有的观点具有大致相等的价值，其价值接近于零。我不相信这一说法，下面是我的理由。

观点是结论。从理想状态来说，我们是通过衡量所有相关的证据、经过仔细推理才得出它们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合理的论据，以得出一个明智的观点。当然，并不是每个人在所有时间都会这么去做（真能每次都这样去做就成圣人了），因此，有些观点是以一些不好的信息、不完整的信息、或是不合逻辑的推理为依据作出的。在这几种情况下，它们确实极少有什么价值。

在另一方面，有些观点则是根据坚实和广泛的证据和仔细考虑作出的。能发现这样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因为它们可以节省我们很多工作。但是，更好的做法则是，能够看到工作是怎样完成的、怎样能让工作为我们服务。这是本书想要传授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如何做好培养关于社会世界的观点的工作。当然，你应该对这里所说的所有观点都抱持一种批判态度。考察它们产生的根基。然后设法看清它们是怎样被建构而成的。

关于盲点的注解

尽可能地一直具有社会学意识，看上去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实际上，它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没有谁可以在这上面做到一直成功。即便是我，也做不到。但是，在实践过一段时间之后，具有社会学意识就可能会逐渐成为所谓的我们的“第二天性”。这意味着，具有社会学意识可以成为我们是谁的一部分，并可不用有太多的自觉意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能在某些区域存在盲点。

“盲点”是人的眼睛中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人们不能清楚地看到事物，

或者是什么都看不到。如果我们单从字面意义上来谈论人的眼睛，我们可能会注意到，盲点的产生是部分视网膜受到损伤或退化所致。但是我在这里使用的“盲点”，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用来指一个人没能或是不愿去批判思考——甚至是不愿去认知——社会世界中的某些方面。

考虑一下这个例子：一个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白人男子，努力学习，不惹麻烦，考上了大学，最终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对社会阶级体系，以及它怎样为某些人提供优势又对其他人设置不利条件具有社会学意识。之所以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已经亲身体验过其中的一些不利之处。

不管怎么说，对他来说，也许他很难对白人特权和男性特权具有社会学意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看到这些社会现实意味着要认识到，尽管因为他的阶级出身他要面对一些障碍，但是因为他的性别和种族，他还是获得了一些优势，这会影响他对自己成功的看法，认为那都是通过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得来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在批判思考种族和性别时，在他身上就存在盲点。

当谈到某些可能会威胁我们比较珍视的观点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会出现盲点。我们所能做得最好的就是，尽可能地意识到这些盲点，付出额外的努力，去面对可能会让人心神不宁的真理。这并不是我们做一次就可以学会并可受用终身的东西。具有社会学意识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它要求实践，不仅要看到那些比较容易看到的，尤其要看到那些我们也许不喜欢看到的。

三思而行

1. 即使我们认识到伤害可能来自我们所做的特定选择，我们也可能会拒绝改变我们的行为，因为这些选择有益于（或者看上去有益于）我们自身。例如，有些学生回应关于橄榄球的部分说，他们确实不喜欢看橄榄球，如果能再也不用看比赛他们会无比高兴，但是他们之所以还是看它，是因为它能提供获得与朋友在一起的乐趣，或是与父母（通常是父亲，他们比较喜欢比赛）在一起的纽带。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感到他们必须依靠橄榄球来提供这些伙伴友谊的乐趣呢？人们还可以选择从哪里寻找这些乐趣？

2. 假想有一个少妇，姑且就叫她玛拉吧，被聘为酒吧服务员。她直接对男性顾客说，她喜欢与他们开玩笑，但她不能容忍性别歧视的评论或笑话。大部分男性都改变了他们的行为。然后另一个少妇，姑且叫她克里斯提，也被聘为服务员。男人测试她，发现她不在意他们带有性别歧视的评论。她只是一个劲地微笑。很快男人们就又恢复了他们的老习惯。当玛拉面对其中一个男顾客时，他说："瞧你，人家克里斯提都不在意，为什么就你在意？"然后，玛拉跟克里斯提谈起这个问题，克里斯提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容忍不容忍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无关。"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使得克里斯提很难具有社会学意识？玛拉怎样做才有可能让克里斯提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有可能在与男人互动时作出不同的选择。

3. 根据一种看法，情感更多地是由大脑中的生化物质决定的，而非社会互动。不管怎样，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至少可以猜测，大脑中持续进行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就像社会生活中持续不断进行的。实际上，你可以通过在大脑里想象你目击的痛苦的受伤情况、你厌恶的一种食物或是性幻想来证实这一点。当你这样做时，大脑想象会激起你的身体反应，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应，是因为想象影响了你的大脑里进行的东西（生化方面）。考虑一下，这些想象及其意义是怎样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情感上强有力的想象，是怎样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的？我们又是怎样学会使用这些图像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情感的？

参阅书目

Bellah, Robert N., Madsen, Richard, Sullivan, William M., Swidler, Ann, & Tipton, Steven M.(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ry, Wendell.(2003). *Citizenship Papers*. Washington, DC: Shoemaker & Hoard.

Dewey, John.(1908/1932). *Theory of the Moral Lif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Gilligan, Carol.(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chschild, Arlie.(1983). *The Managed He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hat Hanh, Thich.(1987). *Interbeing*. Berkeley, CA: Parallax Press.
Noddings, Nel.(1984). *Ca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ubin, Lillian.(1983). *Intimate Strangers*. New York: Harper & Row.

5
成为人

为了做下面我要描述的这个实验，我们需要一对新出生的双胞胎。还需要一个大箱子，以便让双胞胎中的一个生活在里面，不与他人发生联系。有一个机械化的工具，会定时往里面放上所需的食物和水，并取走垃圾。箱子里也必须不透明和隔音，以免通过箱壁进行互动。

实验其实非常简单：一个孩子正常喂养，另一个在箱子里长大。18年后，我们打开箱子，比较这两个孩子，看他们俩之间是否有所不同。如果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与他人在一起事关重大。如果两个孩子在相隔18年后一模一样，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化（与他人在一起学习）并没有产生什么差异，人的个性是先天基因早就编好的。

你也许会认为，“社会化当然关系重大。我们不需要把一个孩子放到箱子里来证明那一点！”但是，也有许多人争辩说，一个人的成长主要是基因决定的。如果那是真的，一个孩子是否在箱子里长大就无关紧要。基因编程将会自动把它变成早已注定要成为的人，不论是在箱子内还是箱子外。

当然，做箱子试验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婴儿无法体验在我们的文化中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亲密关系、身体情感和精神刺激。我们珍视这些事情，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对创造出正常的人来说有多关键。仅仅是想象一下箱子实验，就会使人震惊得记住它。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社会生活怎样使我们成为人。有一次，

在讨论过儿童是怎样被教导成为男孩和女孩之后，一名男生说："我妈妈教我裁剪做饭，我爸爸教我打猎逮鱼。"他要说的重点不够清晰，于是我就问他："你的意思是否是说，你是在生物学上注定成为你现在所是的男人，不论你的父母教给你什么。"他说是的，那正是他想要表达的。

在下次班级会议上，我告诉这个学生关于他的双胞胎兄弟，费斯特，当年一下生就被卖给不讲道德的试验者。"他前十八年的生活都是在箱子里度过的，"我说，"当箱子被打开时，场面让人悲哀。费斯特蜷成一团，就像一个孤立无助、极其受惊害怕的小动物，他无法说话，也无法辩解。你不知道已经做的关于你和你兄弟之间的比较，因为他们是秘密地做的，有录像跟踪拍摄。判断是由一队科学家作出的，他们会在接到带子后进行判断——"这时，一个学生突然插进来，"他们没有差异！"就连可怜的"费斯特"的兄弟也笑了起来。

笑声说明了这样一点，即认为任何人能够"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各项机能运转正常的成人，是荒谬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为人父母者就可以把孩子放在箱子里抚养而省去极其多的麻烦。

在现实生活中，天性与教养（nature vs. nurture）之争是不可解决的。每个人都会像他/她所是的那样发展，因为有些潜能是可以教养的，有些潜能则是教养不出的。没有社会生活，没有什么潜能可以得到开发；不同的社会生活，将会开发出不同的潜力；并且，如果没有某方面的潜能，那么在那方面下再大的劲也是白搭。因此，没有真正可以分离开的天性和教养的作用，可以使我们成为我们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是这两种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

想要对我们是怎样变成人的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只需假定这样一点：每个人都有比其可以实现的更多的潜能。这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体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使我们成为我们现在所是的能力、欲望和习惯——仅仅是无限多的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我们所具有的全部潜能；我们只可能知道，在后天生活中，哪一个或哪些潜能被实现了。我们所能知道的，或者说我们至少能够意识到的，是社会生活如何将我们转变成了某类人。

为了看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的相互依赖性。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意识到更多。我们也必须注意，社会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我们是在哪里找到我们的位置的，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带来了不同的经历，使得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一“社交性质”(socialness)，包括所有使我们超越动物阶层的东西——我们大脑思想的运作，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欲望和希望，我们关于自身的感觉。所有关于我们的这些事情，这些使得我们成为人的特质，都来源于社会生活。

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去了解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某些人，像费斯特兄弟，就拒绝对我们是怎样变成人的具有社会学意识。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在美国文化中，我们一直被教导，我们的价值取决于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被社会生活塑造的，则使我们看上去显得与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其他许多人一直都是按照相似的方式被塑造的，所以，意识到这一点，会让我们觉得我们都成了芸芸众生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员。

我们是否仅仅是像他人一样?在某些方面，确实是这样。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持有相似的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并且做着相似的事情。这是当人们在同一个文化中长大时，我们可以期望看到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则是与他人稍有不同——不是有很大不同，而是有一点不同。并且还有一些方面，我们则是截然不同。没有他人会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经历，没有他人会按照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方式一直被塑造而成，并且没有他人会生活在我们的身体里。

因此，实际情况是，我们都既是一类中的一个，又是自成一类。我们与他人既相同又不同。在美国文化中，我们通常都会夸大我们的差异，而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很多方面与他人有着相同的地方。

一条古老的中国谚语说，“成人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你不是一个人。”这意味着，只要我们抱着个性的幻觉不放——不去审查我们是怎样与他人相像和不相像的——我们也就不会成为所有我们作为个体可能成为的人。这也就好比是，成为独一无二的幻觉是如此令人满意，以至于它会阻止我们去做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成长为人的思考。谚语也提醒我们，我们与他人的相似性，对成为人是很关键的。

意识到这些事情的关键，并不是去帮助我们尽力变得与众不同，好像那就是

人生的最高目标。关键是要意识到，我们怎样使自己和他人成为人——作为带着更多智慧和同情去做的一步。具有社会学意识，是认识到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怎样依赖于我们与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本质的一个方法。或许，我们也可由此看到，我们怎样可以用使人更能和更愿为自己和他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方式，一起来做事情。

理解意义

你很幸运，不用在箱子里长大。相反，你从他人那里学会了一种语言，这门语言允许你从心智上开始去理解这个世界。对你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混乱不堪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分清的世界，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一个充满有意义的事件、情境和物体（包括你自己和他人）的地方。没有语言，所有这些都将消隐无踪。你将会陷入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

什么使得我们能够作为人生活在一起？是我们能够平和地和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们创建复杂的机制和传统的能力；是我们互相分享经验的能力；是我们随着时间推移保存知识的能力，以及我们想象和谈论未来的能力。没有语言，我们就不能做这些事情，是语言给予我们力量，去开发我们个体人性的一面，和按照独特的人类的方式与他人发生联系。如果你能意识到语言的力量，你就会注意它的本质和用途。这样去做，也就是要意识到，人们是怎样创造他们自身，以及一个共享的社会世界的。

接受身份

作为一个婴儿，你不知道你听到一遍又一遍的声音就是你的名字，不过，最终你学会了“马尔”或“罗莎”这一声音指的就是你和你自己。在学会你的名字的过程中，你会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对象。你学会了你是一个可能会被谈到、想到、被夸、被骂、被爱、被恨等的生物。一旦你能想到“我是某某人”，你就会开始理解你自己和成为一个复杂存在物的意义所在。

当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就会从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角度来理解我们自身。这

意味着，可以利用我们所处文化中可以获得的术语来定义我们自己。他人必须交给我们可以使用哪些术语及在什么时间使用。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像学生、主修生物学的学生、儿子或女儿、民主、自由、基督徒或佛教、黑人或白人、同性恋或异性恋、婴儿潮出生的一代或X一代——给予我们我们是谁的认识。这是成为人的一部分，一个逐渐认识到我们是谁和是什么的过程。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赋予自身的意义，总是来自社会生活。我们不仅在定义我们自己上相互依赖，而且在维持作为人我们是谁和是什么的清楚易懂与稳定的意义上也相互依赖。如果他人不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就很难确切地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和是什么。

我们的身份——我们赋予我们自身并告知他人的意义——让我们找到相对他人的位置，并告诉他们如何对待我们。宣布我们的身份，使得他人可以在与我们互动时采取可预测的方式。比如，如果他人知道你是个水管工，他们就会知道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比如，当水管发生泄漏时——对待你。因此，身份不是停留在我们头脑内部只具有私人意义。身份是决定人与人之间多数事情发生的公开的意义。

你可能会理解按照相同方式运作的其他意义。如果他人知道你这个人“脾气不好”，或者“非常富有”，或者“非常幽默风趣”，他们就会知道如何与你互动的一些事情。在理解对我们自身而言的意思时，我们获取了许多可能的联系节点——即许多他人能够明白我们是谁和是干什么的，从而与我们进行可预期的和顺利的互动方式。社会生活不仅给予我们身份，而且还有赖于它们。

身份可以让我们迅速为他人所理解。当你说“我是个学生”，或者“我是个学生物的学生”，或者“我是个工程师”，你就是在使用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你是谁和你是干什么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按照同一种方式去理解“学生”或“学生物的学生”或“工程师”的意思。即使如此，像这样的一种身份仍是一个很有用的起点。在宣称了我们的身份后，我们通常会向他人解释我们自己。我们会尝试尽可能多的方式，去影响别人赋予我们的意义。

获取语言和开发自我意识，对成为人和能够在社会世界中自如地生活，非常重要。理解一个人的自我——即知道自身及对他人来说自己是某个特定的人——

也是成为人的一部分。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这些过程仅仅是因为人际互动才得以发生。如果是在箱子里长大，我们不可能变成人。我们成为谁和变成什么样的人，取决于社会世界提供的符号和意义，以及使用它们的机会。在成为人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比在已经成为人的过程中，有更少的相互依赖。

约束或调控我们自身

费斯特的兄弟，原本很可能会对“没有差别”这个笑话采取攻势并暴跳如雷。幸运的是，他与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气急败坏？他一定发展了一些能力，使得他可以约束或调整他的行为，以便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安全和有用的参与者。如果人们没有按照这种方式变得自我调控，他们就会引起很多麻烦。

语言和自我意识，是自我调控或约束的前提条件。但是，仅有这些并不足以控制我们自身。我们还必须发展出其他几个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来的人的特征。

首先，我们必须非常重视我们用来理解自身的意义。我们重视它们，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凝聚力和可持续性。你今天是你母亲的儿子或女儿，一如你昨天所是。这一知识，以及其他你的身份知识，允许你从今天到明天舒适地肯定你是谁和你是干什么的，让你保持神志正常，精神健全。

如果你与一些身份特征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你（和他人）高度珍视那些身份特征，事情将会更好。如果这是真的，这些被重视的身份特征就会成为自尊的来源。这是你重视它们的另一个原因。而且很有可能，你从某个特定的身份特征上获取的自尊越多，你就会越发坚定地认同它，并将自己与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切与自我约束或调控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非常看重你的身份特征，你就会尽可能地设法按照能够维护它们的方式去行动。例如，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诚信的人，这时有一个考试作弊的机会，你可能会选择不作弊，以便能够继续把自己看做一个有诚信的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名好学生，并且这一自我认知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就会倾向于做一个好学生会做的事——看书，思考，提问题，准时上课，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等等。这些行为会对你和他人传达

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你确实是名好学生。

如果我们重视关于我们自己的某些想法，我们就会倾向于去做肯定那些想法而不是与那些想法相反的事。我们将会设法按照那种能让他人按照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去看待我们的方式来行动。例如，如果对某个人来说，做个“友好的人”是他或她的一个重要身份，她或他就很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抱怨他人或漠不关心的冲动，以免得到来自他人与自己感受不一致的反馈——“你闹脾气，你不够友好！”身份特征，不管它可能会是什么，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它，就会成为一项调控或约束我们行为的方法。

具有自我调控或约束意识，也取决于学会自我评价的标准。通常，我们都会想要对自己有种很好的感觉，因此，我们会尽可能地去做那些能够证实我们的能力和道德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的文化与特定情境，以及一个人宣称的身份特征。例如，一个男人也许会听说，在对待孩子上，一个好男人应该是耐心的、亲切的和宽容的。如果他可以展现出这些品质，他就能高度评价自己并由此维护自尊。

显然，不是所有的自我评价标准都会这么和善。在美国文化中，一个男人也可能会学得，一个真正的男人是强有力的、积极的、充满竞争性的和镇静自若的。他也许会由此而感到，被迫要设法展示这些品质，以便对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感觉良好。如果他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做得过火，他的行为很可能会给他人造成伤害。

幸运的是，费斯特的兄弟似乎自认为是一个坚强得足以承受少许戏弄和享受笑话的人，哪怕是为此要贬低自己。如果他一直都将自己视作那种使用暴力来惩罚觉得是侮辱了自己尊严的人，情况也许会变得非常糟糕。

至此你应该能看到并应该能理解，留意我们教给孩子的自我评价标准，以及批判考查我们用于自身的标准，为什么是必要的。不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我们将会把我们对做好人好事的能力和价值的情感，都赌在那些可能会对他人产生坏结果的事情上。

我们应该高兴，因为对多数人来说，做个好人意味着诚实、亲切、宽容、具有同情感和平和。已经学会用这些标准来进行自我评价的人，会更好和更容易相处。换言之，多数人都会避免去做那些不诚实、残暴、自私、无情和暴力的事情，

以免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这使得人们可以采用一种有用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调控或约束。如果人们学会通过很好地对待他人来寻找自尊，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在行动上表现得像个品行端正的人。

缄默知识

自律也要求具备在不同场合下如何与他人互动的知识。这一知识通常是没有明白说出的，它是知道怎样去做某些事情，但却无需把它解释清楚。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依靠很多这类缄默知识。

例如，你可能知道如何进入商店，找到在豆腐和茄子之间最好的交易，付钱购买，拎上东西离开。你可能也知道如何排队买票，如何在葬礼上行动，如何在聚会上做些小型谈话，如何在起床时穿衣服，如何在第一次约会时表现自己，如何应对你的老板，如何问路和指路，如何在公众场合擤鼻子，等等。这些可能看上去都是些极其简单的行动，但那只是因为我们忘了它们需要的知识有多少。

想象我们给一个机器人进行编程，让它寄信。乍看上来，似乎仅需两个指令就够了："把邮票贴在信封上。把信投入邮箱。"但是，机器人实在是太笨了，你要不说清楚，它什么也做不了，因此，你必须给它提供明确的指示。你必须说清楚一张邮票是什么，如何选择正确种类的邮票，一个信封是什么，应把邮票贴在信封上什么地方，一个邮箱是什么，在哪儿能找到一个，怎样把信封投人其中，等等。你的机器人需要知道所有这些事情。

最终，你的指示单可能会有数百，甚至数千行。与一个机器人需要一个长长的编程去做像寄封信这么简单的事情相比，更让人吃惊的是，你的头脑里已经了解了所有这些知识这一事实。想象某人设法编程机器人做你会做的所有的事。所有的知识——可能有数亿行？——都能输入一种没有大脑本身复杂的形式里，是不可能的。

作为缄默知识的另一个例子，想想你必须知道什么才能用英语说出一句话。你能否解释如何才能做到它——如何把所有的词按照正确的顺序组织起来，以便从你的嘴里说出一个连贯的句子？可能说不清。但你仍然知道怎样去说。也许只是某种程度的知道。

知道如何与他人互动的情况，与此非常相似。就像我们需要知道英语语法规则来构成正确的句子，我们也需要知道社会生活的规则，以便能够让我们的行动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条理的、清楚易懂的整体。

我们需要知道的某些规则具有规范性，例如，不要把他人当做物体来对待、或是要尊重他人的感情。这些规则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何作出有道德的行为。其他规则是程序性的；它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让情境按照我们想让它们展现的方式展现出来。

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同样的程序规则，我们就能顺利地继续去买茄子和豆腐，去排队买票，去遵守规则开车，去进行聚会，去谈恋爱，去念大学，等等。当我们设法一起做事时，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会对事情如何持续进行有一个粗略的想法。一旦我们拥有了必要的处理惯常情境的程序规则，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生活，而不必打电话要求家人提供指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变得更加自律。

这些规则不是从我们内部来控制我们。相反，它们是我们用来与他人一起完成事情的资源。有时，我们会通过打破规则来完成事情。

例如，假设有这样一条规则，“不要盯着人看。”当顺着一条拥挤的街道行走时，你遵循这一规则来避免受到陌生人的注意。你希望自己主动避开目光接触，就不会为陌生人会去看你而烦恼。在其他情况下——像在公交车上别人侵占你的地方——你也许会违反这一规则凝视对方，就像是在说：“请离我远点。”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凝视也就成了一种传送信息的方式。这样做之所以会起作用，是因为人们知道社会规则反对凝视，并且知道打破它是别有意味的。

让事情步入正轨

人际互动的基本规则，使得我们可以轻松地应对大多数情境。但是，当规则不够清晰，或者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这一情境是什么，或者是当人们不同意规则应该被使用在某一特定场景下时，问题仍然有可能出现。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人际互动也可能会出错。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能够让事情重新回到正轨上。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往往会通过谈话来做到这一点。在混乱或冲突的情况下——当某人看上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按照适宜的规范行动时，或

者拒绝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时——我们通常都会谈论我们的某些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必须做的比谈话要更多。我们也必须能够采取他人看问题的视角。这意味着，需要想象他人在想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以及有可能怎样去做。

我们学会这样去理解他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能够体会他人的处境和心境，“如果是我处在那种情境下，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有可能会怎样行动？”有时我们必须从他人的言行表现中作出推断。我们可能会想：“她看上去没精打采，不修边幅，不直视我的眼睛，她的声音听上去很是疲惫和悲哀——她可能非常抑郁和绝望。”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有些夸大其词；一个人内在的情绪状态通常是非常微妙、不易看到的。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学会如何“从内”去看他人，以便我们能够预期他人将会如何行动，以及他们期望从我们这里获得什么。

一起做事，要求我们能够以这些方式去理解人们。在社会世界中找到我们正确的行进方式，需要的不仅是我们必须具备通常情况下进行互动的规则。我们必须也能应对通常比较少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了解陌生人是怎么想的和怎么感觉的。谈话和站在别人的视角，是我们了解事情如何继续下去最好的方法。

同情他人和与他人同在

或许我前面所说的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自律仅仅是依赖理性推理，因此，如果人们只要想得对，他们就会是温和可亲的和考虑周到的。不管怎样，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理性并不足以使得我们可以不去伤害我们自己和他人。就像历史所显示的那样，人类总是能想出种种理由和借口来让严酷和暴力成为合理的。因此，逻辑和合理推理并不足以确保人类就会按照人道的方式去行动。同样重要的还有能力和意愿，以及同情他人和与他人在一起。

我正谈及的是可被称作“与心同在的视角”——它使得我们可以对他人作出有情感的回应。我们的反应可以是充满同情感的（同情他人）或心灵相通的（感觉与他人同在）。如果我们为一个父母去世的朋友感到悲伤，那就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反应。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朋友的一些哀情，就好像我们自己的父母去世了，这就是一个心灵相通的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不论哪一种，我们都体验到了回应他人情感的情感。像这样的反应并不是自动就有的；我们也可以拒绝产生它们。

假设你有机会窃取一大笔钱，这笔钱原本是捐赠给穷人的孩子买药品用的。金钱就在那里，没人看管，也没有什么东西监视。你可以用它来付账，买新的立体声音响和进行一大堆有趣的活动。被逮住的机会微乎其微。你会怎样决定是拿还是不拿这笔钱？

你也许会设法想象窃取这笔钱会让他人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捐赠并收集它的人会变得非常恼怒。预期将会从中受益的孩子们会是哀伤的、沮丧的，不得不承受他们所需药物缺乏的痛苦。如果你被抓住并被送去审判，你的家人朋友会感到羞辱和失望。你大概也会感到自己对自己的憎恶。如果你能想象出所有这些情境，并能让自己感受到如果你偷走这笔钱他人可能会感受到的，你大概就会不去理会它。

但是，假设你的头脑比你的心转得更快，并且在你感受到任何事情之前你就认为，"捐出这些钱的人是富人，他们仅仅是想少交税；他们并不是真心关心那些可怜的孩子。至于孩子，我确信他们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帮助。此外，多数医药都没什么好效果；你最好不要去使用它们。我甚至怀疑这么多钱最终会有多少能真正花到孩子们身上。这些钱很可能会悄悄进入主管人自己的腰包。这些家伙总是拥有远远超出他们真正需要的钱。我则没有。我现在穷得一干二净。这笔钱对我的帮助要远多于对他人的帮助。我只需快速把它藏起来，然后走我自己的路就可以了。"

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可以很有理性地说服你自己拿走金钱是件合理的事。这里面甚至也有一些站在他人视角的考虑，像"富人并非真正关心孩子们"。事情也许确实是这样，但它不能用来证实拿走金钱就是应该的，因为他人的情感很难预料。仅仅是通过忽略这些情感，理性才允许得出一个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结论。

我们必须同情他人和与他人心灵相通，并不仅仅是为了阻止有害的行动。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际交往，也取决于有情感的回应。例如，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在路上碰到与我们认识的人时礼节性的问候："嗨，你好吗？""很好，你呢？""我也很好。""那很好。""改日见。""再见。"乍看上去，在这里面很少有什么想法或感觉。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它服务于什么目的呢？

问候仪式，是人们互相承认对方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

知道，承认一个人的存在要比忽视一个人的存在，会让人感觉更好。换句话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尊重他人的情感，他人也尊重我们的情感。当我们度过我们的每一天时，这是一种小小的仪式，可以从情感上鼓励我们和稳定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你所问好的每个人都不理你，或是冲你喊道“滚开”，你心里会是种什么滋味？

小小的礼貌行动，服务于同一个目的。这些小行动——请、谢谢、对不起等等——符号化了对他人的尊重。这些行动告诉他人，我们可以作为互动的个体相互信任。如果我们用这些小的方式来表示尊重，我们也就可以信任对方不会采取那些破坏他人情感的方式行动。这里暗示的是，有情感地回应他人，是与他人一起完成任何事情所必要的。

我们也必须有情感地回应他人，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感受或情感。他人也能——如果他们想要那样做的话——拒绝我们的身份声明（即他们可以拒绝接纳我们宣称的我们是一个好人），或是用一种轻视或不尊重人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当然，我们同样可以这样对待他人；如果我们倾向于否认他们的身份要求并且不尊重他们的话。这是我们在情感上与他人紧密相连的另一种方式。我们恭敬地对待他人，他们不仅会因此而对自己感到很好，也会因此而使得他们感到自己有义务按照巩固我们珍视的身份特征和让我们获得自尊的方式对待我们。

我们多数循规蹈矩的行为，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他人的情感反应和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之上。换句话说，我们关于自身的好感觉或坏感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如何回应我们，以及我们如何想象他人正在评价我们。例如，考虑一下刮腿毛的惯例。

当我询问我的性别课上的女性，为什么她们会做这样一件古怪的事情时，她们通常会说：“那有什么，那是个人选择，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腿毛刮掉后看起来更好看。”这是一个有用的回答，因为它并非没有一点意识存在其中。为了展示这一点，我会问：“既然是个人选择，为什么班上每个女性都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如果它真是一种个人选择，难道不应该至少是有10%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吗？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被认为看重个性的文化中。”一分钟后，答案来了：“我男朋友讨厌它”、“你要不那样做人们会认为你是个女同性恋者”、“你

不能在公开场合穿短裤，因为人们都会盯着你看”。因此，真正有风险的是对自我的感受，它会受到珍视的或想象的他人反应的影响。

你可能会想了，“可是如果我们的文化就是喜欢或流行腿上无毛，就是不喜欢男人穿着随便，你又有什么办法？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每种文化都有它的时尚。”你说的一点没错，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必须面对人们为什么会感到必须遵守传统。需要看到的重要的一点是，传统的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对他人的情感回应。反过来，这一情感回应来自于我们想象他人将会怎样评判我们的能力，来自一种想要对我们自己感觉更好的渴望。如果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感觉他人认为我们是蠢笨的、丑陋的或不道德的，我们很难会对自身有好感。

将我们自身与他人分割开来的风险

我们对他人的情感回应，激励我们去尊重地对待他人和尽可能地和平相处。知道我们的情感为他人所控制、他人的情感也会为我们所控制，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友好相待。不过，我们的回应也有可能出现破裂。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切断对特定他人的情感，并放弃与他们的联系。

例如，在战争中，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人们，定义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人们为敌人。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战争要想进行下去，相互对立的国家的人们，必须停止对对方抱有同情及与对方在一起。这一情感分界线，就是使得普通的和正派的人们变成冷血动物相互残杀的东西。如果敌对双方的人们能够感受到那些被射死、杀死、烧死和残废的人的痛楚，也就不会有战争存在。发布杀死对方命令的政客和将军们，也许会被驱逐到一个他们不可能在那里发布伤害他人命令的地方。

甚至是在战争中，人们也会对一些人——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保持情感上的回应。在一个共同的敌人和死亡的远景面前，情感纽带可以是强烈的。如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这种强烈的情感纽带，他们也许就会发现战争具有吸引力。这看上去就像是，短暂地爱你的邻居、你的朋友的代价，就是大量杀死他人。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我们对某些观众的判断反应太过热情，因而感到有义务

去做我们明知是错误的事情。我们渴望被一个群体内的人接受和喜欢，会导致我们去伤害其他群体中的人们。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可以警觉到这种危险。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对一个群体的忠诚正在引导我们较少人性地去对待另一个群体的成员，我们就可以在心底追问自己："如果我漠视他人身上的人性仅仅是为了在这里被人接受，由此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应该对其他自律的人们大声提出的问题。

人们不必非得是在战争中才会发生这种切断情感回应的事情。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感到没有办法从另一个群体那里获得尊重，受歧视的群体成员就可能会停止在意另一个群体成员的情感和评断。通常，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和被压迫群体之间。例如，在美国，持续数个世纪的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导致许多黑人对白人的蔑视，和对被定义成"白人"事情的鄙视。这不是"反向种族主义"，而更多是一种对占支配地位、歧视性的文化的拒绝。

因此，对他人不带情感的回应，可能是一种自卫行动。它可能仅仅是太过心痛，而无法去在意那些在任何场合下不尊重我们的他人的看法和感受。

然而，还有这种切断情感联系发生的其他原因。也许是占主导地位群体的成员，为他们引起他人所受的痛苦而感到羞耻和负罪感。倾听和同情那些被虐待和深深伤害的人，痛苦得让人难以承受。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许多白人在倾听黑人描述种族主义带给他们的痛苦时会感到很难受的原因所在。对白人来说，感受到这种痛苦和悲哀、承认他们对引致其发生至少应负部分责任，实在是太难了。

相似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彼此相爱的人之间。如果别人伤害了我们爱的人，我们很容易产生同情和产生心灵感应。我们会尽力同情受伤的人和与受伤的人在一起。但是，如果导致我们所爱的人受伤的来源是我们的行动，我们可能就不会在情感上有所回应。可能我们就会使用理性来避免应对感情。我们也许会说："很抱歉你感觉自己受到伤害，但你要是仔细考虑情况，你会意识到你误解了我的行动；因此，你不应该觉得你受到了伤害。"

我们中极少有人会想要因为意识到我们伤害了我们所爱的人而感到负罪感，因此，我们会尽可能地定义他们为不合理性、过度敏感或是误解了我们的真实意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样做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他人具有情感回应。如果

我们不这样去做，我们就不必在运用理性上如此聪明，以避开因为我们而导致他人痛苦所产生的不愉快的情感。有时则是因为担心，如果我们敞开心怀同情他人和与他人在一起，他人可能会使我们感受到的，而把我们分离开来。

理性并非情感的敌人。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对情感进行分类，选出最好的行动方案——可能是最好地尊重他人情感的一个。确切说来，因为我们有时会有抨击或怒斥他人的冲动，我们需要理性来使自己变得平和自律。例如，我在这里使用理性来争辩有情感地回应他人的重要性。只有在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他人或我们的情感，我们使用理性来避免倾听他人时，问题才会出现。

有意识的抵抗

我们所有人都会在意某些人超过其他人。对所有人来说，总会有某个群体对我们非常重要，不论我们是否承认这一点。甚至那些十多岁的孩子（他们摆出一副冷酷的造型声称“我不在乎任何人会怎么看我”），也在养成一种想象，去打动同龄人给同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和惹恼父母。这一不关心任何他人会怎么样的声明，同样是自我表现的一部分。

然而，可能有更好的理由来抵制特定他人的评断或看法。女性可以决定不刮腿毛，作为反对性别歧视文化的一种方式，这种性别歧视文化坚持认为，女性应该是光滑的、柔软的和讨男人欢心的。非裔美国人可以决定不把他们的头发理得溜直溜直，作为抵制种族主义文化的一种方式，这种种族主义文化把白人的美的标准强加到黑人头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决定不去理会政治家和将军的看法，他们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忠于国家的公民，我们必须憎恨和杀害另一个国家的人们。在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下，决定不理会某些人（观众），可以成为一种抵抗压迫的方式。

决定不去理会任何一个群体人们的看法和情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会有代价的。不刮腿毛的妇女，也许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找到一个和她共同分享其反性别歧视价值观的伙伴。在有些地方，一个抵抗公司老板权力的人，可能要面临失业、拘留、拷打和死亡的威胁。因此，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的抵抗

行动。如果我们决定忽视一个群体的愿望和感觉，它必须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与促进在更大的人类群体中的正义和平等。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对他人的情感回应，极大地受到我们生活所处境况的影响。例如，在一个因为不平等和不公道而有着很多痛苦的社会，可能很难一直放开我们自己，做到同情他人和与他人在一起。我们可能会感到自己被所有这些苦难所淹没，因而想关闭自己，不想去面对现实。如果我们自己是不公道和不平等的受害者，并因之而沉浸在我们的痛苦中，我们也很难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不平等还会以其他方式影响情感回应。权力集团的成员可能不会对无权无势的人作出回应，因为权力会产生一种尊重他人情感的缺乏。与此同时，被压迫群体的成员则可能会对权力集团的情感和看法缺少尊重，因为看上去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赢得对方的尊重。并且在特殊时期、战争时期，社会中的许多人都会尽可能地切断自身与那些他们正在战斗的人们的情感联系。

或许你能看到群体间的界限为什么会这么重要。这些界限可以确定谁是自己人——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值得关心和尊重，以及谁是局外人——不同于我们的人——他们较少值得关心和尊敬。当然，我们没必要去相信这样的界限和由它们创造的区别的幻觉。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将会质疑所有这些界限和分类，因为它们会减弱我们对他人的情感回应，从而更有可能对他人作出不尊重和虐待行为。

社会学意识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更多超出社会化重要性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产生出和蔼的、高贵的和聪明的人民，要求细心的教养。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事情：我们怎样组织自己生活在一起，也会影响到人类的创造。在一个社会中，大量的不平等会产生恐惧、虐待、不信任、不尊重、甚至是相互仇恨，并会将人们相互分开。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就好像我们中许多人都是在箱子里长大的。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注意到，社会生活怎样塑造我们成为人。我们会询问："我们的信仰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方式，是帮助还是阻止了我们平和自律和有感情地回应他人的能力？"社会学意识并不是对那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寻找答

案的实践——一种非常重要的看到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世界的实践。通过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能够看到的不仅是我们怎样变成人，而且是我们怎样才能生活得更有人性。

没有终结的对话——社会世界里的头脑和心智

为了回应我就“成为人”所说的，我想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必须解决的是，我们的体验怎样按照我们以后不会改变的方式塑造了我们。一个学生这样表述这个问题：“你所说的看上去就像是，不论什么时候，人们都可以变成他们想要成为的人。但是对人来说，难道不会按照不确定的方式受到损伤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应该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不认为人们能在任何时候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人们确实能够改变自己。但是，根据我们正在谈论的改变的类别，改变的过程可能是艰巨的和复杂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怎样在童年就已被塑造定型；也是因为我们怎样作为成人适应社会。

变成人的一部分是，获取理解、思考和感受的方式。当我们快要临近成年时，这些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在我们的内心——就像木头的纹理，作为树木如何成长、如何获取营养、在它的生命中怎样承受压力的结果。当然，我们不是木板，因此改变依然是可能的。但是，过上一段时间后再作出改变，往往会有更大的压力。

这样的压力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你可以大致想象它们是什么：改变我们世界观的新观念，产生混乱情感的体验，要求我们采取不同于我们惯常行动的人们，一个使得旧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派不上用场的新环境。有时，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压力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改变了我们多少，直到几年过后当我们回首往事，才会惶然发觉自己已经改变了许多。有时，我们也会主动寻找这样的压力，希望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我们自己。

使得改变难以发生的是，（即便是我们主动寻求改变）我们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对它产生抵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如果我们每天都在改变，不能维持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观念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我们就会失去对

现实的控制感。太快太多的改变，会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给我们自身造成混乱。因此，我们必须总是保持一只脚踩在刹车上——就字面意思而言。

一个老的社会学观念认为，改变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她放进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在这一环境中，有全新的人、全新的关系、全新的观念、全新的工作等。其隐含意思就是，那些声称想要改变但却不能或不愿改变其所处环境的人，不可能发生很大改变。这是那些其问题源自已经适应糟糕环境的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情。除非他们可以进入不同的社会世界，他们很可能会一直陷在麻烦与问题之中。

这时我们再回头去看，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说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是种太过简单的说法。当我们努力去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抵制急剧变迁带给我们的压力。而且，我们周围世界的秩序性和稳定性——他人会怎样想、感受和行动；以及外在环境的稳固性——都会导致我们保持原样不动。

到目前为止，我忽略了问题的另一半：人们是否会在这一成长过程中损坏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是不可修复的？或者换种问法：人们是否会被他们的经历伤害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无法像有智力的成人一样正常地与他人和平相处？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想到的是在被虐待和被剥夺的情况下长大的男子，他们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犯下一件又一件冲动的暴力犯罪，最终经常是以进入监狱收场。

这些人是否就是不可逆转地被损坏了呢？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社会学意识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想法。

要记住的一件事是，行为是环境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个性的产物。在第6章我会更多地谈到这一点。这里我仅仅是指出一个极其明显的事实：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多数人都有实施暴力行动的潜在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应匆匆忙忙就得出假设，有过暴力行为历史的人，要比其他人会产生更大的危害性。可能他们仅仅是深陷——远远超出多数人的情况——诱发暴力的环境中不能自拔而已。

同样需要记住的是，有许多人把他们的生活彻底翻了个过。有时，那些多年来一直都是按照卑鄙、自私和暴力方式行事的人，会突然体验到一种觉醒、一种

急剧的心灵和精神改变，而这则会导致他们产生完全不同的行为。因此，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对假定不可逆转的改变保持警觉。可能某些人仅仅是需要发展出同情心的机会。

但是，早期成长经历仍然可能影响到以后的成长。例如，如果儿童没有在非常关键的“发展窗口期”[1]学会使用语言；这一窗口期存在于他们非常小的时候（当他们的脑子形成神经网络）时，他们可能这辈子都发展不出正常运用语言的能力。换句话说，在生活中关键时刻的极端剥夺，可能会使后来学会某些事情变得非常困难。但这是否意味着这里就存在不能挽回的损伤呢？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人脑是一个惊人的容器，并且让人吃惊的心理改变的案例，或者是大器晚成的天才揭示出：大脑在正确的环境刺激下，能够产生更多的成长和自我修复，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

因此，有很好的理由去怀疑人们遭到损伤后难以修复这一声明。这看上去是

1 “Developmental Window of Opportunity”，中文译作“窗口期”。宝宝0—6岁大脑分区发育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在某些时期大脑对某些信息接收特别快。这些独特的时期称为窗口期。不同生理功能的窗口期是不一样的，如：0—1岁半是视觉的窗口期，1—3岁是语言的窗口期，3—4岁是数学和逻辑能力窗口期……处于不同的窗口期，大脑对相应信息特别敏感，因此能更快更高效率地接收和学习该种信息，例如婴儿开始注视大人说话的嘴形，牙牙学语时，“语言窗口”就随之打开，语言能力迅速提升。然而，“窗口期”是有时间性。如果大脑各区域的脑细胞在窗口期没有得到充分刺激，成年后，这些没有被激活的脑细胞就会逐步萎缩。一旦错过窗口期，脑组织结构就会趋于定型，潜能发展也将受到限制，原本优越的天赋将逐渐流失。正如世界学前教育的先驱福禄培尔所指出的：“我们对于儿童的帮助不宜过多、过早、过快，也不宜过少、过迟、过慢，应不失时机和恰如其分。”由于窗口期宝宝对某些信息接收特别快，此时父母就要给予0—6岁宝宝合适的、充足的“精神营养”帮助其成长。这些精神营养是指有针对性的教育，教育的重心不是简单灌输知识，而是注重各种能力的培养，帮助宝宝日后的潜能激发，影响长远的发展。以语言窗口为例，当宝宝语言区域分化发育进入语言的窗口期时，父母一方面应尽量多和宝宝进行语言交流，另一方面要注意用正确的词语、完整的句子、标准的发音，给宝宝一个正确、科学的语言基础。另外，还应多向宝宝介绍身边的事物，加强宝宝的词汇……当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要激发宝宝的兴趣，寓教于乐，让宝宝在窗口期能快乐地、快速地把能力培养起来，为日后潜能的激发打下基础。

不可能的，除非严重受伤或有严重疾病。尽管如此，关注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发展仍是合理的。不管怎样，按照社会学意识方式来做这些，暗示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不只是要追问由剥夺或残酷虐待造成的损伤，我们还必须追问怎样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会被剥夺（不应被剥夺）或受虐待，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最好的人类特性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

* * * * *

一个选上生物心理学课的学生，提出了一个关于基因对行为影响的问题。她问："科学家正在了解越来越多基因影响行动的东西，难道不是真的吗？"是的，它是真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到基因可以脱离环境，直接影响行动。实际上，他们所了解到的恰恰相反。

如果你想要一个技术性的解释，你必须去查询一本不同的书。这里我将使用隐喻来解释基因是什么，以及它们会起到什么作用。它们实际上是一个食谱，被编码成分子形式，把蛋白质分配到活的有机体中。但是引导整个过程的基因，就像所有食谱一样，并不保证最后就会出现一个特定的结果。结果更多地取决于环境——想一下厨师混合各种成分，设定烤箱温度，判断什么时候东西已经烤好可以出锅，如何按照食谱上所说的去做这一互动。

因此，即使我们谈到身体怎样发展，单是基因自身，并不会严格地一成不变地确定过程或它的结果。如果我们说到大脑——尤其是回应环境刺激而形成的中枢神经系统——甚至很少有基因决定。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说到心智——思考和内在精神展现的模式——很难看到基因在这里面起了多大作用。基因引导大脑进行人类思考的构建。但是它们并不能决定那些想法将会是什么，或者伴随那些想法而来的是什么样的行为。

研究这些事情的科学家正在了解到，在基因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比先前所预测的更多的互动。这支持了我的观点——想要摆脱天性和教养是人类发展的促成作用是徒劳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主要关心的都是行为，而不是人体解剖学。因此，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把身体塑造（主要由基因引导）与头脑塑造相混淆。后一进程取决于文化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强烈希望相信基因决定行为的人们，经常忽视人类存在的这一明显事实。

关于情感的注解

我们通常认为，情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内心，产生于作为个体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心理动力。第4章开篇我的跑步故事表明，恰恰相反，情感来自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互动反过来由社会分类中的成员所塑造。但是关于情感的社会本性，要比我所说的还要多。

很容易看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情绪受到与他人互动的影响。较不明显的是，成为人的一部分是学习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应当如何做、如何正确地展示情绪、如何控制我们的情绪和如何感知他人的情绪。没有学会这些功课的人，将会被视作是一个陌生人，在度过自己的每天生活中都会很艰难。

假设你在高速公路上高速驾车，这时某个人突然把车切入你的道路上。你迅速打转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为此你险些控制不住你的汽车。当这一惊险时刻过后，你的手还在不停地颤抖，并且你的心也在一个劲地怦怦直跳。现在怎么样？你感到了自己有什么情绪吗？或许你还没有什么情绪，因为你还处在刚才那一惊险的场景中没有回过神来。你可能会判定你感到害怕、愤怒、悲哀或是感恩——或者是这些情绪的某一混合。你必须去做的是，解释你由此引起的状态并为之贴上一个标签。这同样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成为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理解我们内心里将会发生的。

我们怎样标记我们的感觉非常重要。在上面的例子中，觉得非常愤怒的司机，会尽可能地追上那位突然改道的司机并进行报复。当然，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为了阻止这样的反应，被触犯的司机也许会设法（希望是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通过想象如果因为自己的这一举动而引致无故的人受伤或死亡，该是多么糟糕的事情。或是通过想象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将会失去的那些美好的事情。

思考我们对改变有何感受，被称为情感工作。学会如何做这种工作，是成为人的另一部分。社会生活可能确实会在情感上把我们撞翻。但是，文化也使我们有能力应付社会世界里出现的碰撞，或是独自一人，或是共同作出。

三思而行

1. 理解人们与我们紧密相连的一种方式，就是使用“二十个声明测试”。测试非常简单。人们自己问自己“我是谁？”然后写下浮现在脑海的前二十件事。尽可能这样去做，看看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有助于你对你用来理解自己的意义进行反思。浏览一下你的表单，你觉得其中哪个意义对你来说最为重要，为什么？这些意义怎样依赖于你与他人的关系？

2. 当我们想到“社会化”时，我们常会想到父母、老师和其他成人告诉孩子如何行为。社会化确实经常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发生的。父母、老师和其他成人经常给孩子关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明确指示。但是，如果我们留意到社会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会注意到两件事——多数指示都不够清晰，多数指示都是通过孩子与他人互动来完成的。回想一下你是怎样学会作为一个女孩或妇女、男孩或男人来表现的。你从你自己的观察中学到了什么经验教训？你从与你的同辈群体的互动中学到了什么经验教训？

3. 成为人的一部分和学会在社会中与人相处，也包括养成“适应性习惯”，即回应他人和情境的习惯性的方式。一般说来，我们会养成和维持能起作用的习惯。不过，当在一种情境下起作用的习惯，进入另一种它们不起作用的情境中时，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许多人可能都会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即把每种情境都视作一种竞赛，并尽可能地在这里面超过所有人。这一习惯性的竞争意识会在哪儿、会怎样和会对谁引致问题？鼓励多数人（尤其是男人）养成这种习惯的美国社会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参阅书目

Erikson, Erik.(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Gerth, Hans, & Mills, C. Wright.(1964).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Harbinger.

Goffman, Erving.(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Pantheon.

Hochschild, Arlie.(1983). *The Managed He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ne, Harlan.(1977). *The Wild Boy of Aveyr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wontin, Richard. (2001). *The Triple Helbc: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ead, George Herbert.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iaget, Jean. (1954).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 New York: Basic Books.

Polanyi, Michael.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Shibutani, Tamotsu. (1961). *Society and Personal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6
作为互动产物的行为

在演讲结束之后，演讲者通常都会问上这样一句："谁还有什么问题？是否有需要我解释清楚的地方？"——下面一片沉默。大家默默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情况，因为似乎不太可能，哪怕是一场无比乏味的演讲，不会让头脑清楚的成年人产生任何反应。那么，我们怎样来解释这一沉默呢？或许那些去听演讲的人，不论是在大学里还是在其他地方，正在受到过度沉默主义失调的折磨。

看上去，听众席上的每个人不可能都有相同的个性特质。并且你自己的体验会告诉你，过度沉默主义的想法是个傻想法。即使你很少在演讲过后提问题，那也并不是因为你天生就喜欢安静。毕竟，在别的场合下，你可能会滔滔不绝，声音非常大。但这仅仅是更加增加了神秘感。为什么有时滔滔不绝、声音很大的人们，比如像你一样的人们，会在演讲以后仍然沉默地静坐着？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可以通过看到人们所处的情境而不是看人们的个性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会设法确定人们保持安静的条件，即使他们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或许我们会发现，当人们认为他们的智力将会被他人说三道四、不是平等地参加讨论，以及感到提问题有可能让自己出丑时，他们就会倾向于静静地坐着。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些情况在多数举行演讲的地方都会存在。

关键是，人们对其所处情境回应的行动，建立在他们认为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可能遇到的风险这一基础之上。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使用。然而，我们经常考虑不到他人对他们所处情境的认知。如果另一个人的行为非常糟糕，我们也许会在心里想，"真是太可怕了！我可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或许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他人是怎样认知他们所处的情境和作出他们的选择，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快地作出判断。

这里是一个你可能已经听说过的例子。1964 年 3 月的一个深夜，一个名叫吉诺维斯的年轻妇女，在纽约皇后大道自己所住的公寓停车场附近被刺死，当时有 38 个人从他们的寓所里看到了这一幕。但是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出面干预或是打电话报警，即使他们有大量时间这样去做。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例，因为人们通常都会帮助那些受到攻击的人。不幸的是，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件都证明，在相似情况下，人们往往并没有伸手相助。

你也许会认为，"如果当时我在那里，我会作出某些事的。"也许事情会如此吧。当然，看到吉诺维斯死去的人们，很可能会在听说他人不愿帮助受攻击的女性的案例时说过与你相同的话。然而，当相同的事情发生时，他们却也是什么都没有做。他们是否仅仅是一些胆小怕事的懦夫呢？

假定懦弱是没有给予帮助的原因，也许会使我们感觉好受些，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作为更加勇敢的人，会比那些人做得更好。然而，就像怯懦是一个坏的解释一样，过度沉默主义在本章开篇的例子中也是一个坏的解释。我们必须再次注意到事情发生的背景，以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去做什么或不去做什么。

在吉诺维斯案中，背景包括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对我们的邻居极少有非常熟悉的了解。在一个大城市，甚至是在郊区，我们可能与人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却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因此，在某些场合，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是否应该插手去管别人的事。这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许多愤怒和带有暴力倾向的人，警察不可能在一天中的每时每刻，都守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因此，担心"卷入其中"会让我们自己成为受害者，并不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

情况也可能会非常混乱。对方是否需要帮助或是想要帮助，往往并不是非常清楚。如果一个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人躺在马路边，碰巧路过的人们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你是否应该弯下腰来看看他是否需要帮助？如果你看见一辆停在一条繁忙的高速路（数百辆车正飞驰而过）一边的敞篷车冒着青烟，你是否应该返回去进行帮助？或者假设你看见一个妇女冲出酒吧，一个男人追上她，抓住她的胳膊，为难她。这是正在进行中的攻击、是酒醉恋人间的争吵，还是企图中止盗窃？

即使我们认为对方需要帮助，我们也经常会喜欢想象别人将会给予帮助。或许当你看见马路边上一个男子、一个冒烟的小汽车或一对争吵的夫妇时，你会认为，"为什么我应该是那个参与其中的人呢？我这会儿正忙着呢。实际上，我正在跑步前进生怕迟到。再说了，如果那里急需帮助，我相信肯定会有人上前帮助的。"当然，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会去帮忙。

认为情况可能是模棱两可的、给予帮助可能是危险的、无知地对没有提供帮助合理化，并不是可以找寻的借口。辩解或指责，也不是问题关键所在，关键是要意识到情境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它是要尽可能地去了解人们为什么会照他们所做的那样去做，而不是去判断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到我们作为当时情境的局外人想象我们会做的。

理解人们在一定背景下的行为，我们必须掌握当时具体情况的事实：谁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怎样和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对谁做了什么。如果我们回答不出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人们为什么会照他们所做的那样去做。我们也一定要意识到，情境对置身其中的人来说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事物，这是一项因为有偏见存在而更难做到的任务。

例如，年轻的非裔美国妇女，尤其是生活在市中心贫民区贫穷的妇女，经常被指责多要孩子以便可以接受福利。这些指责通常是由那些对市中心的工作前景、对种族歧视、对穷人（尤其是青少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对实际上能为他们提供多少福利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提出的。尽管存在这些无知，指责者还会大放厥词："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想工作！他们宁愿过性生活、生孩子、靠政府帮助来维持生存！"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追问："谁有多少个孩子？对这些年轻女性以及

对那些使她们怀孕的男人来说，世界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怎样看待性和计划生育的？对于他们来说，成为父亲或母亲是什么意思？在他们所在的社区，他们有什么机会可以谋生和赢得尊重？是否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工作？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代价是什么？普通工作能提供多少金钱？福利保障能提供多少金钱？”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一个透彻明白的回答，我们才能开始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让人们解释他们自己的行为，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接受他们的解释。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在准备判断他人之前，先去倾听一下人们怎样解释他们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没有倾听他人，可能我们就应该保持安静，直到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对方的知识。

依赖刻板印象和偏见，要比去了解关于他人生活的事实，更容易做到。谴责别人所作出的在我们看来是不应该的行为，而不是去理解我们不喜欢的行为源自超出个体控制的环境，也会让我们对自身感觉良好。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抵制住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诱惑。我们当然想要他人考虑到导致我们作出我们行动的环境，尤其是当我们没法做到像圣人一样生活时。

文化背景

对背景具有社会学意识，也意味着要注意文化——由一群人所共享并由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信仰、价值观和惯常。因为文化是一个群体适应环境（它存身其中）的产物，它同样必须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虑。看上去有些奇怪的是，信仰和行为，通常只有在我们考虑到群体设法生存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如果考虑到了文化的存在，我们可能就会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对局外人来说似乎是古怪或错误的行为，在局内人眼里则是正常和适当的。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行为，仅仅因为它是某一群体做事的传统方式，或是因为它有助于人们的生存，就都是好的。而是说，如果不去考虑在他人的世界里他们一直被教导的什么是正常的和正确的，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们所做的和为什么会那么做。

我们同样必须记住，人们没有办法去选择他们出生其中的世界。如果我们出生在一个安静而富有的世界，我们可能只需提出要求，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

如果我们出生在一个资源匮乏、艰辛度日和绝望的世界，我们也许会学到，我们的生存取决于具有主动进攻性，甚至是暴力。这并不是为了证明侵略和暴力就是正确的，而是说，要理解他人一定背景下的行为，就必须理解形成其生存习性的世界的本质。

假设你是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的，在这里，任何软弱的迹象都会使你成为虐待的受害者。假设你的存活取决于对所有威胁你的尊严（尤其是在公开场合）的快速报复。现在假设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当一名销售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必须忍耐被你的老板所控制，被工友所戏弄，被顾客所欺侮。你是会一天又一天地带着耐心和很好的幽默感来回应这一切，还是会转而依靠你以前养成的旧习惯，在你忍无可忍的那一天将你的老板、工友和顾客统统暴打一顿？

如果你来自一个不同的背景，你也许会认为，“所有低层次的工作都需要忍耐某些讨厌的人。在你升入一个更好的位置之前，你只有默默地忍受。”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是因为你学到的是不同的生存习惯。可能你已学会掩饰你的情感，老板让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以便与人和睦相处，事业一帆风顺。这一策略在有些世界确实很管用，但它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管用，它也是有代价的。

假设你已形成这样一个习惯，即别人让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假设这一习惯已经使你得到一个有着高薪的好工作。一天，你意识到公司计划生产的一种产品是有瑕疵的，将会在某些方面伤害使用它的人。你争辩说，产品应该重新进行设计，以便使其变得对用户更安全，但你被告知：“那样做将会大大提高生产成本。我们将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如果有人受到伤害，会有保险包括其中。”因此，你依赖于帮助你获取成功的习惯——你做了告诉你的事情。然后，就像你所预见的，某些人因为买了你公司生产的产品而严重受伤。

在所有这一切都披露给公众之后，局外人说你应该提出警告或者放弃你的工作以示抗议。你本可以让那些人避免受伤，但你却并没有那样去做。为什么？我们可能会说，你是软弱的和不负责任的——就像那些多要孩子以领取福利的妇女们一样。或者我们也会以尽可能地在你所处的背景下来理解你的行为。

我们应该意识到，你的选择就像你所看到的那样。如果你抗议得再大点声，你是否认为自己会被工厂开除？如果你离开或被开除，你是否相信自己还能找到

另一份工作？你是否相信，如果你揭露内幕，你的职业生涯将会就此毁于一旦？或许你还有孩子要考虑。如果你丢了工作，你如何去支付他们的衣食住行、求医治病、学校教育等等？因此，你可能感到自己最好还是什么也不要说。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你的工作对你意味着什么。可能就像美国文化中的多数人一样，你学会了把你的身份寄托在你的工作上，因此，失去你的工作，对你来说会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或者可能你会被教导，是发布命令的老板，而不是负责执行命令的工人，应该为结果买单。这是一种危险的信仰，也是一种在美国社会非常常见的信仰，但是我们不能责备你发明了它和把它放入你的脑子里。

要理解这个例子中你的行为，我们必须立刻意识到几个背景：你在其中拥有很少权力的企业；你是其中一部分的家庭和友谊网络；以及充满竞争的个体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你有合理的理由担心你的能力能否过上体面生活。考虑到这些情况，你的行为，虽然不让人敬佩，至少也是有道理的和可以理解的。

互动的惊奇

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不会引领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观点，"背景决定行为"。在这句短语中，确实隐含着一定的真理，但重要的是要看到，在一种情景下发生的，是人们设法了解如何一起做事——没有人能担保某事会像任何人预期的那样出现——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注意行为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经常是未预期的、超出互动之外的。

我们必须注意互动，因为人们并不是简单地对一个背景作出反应；他们与他人一起创造背景，推测在这种背景下什么样的行为是合适的。例如，假设你与朋友一起喝咖啡。在这一情境下，发生什么是比较合适的呢？是否是调情、诱惑、治疗、控制权、教育、争论、说闲话、崇拜、策划、竞争或偷窃观念？它可能是任意一个，也可能是上面所有的，具体取决于情境是怎样被定义的，以及互动是怎样展开的。

假设你和你的几个朋友一起在咖啡馆谈话。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其中一些事情谁也预测不到。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上，两个男人手拉手从你们身边走过。

看到这一场景，帕特说："看那些男同性恋者。我恨他们。"听到这句话大家都很惊奇，因为帕特以前从未作出过这样的憎厌同性恋的评论。然后罗宾尖锐地接上一句："可能你那么说，只是因为你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勇敢。"随着这一由两个路过的男人所触发的简洁交流，情境立马被改变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呢？依据场景如何展示，人们的生活可能会被急剧地改变。

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场景，都是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期到的。如果你去商店或电影院，你心里很清楚将会发生什么。即使如此，事情也有可能会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发生。可能收银员会评论你买的腌制的鲱鱼，你们进行了一场对话，最后导致约会和新的关系。在电影院，坐在你身后的人也许会不小心把爆米花扔到了你的头上——然后你与对方厮打起来，最终被关入监狱。甚至是在熟悉的情境下，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什么将会发生。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一个简短的小故事（是我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在这个故事中，互动导致了一个没人期待或想要的结果。

> 故事的主人公是托马斯，一个年青的男子，他在芝加哥一个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居民区中长大。他在学校学习非常努力，赢取了奖学金到常春藤大学念书。在他大一那年春假期间，他的许多朋友都去了佛罗里达，托马斯则回了趟老家。他知道，自己在家可能会给母亲一些帮助，哪怕只有一周的时间。
>
> 在他决定返校的先天晚上，托马斯与他以前的朋友德里克、贾马尔在住处附近一家酒馆一起聚了一下，他们俩都没有考上大学。虽然托马斯一直都是名好学生，从来没有惹过什么麻烦，但他却很难算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天使。毕竟，他是在一个生存艰难的地方长大的，在这里，为了生存，人有时必须变得粗野。贾马尔和德里克嘲笑他去上名牌大学，将来会变成一个"胖子，富人，白人"。托马斯接受了对他的戏弄，因为他知道，对他的朋友来说，这是他们释放自己未能上大学的失望之情的一种方式。
>
> 托马斯、德里克和贾马尔开着玩笑，聊了几个小时。夜已经很深了，三个人都喝了不少酒。托马斯说，他现在必须告辞了，因为他还得赶明早的飞机。当他和他的朋友摇摇晃晃往家走时，一辆载满比他们年轻的男孩

的汽车，从邻近的一个廉租房那边朝着他们开了过来。一个人从车里探出脑袋，喊道："你们这些醉鬼，快滚出我们的街道！"德里克大声回了一句。汽车一个加速，在约有半个街区远的下个街口拐了过去。

汽车继续往前开去；在一阵紧张的时间过后，托马斯和他的朋友开始开起关于"那些日子的孩子"的玩笑，说起如果发生打斗谁会取胜。但是，原有的好心情已经被破坏了。托马斯和他的朋友安静而机警地走着他们的路。在下一个街区，他们来到了托马斯妈妈住的公寓前面。托马斯和他的朋友站在街边相互道别，这时一辆汽车加速驶来。当汽车在他们面前尖声停下时，四个车门飞快地打开——正是刚才出现的那辆小汽车。

五个男孩跳出汽车，把托马斯和他的朋友团团围拢。这些男孩中，有两个要大于其他孩子。其中一个岁数稍大的男孩说："你们这些混蛋，需要一个一个教训一顿。"贾马尔走到第一个男孩面前说："笨蛋，会有教训的，但还没轮到你来教训。"第一个男孩伸手从他的夹克下拔出一把手枪。贾马尔伸手去抓，但是他的动作太慢了，子弹射入了他的肚子。

当贾马尔摔倒在地时，传来了另一声枪响，第一个男孩的脑袋垂落下去。托马斯一个跳跃，跟着在地上滚了两滚，马上发现自己与德里克一起蹲在汽车后面。"拿着这个"，德里克说着，递给托马斯第一个男孩从车里掉出的枪。德里克有自己的枪。托马斯不想要枪，但他的手却似乎是自动地把枪接了过来。两枚子弹击中了他们躲藏其下的汽车挡风玻璃，玻璃碎片像雨水一样洒落街道。

开始战斗的男孩子想要回到他们的汽车上，这时车仍停在街边，车门大开。托马斯听见远处传来的警报声，希望它意味着枪击很快就会结束。就在这时，德里克站了起来，朝着想要进入汽车驾驶座的一个男孩开了一枪，男孩转了一下身子，回射了一枪。德里克跌倒在地，摸着他的脖子不停地呻吟着。托马斯想要上前援助他的朋友，但他感觉自己全身好像被麻痹了，一点也动弹不得。

射中德里克的那个男孩没有进入汽车，而是朝德里克走来。托马斯充满恐怖地凝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那个男孩子把他手里的枪对准德里克的

脑袋时，托马斯突然站起，大声尖叫："不要开枪！"男孩子如此吃惊，以至于子弹射到了路面。当托马斯射中他的胸口时，他仍然是睁着大大的眼睛，一脸惊异的神情。

街边的汽车一个加速开走了，在过了一分钟，也许是十分钟之后，警察赶到了现场。托马斯仍处在极度震惊中。他几乎没有明白自己因为谋杀而被逮捕了

如果这些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故事不会在这里结束。托马斯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即使他不会被判谋杀罪，他是否还能恢复他的学校生活也很值得怀疑。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在他身上呢？并且，尽管对那些在枪击中死去的男孩子来说故事已经结束，我们可能还想知道，在他们的家庭和朋友身上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故事展示了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将我们卷人其中的事件和行动的背景的力量。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仅仅是想聚一聚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并不想寻找麻烦。如果不是其他男孩子引发事端，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会在第二天回到他们通常的生活轨道上。托马斯也会回到他所在的学校——一个非常不同和更加安全的社会世界。

你也许会认为，"是的，你说的没错；但是托马斯和他的朋友本应知道，在那么晚的时候，在那样糟糕的街区，最好是不去外边喝酒。并且他们不应该回应车里的责骂。"这样去想确实挺有吸引力。我们经常会试图通过指责个体，而非理解背景，去理解别人陷人其中的麻烦。

在这个例子中，应该尽可能地通过托马斯和他的朋友的眼睛来看事情发生的背景。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街区，而是他们成长其中并且他们中仍有两个人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地方。在某些夜晚泡在外面某个地方和在街上游荡，是一些他们以前经常干的事情。他们也是年轻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学会听任别人侮辱而不反击可能是危险的。你可能会说，在这种时候回骂对方是一个坏的选择，但那是事后的认识。如果其他男孩不想追求战斗，你也许会认为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仅仅是做了在他们的社会世界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或者可能你会想了，"托马斯在学校又聪明又成功，做什么事都一帆风顺。

他应该很清楚最好不要进行战斗。”再次，这仍是作为局外人说着容易。（真要是你置身那种场景，不定你会怎么样呢。）托马斯并不想陷入争斗，但他陷入了这一情境，即他的生活和他的朋友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不可能去说：“等一下，小伙子们，我是一个大学生，我有着光明的前途。请让我离开这里。”考虑到托马斯是怎样长大的、他对朋友的忠诚、他对自己荣誉的尊重，以及当时那种情境下构成的威胁，期待托马斯作出这种反应是不现实的。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发生在托马斯和他朋友身上的事情，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大家相互“合作”，使得他们当中谁也不想要的某些事情得以发生。结果，因为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以及其他男孩，对他们一起创造的情境的认知，事件就像发生的那样发生了。

这个故事也建议我们用另一种方式去意识到背景。我们需要跳出直接情境之外追问：“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极少考虑他们的未来而宁愿卷入致命的暴力中？为什么他们不期望能够过上好生活？他们是怎样习惯于认为暴力是证明他们是男人的适当方式的？他们是怎样碰巧这样容易获得枪支的？”

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要意识到更大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场景得以发生。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不仅是舞台上的举动，还必须意识到道具、剧本和剧院本身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或者用第3章的话来说，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幕场景和它得以发生的背景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我们看到随机事件之前看到模式。这样一来，可能所有在某些方面与托马斯的故事相像的事情，都会开始变得可以理解。

意识到和没有意识到自我

如果在你住处附近有一个橄榄球场，请你去那里拔掉门柱。如果警察想要阻止你，告诉他们一边去别来烦你。下面是其他一些你有时间去做的事情：顺着一条繁闹的人行道裸跑；爬到交通信号灯上使劲晃它，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你要弄翻它似的；找到一个有着美丽的老橡树的地方，把卫生纸缠在树枝上，直到树身缠满那些东西。你一边做这些事情，一边大声唱道：“我们是第一！”“我们是第一！”

你也许会认为，这样做绝对是发疯了。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十有八九你会被拘捕并会被迫接受精神病症测试。但是，如果你等到你的橄榄球队赢得大赛，并有其他成千上万球迷加入你的行列，你可能可以做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不会被关押起来。你的行为可能会被视作是让人讨厌的，但却不会被看做精神病或有犯罪意向的证据。很可能你会被人视作"稍稍有点失控"。

这里我要澄清一点：我不认为你应该在任何时候去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一件，因为它们会对他人造成损害，并且会对地球显得不够尊重。这里之所以提到它们，是为了提供另一个例子，怎样对背景及其对行动的影响具有社会学意识。

在人群中发狂的通常性情温和的人，也许会在事情过后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也不关心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那些事情不是我做的。"这看上去有些像是一些空洞的借口，但是事情的真相很可能就是这样。我们赖以控制我们行为的自我意识，在人群中往往会极大地减少。

我们通常不会毁坏我们的财产、光着身子在街上跑、弄脏树木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出那样做他人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被人看做是破坏性的和愚蠢的人。因此，即使我们有时确实会有想要去做疯狂和会伤害他人事情的冲动，我们通常也不会按照那些冲动去行事，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我们将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麻烦。

但是在人群中，人们可能就会感到自己是匿名的。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不会被人认出，并且不用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当人们在人群中作出一些疯狂举动和一些他们通常情况下不会作出的事情时，那是因为他们不再关心（在那片刻间）他们将会被人怎样评判，至少是被那些他们极其看重的人所评判。或者我们可能会说，疯狂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无需去为他们那些他人可能会不喜欢的行为负责。

确定情况

你也许会认为，"并不仅仅是人群才有影响，因为人们在人群中并不会自动发狂，并且多数人群也不会故意惹是生非。"当然，你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并

非仅在于他人的在场，而是在于一个情境是怎样被确定的。在比赛结束后，人们想要沉浸或沐浴在他们的英雄带来的荣誉中。它是一种允许甚至是鼓励人们展现他们也拥有冠军不屈不挠精神的场合。一个人可能会怎样去做呢？可能会通过忽视惯常的公共场合行为礼仪的规则。毕竟，是优胜者制定他们自己的规则。

不过，同样是这群人，他们在橄榄球赛结束后作出疯狂举动，但在庄严的葬礼场合则会举止非常庄重。因此，关键是情境是怎样被确定下来的，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人们共享的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的看法。如果人群足够大，人们在葬礼上也会感到自己是匿名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会通过在坟墓附近跳舞和唱歌“叮咚！邪恶的巫婆是死的”，来故意违犯特定场合下的心情。

他人的在场，有时可能会提升自我意识。或许你能在浴室中用美丽的共鸣声唱出《奇异恩典》这首圣歌[1]。但是假设你正在上课，老师说：“在我们谈论苯分子的本质之前，我们先来唱这首《奇异恩典》，以帮助我们获得学习的心情。”你是否会大胆地唱出声来？

---

1 Amazing Grace，中文翻译为《奇异恩典》，也有人称《天赐恩宠》，grace 原意为“优雅、优美”，此处解释成“上帝对人类的慈悲、恩宠”。是美国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乡村福音歌曲，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也是全世界基督徒都会唱的一首歌。作于 1779 年，开始是一首传统的民谣，或黑人灵歌，它表达了宗教的忠诚，其中包含着一个平淡但是极富深意的赎罪的故事，它成了基督徒每次祈祷忏悔时必唱的曲目，后来它流行越来越广，超越了宗教，成了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成为人们祈求和平的经典歌曲，是人民精神世界的赞歌，歌的主题和《圣经》的主旨相符：忏悔、感恩、赎罪、重生，现在在任何庄严隆重的场合、在仪式上、在很多流行音乐唱片里、在国家级的典礼以及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上，你都能听到这首圣洁、祥和、庄重、优美的歌曲。《奇异恩典》源于 17 世纪的赞美歌，歌词作者是由 1725 年出生于伦敦的美国白人约翰·牛顿（John Newton），歌词简洁，充满敬虔、感恩的告白，也是他的生命见证，牛顿本是一名黑奴船长，无恶不作，后来沦落非洲。在一次暴风雨的海上，他蒙上帝的拯救，于是决心痛改前非，奉献一生，宣扬上帝的福音，成为 19 世纪伟大的传道人。去世之前，他为自己写了墓志铭：“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与神和好，罪得赦免，并蒙指派宣传福音事工。”这首诗歌就是他一生得拯救的见证。在歌中充满了他对自己过去贩卖奴隶的悔恨，和对不计较这些仍赐福于他的真主的感激之情。

你也许会担心自己会暴露出是位唱得非常差劲的歌手。或者你可能想要其他人看到，你太酷了，以至于不会去做在化学课上唱圣歌这种愚蠢的事情。或者，即使你有一个甜美的声音并且心里也很想唱上一曲，但你担心比他人唱得都好会给人一种炫耀之感。在这些情况下，你的自我意识就会上升，并且你会尽可能地控制你自己。

我们是否感到匿名和无所顾忌，或是自我意识和谨慎小心，取决于情境是怎样被确定的。这一情境是否是一个人们期望相互批评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或者是一个人们期望免于他人审查和评断的情境？对于人们为什么会在任意给定的情境下按照他们所做的去做具有社会学意识，意味着注意情境是如何被定义和确定下来的，以及它所导致的自我意识的程度。这并不太容易做到，尤其是在从我们不熟悉的情境之外去做的情况下。

看到更大的场景

当提供血液给心脏的动脉因脂肪而阻塞，部分心肌就会因缺氧而有可能被损坏。如果损伤非常严重，心脏也许会完全停止跳动，从而导致死亡。这是心脏病发作的一个真实原因——动脉变得可怕地狭窄。心脏病发作不仅仅是机械故障。

动脉阻塞主要是因为人们吃得太多又不运动。抽烟也会损伤动脉。要理解人们为什么有心脏病，必须综合考虑这些行为。压力是心脏问题的另一个风险因素。这一点同样必须考虑到。但是，即使我们把所有这些情况都考虑在内，我们仍然必须追问："人们为什么会吃那么多、锻炼那么少、通过抽烟危害他们的身体、感到压力重重？"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世界。

透视心脏病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将行为和社会背景都考虑在内的一种看法——是"整体观"。在医学上，一个整体观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充分地了解疾病的起因。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抵制疾病和创造健康可能需要环境上的变化、行为上的变化和文化习性上的变化。关键是要尽可能地看到整体，看到其内部事情是怎样相互联系的。

具有社会学意识与从整体观考虑问题非常相似。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会尽

可能地看到整体，即看到更大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中，人们的行动和文化习惯得以产生。换言之，它是一个看到更大图景的问题。

再来考虑一下赛后的疯狂行为。人们为什么会追寻这些准许他们失去自制力的情况？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愤恨那些通常由父母、老师和上司施加他们身上的限制。感觉到这种愤恨的人们，可能会热切地创造那种他们可以尽情发泄而不会受到惩罚的场合。我们也应该追问："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会有那么多人想要控制我们？"

历史背景

有一次，在一节课上，一名白人学生说："在我看来，黑人是他们自身的种族主义者。我的意思是说，看看他们是怎样给予那些皮肤不那么黑的人更高的地位的。"

听到这些，一些黑人学生皱起了眉头。

在片刻沉默之后，一名黑人学生，一个皮肤颜色非常深的学生，站起来说："在某方面托德所说的是真的。但他并未真正明白他所说的。"

在托德可能作出反应之前，我插入其中并要求黑人学生详尽地阐述他的看法。

他说："他不明白种族主义和肤色主义之间的区别，而且他对历史显然也是一无所知。"

尽管一开始教室里的气氛有些紧张，但是随后的讨论，帮助我们看到了偏见、种族主义和肤色主义之间的区别。我们所得出的理解是：偏见是指相信某个群体的人是下等的或邪恶的。在这一意义上，任何人都存有偏见。不过，种族主义则是指一个统治群体用来压制另一群体的信仰和惯例。一个被压迫群体的成员，因而可能会"有偏见地抵制"那些统治群体的成员、在某种意义上将他们看成全都是罪恶的，但若把这也称作种族主义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被压迫群体没有权力去增强他们的偏见。

然后，什么是非裔美国人中所说的肤色主义呢？为什么在黑人社区有浅色皮肤的人（经常是有着一个或更多的欧洲祖先）会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部分答案在于由欧洲人创造和扩散开来的信仰，认为浅色皮肤比黑色皮肤更有吸引力，并

且浅色皮肤是优势的标志。当然，这是一种神话。但是，几个世纪以来这一信仰一直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由有权力的群体强制执行。因此，被压迫群体会受到它的影响，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

答案的另一部分在于，白人给予皮肤颜色较轻的非洲人额外特权的惯例。在奴隶制度下，这样的特权可能包括在屋里工作，而不是在户外田地里工作。伴随室内工作而来的是更好的衣服、更好的食物，并且有时还会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友谊和土地所有权。换句话说，发生的事情是，一些白人给予那些肤色较浅的黑人、看上去更像欧洲人的黑人额外的资源。这些资源然后给了肤色较浅的非洲人在他们自己所在的社区获取权力和地位的优势。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好处的复合结果。

或许你已明白这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复杂的与肤色有关的问题。许多皮肤颜色较浅的黑人，不情愿地承认他们今天享有的好处来自一种与白人皮肤颜色的合作。并且那些皮肤颜色较浅的黑人，有时会通过接受肤色较浅是种更好的标志这种观念，来证明他们相对于皮肤颜色较深的黑人具有优越感是正确的。因而，一些非裔美国人已经接受种族主义者的想法，将其作为辩解他们自己拥有特权正当性的一种方式。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必须将所有这一切都放入背景中进行考虑。在美国，肤色主义并不是由黑人发明的，它是种族主义的一个产物，由欧洲人所发明并经由其实践成为惯例。肤色主义的产生也是这一情境所致，在这一情境下，黑人作为奴隶被带到北美，努力奋斗以求生存和获取他们的自由。想要理解肤色主义为什么会产生和为什么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考虑到其历史背景。我们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就是，想要理解存在于任一社区的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它是怎样与围裹它的更大的社区联系在一起的。

常见的疯狂

前面我使用了人们在公开场合疯狂杀人的例子，并解释了怎样将其放在背景下来理解。这样做可能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意识到背景，主要是对解释那些

让人无法容忍的反常行为有用。实际上，所有的行为，甚至是那些看上去非常正常的行为，都必须放在一定的背景下来理解。意识到事情发生的背景，甚至可以引导我们重新考虑什么是反常的、什么是正常的。

假设在那种场合人们不是疯狂杀人，而是表现得文质彬彬和镇静自若。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吗？毕竟，难道这不正是我们多数人被教导去做的吗？是的，多数时间我们这样做都是好的、值得称赞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如此习惯于表现得彬彬有礼镇定自若，以至于我们也容忍了那些不该容忍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恐怖事情。纳粹德国是最常被引用的一个20世纪的例子。当多数德国人做着他们自己的事情，毫无抗议反对表示的时候，数百万人在集中营丧生。我们可以怎样来理解这一自满或自得呢？

在德国，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政府声称它有权使用暴力来控制在其管辖内的人们。德国政府，就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向下面收取税收并利用这些财富建立起实施暴力的手段（通过创建警察、军队、间谍机构、制造武器等）。德国人依靠这一政府来保护他们免受外人的伤害，保持内部的一致性和给他们一种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归属感。在二战之前及二战期间，多数德国人都认为，他们的政府在这些事情上做得非常合理非常好——至少不至于坏到激发大众暴乱的地步。

想象德国政府——它的雇员、它所制定的规则和它所拥有的资源——作为一种执行它所控制的人们的意志的工具。当纳粹领导人逐渐取得对德国政府的控制时，他们也就取得了对一种组织的控制，这一组织配备有（或者说有征集和执行的合法权力）巨大的人力、信息、金钱和武器等资源。对未组织起来的持异议者来说，要抵制这样一个整体是很困难的。

德国政府也是高度官僚化的。就像任何一个这样的组织，它有许多规则、政策和管理层，以让人们乖乖地听从其控制，听命于他们的指挥。因此，对人们来说，想要挑战他们的上司，甚至是想要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困难重重。如果你有过在大的官僚组织中工作的经验，你就会知道问题所在。

即使人们开始看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多数人也会感到无能为力和害怕作出任何举动。在政府部门和军事官僚机构工作的人们——在道德上反对在集中营进行大屠杀的人们——能够通过宣称“我没有杀害任何人。我没有开枪。我仅仅是

做着我所做的工作"来为他们没能提出抗议进行辩解。在战争结束之后，许多被判犯有反人类罪行的纳粹官员都是说"我只是遵照上面指令"来为自己辩护。如果那些实际上被杀害的人可以使用这一辩护，想象一下人们远离这样去杀害他人该有多么容易做到。

现在回顾过去，纳粹政权看上去显得非常怪异和疯狂。我们很想知道，一个人可能会怎样支持它，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但是，我们先来考虑一下事情发生的背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许多德国人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心被伤害的感觉。许多人也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被迫投降感到非常恼火。德国经济步履蹒跚（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许多人都担心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因此，许多人都是憋着一肚子火、一腔愤懑和没有安全感——并且混淆了谁应该受到责备。

在这一背景下，纳粹提供了吸引人的信息：其他国家应该为限制德国从一战中恢复的能力负责；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应该为从内部削弱德国负责；并且德国人是一个更优越的民族，如果能够给予一个公平的机会，他们能够重新建起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些信息提升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并提供给人们一个容易得到的答案，去解决他们的恐惧和焦虑。

我们也应该记得，一旦纳粹取得了对德国政府的控制，他们也就获取了极大的权力去塑造人们的想法和情感。他们利用政府去制造和控制新闻，传播宣传和排除异议。因此，在了解他们所在的国家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上，许多德国人都是听任纳粹政府的摆布。就像在所有的民族国家一样，在德国，纳粹政府是创造社会现实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如果在我讲述这个令人不快的例子时，你一直跟随着我，你可能会想知道，我说这么多的重点是什么。它是否是要表示，我们通过考虑事情发生的背景，可以理解德国人为什么会陷入那些巨大的罪恶行动中而不能自拔？是的，那是我想要说的一部分。不过，更重要的并不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德国，而是关于我们怎样生活在当下。

我们仍然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上，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民主的，所

有这些国家都有政府，这些政府可能会为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追求权力的人所攫取。这些民族国家的政府，仍在使用暴力手段来抵抗那些严重危及其手中权力的威胁。多数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意味着，许多人在他们的工作和收入上都没有安全感。同时，仍然有大量的种族主义在增加替罪羊。因此，一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悲剧仍有可能发生。

或许你会认为，"你说的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因此，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仁慈的政府的国家里。"可以肯定地说，这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自我安慰。不管怎样，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尽可能地在更大的背景下去关注事情，并考虑这些事情在伊拉克人、越南人、尼加拉瓜人、古巴人、智利人、危地马拉人和被侵略、被轰炸，或是被迫服从那些控制美国政府的人的意愿的人们眼里是怎样的。我们可能也应该考虑土著美国人看问题的视角，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美国政府仁慈方面的事情。

纠正常见疯狂的方法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人会相信他们的政府是仁慈的——考虑到国家的宣传力量。多数政府领导人都会尽可能地促进这类信念，因为它能帮助他们掌握权力。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在尝试得到社会世界如何运作方面一个更精确更完整的画面上应该采用不同的视角，我们就会较少受到那些幻觉的影响，这些幻觉认为，当我们周围发生恐怖等事情时，我们应该客客气气、漠然置之。

社会学意识也能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有一种通过接受比较容易得到的答案来解决愤怒、失望和混乱这一趋向。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太可能受到那些政客和其他未来领导人的教唆，认为我们的麻烦应该由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来负责。社会学意识是一种很好的对寻找替罪羊这一渴望的解毒剂。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更可能看到，我们的麻烦来自那些拥有权力并滥用权力的人，而不是那些必须去适应那些权力的人。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会尽可能地看到大图景。我们会尽可能地去理解人们怎样适应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怎样认知他们所处的环境和选择，并且他们是怎

样对他人的出现、期望和行动采取回应。所有这些，都是意识到背景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甚至还能采取一个更加整体观的视角，在一种文化、一个共同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全球经济，以及历史进程的背景下，去尽可能地理解人们的行为。看到行动和背景之间的联系——以及接下去更大的背景、再大的背景等等——是具有社会学意识所意味着的大部分。

意识本身也是所有背景的一部分。一个人们具有社会学意识的背景，显然不同于人们不具有社会学意识的背景。当具有意识时，人们能够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行动的因果关系。这一了悟能够反过来改变人们的行为，而这反过来则会创造新的背景。哪里有着兴旺的社会学意识，那里就将少有无知、恐惧和罪恶可能生根的苦难。

没有终结的对话——常见疯狂的首要条件？

几个读者告诉我，如果我能写下对“9·11”事件的分析，我这本书将会“更有当代感”。我想这是真的，如果具有当代感意味着讨论那些比起吉诺维斯谋杀案或二战距离现在更近的事件的话。但是使用历史案例的重点是，交给大家怎样具有社会学意识。因此，我用了我更熟悉的事件，它们能够清晰地说明我所想要说明的东西。然后，我希望读者能够运用与这相同的思维方法，来思考分析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即使如此，指出对当前发生的事件也可具有社会学意识，可能也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是在回头重读本章关于常见疯狂部分时确信这一点的。这一部分使我想起两个新故事，它们隐含的意义有些不大吉利。下面是这两个故事的一个概要。

2003年2月，布什总统在亚特兰大郊区一所高中发表讲话。车队经过的路线两边站满了想要一睹总统风采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位42岁的母亲，她有四个孩子。实际上，她希望总统能够看到她举着的标志。标志牌上写着“不要为石油而战”。这名妇女想要表达她反对布什攻打伊拉克的计划。

一开始这位母亲仅仅是安静地举着她的标志牌，当总统车队驶过时，她突然大声喊叫起来：“见鬼！离开这个国家！你不属于这里！”站在她身边的一些人

冲她吐唾沫。一些人则作出淫秽的举动。一群男人把她围起来并大声喊道："支持美国！"那些冲她喊叫的人中，有一些是她们的孩子已经上前线的妇女。

在这一天刚开始时，这位妇女还在为自己是所在社区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但是她的邻居极端的行为改变了她的世界观。后来她写道："我被吓坏了，我的邻居打算伤害我，因为我竟敢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件事不该发生。不该在美国，对不？"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2003年3月上旬，在纽约上州[1]。一个60岁的男子去一家购物中心并且买了一件T恤；前面印着"地球和平"，后面印着"给和平一个机会"。就像那位佐治亚的妇女一样，这个男人也是在表达他反对布什政府攻击伊拉克的计划。当他坐在食品区，穿着他新买的T恤时，治安警卫走过来，告诉他要么换下这件衣服，要么赶快离开购物中心。这个男子拒绝去做这两样事情中的任何一样，于是警察就赶来，并以擅自闯入的罪名把他拘捕起来。

这些事件很是令人困扰，因为它们与美国公开宣称的政治上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作为公民，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我们认为那些行动是错误的时，公开反对政府的行动。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正是通过这一做法，美国人才抵制了国内暴乱。然而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却看到先前珍视的价值观念，被那些其过分热忱和狭窄的爱国心使得他们甚至无法容忍温和的异议行动的人抛到一边。

你也许会认为，"是的，人们斥责那位手举告示牌的妇女确实不合适，拘捕那位穿着印有反战言论衬衫的男子显然也做得有些过头，但这都是一些孤立的事件，不会有什么长期伤害。"但实际上，自从2001年9月11日以来，这些事件并不是相互隔绝发生的。如果你细心搜寻报纸，你会发现很多小的、短篇的故事，讲述那些因为抗议对伊战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而受到惩罚（一个长长的关于这些故事的名单可以在 progressive.org/mccarthy 上找到）。至于由此造成的伤害，看到关闭发出异议的声音可能怎样创造极端危险的状况是很重要的。

1　纽约上州（Upstate New York）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居住在纽约市的人，往往把纽约市以北的整个纽约州都称为纽约上州。由于纽约市地处纽约州的最南端，因此这个"纽约上州"几乎涵盖了整个纽约州（除去纽约市本身）。不过一旦离开纽约市，纽约上州的定义就有所不同，对于那里的人来说，上州往往指的是真正的纽约州北部。在地图上，"北"就是"上"。

它是怎样发生的——多数德国人（在二战之前及之中）得意洋洋地忙着他们的事务，当他们的政府正在准备犯下恐怖的罪行时？人们并不是对正在发生的什么都不知道。在纳粹巩固政权之前，有报告和怀疑，还有抗议。但是通过废除异议——通过暴力、威逼、拘捕和经济压力——纳粹使得多数人都失去了反抗的声音。缺乏可以看见的异议，然后就创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事情也许并不是真的很坏，以及多数人都支持政府。

意识到不用将每个人都毒打一遍就能废除异议，也是重要的。它所需要采取的办法就是，弄出几个发生在持异议者身上的例子。可能会有一些女性赞成那位女性“不要为石油而战”的口号，但是看到那位女性的遭遇，谁还会主动站出来大声抗议呢？多数人是否会冒着拘捕的危险去穿一件赞成和平的T恤？许多人，即使他们不赞成有权势的政治领导人所做的事情，也可能会决定安静地待着，不让自己引起他人的注意。

然后将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历史上来说，什么都可能发生。疯狂的根子已经创造好了。

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不意味着所有时间都持异议，或者抗议政客们正在做的所有事情。持有异议或抗议，是一个人在分析过情况以后决定采取的行动。但是，具有社会学意识确实意味着，关注想法的表述是怎样被控制的、条件是怎样创造的，以及历史告诉我们的关于窒息持异议和强制执行大一统的危险所在。

关于偏常的注解

有时会有读者要求我增加一些对常规社会学课本中所涵盖的主题的讲述。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一个主题就是偏常。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过任何关于偏常的东西，至少是没有明白地说过，因为在我看来，我对那些不太常见的东西没有太多可说的。但是注意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是值得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期望去看到它，我们就可能会忽略掉那些看似极其平常观念背后的东西。

这里是我想说的主要事情：什么算是“偏常”——即什么被视作反常和不道德的——取决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视角。在一个人或一种视角看来是异常的行

为，在另一个人或另一种视角下就可能是正常的和可接受的。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社会学视点。然而，当我们追问谁有权决定什么算是偏常、这些判断是怎样得出的、如果别人不同意怎么办、给一个人与一个群体或一类行为贴上偏常的标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时，事情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过去有段时间，那些想要拥有投票权、想要出去工作，或是结婚以后想要保留自己物产权的妇女，被认为是偏常的。相反，那些接受政治公民权的剥夺及听任其丈夫控制的妇女，则被视作是“好的和适当的”妇女。今天，由于数十年来的女权主义运动，西方社会的多数人都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考虑妇女的权利。现在，谁要是认为妇女不用享有充分的人权，谁就会被视作是不可思议的。就像这个例子所揭示的，权力在定义什么是偏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背景同样也很重要。在拳击台上可以被接受的行为（比如攻击某人的鼻子），在教室里就会被视作是偏常行为。

考察导致定义人们或其行为为偏常的价值观和过程，是很重要的。当然，就一个社会而言，在几乎每种情况下，都会有一些我们赞成的对一些有害行为的处罚。但是，怎样对待抗议一场不公道战争的民众反抗呢？那是否是偏常的？怎样对待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像这些情况提醒我们，给人们或他们的行为贴上“偏常”的标签，经常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为了维护其自身对他人控制所做的一种举动。

三思而行

1. 可能吉诺维斯的事例已经有些过时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更多新近发生的关于旁观者问题的例子，因为它每天都在发生。例如，某些白人真诚地痛恨种族主义者的语言和笑话，可是当同一群体中的人使用这种语言或讲一个种族主义者的笑话时，他们仍会保持沉默。同样，一些男人非常厌恶其他男人用一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去说女性，可是当他们的男性朋友使用这样的语言时，他们仍会保持沉默。你怎样解释在可恨的和会造成伤害的评论面前保持沉默这一倾向？在这种场合下，怎样做可能更容易当众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2. 假设你回到了过去，大约是 1840 年，因此，你可以亲眼看到美国西部的情景。一次，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下，你在一个好客的家庭吃饭，谈话内容转向了称赞军队所做的美好工作——把异教徒的野人赶出边界。你的主人看上去显得非常高兴，因为政府已经成功地撵走了曾经居住在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印第安人。当你质疑土著美国人这样被对待是否合乎道德时，你的一位主人说道："你怎么敢质疑我们和想要让我们产生负罪感！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但是，是什么使得你可能在实际上比你的主人对实际情况理解得更好？然后我们再回到现在，并假设你正在招待一个来自 150 年后的时间旅行者。这个人可能会向你质疑什么样的当前事件和制度安排？

3. 学生所交的学费仅占维持公立学院或大学所需费用的 30%—50%。余下花费中的大部分都来自政府财政税收。因此，如果你上的是一所公立学院或大学，你就已经在享有一些福利。或许你会对此感觉良好。毕竟，你正走在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公民的路上，因此，公众支持你的教育可被看做是一种投资。当然，付税支付你学校教育的人想要确信你不会挥霍浪费他们的投资，因此他们自然会坚持认为你应该上所有该上的课，读所有该读的书，准时完成你的作业，明智地利用图书馆，以及尽可能努力学习。如果你做了所有这些事，你的良心就是清白的。但是，如果你并没有做所有这些事，你会怎样向那些付税供你念大学的人们解释你这一看上去再明显不过的懒惰呢？在他们通过关于你的决议之前，你会想让他们理解什么？

参阅书目

Arendt, Hannah.(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Bandura, Albert.(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u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 193-209.

Bellamy, Edward.(1966 [1888]). *Looking Backwa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Bourgois, Phillipe.(1995).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kall, Robert. (1988). *Moral Maz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lman, Herbert, & Hamilton, V. Lee.(1989). *Crimes of Obed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ver, Janet. (1983). *Soccer Mad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cLeod, Jay. (1995). *Ain't No Makin' It: Aspirations and Attainment in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2ri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Majors, Richard, & Billson, Janet. (1992). *Cool Pose: Dilemmas of Black Manhood in America.* New York: Touchstone.

Milgram, Stanley.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Sandstrom, Kent, Martin, Daniel, & Fine, Gary Alan.(2003). *Symbols, Selves, and Social Reality.* Los Angeles: Roxbury.

7
理解模式

有时我会要求我的学生去读“一个典型的约会强奸”的故事。故事描述了这样一个情境：醉酒、错误的信任、贫乏的交流沟通、微妙的暴力威胁和一个男子毫不理会一个女子“不”的回答，结果强奸发生。

有一次，一个妇女在课堂上读了这个故事后说：“不可能有这样典型的约会强奸。每个实例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同意她这一观点。我说，写这个故事的人研究过很多约会强奸案例，这个故事总结了他从中学到的。

我这一解释并没有说服那个学生。她坚持认为，每个案件都是独特的。

我说：“是的，每个案件在具体细节上也许是独特的，但是许多案件也都有一些共同之处。”

这时，另一名学生主动站起来说道：“我在妇女中心做过咨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故事非常真实。它符合我多次看到的模式。”

就像结果表明的那样，那位坚持每个案件都是独特的学生承认，她只知道一个这样的案件——一个并不是非常吻合故事中所描述的模式的故事。因此，她认为没有什么模式可言，并且不可能将其概括化。

她错了。

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要看到，社会世界是按照模式化的方式运作的。在这些模式中，有许多都很容易看到。数百万人一大早就起来去

上班，工作八小时，回到家，吃饭，睡觉，第二天继续重复这一切。这是一种模式，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许多人都按照相似的方式去做事。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模式所是—— 一种有规律的世界运作方式。

约会强奸的故事描述了一个模式—— 一个不太容易看到的模式。它要求研究许多约会强奸案件，才能找出隐藏其中的模式。在社会生活中，经常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发现模式，因为某些类别的事件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如果请你描述一次典型的银行抢劫案，你必须研究很多案件，以发现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然后，可能你就会看到一个模式。

社会世界运作的某些模式化方式，一眼就可看出；也有一些则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具有社会学意识，意味着以一种学术方式去关注事情，以便可以看到那些并不是一眼就可看出的模式。所谓“学术”，是指在想要看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坚持遵循某种程序规则。如果我们粗心大意注意不到，我们仍会看到事情在继续发展，但是许多模式对我们来说依然是看不到的。

例如，考察了许多约会强奸、银行抢劫或其他罪行但却没有发现存在什么共同的模式，是可能的。这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关于每个案件相同的事实，因而我们也就没能看到很多案件所具有的共性。因此，一个好的关注事情的程序规则可能是：从每个案件都能得到相同的事实。坚持这一规则——它很容易被忽略——是按照学术方法关注事情所包含的东西。

在第12章，我会说到更多需要注意的规则。这里我更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意识到模式存在，以及对其具有社会学意识为什么是重要的。

意识到模式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想要改造世界，我们一定要明白使得世界成为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的模式所在。例如，如果我们想要防止强奸发生，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想法和行动通常会导致发生强奸，是很有用的。这一了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尽可能去设法改变哪些情况、想法和行动，以便打乱导致强奸的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一原则——理解产生特定效果的模式——应用到任何我们想要改变的事情上。例如，为了停止疾病传播，我们必须知道它是怎样传播的；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模式。病例的高发区在什么地方？在哪些人

群中？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特征？他们是否全都是到了同一个地方，参与同一项活动或者吃了同一样食物？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可推测出模式是什么及如何阻止疾病传播。

有时，了解和打乱我们自己想法和行为中的模式是重要的。假设有一个人总是同意帮助他人去实现他们的目标。帮助他人使得这个人感觉良好，但是帮助别人太多也使得她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由于她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她感到有些失落并且很是沮丧。假设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如果这个人意识到存在的模式，她可能就会作出改变。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必要做到的一点是，当帮助的请求变得太多时，应该学会坚定地对其说“不”。

模式内的模式

有时，更大的模式里会包含一些更小的模式。例如，考虑一下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骚扰者通常都是一个男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骚扰者都是男人，并且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妇女，因此存在一个清晰的模式：男性骚扰女性。这是否意味着女性从来不会骚扰男性呢？不一定。在极少数案件中，犯罪者就是女性。

可能你会认为，“如果妇女能成为骚扰者，而男性则成为受害者，那就意味着，你不能推论说所有时候恶棍都是男性。”你说得没错；并不是所有时候恶棍都是男性，但是模式仍然存在——多数犯罪者都是男人（而且即便男人是受害者，犯罪者通常仍是其他男人）。但是，如果女性有时也可能是犯罪者，我们就需要寻找一个更大的模式。如果我们研究过实际案件，我们就会发现，实施性骚扰的女性在一个方面与男人非常相像，即他们在工作场所拥有控制他人的权力。

因而，更大的模式就与权力有关。如果我们只看到最明显的模式（男人骚扰女人），我们可能就不会看到权力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也看到了比较少见的事例（女人骚扰男人），我们就会被迫考虑事情可能还会以怎样的方式发生。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大的模式——当一个人拥有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时，（各种各样的）性骚扰都有可能发生。

理解模式并不是要知道它为什么存在。某些人为什么会一再让自己陷入非常

糟糕的情况中？为什么某些群体成员的发病率高于其他群体成员？为什么某些人会滥用手中的权力并剥削他人？诸如此类的模式也许很容易看到，但却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通常我们必须更深地往下挖掘，了解事情为什么会照它们发生的那样发生。

想要看到星星是怎样运作的模式，我们必须按照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做研究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想要看到有机体是怎样运作的模式，我们必须学习生物学家用来做研究的方法。为了理解社会世界——看到和解释使得社会世界成为其所是样子的模式——我们必须研究人们是怎样在一起做事的、他们创造的意义和制度安排、他们欣然接受的观念，以及他们养成的文化习惯。只有通过关注这些事情，我们才能看到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模式。

要做到这一点，要做的事情比起寻找典型案件多得多。为了确认某一事物的典型案例，也就是要识别出某一类别的模式。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的方式去关注社会世界，我们也会看到其他不同的模式。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在许多方面都有模式。

不同的模式

描述社会世界是怎样模式化的一种方式，就是这样去说："世界被划分成不同的人类群体，这些群体的人们经常共同分享着使得他们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征。"这是一种算不上伟大的洞察。我们在人生旅程的早期阶段就已学会，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同种类的人们。我们通常没有学会的是，怎样对群体间的差异具有社会学意识。

再一次，看到这些不同的模式是不太容易的。是否群体中被称作"女人"的人，比那些被称作"男人"的人寿命要更长？可能你已经看到或认识许多上岁数的男人，但却很少看到上岁数的老妇人。你也许会因此而相信男人比女人寿命更长。实际上，平均而言，事情并不是这样。平均来看，女性要比男性能多活6年（在美国）。然而，你只有通过按照一种系统分析的方式来注意这个问题，你才有可能看到这一模式。

我们应该记住“平均而言”是什么意思。它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妇女活得都比所有的男人长，也不意味着没有男人活得比多数妇女长。说女性平均而言比男性多活大约 6 年，仅仅意味着，与男性相比，有更多的女性能够活到更老的岁数。如果我们单是看一些个案，我们也许不会看到这一模式。但是，通过看到所有个案（或有代表性的抽样），这一模式就会变得非常明显。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提问：“我们社会中的群体，怎样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有更多金钱、更多教育、更好的健康、更多的声望和更长寿——平均而言。通过看到这些平均差异，我们能够看到揭示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模式。或者最好是说，看到这些模式，能够给我们一个社会世界的快照。我们也会想知道，这些群体差异是怎样出现的。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群体差异并非仅仅是一些抽象东西。它们是一些标示，可以说明一个群体成员的生活如何不同于另一个群体成员的生活。例如，如果平均说来白人家庭比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黑人家庭有更高的收入，这就会告诉我们，或是引领我们怀疑，在这些群体中长大的人们，也许会有不同的体验感受。

群体平均怎样怎样，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个体的情况。即使平均说来白人家庭比黑人与西班牙裔家庭有更多金钱，许多白人都是穷人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与此同时，有些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则非常富有。每个群体都有一个收入和财富的范围，因此，那些处在一个群体顶部的人，可能会领先于那些处在另一个群体底部或中部的人。但是，平均差异依然存在，并且这一模式告诉了我们关于不同群体的地位和权力，即使它没有告诉我们群体中每个人的体验感受。

解释群体差异

我们可能会争论群体差异的意义所在。一个人也许会认为，“是的，这里有模式存在；平均来说，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有较少的收入和财富。但是，这是因为那些群体的人相对于有着更多收入和财富的那些群体的人是劣等的。”另一个人也许会看到同一个模式，并将其视作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经济剥削的结果。仅仅提供不同群体间差异的一个模式，并不能解释它是怎样出现的。要解释模式，我们必须研究谁对谁做了什么、怎样做的和在什么情况下做的。人类的行为是构

成每一模式的基础，想要解释这一模式，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行动。

意识到我们如何解释群体差异是很重要的。缺乏社会学意识，可能会导致作出加强不平等的解释。例如，平均而言，男人要比女人有力气。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模式，但其意义却经常被歪曲。

为了理解这一歪曲，我们应该记住：第一，差异仅仅是一个平均差异。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比每名妇女有力气。有些妇女比有些男人更有力气，并且最强壮的妇女比多数男人都要有力气。我们也应该记住，平均差异不仅是生物学上的结果，也是文化上的结果。如果鼓励男人发展他们的力量，而不鼓励女人这样去做，就会导致群体差异。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事情，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力量差距”，也就不会像看上去有那么重大的意义。

不过，这一差距经常被解释成这样：“平均而言，男人比女人有力气；因此，男人比女人有力气。”这一解释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把群体平均差异偷换成了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差异。实际上，“男人比女人有力气”是不真实的，它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所有的男人比所有的女人都有力气。

为什么会有人犯这样一个推理错误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附着于身体力量的价值观念所致。力量通常被视作一个人人都渴望拥有的特征，特别是对男人来说。另外，男人经常援引力量作为他们控制女人的一个原因。因而，特别是对那些只有平均身高和力量的男人（他们可能会被强壮的女性当做儿童来对待）来说，把一个平均差异变成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普遍差异的宣称，是有诱惑力的。

问题并不是男人不愿直接面对这些事情。再一次，这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模式。统治群体的成员经常会犯同一类错误。例如，平均而言，白人比黑人有更高的智商分数。尽管许多黑人比许多白人有更高的智商得分，两个群体之间的平均差异却经常被白人看做意味着白人比黑人要更聪明。对白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智商得分仅仅达到平均水平的白人来说，这是一种安慰，虽然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结论。

（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就在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智商得分上存在的较小的黑人—白人差异——一个始终存在的差异，即使将学校教育和社会阶级都考虑在内——与固有的能力无关。这一差异来自两件事情。一是智商测试中的许多

问题，微妙地测试了深深浸泡在欧洲美国文化里中产阶级的口味，这就使得黑人学生处于一种不利地位。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智商测试的意义激起的忧虑，会使黑人学生做得逊于他们最好的可能。如果告诉你你的测试得分将被用作你的价值、你所属民族的价值的测量，忧虑无疑会削弱你的表现。同时，也很有必要意识到背景。在一个没有种族主义的社会，这些偏差和测试焦虑就不会出现。)

在考虑群体间差异时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应该询问："在这些群体内部，是不是比在群体之间有着更多的差异？"如果一个群体内的人们比起不同群体间的人彼此非常不同——在某些特点上——那么，群体间的差异可能也就没有太多意义。

例如，假设我们想知道 Greasy Lake 城的男人或女人哪个会更友善。某些人也许会根据小道消息猜测，女人比男人更友善。但是，如果我们想肯定地知道，并且如果我们想知道差异有多大，我们就必须测量"友善"。可能我们就要询问人们在过去一年作出过多少次友善的举动（假定我们对什么是友善的举动有一致的看法）。或者这样说吧，我们让镇里所有的女人和男人参加一个"友善测试"，以便可以计算出每个人的"友善商数"(KQ)。

现在，应该比较容易说出谁更友善，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做的就是为每个群体计算出其平均 KQ 得分。假设我们发现男人的平均得分高于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上去就得到了我们的答案：男人比女人更友善。不过，我们再假设在"男人"和"女人"的类别之内，KQ 得分差异非常大。换句话说，在每个类别内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得分，这告诉我们，当谈到友善时，妇女可以非常不同于其他妇女，男人可以非常不同于其他男人。然而，由于一些男人的高分数（可能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友善）和一些女人的低分数（或许她们低估了自己的友善），结果表明，男人作为一个群体有着更高一些的平均分数。这会将我们引向哪里呢？

如果具有社会学意识，这些结果就会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追野鸭子白忙活。如果在我们想要比较的群体内部存在如此多的差异，而在群体之间则存在较少的差异，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一开始所进行的分类（男人或女人），与人们是否是友善的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需要通过对比 KQ 比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统计方法可以告诉我们差异是否显著。)

友善商数的例子也许看上去显得有些傻，但它与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数十年的“个性上的性别差异”并没有太多不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这样的研究得出的整体结论都是，当谈到个性时，女人和男人要更相像，而不是更不同。如果一个人必须找到哪怕是任何一点群体差异，社会学意识会建议寻找更有意义的分组。

趋势和倾向

有些模式只有随着时间推移才可以看到。当我们观察到世界是如何改变的，我们就能看到它们。一种随着时间变化得到稳定持续发生的变迁——例如，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就是一种趋势。美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创造的多数新工作都是服务业（而非产业），是另一种经常被引用的趋势。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注意这些变迁，并猜想它们可能会把我们引向哪里。

与其他种类的模式一样，趋势之内也有趋势。例如，自1800年以来，美国人口从未下降或是保持同样的数目，它总是在增长。这是一个总体模式。不过，也有好多次，它会比其他时间增长更快——例如，每次在战争过后的十年内。由此我们可以说模式内还有模式：总体增长，伴随着战后迅速增长的时期。这里我们要再次指出，要理解整体，寻找模式内的模式是很重要的。

倾向是模式的可能性。例如，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的人们，最终可能会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倾向。一些来自工人阶级或穷人家庭的孩子，将会成为医生、律师和教授。甚至有可能，那些父母都是专家的孩子，将会成为工厂工人、卡车司机或捡拾垃圾者。即使如此，通常的模式——最强烈的倾向——是，对人们来说，他们的父母处于什么样的阶层，他们最终也会有着大致同样的社会阶层。

为了看到倾向，我们必须密切关注，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什么和发生的频率。例如，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大约是不抽烟者的11倍。男人从他们所受的教育中获得的报酬（工资收入），要高出女性的45%—70%。类似这样的倾向，像女人倾向于比男人寿命更长的倾向，可以通过透视群体差异找到。

如果我们无法在足够长的时间段，看到足够多的案例里发生的事情，趋势和倾向可能依然是看不见的。假设你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第一个念大学的人，并且假设你在大学里的多数朋友也都有着与你相似的背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趋向于停留在工人阶级中，看上去就是错误的——毕竟，你和你的朋友就是阶级流动是可能的活生生的证据。然而，避开一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这一可能性。

为了看到真正的倾向，我们必须从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中找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看看他们最终干的都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有通过观看这一大图景，真实的倾向才会变得明显。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想法避免从个人经验中进行过度概括化的错误，等到我们有了关于许多案例的信息，才可以说出真正的模式是什么。

尽可能看到趋势和倾向的关键之处在于，对社会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不过，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观察一种趋势或倾向，与解释它并不是一回事。要做到那一点，需要研究谁正在对谁做什么、在哪里做的、怎样做的，以及为什么会那样去做。看到趋势或倾向，是理解这些事情的第一步。一旦我们确认了这一趋势或倾向，我们就可开始尽可能地去洞察识别出产生它的人类行动。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趋势或倾向，我们可能也就意识不到，在它背后有什么行动值得关注。

通过辨认趋向和倾向，我们也可以获得一种关于我们将会往哪里去的看法。如果公司持续裁员和让人失业，结果会怎样呢？如果有少之又少的安全工作可以让人们去从事，又会怎样呢？如果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的市中心持续衰退，又会怎样？如果地球上的人口持续照目前的速率增长，又会怎样？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感觉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又会怎样？这些趋势将会导向哪里？将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

社会学意识并不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并且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答案。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将会看到联系，我们将会看到由人类行动创造的社会世界，并且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行动如何为其所处的背景所塑造。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具有社会学意

识，我们就能对那些我们置身其中以及我们可能想要改变它们的模式有一个更全面、更充分的理解。

一同发生的事情

理解模式，经常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理解什么样的事物倾向于连接到一起或一起发生。就本质而言，一个模式就是将飞行和羽毛连接到一起。任何会飞的生物（不仅仅是昆虫），除了皮毛都可能会有羽毛。可能这看上去并不是一个有用的模式。那么，这里是另一个：任何一个有着三角形脑袋会滑行的无腿生物，都有可能有毒牙和毒液。知道这一模式，也许会在某一天拯救你的生命。

关于世界的特定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识别模式的问题。当我们学会什么倾向于与什么一起，或者什么样的事件倾向于一起发生，我们就开始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世界运作的模式，这个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更可预测和控制的地方。如果我们知道模式，我们在避免引发问题或解决问题上就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们知道事情将会倾向于怎样发生，可能我们也就可以干预和让它们按照其他方式发生。

不管怎样，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应该可以识别出自然世界里的模式和社会世界里的模式之间的差异。自然世界里的模式——飞行与羽毛之间的关系——不是人类的创造发明。我们看到这些模式的能力是社会构建的，但是模式本身就是存在于那里。社会世界里的模式则是信念和文化习惯——我们创造的一起做事的方式——的产物。因此，这些模式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人们能不同地去思考和行动，漠视就会发生改变。

例如，你可能知道，收入倾向于随受教育程度增高而增加。就像羽毛倾向于与飞行同在，金钱则倾向于与学位和证书同在。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支付方式付给努力工作（不论他们从事的是什么工作）的人更多的薪水，而不是按照学位来支付薪水。或者我们也可以根据人们照顾自身及其家庭所需要的钱去支付他们薪水。有许多可能的制度安排——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创造不同的模式。

变量之间的关系

某些人可能会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思考，就是将社会世界“切分成”不同的变量，然后看看它们相互之间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例如，我们可以测量收入（年收入）和教育（所受学校教育的时间），看它们是否一起变动或是在某些方面相互关联。有可能在某一点以后，更多的教育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收入。如果那是一个模式，它也许值得知道，尤其是如果有人期望拿到博士学位会给自己带来极大收益的话。

我们也可以使用友善商数来寻找模式。或许受教育程度倾向于增加友善度，因此，平均说来，大学毕业生会比高中辍学者有更高的 KQs。另一方面，收入也许会倾向于减少友善。这意味着教育的作用将会被取消，因为教育也倾向于增加收入。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这将可以解释，为什么上过大学的人并不比没上过大学的人显得更友善。当然，所有这些例子都很傻。它仅仅是一种例证的方式，用来说明某些人怎样在社会世界中寻找模式。

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意识到模式并不总是件傻事。如果某些种族、民族或性别群体的人更可能是失业者、有偿的低工资或者在某个方面受虐待，知道这一模式是值得的。看到群体间的平均差异，是一种识别这种模式的方法。看到什么事情在什么情况下伴随什么事情发生，是另一个获取模式的方式。看到这些模式，如果它们确实存在的话，对理解社会世界是怎样运作的非常重要。

知道一个变量伴随着另一个变量，是一个起点。一旦我们看到模式，我们必须设法看到它是怎样产生的。例如，为什么当肤色变得更浅，收入就会倾向于增加？这是一个应该得到解释的令人焦虑的模式。要解释它，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谁对谁做了什么、怎样做的和在什么情况下做的，使得皮肤更黑的人们平均而言获取较少的薪水。如果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注意那些使得我们看到模式产生的人们及其行动。

模式与个体生活

卫星上载携的相机能够展示给我们，云彩和风暴是按照我们在地球上看不到

的方式模式化的。具有社会学意识，就像对社会采取卫星视角。它意味着，要尽可能去看到那些我们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个场景不是那么明显的模式。社会学意识要求获取“高度”，以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陷身其中围绕我们打转的人类行为的模式。

采取这一观点是不容易的。通常，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每天遇到的问题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不容忽视、不容推卸。我们也许会认为，我们有同样多的改造社会世界的机会，就像改变天气一样。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拿这些大图景来烦我们呢？

不管怎样，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每日都要与之奋斗的许多事情，都来自我们置身其中更大的人类行为模式。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难获得尊严、安全和和平，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我们的工作场所、社区和政府的控制。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些社会生活中模式化的特征是如何运作以削弱我们的控制的，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如何去改变这一持续产生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许多问题的情况。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尽可能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于这一模式的什么地方。有时，我们的表现很像典型案例中出现的情况；有时我们则是处在平均状况；有时我们的生活会按照通常的倾向发生；有时我们则处在模式的中心。其他时候，我们也许会与模式截然相反。

或许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付出刚好相反。如果事情是这样，我们就应设法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例如，我在前面说过，孩子们趋向于处在与其父母相同的社会阶级地位上。但是，假设这对你来说是不真实的。假设你体验到了“向上的流动性”，即你比你的父母中任何一人都有一个更有威望和更多工资的工作。这看上去好像偏离了我们所说的模式。你会怎样理解这一事情？

你也许会认为，“我的生活是不同的，因为它不符合通常的趋向；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这是不正确的。如果多数人都是生在什么样的阶层里最后还是从事着什么阶层的工作的话，那并不是一个个体是独一无二的证据。我们可以真实地说，通常的倾向是因为缺少阶级流动性。因此，如果说有10%的人确实获得了阶级流动性，那是另一个有趣的模式的片段。或许你就是那10%中的一个。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重要的是对你的生活符合或不符合通常的模式具有社会学意识。如果它符合，询问它是怎样符合和为什么会符合。你与那些生活与你不同的他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你与他们共享着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问题和机会？具有社会学意识你将会看到，共同的背景如何创造了你和他人相似的生活，不论你处在90%或10%之内。由此你可以通过理解它怎样与你的生活相联系，更好地理解总体模式。通过这样去做，你也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活。

社会学意识并没有暗示，可以仅仅通过了解人们属于什么样的分类来理解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并不意味着你就会与所有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的白人有着相同的体验，也不意味着你就不会与其他类别的人有着相同的体验。即使如此，由于种族、民族、性别和阶级类别的原因，你很可能会与其他与你有着同样类别的人有大量相同的体验。你也可能会陷入相似的模式。

设法确定谁或什么是典型的情况、考察群体间的差异、寻找趋势和倾向，以及了解什么与什么联系在一起，都是更多地了解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方式。如果我们细心关注，我们就会看见大的模式和许多更小的模式。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也会尽可能地看到我们自己符合这些模式中的哪些。我们也许会由此而发现，许多我们“个人”的想法和行为习惯，都是适应更大的社会生活模式的产物，这些模式带着我们前行，但是我们并不必然要让自己任其摆布。对社会生活中的模式具有社会学意识，使得改变它们也成为可能。

没有终结的对话——社会结构语言

我从一些老师那里听到的评论是，这本书关于社会结构说得不够。相同的批评有时会这样表达：这本书“主要关注微观层面”。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尽管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它看上去会是这样。我认为，它必然与误解社会结构是什么及它怎样与每天都在继续的日常生活相联系有很大关系。或许我可以纠正这一点。

我已经说过，多数日常生活都是一个惯例问题。当然，风俗和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在短期内，它们会倾向于相当稳定。因此，我们看到人们日复一日地

按照惯常的和习惯的方式一起做事。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稳定的行动和互动模式。许多社会学家都使用“社会结构”这一术语来指这些模式。

我们也可以谈论社会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教育是怎么被组织起来的、医院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政府是怎么被组织起来的、警察和法院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家庭生活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等等。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会看到：谁跟谁一起做了什么，它们是怎样做的，以及完成了什么。社会学家可能会看到这些不同的活动领域是怎样连接起来的。研究这些事情，就是研究社会结构。

这里还有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它。如果我们说，一个社会建立在狩猎和采集基础上并由部落首领统治，另一个社会建立在稳定的农业基础之上并由军事贵族统治，还有一个社会则建立在工业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并由财产所有者所统治，我们就是在说每个社会都有一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像这样大规模的安排，就是一些社会学家所说的一个社会的“宏观”特点。

在社会学中，“微观”（与“宏观”相对）这一术语，并不是指那些很难看到的东西。这一术语通常是指在具体场景里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研究面对面的互动，被许多社会学家视作是研究社会生活的微观方面。例如，如果你研究参议员、企业主和游说者怎样在高尔夫球场互相谈话，这就是研究一些微观方面的事情。如果你研究国际贸易政策怎样影响国内劳动力市场并反过来影响阶级形成，这就是研究宏观方面的事情。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第 2 章对物化的讨论，你也许会看到一个问题：什么被视作宏观？说社会运作就像一个系统，以至于一件事情（贸易政策）上的一个变化，可能会导致其他事情（劳动力市场，社会阶层）上的变化，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动力学超出任何群体的了悟或控制，因此，看上去社会经常有它自己的头脑。然而，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目中无人，让人消失。

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世界里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创造了特定的意义并按照这一意义去行动，按照特定方式来确认他们自己和他人，并按照特定方式定义场景。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互动——亲自或远距离（像我现在就在与你互动，或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例如电视）——得以完成。同样，只要我们记住

我们所说的“社会结构”是由行动——一起按照稳定有序的方式做事的人们的行动——构成的，那么谈论社会结构就是好的。

不过，即使我强调对社会生活是怎样创造的及通过互动得以维持的具有社会学意识的重要性，这并不暗示就可以忽略资本主义、公司权力、联邦政府、教育体制、社会阶层、民族主义，甚至是世界体系。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结构性的”事情——这也再次证明我们不应忽略它们的互动基础。

或许这远非你想知道的社会学行话。但是，如果你正在为学习社会学课程而读本书，那么你很可能会遇到专业术语，并且它会帮助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当人们使用一种不同的社会学语言时，你也会更好地理解人们的意思。如果你遇到像“社会结构”或更糟的“宏观结构现象”这一术语，一定要停下来考虑一下它们的意思是什么。事情经常会是这样：当意义被打开，你就会进入一个新的互动，而这则有待进一步去分析。

关于理论的注解

当我教社会理论课想要谈一下什么是理论时，我喜欢提这样一个问题：“进化是一个事实还是理论？”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问题，因为多数人都会说它是一个理论。下面我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没错，多数人，包括多数科学家、生物老师和科普作家在内，都会说“进化论”。但是这一短语具有误导作用，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理论”一词意味着“猜想”或“直觉”。于是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进化论也就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科学家们仅仅是猜测进化发生。实际上，科学家并不是这样做的。

这一见解（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从最初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是一个可以在科学中找到根据的坚固的事实。来自许多学科——主要是物理、化学、生物、遗传学和古生物学——的证据都证明了演变的发生。由于这些证据，科学家中不再怀疑进化，就像不再怀疑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

这样一来，正确地讲，我们可以说：“进化是一个科学家已经用自然选择理论加以解释的事实。”自然选择是达尔文最喜爱的理论。自他那时候以来，科学家

们已经了解到，性选择、遗传漂变、突变和环境变迁，都源自于进化。实际上，关于这些进程中的哪一个更重要，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一直有一些相互竞争的理论。

因此，理论就是被设计用来理解事实（或者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解释数据背后的模式”）的观念。能够解释多数事实的理论、无须假定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东西不相符的理论、逻辑上连贯的理论、能够作出正确预言的理论，通常说来都是一种比那些不符合这些标准的理论更好的理论。由于理论也能塑造我们对事实是什么的认知，因此，能够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去思考问题也是件好事。我们也许最终会决定放弃一种理论，但是我们应该首先测试它，看它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和解释我们也许不这样做就会忽视的模式。

三思而行

1. 看一个地球仪或一幅世界地图，你会注意到，大陆的轮廓互相匹配，就像一个谜语的一个个片断。看上去就好像是，所有的大陆，如果你能挪动它们的话，将会合成一个巨大的陆地。这一大陆轮廓匹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多数科学家都将其视作是一种仅仅是巧合的假象。在地质学家能够将这一“假象”视作一种有意义的模式之前，必须发生什么事情？（查寻百科全书中的“板块构造”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在自然界的情况下，新的想法能帮助我们看到人类行为之外存在的模式。一个新的想法会怎样创造或改变社会世界里的模式？

2. 两名学生，布里斯克和帕拉斯，正在谈论从事相似种类工作的人们，怎样倾向于具有相似的个性特征。他们认为，这样的模式是存在的。但是布里斯克说，这是因为工作塑造了人的个性，而帕拉斯则认为是人们的个性决定了他们最终从事的工作。假定他俩请你来评断他们谁说得有理。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来确认真实的模式？假设结果表明，在其它每件事都相等的情况下，工作塑造人的成分要大于人塑造工作。你会怎样理解这一模式？

3. 许多研究都已表明，小学老师经常会在教室里按照不同的方式对待女孩子和男孩子。当然，多数老师都否认他们会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说，女孩子得到的

关注和鼓励与男孩子一样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在观察员报告结果显示老师给予男孩子更多关注的情况下，有些老师仍然拒绝相信他们正在做的。只有在观看录像带时，他们才会承认他们的行为模式。你怎样解释老师们拒绝看到他们行为中的这些模式？在你自己的行为中，你觉得哪类模式最难看到？为什么？

参阅书目

Becker, Howard S.(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iggs, John, & Peat, F. David. (1989). *Turbulent Mirror*. New York: Harper & Row.

Epstein, Cynthia Fuchs.(1988). *Deceptive Distinctions: Sex, Gender,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ould, Stephen J. (1981).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Norton.

Kohn, Melvin L., & Schooler, Carmi. (1983). *Work and Personality*. Norwood, NJ: Ablex.

Laszlo, Ervin. (1972). *The Systems View of the World*.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Nisbett, Richard E., & Ross, Lee. (1980). *Human Infere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agels, Heinz. (1988). *The Dreams of Reason*. New York: Bantam.

Sadker, Myra, & Sadker, David. (1994). *Failing at Fairness: How Our Schools Cheat Girls*. New York: Touchstone/Simon & Schuster.

Zerubavel, Eviatar. (1997). *Social Mindscap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

偶然事件与因果关系

什么促使你来阅读这本书？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如此难以回答，以至于你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作出一个完整的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说清你是怎样变得有能力和有意愿来阅读这本书的。你也必须弄清楚阅读、写作和书籍印刷是怎样成为可能的，这本特定的书是怎样形成的，你和我是怎样达成理解认识的，并且你和这本书又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远远超出你所能解释的范围。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必为我们为什么读一本书提供理由。如果我们说“这本书非常有趣”或者“这本书是老师指定要看的”，多数人都会满意这一回答。即使如此，如果语言和书、你和我，以及将这本书带到你手里的情况都不存在，这一时刻（读书）也就永远不会发生。导致你去阅读这些词语这一行动的一切事情，是它发生原因的一部分。没人能够辨认所有这些起因，其中每一个起因都又有它自己的起因。

这里是另一个问题：感冒是什么引起的？你也许会说：“当人们的鼻黏膜被鼻病毒感染，人们就会得上我们所说的感冒。”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答复是对的。然而，真正的情况远比这里所说的要复杂。

首先，鼻病毒并不总是引起麻烦。免疫系统统常会阻止它们，除非出于某些原因它被削弱。我们也必须考虑环境怎样允许鼻病毒生存得如此长

久以至于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递，以及什么样的行为会传递它们。因此，一个好的关于人们为什么会得感冒的解释，必须超出类似“传染源进入身体，身体就得了感冒”这样的解释。

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要认识到，所有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在想要说什么引起一个事件、一个行为或一种倾向时，我们总是要面对这样一个不可能性，即说出所有起促成作用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是认为多数这些情况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事情为什么会照它们发生的那样发生作出不完整的解释。当然，这样的解释仍然是有用的。你不需要知道发动机是如何运作的，就可以知道如果你转动钥匙，它（通常）就会启动汽车。

在设法理解社会世界时，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使得事情按照它们发生的那样发生。通常我们并不关心我们的解释是否完整，只要这些解释能够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容易预期与控制。有时，我们的解释看上去是如此的好，以至于我们会欣喜地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但这不过是一种幻觉。事情并不是某一单一原因的结果，而是许多原因相互交织的结果。客观环境也必须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出现，才会使得事情正好按照它所发生的那样发生。换句话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所谓偶然的，是说它们是各种环境和行动一种独特的混合的产物。

或许 1991 年海湾战争这一例子，能使偶然事件这一看法变得更加具体一些。回顾一下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导致了海湾战争呢？它是否有一真正的起因？如果你了解这场战争，你将会发现，下面提及的每一个，都可被看做是主要起因：

-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下令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伊拉克，因为他想提高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分散人们对国民经济问题的注意力，确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 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受到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威胁，因此，乔治·布什代表那些公司行动，使用暴力打击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以便恢复美国对中东的控制。

- 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通过剥削欠发达国家，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来牟取利益，因而，这些国家任何想要脱离资本家控制的企图，都不能被接受；所以，美国摧毁伊拉克，以警告其他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他们越出界限之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 海湾战争的进行，通过展示即使苏联不再是一个严重威胁，为了镇压像萨达姆这样的暴徒，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然是有必要的，可以帮助说明美国政府在军备上持续高开支的合理性。

这些原因中哪一个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真实原因？每一个听起来都是振振有词，并且它们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可能全都是真实的。可能你还会想出其他一些原因。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解释中的每一个都留下了许多没有明说的东西。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停下来考虑一下，那些没有明说出的东西是什么。

例如，没有明说为什么美国经济依赖进口石油，为什么美国民众感觉自己有资格去获取别的国家的自然资源，为什么或者萨达姆是怎样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可以听任他的支配，为什么美国战士愿意听从命令去杀害另一个国家的人们，或者为什么多数美国公民会愿意接受由他们的政府实施的暴力。

依据这些情况来说，海湾战争是一偶然事件。如果情况稍有不同，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因此，我们应该对那种战争只有一个起因的宣称保持警觉。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事件，不论是大是小。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可以避免急匆匆地确认一个唯一起因，而尽力看到事件是怎样在环境和行动的混合之中出现的。

我们也能试着确定，特定的行动或情况——像病毒进入身体、想法进入头脑或武器进入战士手中——是否必然会促使某事发生。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看到，最终发生的事情依赖于许多其他环境，一些是稳定的，一些是快速变迁的，刚好按照适当的方式一起发生。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偶然性的旋涡有时会引发怎样可怕的事件，我们就会关注在任一给定时间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稳定和变迁

或许我所做的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生活看上去是随意的和混乱的，

好像每个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和出人意料之外的。显然，这是不正确的。多数时间，社会生活都是井然有序和可以预测的。你也许会认为，这一有序性正好反驳了那种认为事件和行动总是发生于偶然事件的漩涡的看法。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社会世界既是可以改变的，同时又是稳定不变的。

由于人生短暂，我们经常误把临时的稳定视作永恒不变。例如，你也许会认为这本书将会持续存在很长时间。然而，即使现在，它的上面也已落满灰尘，就像世界上所有的高山和建筑物一样。太阳和地球看上去似乎真的可以永恒存在，但是再过40亿年，太阳的热量就会燃烧殆尽、发生爆炸、然后在再次爆炸之前覆盖整个地球。因此，即使是我们居住其上的地球，其存在也是暂时的。

同时也要考虑到，需要付出努力去维持世界的有序性。如果太阳不散发热量进入大气层，我们知道的所有动植物（包括我们自身），很快都会绝灭。为了让社会世界日复一日地持续存在，我们必须增加能量，形成和传递文化习惯。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秩序就会崩溃。因此，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秩序，并不仅仅是惯性的结果。秩序和稳定性也是行动的结果。

由此一来，当环境按照适当的方式塑造而成，产生让人吃惊的变化，它就总是会与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情况的背景相反。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情况下，其背景是一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以紧缺的石油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即使战争很快就宣告结束，但是这些背景情况在战争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就是在今天也依然存在。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意识到，不应把这些背景情况视作理所当然，而是要将其看做原因与偶然性的旋涡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事物的一部分，在这之外则会出现可预期的或出人意料的事情。

具有社会学意识意味着，不仅要意识到我们的解释总是不完整的，而且要尽力看到它们是怎样成为有选择性的和不完整的。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确认某些情况作为起因，而将其他情况视作理所当然？答案需要考察我们喜欢将某些事物当做特殊的而对其他事物全然不予理会这一偏好。

原因、情况和选择的可能性

如果你往窗外扔一只粉笔，并且它掉到地上，那么说它的下落是重力引起的是合情合理的。要想理解这一情况为什么会发生，你可能要读一本物理书。你不会去让铅笔自己解释它为什么会掉到地上。不过，如果是你自己将自己扔到窗外并摔到地上，我们就会想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多数人都不会接受“地球引力”这一答案，如果你可能这样回答的话。

我们的行动并不是自然规律引起的——像重力引起粉笔掉落这一方式。那么，是否可以说是天太热使得人们跑到海滩上呢？即使在天变得很热的时候可能确实有很多人会跑到海滩，但要说是天气引起他们去的，则是愚蠢的。因为人们可以选择其他方式降暑。或者他们也可选择什么也不做。铅笔不能作出选择，因此将“引起”这样的语言用到粉笔和其他无生命物体身上是公平的。然而，当将这种语言用到人身上时，我们就应小心了。

有一次，在课堂上，一个学生说：“我在另一门课上的教科书中读到，种族造成罪犯得到更长的处罚。”他的意思是说，与那些犯有相同罪行的白人相比，那些被判有罪的黑人，趋向于得到更长的监禁和更重的惩罚。他的关于模式的看法是正确的；平均而言，对于同样的罪行，黑人确实倾向于得到更长的量刑。但我要说的是，说这一模式“由种族引起”，则会使人误入歧途。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会努力通过看到谁对谁做了什么来理解这一模式。被判拘留或坐牢，并不是像雨点掉到人的脑袋上那样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最后都是由法官作出判决。因此，我们必须追问：“法官为什么会对黑人判刑更长量刑更重？是否是种族造成他们那样去做？”显然，事情并非真是如此——就像并不是天热造成人们去海滩。

就像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法官是根据人的特征作出裁决的；而法官所依据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或许是无意识的，就是肤色。在我们这个多少有些种族主义的社会，黑人特征经常被视作一个坏特征的标志。法官（大都是白人）也许会因之而判定，黑人比白人需要或应受更苛刻的处罚。但是，并不是被告的肤色造成一位法官按照这种方式去看事物。问题毋宁说是，种族主义信仰影响到法官怎样

去想和怎样去选择行动。

我们不应将严厉的判罚仅仅归因于法官脑子里的观念。这里面同样有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例如，要解释对黑人判刑更加苛刻这一模式，我们必须知道法官为什么会有必须看上去非常严厉的压力；对黑人的想象是怎样一直由媒介塑造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白人，不仅仅是法官，坚持将肤色看做特征的一个标志。我们也应该记住，不同于重力，所有这些“社会起因/原因”都是多变的。

使情况成为可能

另一次，在关于色情的一节讨论课上，一名学生说：“我看了书中一些内容，但我不太确定作者的意思是否是在说，色情引起暴力。请你直接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这名学生想要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当我拒绝给出这样一个答案时，他可能会在心里想，我可能自个都拿不定主意。

你可能已经看出，为什么像“色情导致性暴力”这样一个宣称是错误的。色情并不是一种自然力量，会造成人们按照特殊方式去行动。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联系和背景，以及因果关系网，你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说“色情与性暴力无关”也是错误的。色情的确与男人对女人实施的性暴力有关，但是，有联系并不代表就是因果。

性暴力涉及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一个人要伤害另一个人，这个人必须无视被伤害者的感受。它看上去就像是，伤害者将对方视作一个物体——一个不值得尊重、没有感情的物体。一些人的感情是怎样被视作不值得尊重的呢？这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能发生，即因为一些人创造和传播了其他人的情感不值得当回事这一观念。

通过言词和图片，色情表达了对女性的看法，这些看法会影响男人对女人的想法。一个被许多色情东西传达的看法是，女性总是准备和愿意去满足男人的性欲望，不论她们表现出的是什么。另一个看法是，妇女是可以欲求的，因为她们的外表和她们在性上总是自愿服从于男性。换句话说，与她的乳房形状和她对与男人做爱的兴趣相比，女性的想法和感觉远不重要。

色情影片和杂志（你可以在一家杂货店很容易找到它们）的易得性，也传达

了这样一种信息：将女性当做性对象是件好事。如果随处都能找到关于女性的色情东西，并且对此极少有什么抗议，那么将女性视作性对象，也就会慢慢成为一种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

是否是这些看法及其广泛传播导致了性暴力呢？不是，这样说未免太过简单。多数男人都不看色情东西，因而并未感到要强迫自己去进行性暴力，即使他们的欲望有时也会被想象所激起。但这并不是色情和性暴力无关的证据。意识到因果关系和意外情况，我们就能将色情东西和它的可得性作为促使情况发生的因素。

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被教导相信，成年的象征标志就是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因此，男人相互竞争（看谁更像一个男人）的一种方式就是，努力获得性征服。在这一竞争中，一个男人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女性来满足他的性欲望。只有当她们妨碍了一个男人的性追求，她的感受才会值得考虑。因此，女性的感受并没有得到尊重，而是被看做一个男人去克服的问题。

这一成人地位竞争发生其中的更大的背景，使得多数男人都会失败，因为最终获胜不仅取决于性技巧，还取决于财富和权力，而在这一点上多数男人都几乎是没有。就像你可能会想到的，或者就像你可能已经从你的经历中知道的那样，这一状况使得许多男人感到愤怒和缺乏信心。现在再加上色情东西，它们就会强化这样一种想法：女性是性对象，并且男人知道女人的性欲比她们表现出的要更强。在这些情况下，以暴力和微妙形式发生的性压服，很可能会发生。事实上它也经常发生。

对性暴力的“起因”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回到偶然事件的想法上。我们已经看到，性暴力产生于使情况成为可能的同时发生的各种事情。因此，我们不能说“色情东西导致性暴力”，但我们可以说，它帮助创造了促使性暴力成为可能及促进性暴力发生的条件。在这一意义上，色情东西是诸多起因中的一个，是编织成网的许多条线中的一条。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起因，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废除色情（扫黄禁黄）并不会结束性暴力。一个原因是，促成性暴力发生的想法并非仅在色情东西中可以找到。禁黄并没有改变其他使得性暴力成为可能的条件。然而，就像某些男人争论的那样，通过使它传播的观念较难为人获得，以及明确声明这些观念是有害

的、理应被拒绝接受，禁黄可以减少性暴力的发生。

理由和选择

说到取缔色情的可能性，又把我们带回到选择的问题上。假设许多人都将色情作为性暴力发生的起因。假设许多人都认为，使用女性的身体来卖啤酒、汽车和体育项目，也是这一问题的一部分。然后会发生什么呢？某些人可能会说："事情就是那样；我们对此什么也做不了。"其他人也许会说："如果这些事情引起问题，即使它们不是唯一的起因，为什么还要接受它们呢？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除掉它们，就应该这样去做。"

要就我们是否应该废除色情东西或者那些利用女性身体的广告得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看法，需要考虑到远远超过我在这里提到的主题。但无论如何，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必须伴随色情东西和带有性意味的广告的不良影响一起生活"，都是不正确的。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看到，促使事情得以发生的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决定采用不同于以往的旧方式去做事，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将"引起"这样的词语应用到人类行为上，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是按照想法和意义在行动，并且人们可以重新考虑他们的想法和意义，选择不同的行动。当然，如果人们从未对他们行动的想法和意义产生怀疑，他们就会按照旧有的方式继续行动。如果人们相信肤色是特征的一个标志，那么看上去就像种族导致歧视。然而，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将会看见，是人创造了维持这些行为模式的观念和条件，同时也是人创造了给予我们改变力量意识的模式。

作为被构建原因的规则

如果一个老师按照曲线给学生打分，只给班上所有学生排在前十名的学生A⁺，那么是否是这一评分模式引起班上前10%的学生得到A⁺呢？你可能会说不是，因为这一模式并不是一种自然力量，它仅仅是选择的一种做事的方式。但是，像"仅有名列前茅的10%得到A⁺"这一规则，就有一种因果力量，因为它总是会导

致某一特定结果。无论学生学习多么努力，或者老师教得多好，都只有 10% 的学生得到 A⁺。只要 10% 的规则被遵循，就不会有什么别的情况。

引导一种一起做事方式的规则，就像是一场比赛的规则。只要规则被遵循，某一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以网球比赛为例，规则保证没有比赛会在平局结束；网球比赛的规则总是会产生一个优胜者和一个失败者。而且，你不能跳到网对面抓你对手的痒痒来获胜。规则不允许那样去做。

规则也会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竞技体育的规则保证，不仅将有优胜者，而且多数人都将是输家，并要承受一些忧虑和沮丧的感觉。没有谁会有意让这一切发生，但是，竞技体育的规则使它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要看到管理社会安排的规则和询问这些规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不论人们最初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任何模式化的一起做事的方式，将这一点应用到比赛、组织、经济和政府中去。所有的事情都会根据一些可识别的规则和意愿（如果规则被遵循）正常运转，并会产生某些必然的结果。资本主义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

生死竞赛

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合法规则就是，允许一些人控制巨大的财富和财产。如果资本家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关闭工厂和让数千人失业挣更多钱，他们也有法定的权利这样去做。如果资本家认为从长远来看可以通过让自己的财产闲置挣更多钱，他们同样可以让它闲置，即使人们正在忍饥挨饿，并有可能利用这些财产来养活自己。简而言之，规则就是，财产权优先于人们的需要。

资本主义的其他基本规则有：获得最大利润，让尽可能少的工人做尽可能多的工作，支付工人尽可能低的薪水。尽可能少付工人工资，意味着产品低价出卖仍能获得利润。支付工人较多工资的企业，将会获得较少利润，除非它能高价卖出它的产品。但是，提升价格通常意味着失去顾客，他们会在别的地方花较少的钱。因此，一个不想驱使工人玩命干和让工资处于较低水平的资本家，就可能会逐渐退出市场竞争。这并不是一个人品质好不好的问题，资本家为了维持自身在

市场上持续存在，必须这样去做。

当经济按照这些规则来运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在财富上，总是会有不平等，因为资本家控制着为自身创造巨大财富的方法，工人则仅有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出卖，去获得微薄的薪水。虽然工人——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的话——也能进行反抗，不平等仍将倾向于增长。这一点也是很可能的，即允许许许多多的人失业，或是有太少的工作去维持基本生活，以至于资本家可以通过威胁雇用那些生活境况更糟的人来控制工人。

有一次，当我谈到资本主义怎样运作时，一名主修商业课的学生，斜靠在他的椅子上，双臂抱在胸前。

“你是不是在说资本主义导致了贫穷？”他问道，话语中带着一丝愤怒和怀疑主义的混合物。

在我张口回答之前，他坐直身子接着补充道：“以我所见，资本主义创造了工作。”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挑战。

我说：是的，资本家创造了工作，但是，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获取利润。如果他们这样做还有别的原因，他们也就不会作为资本家而存在下去。我说，资本家将会毁掉任何数量正当支付的工作，如果他们可以用低支付的工作替换它们的话，因为当他们可以减少他们支付劳工的工资费用，他们会挣更多钱。实际上，我说，资本家创造工作，仅在非常必要之时——像他们做的那样支付尽可能少的工资，以及如果可能尽可能地消除工作（经常是通过自动化）。

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似乎跟这名学生从他的商业课上所学到的东西非常相像。但他仍对我谈论资本主义的方式怏怏不乐。

他说：“当然，商人都会尽可能地赢利，但那并不必然引起贫困。”

他是正确的。我说，即使资本家有动机把工资降到贫困线上，那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总能做到。工人有时会进行一些成功的抵抗；并且，拥有特别技能的工人，有时可以要求高薪水。

为了回到他所说的关于贫困的问题上，我问他：“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接受这样糟糕的工作？”

他说：“首先，人们需要工作；其次，总是会有没有受过足够教育的人想要

得到更好或者更多的自尊。"

我说，他的第一点——人需要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们没有其他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我们就不应对这一点感到惊奇，即他们愿意去做任何他们所能得到的工作。

他的关于教育的看法，引领我提出一个思想实验。我说："假设大家都有博士学位和高自尊。然后会发生什么？大家是否都会得到一个好工作？"

在他苦苦思索这一问题时，另一名学生说道："我不认为大家都可能有一个好工作，因为必须有人清洗地板和拣拾垃圾和挖掘地沟。并且，即使有博士学位的人愿意去做那些工作，仍然不会人人都有工作。看看现在有多少失业的人。我们的周围并没有足够的工作。"主修商业课程的学生承认这是真实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让政府来为每个人都创造一个工作，以便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体面的工作？"

主修商业课的学生答道："商人不喜欢那样做。"

我说他说的很正确，并且女商人同样不会喜欢。但这又是为什么？难道不是雇主经常批评福利并说大家都应工作吗？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会反对利用政府来创造工作？

他答道："我想事情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大家知道他们可以得到一个体面的工作，他们会变得更加挑剔，更不愿去做低薪水的、没价值的、讨厌的工作。这也就意味着，雇主必须支付人们更多工资才能留住他们，而那则会损害企业利润。"

我很高兴他能看到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不过，我们仍然没有回答关于贫困的问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贫困是资本主义运作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呢？"我问道。

看到没人回答，我又换个方式重新问道："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产生像我们现在这样多的财富，为什么还必须有人是贫穷的？"

过了一会儿，一名学生说道："我不认为有人必须是贫穷的；它仅仅是一个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那些拥有财富的人不愿放手，至少是不经过一场战斗不会

放手。"

现在，我们已经快要抵达某个目的地。"战斗将会在哪里发生？"我继续追问。

另一名学生说："如果你是在说利用政府创造工作，我想那将是一次政治战斗。"

我问："谁会赢取最终胜利？"

我们一致同意，资本家——受益于迫使人们去从事糟糕工作这一状况的那些人——可能会赢，因为他们手里拥有更多资源和更多对政府的掌控。

"他们是否必然会赢呢？"我接着追问。

主修商业课的学生说："不一定。如果所有产业工人都团结起来，他们就可能赢。但是那样一来，将会发生一次巨大的战斗。"

马上就要到下课时间了，因此我尽可能对上面的讨论做一小结。资本主义倾向于将工人推向贫困之中，我说，因为利润来自保持低薪水，甚至是让人失业，如果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干活的话。贫困也有益于资本家，因为它意味着，许多处于绝望中的人都会接受报酬极低的工作。所以，资本家不会匆忙结束贫困。因此，资本主义并非不可避免地引起贫困，但它确实为资本家创造了动机，去按照使得贫困成为一种可能结果的方式去行动，特别是在工人太过涣散，无法组织起来进行回击的情况下。

讲述这一切的重点，并不在于去展示资本主义坏透气了，而是说，某些确定的坏结果——不平等、糟糕的工作、失业、贫困——源自资本主义运作的方法。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比赛，一种为高风险和高收益而竞争的比赛，我们将会看到，它的规则使得一些坏结果不可避免。一旦人们置身这场比赛之中，这些结果一定会出现，除非人们改变或打破这些规则。

避免简单化理论

构成社会安排基础的规则，很少像摩西的《十诫》那样被明确说出。它们更像隐藏的逻辑，等着人们去发现。但是，一旦我们看到规则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它们带来的后果。它就像是在说："如果我们一起按照这种方式做事，如果我们遵循这些规则，它将会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我们将会为我们自己创造出什

么样的结果？”当然，这些仅仅是一些最初步的问题。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也会询问谁制定的规则、谁会从中受益。

意识到规则作为起因，也能帮助我们避免设法按照心理学方式去解释社会生活，这种方式被称为“简单化理论”(简化论)。例如，如果某人说橄榄球是暴力运动，因为橄榄球运动员有一种个性特征使得他们具有暴力倾向，这就是一种简单化理论。橄榄球运动是暴力的，是比赛规则所致。依据比赛进行的激烈程度，它也可以是更多暴力或较少暴力的，但是橄榄球的基本规则要求人们相互冲撞。

缺乏社会学意识，导致许多人陷入简化论的思维之中。例如，许多人都相信，贫困是由一种叫做“懒惰”的个性特征造成的。当数百万人都陷入贫穷之中，即使他们在那些没有支付合理工资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将贫困归因于个性特征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将会注意人们置身其中的比赛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能够看到，问题不是懒惰或贪婪的个体，而是规则，是那些使得人们把对方当工具对待以获取更多利润而非让人成为人的规则。

机会、模式和道路

说人们“陷入游戏规则”，可能会使事情看上去就好像是，人们的生活道路是由这些规则设定的。事情并不必然就是这样。即使在体育比赛中，规则也只是说一场比赛应该怎样进行；而并没有说比赛中将会发生什么，或者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生活中总是会有惊奇发生。无论可能有多少已说出和未说出的规则，社会生活仍然是偶然性组成的一个漩涡，从中可能会发生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当我们注意人们的生活如何逐渐展露出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无论我们对一个人的背景了解多少，当我们猜测一个人的生活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仍然有可能犯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是机会问题。在人的生活中，说得更广泛点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既有机会，又有模式。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努力看清，机会和模式怎样连到一起。或许展示这一切的最佳方式就是讲述一个有着两种结局的故事，这两种结局都可能是真实的。下面就是这个故事。

* * * * *

为了挣够毕业学分，莫伊拉需要一门选修课。朋友告诉她去上哲学教授瓦尔基丽的课，但是莫伊拉对哲学不感兴趣。

莫伊拉说："再说了，我根本听不懂在212教室上的课。我对哲学一窍不通。"

她的朋友说："是吗，我过去也认为哲学要么是无比乏味，要么就是让人无法了解——你知道，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等那些玩意。但是，瓦尔基丽真的很伟大。她真的会使你开始动脑子思考。你应该去试着听听她的课。"

等到选课的时候，莫伊拉想选的天文学早已人满。唯一能跟她的课程安排相吻合的就是"哲学入门"，主讲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朋友说过的瓦尔基丽教授。

莫伊拉朋友的话是正确的。瓦尔基丽教授的课讲得非常好。她能把非常复杂的概念，用一种学生都能听懂的方式解释出来。她也会尽可能地把哲学带回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里。莫伊拉喜欢老师这样做，并且发现它帮助她理解了很多自己先前不明白的事。

莫伊拉在这门课上非常用功，打动了瓦尔基丽教授。在学期结束时，瓦尔基丽教授在莫伊拉的作业上写道："你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你的论文和思考都是一流的。如果你需要推荐信，跟我说一声就行。"

几个星期后，在春季学期已经结束之后，瓦尔基丽教授去吃午餐，偶然遇到在另一个系教书的一位教授。他们决定一起去"便士大学"——校园附近新开的一家咖啡馆。就像结果表明的，那里的食物非常好，但是，服务比较慢，而且热奶咖啡也不够热。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没有人教给站柜台的人怎样干好他们该干的工作。

当他们往回走时，那位教授对瓦尔基丽说："咱们刚才去的那个地方的服务，让我想起我的研究助理必须走人。他把事情弄糟了许多次。我需要一个更加可靠的人，但我不知道在夏天这段放假时间，可以去哪儿找到合适的人。"瓦尔基丽教授说，她倒是认识一个学生，干事非常麻利，并且可能暑假正好需要找份工作。当他们走到校园，他们找到了电话簿里莫伊

拉的电话。

那位教授给莫伊拉打了电话，莫伊拉说，如果可以去做研究助理工作，她愿意放弃在GrabnGo（莫伊拉以前打工挣学费的地方）的工作。她们约好，莫伊拉第二天早上9点来面谈一次。

莫伊拉非常激动于这份有着更高报酬和更吸引人的工作的前景，但她心里也非常紧张。即使她在瓦尔基丽教授的课上表现非常好，莫伊拉还是不太敢肯定，她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做研究。

莫伊拉穿上她认为朴素而舒适的衣服——非常合身，又不太花哨。她不想给人一种她关心衣裳多于关心书和思想的印象。并且，即使为了吃早餐她必须清洗同屋的饭碗，到8:30的时候，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在校园转悠。她不想在工作面谈这件事上迟到。

在离她的公寓三个街区的地方，莫伊拉正要右转弯，这时一只小鸟撞到了她的挡风玻璃上。一两根蓝色的羽毛飞落其上，莫伊拉急转方向盘，汽车后面的右轮胎弹跳了一下。她停下车，看了看鸟儿击中挡风玻璃处留下的斑点。莫伊拉感到有些悲哀，就好像她侵入了鸟儿的生活，只是为了毁坏它。

这时后面一辆车按起了喇叭，莫伊拉意识到她阻拦了交通。“这不是我的错”，她想，一边深深地呼了口气，“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最好还是赶紧上路，要不我会迟到的。”

莫伊拉刚开了一个街区的距离，就听见汽车后面传来的放气声。刚才撞到马路牙子的轮胎已经变成平的了。

“他妈的！”莫伊拉带着怒气低声骂道，一边回到车里。她看了看她的手表——马上就要9点了——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她找到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迅速更换轮胎。因为顶起了汽车，莫伊拉仍能看到小鸟击中挡风玻璃留下的印痕。这会儿看到它，让她感到心里非常恼火，好像是小鸟干预了她的生活，把她挤出了她正常的生活道路。

更换轮胎弄得莫伊拉衣服脏兮兮的，满身是汗。她知道，面谈已经晚了，而且当她赶到那里，事情将会是一团糟。

莫伊拉在一个卖汉堡包的地方打电话给教授，告诉她发生了什么。

教授说："我明白了。那么，好吧，我已找到另一个人来谈这份工作，我今天就需要雇用人。因此，如果明天还需要人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

那是莫伊拉最后一次听到那位教授的声音。后来，当瓦尔基丽教授问起另一位教授莫伊拉怎么样，她说："我们安排了一次面谈，但她没来。她只是打了个电话告诉我轮胎没气了。坦率地说，从我已经解雇的那些人那里，我已听到太多这类借口。因此，我又找了别人。"

莫伊拉非常失望，因为自己甚至连试一试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她可以告诉自己那位教授不相信她说的关于泄气轮胎的事情。有时她又会幻想，她应该推着那个损坏的轮胎进入教授办公室，说："这就是我电话里跟你说到的轮胎。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在上面，以便有另一个工作时你可以找我。"但是莫伊拉所能做的，只能是回到GrabnGo工作，尽可能地攒钱上学。

那年夏末，副经理离开，莫伊拉被问到是否想要这份工作。她不太肯定。莫伊拉原本希望得到学位和一个类似教授的职位。但是除了瓦尔基丽教授的课之外，她在学业上并没有大获成功，并且她也厌倦了中断学业。因此，她决定休学一年，试试干工作的滋味。莫伊拉想的是，如果她不喜欢这份工作，她还可以在来年春天放弃这份工作重回学校。

莫伊拉发现她喜欢管理商店。它是一种挑战，一开始，她要学会如何做存货、订货、调度维护，并要记录工资单。做所有这些事情，给了莫伊拉一种成就感。工作中最难的地方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她内心的那种寂寞。她非常想念大学里的朋友。

那年秋天，莫伊拉开始与一个给店铺送啤酒的小伙子约会。起初，她并不想严肃以待，但是事情一件接一件接踵而来，到来年一月份时他们已经开始一起生活。

在双方适应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一安排似乎非常适合他们。几个月后，莫伊拉和她的伙伴在弗吉尼亚度假。一天早晨，当他们彼此感觉非常相爱时，他们决定结婚——说办就办，那天下午他们就办完了登记手续。

在他们旅行回来后没多久，莫伊拉得到一份在本城另一区域的一家分

店担任经理的职位。到现在为止，莫伊拉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圈子，并且越来越少考虑回到学校的事。“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呢？”她想，因为她可能做什么也没有作为 GrabnGo 经理挣的钱多。她的新婚丈夫同样不喜欢她接着去念大学的想法。

莫伊拉管理商店管理得非常好，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公司的地区经理。但是连着三次她都没能得到提升。有两次地区经理的职位都是给了岁数比她大并且有学位的男人。莫伊拉想不明白获得这个职位跟学位有什么必要关系，但她也并不认为某个有学位的人顶掉了她——如果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都是平等的——是不合理的。一年后，一个比她稍稍更加年轻的男子，来公司的时间还没她长，被提升为地区经理。莫伊拉开始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当了商店经理四年之后，莫伊拉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她已经学会了所有管理 GrabnGo 商店的东西。因此，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她决定辞去工作在家照看孩子，并不是一件很难作出的决定。莫伊拉认为，她以后还会再要一个孩子，在两个孩子都长大之后，可能会再回到大学。

这是故事的一个结局。下面是另一个。

莫伊拉正在锁前门，锁上之后她感到一丝恐慌。她关火炉了吗？她打开门又回屋检查了一遍。当然，火炉早已关得严严实实。她从来都没忘关过火炉。但是，每当她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紧张，她就会想象自己没有关炉子就出门了，结果房子被烧毁，为此而责备自己。

“可能早上我应该坚持吃冷麦片。”莫伊拉想，当她启动汽车赶去面谈时。

大约离她的公寓三个街区的距离，莫伊拉正在拐过一个角落，一只蓝鸫飞过她的挡风玻璃。它飞得是如此接近，以至于她可以看到它嘴里噙着的秸秆。这时她记起祖母说过的一个老说法，“如果你早晨看见的第一只鸟是蓝色的，你这一天就会有好运。”

莫伊拉微微一笑，当那一想法闪过她的脑海，她稍稍放松了自己紧张的心情。“谢谢你，祖母。”她大声说，确信她那天早晨不会再看见任何其

他鸟类。

莫伊拉在教授住处附近找到了一个停车位。她在楼外的一条长凳上坐了几分钟，然后起身进楼，爬上三楼。莫伊拉仍然早到了十分钟，当她在楼梯上看卡通时，一个高高的、有着长长发辫的黑色女子下到大厅。她肩上挎着一个皮革做的女用手提包，下穿牛仔裤，上穿一件白色T恤，外罩一件背心。她的金边眼镜与背心非常搭配。

"你就是莫伊拉吧，"那位妇女说道，"我是塞席塔教授。进来坐。要不要来杯咖啡？"

面谈进展得非常顺利。莫伊拉喜欢塞席塔教授，尽管她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当莫伊拉问需要干什么工作，教授指了指她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桌子。上面堆着两英尺高的原稿和旧报纸。

"第一项任务是审阅那堆乱东西，编出一个文献数据库，"教授说道。"一旦你学会它，这一点也不难做，但你一定要细心和精确。"

莫伊拉承认，除了写课堂论文，她没有做这类事的经验。

谈话大约进行一小时以后，教授再次使莫伊拉感到惊奇，当她问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项工作？"

莫伊拉向GrabnGo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并开始在下个星期为教授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作确实比较容易。所有莫伊拉必须做的，就是将每篇原稿或新闻特写的标题、作者和来源输入计算机程序。一旦莫伊拉学会如何使用计算机，工作速度也就越来越快。但是有时，当信息缺失时，莫伊拉就要去图书馆追踪检索出来。她喜欢做这类侦探工作。

在教授办公室的原稿和报纸堆中折腾了一个月，终于把这些东西弄完了。然后，在图书馆一个特别的地方（很少人去的地下室的一间屋子），有更多原稿需要整理。莫伊拉喜欢带着电脑去那里干活。那里非常安静，适合冥想，并且时间很快就被消磨掉了。有时莫伊拉也会停下来读上一些原稿。她看上去没有真正花费什么力气就学到了许多东西。

莫伊拉也与教授谈到了她的研究。教授向她解释了她的项目是什么，以及她是怎样对它感兴趣的。莫伊拉有时也会问起她在原稿中读到的一些

事。这些是莫伊拉最喜欢的谈话，即使她并不能够确切理解教授所说的一切。莫伊拉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当她询问教授她所读到的某事的意思时，教授会将所有的事情联系到一起给她一个详细的答复。莫伊拉非常期望她在学期期间的课业能像是这样。

夏天这一假期很快就结束了，不过莫伊拉感觉在那一简短的时间里自己发生了很多改变。学校给人的感觉开始有些不大一样。以前，莫伊拉将她必须上的课视作是获得工作和过上真正成人生活的一种枯燥乏味的折磨考验。现在，她认为每堂课上都有什么东西悄然消失，并且应由她去追寻，不让一位愚钝的教授或乏味的课本阻止她前进的道路。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比她有时间去充分探索的更为有趣和更加复杂的地方，既让人激动人心，也让人为之沮丧。

进入秋季学期的几个星期后，莫伊拉在校内碰到了瓦尔基丽教授。

“假期过得好吗？”瓦尔基丽问道。

“太棒了，要多好有多好，”莫伊拉说。“我为塞席塔教授工作，主要是做些归档和书目工作。报酬非常丰厚，我从中学会了很多东西。”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不再主修哲学了？”瓦尔基丽半开玩笑地问道。

莫伊拉也笑了。

“过去我一直在主修‘未定’，但是现在我有些偏向历史。当我选修春季课程时，我可能会主修历史，捎带也会选修哲学。我想在你方便的时间拜访你一下和你谈谈这件事，”莫伊拉说。

“你来吧，不论哪个周二或周四下午都行，”瓦尔基丽说，“3 点到 4 点是我的办公时间。”

就像结果显示的那样，莫伊拉主修历史和政治科学。这多花了她一年时间完成双学位，但她心里并不着急。她知道，她再也不可能像在学校这样可以随意地去追求她的兴趣。莫伊拉也报名参加了这样一个工作，即一个帮助大学里的管理人员争取高工资的学生群体的工作。当莫伊拉了解到大学付给它的全职清洁工的薪水使得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时，她愤怒了。她决定在自己离校之前，至少是要努力改变这一情况。

在她的第五学年开始时，莫伊拉知道自己想去法学院。她认识的一些教授建议她去攻读研究生院，但是莫伊拉不想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需要改变的情况下去进行学术竞赛。她与管理人员接触的经验，已经打开了她的眼睛，让她看到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被剥削的其他情况。莫伊拉觉得，她应该做一名律师，而非教授，为与这些不公正进行抗争作出更多努力。在法学院念过三年以后，莫伊拉得到一家企业代表联合会、消费者群体和活动家组织进行活动的工作。在她赢取一桩反对 GrabnGo 公司性别歧视的案件之后，莫伊拉当上了律师。

* * * * *

这个故事两个不同的结局，展示了人们怎样陷入偶然性的漩涡，其中一个小小的事情——像撞到挡风玻璃上的小鸟——就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也能从这两个故事中看到，并不是那一单独的小事情造成事情按照已经发生的那样发生下去；它是一系列情况交织到一起而促成事情那样发生的。即使这些情况中一个小小的改变，都能把一个人的生活撞出其常规道路，将其引向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或许这样说，会使人感觉对个体生活具有社会学意识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每种生活的展开，都是一系列独一无二的随机事件的结果。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添麻烦去分析考虑个体的生活呢？我们可以希望从什么意义上理解随机性呢？然而不管怎样，生活并不是真正随机的，即使偶然性的漩涡会使它们带来的结果变得无法预测。

莫伊拉的生活不是随机的。它是模式的一部分。要看到这一点，可以考虑有成千上万个莫伊拉——那些想要通过上大学来获得领先地位优势的年轻女性，但是她们必须面对来自她们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冲突的要求，这些要求来自关于工作、性别、婚姻等的文化观念。这些女性面对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并且这些情况使得一些结果比其他结果更可能出现。即使偶然性的漩涡能够带来惊奇，像莫伊拉变成一个律师，但是我们之所以感到惊奇，只是因为那与通常会发生的事情有所背离。

如果重写我们上面讲述的这个故事，你就会看到这一点。如果莫伊拉的父亲

一直是位医师，而她母亲是位大学教授，情况又会怎样呢？她是否还会为了攒钱上学一直在 GrabnGo 打工？很可能不会。她是否还会将一个送货员视作自己结婚的对象？很可能也不会。或者要是莫伊拉是个男性，事情又会怎样？可能他早就被提升为地区经理了。这些改变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让莫伊拉进入一个不同的模式。

想象你把一根小树枝头上的一点扔入一条小河。有可能一条鱼儿会误将它当成一个小虫而吞下。也有可能，一只鹰看到小鱼浮出水面而吃掉它，包括小树枝末。可能这一枝杈，原本最终会待在你投它入河的地方之上数英里的森林中。所有这些都可能发生。但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是，这根小树枝顺流漂浮一段时间，浸满水后，沉到水下，陷进堤岸之下，逐渐朽烂。由于自然世界的运转规律所致，这是多数掉入水中的树枝的结果。

莫伊拉的生活，像每个人的生活一样，落入一条由时间和事件构成的旋转的小河。然而，这一旋转，就其所能带来的所有的惊喜而言，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模式化的——就像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所能看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这些模式——我们进入其中的地方——视作引起我们被推挤和被拉扯的东西，就像小河里的小树枝，比起其他地方，更可能将我们引向某些地方。我们可以将旋转——不断变化的各种情况的混合——视作有时会突然把我们从一种模式变入另一种模式，或是朝向没有想到的地方的东西。

没有终结的对话——自由、限制和未预见到的意外情况

考虑起因和意外情况，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控制。确实，我们可以作出选择，并且这些选择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将会有怎样一个结果。不过，看起来它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作为孩子，我们为社会环境所塑造，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进入成人，为了适应成人生活，我们必须对我们置身其中的情况进行适应和作出反应。因此，一个比较老的说法——人类创造历史，但却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是相当真实的。

不管怎样，在什么限制了我们的行动上，都值得进行更多考虑。我已说过（在

第5章的对话部分），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可能改变自己成为他们不想成为的东西。但是，是什么阻碍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呢？

一个明显的答案就是他人。要顺利渡过一整天，我们必须协调我们的行动与他人友好相处。如果我们表现得非常奇怪，或是在某些方面与他人期望的非常不同，他人是不会与我们合作的。他们或是不知道如何与我们相处，或者就是认为我们是危险的或发疯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在期望的品行之外做得太过头，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他人的合作——这对在世界上与人好好相处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这并不是说你不能作出一些奇怪的事情。你可以用你的私人语言来化妆自己，用油膏和鸡羽毛覆盖你的身体，然后站在街角，宣讲反对手机的罪恶。你可以那样去做。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但是，这一行动会产生这样一种影响，即，使你很难在这个世界上回到正常，因为他人会对你的古怪展示作出回应。

上面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有比我们经常承认的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当某人说“我必须去做什么什么，我没有选择”，这是相当不真实的。它的真正意思是，“我选择做什么什么，是因为不做什么什么的后果比我可能承受的要更多。”如果某人用枪顶着你的肋骨并要你交出身上的钱，你仍然有一个如何回应的选择。

因此，假定我们关心在这个世界上与人好好相处，他人就会构成我们行为的主要限制。我们也会受到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想法的限制。可以这样来考虑：在决定如何行动上，我们有很大的自由，但是我们不可能作出我们不知道的选择。如果你一直被教导相信你的选择是C、D和E，那么对你来说，你也许永远不会去考虑A和B或F和G。如果说这些选择简直是难以想象，那是由于你一直被教导这样去认为，于是你的行动也就有效地被限制了。

我们也为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所限制。无论我多么快地挥动我的胳膊，我也没法像鸟儿一样飞上蓝天。我也不能用羽毛去钉钉子。也不可以长时间忽略我的身体对食物、水、衣物和遮风避雨的需要。因而，客观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本质，也对我们所能做的强加了某些要求并设定了限制。

有一次，当我谈到限制我们行为的事情时，一名学生问起吸毒上瘾的事。她想知道，这样说是否公平——吸毒上瘾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他们想要的

话。“难道他们不能控制自己不是一种病吗？”她问道。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人们开始使用药物（酒精、尼古丁、咖啡因或别的什么）的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对一些人来说，它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乐趣和交际问题。不论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一开始人们会选择使用或不用药物。不过，我们还应该承认其他两件事。首先，许多人都会面对不是由他们创造的紧张情况。其次，人们从他们所处的文化中学到了应对压力和获取乐趣的可接受的方式。

但是，隐藏在学生问题背后真正关心的是，疾病是否会导致上瘾，进而导致失去控制。看上去，不可能是器质性疾病造成人们选择抽烟、喝咖啡或者喷鼻息可卡因。不过，这倒是有可能的，即某些人的身体（归因于生化），会对某些药物产生一种更加愉悦的享受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迅速发展出对药物的强烈热衷。但这是否就必然暗示了会失去控制呢？

一方面，不会，因为人们仍然可以选择如何对他们的热衷和欲望作出反应。他们可以抵抗，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屈服。然而，这假定了人们是正常的，并能斟酌其行动后果。有些药物能够如此强烈地扰乱大脑的正常功能，以至于一个人无法进行直接思考。因而，在另一方面，它也是真实的，即过度使用有些物质，可能会妨碍理性思考到失去控制的地步。

看上去我在这儿所说的有些跑题了。但我仍会提出一个关于起因和意外情况的观点。这一观点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是，至少部分是，我们将来必须应对的情境的起因。

回到药物的例子上，选择服药可能会创造一种一个人在以后的日子里需要服麻醉剂才能感到正常的条件。几乎没人能预见到这一点。然而，一旦生理热衷扎根，它就是上瘾者必须应对的现实。例如，吸烟者也许会说：“我对尼古丁已经上瘾，我没法戒掉它。”不过，更准确地来说则是，某个时间的一个选择（吸烟），导致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其他选择（戒烟）会产生不舒服的后果（忧虑、暴躁）。

我们总是在按照会带来未预期后果的方式来行动。在寻求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和欲望的过程中，我们帮助创造了我们必须在明天应对的情况。换句话说，我

们正在创造一系列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将会按照我们没有充分预期到的方式，改变我们未来的行动。我们今天作出的选择也会改变我们，因此，当明天到来时，我们将会作为不同的人来面对它。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可以将这项原则应用到更大的情境中。考虑一下我们以石油为基础的社会。当化石燃料首先被开采出来时，没人预见到日常生活和全世界经济将来都会依赖于它们所包含的能量的程度。我们也许可以说，石油，已经塑造了我们今天所是的样子。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没有石油，多数我们现在已经视作理所当然的社会安排都将不会存在。

然而，现在我们面临着，在今后70—100年内（据有些估计）石油将会枯竭的结局。然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意外情况？我们将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将会怎样作出这些选择？我们也许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即接受变动的必然性，明智地找寻一条通往未来的健康之路。或者我们也可按照上瘾者的方式去做，否认变动的需要，当事情以毁灭告终时，绝望地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取决于我们所具有的社会学意识的程度；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评估我们当前的形势、我们将会朝向哪里发展，以及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关于运气的注解

因为往往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引致事情按照它们发生的那样发生，我们经常会提到“运气”这一概念。如果我们喜欢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说它是好运。如果我们不喜欢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说真不走运。社会学家通常对“运气”并没有说太多，因为这一术语暗示，人类的命运是由神秘的力量塑造的；并且多数社会学家都喜欢认为，从原则上来说，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有一个可以识别的解释。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谈到许多关于“运气”的东西。他们也使用“运气”这一想法，来考虑事情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会像它们发生的那样发生。因此，或许“运气”是一个值得对其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事情。

要使社会生活里任一特殊事情发生，都要求各种情况复杂的契合。例如，得

到工作，要求许多情况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一起发生。如果一种情况是不同的，工作也许就会转到别人手里。由于我们无法看到所有这些情况是什么，因为它们的契合看上去也许似乎是一种侥幸，并且因为很多情况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外，我们用“运气”来解释我们否则就无法解释的发生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我们自己对利用不大可能的机会所做的准备，也是一个相关的情况。并且我们确实可以对这些准备有一些控制。就像一位著名的高尔夫球手所说的，“我练习得越多，我的运气就越好”。许多人都喜欢将这一讽刺应用于现实生活，作为一种说明成功更多地是一个艰苦工作的问题而非运气的方式。

但是在游戏和体育比赛中，环境是公平的——大家面对同样的规则和挑战。真实的生活则是不一样的，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并没有得到同等机会去进行“比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去了解“比赛”、接受专业教练指导或者去练习实践。某些人甚至会发现自己面对着比其他人更艰巨更困难的规则。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了说明一点，在真正的生活中，我们所说的“运气”并不是相当随意的，而是基于一些不容易看到的原因，按照模式化的方式被分配的。

三思而行

1. 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父亲作为一位电工为一家铁路公司工作。后来他被提升到一个管理岗位，地位和薪水大增，并有大量外出旅行。在公司得到提升，也意味着每年都要搬到一个新城市。我的父母发现他们不想要这种生活，因此，我的父亲放弃了管理工作，仍然回去当他的电工。作出这一决定时，我7岁，这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如果可能的话，问问你的父母，他们是否会作出一个相似的选择。这一选择将会怎样改变你的生活路线？如果你的父母选择不那样去做，你的生活也许会有怎样的不同？

2. 有句老话说，不是艺术家选择艺术形式，而是艺术形式选择他们。这意味着，当人们探索完成创造性工作的方式时，他们最终会找到一条将他们深深地拉进去的道路——原因很难推测。我们可以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艺术领域之外，看到许多人发现一个爱好、一项体育、一种工艺、一个研究课题或一种工作，看上去

就像是自然而然地强迫他们去热爱的。当这发生时，人们经常会带着极度的热情努力获取知识和技巧。什么样的社会情况使得人们会产生这种经验？如果一个人从未有过被创造性的活动所选择的经验，又会有什么不同？

3. 在努力发现其根本原因这一意义上，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得到了同等好的研究。或许是因为从可论证的角度来说比较微不足道，像玩杂耍这样的事情没有引起科学关注。但是有些盲点很是令人惊奇。例如，很多研究都在努力发现什么导致同性恋，而不是努力发现什么导致异性恋，后者看上去似乎要更常见。与之相似，很多研究都在设法发现为什么小比例的穷人成功地脱颖而出，而更少去关注什么首先导致不平等和剥削。如果社会科学家在美国可以自由地研究他们想要研究的，你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在发现什么导致我们社会占据中心的特征上作出的努力相对较少？这种有选择的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

参阅书目

Becker, Howard S. (1994). "'Foi por acaso': Conceptualizing Coincidenc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5: 183-194.

Bloor, David.(1976).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rown, Robert.(1963). *Explanation in Social Science.* Chicago: Aldine.

Campbell, Jeremy.(1982). *Grammatical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Davidson, Donald.(1963). "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60: 685-700.

Deffryes, Kenneth.(2001). *Hubbert's Peak: The Impending World Oil Short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ulmin, Stephen E.(1972). *Human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on Wright, Georg Henrik.(1971).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gner-Pacifici, Robin.(2000). *Theorizing the Standoff.*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图像、描述和理由

俗话所说的“不要根据封面来判断一本书”提醒我们，外表能骗人。第一眼看上去像是真实的，结果可能是相当错误的。不过我们仍然一直都是根据书、人和其他事物的外表去判断它们。我们倾向于看到我们所能看到的——书的护封、一个人穿的衣服、汽车防撞器——并对其潜在的质量作出推论。既然我们知道这样做有很高的风险并会让我们走错路，为什么我们还会这样去做呢？

我们依靠外表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知道可以从人们和事情那里期望什么。当我们遇见一个不熟悉的人时，我们也许想知道她或他是友好的还是危险的，是值得信任的还是不诚实的。我们也许想知道她或他是否可以给我们帮助，或者是否想要设法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直到我们真正了解一个人，我们对这些事情不会有太多确信。但是，即使那样，我们仍然需要对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有一种想法，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我们可以发现的特征标志作出评断。

我们依靠外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要应对许多我们可能永远不能有很好了解的人。我们与他人的许多相遇，都是非常简短的，有许多人我们都是这辈子可能只会看到一次。可是我们仍然必须决定他人可能会怎样对我们行动——从而决定我们应该怎样对他们作出行动。要想让事情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学会快速“阅读”他人。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

会犯错误。当刻板印象影响将一个人当做独立的个体深入理解，我们很可能会判断错一个人的特点。

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克服基于有限信息对他人做判断这种需要。如果我们都住在小村庄——在那里，在许多年的交往里，每个人对他人都有很好的了解——事情显然会有所不同。但是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被迫依靠我们能够迅速看到和解释的东西。具有社会学意识，意味着知道我们正在做它，知道我们正在怎样做它，知道环绕我们周身的外表都是精心制作，以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感受。

社会世界里充满了策略性地制作而成的图像和描述。说它们是“策略性地制作”，意味着它们是按照创造一个特定印象的目的去做。考虑你为自己制作的图像。例如，在工作面试时，你必须制作一个自己是能干的和热情的图像——自始至终都要看上去是那么自然，以至于不会被人看成是骗子。在初次约会时，你可能会精心制作一个关于自己的图像，以便他人能够看到你身上最迷人的一面。当然，它会从两个方面起作用；他人也会为你精心制作关于自己的图像。

或许这会使得社会生活看上去就像是一场欺骗比赛。你也许会认为，“既然这样，具有社会学意识，也就意味着看到每个人都是一个骗子，因为大家都在设法用这些伪造的图像欺骗别人。”但这并不是社会学真正想要引领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骗子，也不是所有精心制作的图像都会误导他人。关键在于，不论我们是否有心误引别人，或者显露我们最真实的自己，我们仍然必须精心制作图像。

假设你想要表达你对另一个人的爱。怎样做你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你必须把你的情感付诸行动，让另一个人将其解释为爱的标志。这是你能做的全部，因为另一个人不可能看到你的内心，去检查那里面是否有一种感情贴着“爱”的标签。另一个人必须根据你所说的和所做的，来判断你对他/她的感情到底有多真。这也就意味着，你必须精心制作一个你的图像，别人会将其视作表露你真实感情的标志。无论我们是在伪装，还是尽可能地诚实，都回避不了我们对图像的依赖。

再举一个工作场所的例子：当你寻求被雇用和提升时，有能力是件好事，但是，看上去能干则更加重要，因为关于你的未来的决定，将会取决于掌握权力的人认

为你会是怎样的。如果你很能干但却没有在他人的印象中创造一种有能力的图像，你在工作上的发展就不会太好。不过，当关键时刻出现时，那些花费更多努力去刻意创造一种比真正有能力的人显得更有能力图像的人，也会失败或摔跟头。

我们创造的图像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可能都要依赖于它们。他人依赖外表决定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同样依赖外表决定如何对待他们。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并没有去想，"我将依靠外表判断这个人。"我们所做的，带有或多或少的习性，就是寻找一个人内在品质的标记。我们所依赖的标记，就是我们学会去看和解释的那些。

这一对图像信赖的一个好奇的结果是，我们在互动中互相创造对方。例如，你可能会处在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你感觉就像你说的和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创造了一个关于你自己是智慧的、迷人的和和蔼可亲的图像。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是你所是；从你的表现，他人能够推断你确实是一个机智的、迷人的和和蔼可亲的人。

你可能也会处在这样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下，你感觉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并且由此也可能导致他人认为你是个大傻瓜。为什么这会发生呢？你也许会说："今天是个坏日子。"也许那天你确实不走运，但是，如果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看到，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看到有一个好日子或坏日子，与人们之间将会发生的事情有很大关系——他人能够产生最好或最坏的我们。

如果他人显示出对我们所说的感兴趣，如果他们尊重我们的看法，如果他们听了我们的笑话与我们开怀同乐，我们可能确实会比在如果我们讲话他们走神、我们讲笑话他们沉默不语或者驳斥我们的看法的情况下表现得更好——即表达更流利、更有自信、更机智和更迷人。通过影响我们的表现，他人从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某一情境下我们是谁。如果他们的行为在我们身上激发出一种好的表现，他们就会有证据推断我们有优良品质。如果他们以一种会使我们搞糟搞乱的方式对待我们，他们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不好的表现，并会从这一表现推断我们是笨拙无能的。

再次，它是按照两种方式进行；我们影响他人的表现，也是以两种方式进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按照能够让他人展示他们是谁最好一面的方式对待他人的问

题。有时，它是一个接受他人宣称要比他们所是的做得更好的问题。朋友也许会稍稍吹嘘，夸大某些质量或技艺。我们是否应该不加评论地放过这一吹嘘，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挑战它？不管我们选择哪种做法，我们的行动都会影响朋友努力创造的图像。他人同样可以支持或挑战我们提出的关于我们自己的宣称。

因此，他人赖以作出关于我们特点的推断，就是社会创造物。我们不能单由我们自身作出图像。并且，正好合适的图像——从而也是他人强加于我们的"真正自我"——依赖于我们可以成功地应对各种各样的观众。但是，还有更为深刻的方式——这一图像及真实自我的创造取决于社会生活。

创造图像的资源

考虑一下，需要什么来创造一个关于一个人的自我讨人喜欢的图像。我们必须能够展现标志——讲话方式、行为方式和物质对象（像穿衣）方式——他人可以用来作出关于我们的推断。所有这些资源都来自社会生活。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按照他人将会理解成有能力、有道德或其它优良品质的标志的方式，去讲话和行动。我们也必须获取某些资源（技能、金钱），它们将会允许我们获得其他具有符号性的资源，例如一件好工作、一件精美的衣裳、一辆汽车和一个家等。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我们可以用来创造图像、印象和值得称赞的自我的标志，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以一种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使用这些符号的能力，也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或许你会认为，"没错，符号标志来自社会生活，使用它们的能力也来自社会生活。那又怎样？"答案是：在一个有着大量不平等的社会，对展现一个应当认可的自我非常必要的资源和技能，会得到不平等的分配。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一个可以得到认可的自己，至少是有些观众就做不到。这也意味着，一些人将会通过运用权力，而不是美德的力量，来创造善良的印象。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注意到谁能获得和使用什么样的标志，学会如何适当地使用它们，并可得到与特定观众使用它们的机会。我们也会追问："谁有权决定什么被视作特征的重要标志符号？"这是意识到在美国社会，一个男性身

体、白皮肤、白人特点、盎格鲁撒克逊姓氏、异性恋倾向和财富，为什么被理解成一个值得尊敬的自我标志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意识到，图像非常关键，因为它们会影响我们怎样对待他人和他人怎样对待我们；图像不是个性的结果，而是人们怎样定义事情、怎样互相对待、在一个社会中群体之间存在多大的不平等的结果；处于统治群体中的人们，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优势，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竞争力和有道德的图像，拒绝给予拥有较少权力群体的人们创造平等价值的图像的资源。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要注意这样的图像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怎样影响人们过上好生活的机会，以及它们怎样帮助维护（或改变）了社会世界运作的方式。

描述

一名学生曾告诉我，"60 年代"是一个滥用毒品、疯狂的性爱、纵容、反美主义和普遍社会混乱的时代。他想说的重点是，60 年代没有产生什么好东西，并且我们的最佳选择就是应该将这一愚蠢和破坏性的时代抛到脑后。

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他说："1975。"

"那你怎么可能对 20 世纪 60 年代有如此多的了解呢？"

"各种各样的来源。"他说。

当我要求他说得更具体点，他承认他没有读过任何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书，他的知识主要都来自"电视电影等"。

从电视中了解遥远的时代、地点和人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电视提供给我们的知识，主要采用的是一种更多地为了娱乐而不是传授知识的方法。这就意味着，某些人，或者某些群体的人，为我们选择了图景的部分（所有可能知道的关于其他事情的一个子集），然后将其展示给我们，好像这就是事情的整个图像。因此，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一个被精心制作的、部分被重新展示的现实，对这一现实我们可能没有直接接触的途径。

告诉我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没有仔细检查一直展示给他的描述。如

果他仔细检查过，他可能就会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多数大学生都没有抗议，没有暴乱，没有吸毒，也没有参加放纵狂欢，并且，美国社会中的许多负面现象——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通过礼貌和不礼貌的抗议受到挑战，那个年代里发生的事情就像大多数年代发生的一样，而不是所谓的"普遍的社会混乱"。他应该也已知道，许多他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民权运动的收益，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

当然，即使这名学生读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书，并且与在那个年代里生活过的人交谈过，他可能依然会依赖于电影电视描述。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亲身体验，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依赖于他人创造的描述。遗憾的是，这名学生依赖的是那些陈腔滥调或刻板印象，并且没有质疑它们是怎样和为什么被创造出来的。

图像和描述非常相像。图像是通过我们可以直接目击的"符号化表现"来创造的。描述是对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事件的想象。要谈论20世纪60年代是什么样，或者中国人是什么样，或者月亮的黑暗面是什么样，或者夸克是什么样，或者上星期一个聚会上发生了什么，都是在创造一个描述。描述可以把遥远或看不见的现实带入当下。

描述的必要和危险

与图像一样，描述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想要谈论遥远的现实，我们必须创造关于它们的描述。同样与图像非常相像的是，描述也是由来自他人的帮助或妨碍创造的。有时，他人会肯定我们的描述（"是的，事情就是那样发生的"）；有时，他们会提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具有竞争力的版本（"我来告诉你真正发生了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许必须作出一些修正。我们最后同意的描述，通常都是协商的结果。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看见，不仅描述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我们视作现实的东西，也取决于我们创造和赞同的特定的描述。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会理解描述确实就是描述，我们可能会误把它们视作现实的一个未经调停的看法。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描述是重新展现，我们也会看不到它们是怎样经常被扭曲变

形以迎合创造者的利益。

一名学生曾跟我谈到一个电视节目，该节目声称将会展示真正行动中的警察。我说他不应把这个节目看得太认真，因为它的关于警察工作的描述，可能会被编造得更加具有娱乐性。这名学生坚持认为，节目准确地展示了事件正好是像发生的那样发生。我一直没能说服他，直到我发现了一篇文章，它是由一个制作电视节目的人写的，解释了看上去显得非常真实的犯罪现场是怎样策划的。这名学生然后意识到他一直被愚弄了，但是，毫无疑问，仍会有数百万人相信，节目是对遥远现实未经过滤的准确写照。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应该就像警察所展示的那样，怀疑那些宣称没有被构建的描述。我们应该怀疑，因为某人正在设法说服我们一个遥远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同时则掩藏了他们如何挑选东西向我们展现那一现实的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具有意识，我们就会总是能够看到被构建的描述，然后我们就会询问，是谁在构建、怎么构建、为什么要这样构建。有时答案会非常明显，有时则不会。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询问这些问题，我们就极少会陷入其中。

谨慎对待描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此依赖于它们。考虑一下所有展示给我们的事情：历史事件和时代；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我们自己的经济状况；其他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性格特点；公司和政府的行为；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世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直接接触到被描述的对象。当我们没有办法获得那些被描述的东西时——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从几个不同的来源考察描述，并要再次考虑它们是怎样构建的、出于什么利益构建的。

由刻板印象和习性带来的歪曲

对描述是如何构建的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就要假定所有的描述都是设计来愚弄我们的。当然，有些确实是被设计来愚弄我们的。例如，如果一家采矿公司被选为环境保护冠军，里面的伪造是很容易看出的。但是，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即误导的描述被那些原本无意欺骗的人出于一种文化习性创造出来。

假设你听到一个32秒的新闻报道（收音机或电视新闻的典型长度），内容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受到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性骚扰的指控，因为他亲了同班同学的

脸一下。你也许会认为，“这也太过分了！对性骚扰的合法关心，变成了歇斯底里。指控一个6岁的孩子性骚扰，真是疯了！”你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新闻后都会有着与你一样的反应。但是这里还有另一种可能的反应：“关于这个故事是否还有更多可说的？”

结果也许会显示，对这个故事了解得越多，就越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反应。假设你知道男孩长时间来一直找班上同学的麻烦；这个男孩一直抵抗对他实施的更加柔和的遵守纪律的努力；此前学校管理人员一直被起诉未能对一个岁数更大的孩子不断进行的语词相同的行为采取行动；并且管理员并不情愿使用性骚扰这一罪名，但是他们除此之外又没有选择，因为男孩的父母拒绝与校方合作。如果你知道所有这些情况，你也许会对这一新闻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举这个例子的重点，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更多的信息能够导致对一个情境作出更聪明的反应，而是想说复杂的情况经常会按照刻板印象的方式得到展示。在本例中，一个复杂得以至于不能纳入30秒规定时间的故事被缩减成了一个刻板印象：“过分热忱的管理员为了政治上正确走到了荒谬的地步。”这类报告是相同的，尽管不是由于一个否认性骚扰重要性的阴谋。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刻板印象有助于或者说便于对复杂遥远的现实快速创造一个容易理解的描述。

与这类刻板印象非常相像的东西，已经影响了我的学生对“60年代”所抱有的观点。他毫不怀疑他所接触到的关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反叛年代的许多描述。这一刻板印象式的描述，因为它是如此常用，看上去就像是基于大家都同意的基础上的现实版本。不了解更好的对这一时代的描述，没有很好的怀疑的理由，他也就接受了它。

所有的描述都是不完整的和简化的。没有办法避免这一点。我们所能避免的，如果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就是陷入这样一种幻觉，即描述是对遥远现实最直接的看法。换句话说，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描述的构建。再次，这并不意味着要消除所有被用来误导我们的描述。它意味着，我们要关注描述是如何被构建的、由谁构建的、服务于什么目的。

在有些情况下，某些人或小组为什么希望我们接受一个特定的描述，非常容易看到。例如，我们也许会看到，如果我们接受一个群体关于历史的描述，就会

使他们看上去像是不公正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同情和支持他们。认识到人们有一种按照特定方式刻画历史的兴趣，并不会使他们关于历史的描述变得正确或不正确；它只是可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去寻找偏见和更多信息。

最简单的对描述具有社会学意识，就是去问："关于这些人或事件，是否还有其他需要了解的？提供给我的版本是怎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其来源渠道的价值观和利益塑造的？这一描述是否一直都是经过详细调查被构建的，或者它是否仅仅是道听途说而来？谁也许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些事情？为什么？"如果像这样的问题能够习惯性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我们就很少会被刻板印象或恶意编造者所欺骗。

给出和接受理由

假设你快要错过最后期限。为了免受处罚，你可以申请延期。要得到延期，你必须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为什么你的工作要延期。例如，你可能会说："我的工作要往后推迟，是因为我太懒惰、不负责任，没有考虑到我的行为是否会伤害到他人。但是如果你能让我延期，我会尽快把工作完成。"这是一个可能的理由。听见它的人可能至少会相信你是诚实的。

这里是另一个可能的理由："很抱歉我的工作没能按时完成。我真的是尽了全力想要按时完成，但是我父亲这周被解雇，我母亲在参加过我伯母的葬礼之后病倒了，因为假日的缘故我则必须花费额外时间去照看店铺。因此，现在我的事情真是一团糟，我可能要稍稍推后一点。但是如果你给我一些额外的时间，我想我会在一两天内就把活干完。"除非听见这些话的人是铁石心肠或者认为你是一个赤裸裸的说谎者，你很可能会得到延期。

只要我们做的是其他人期望我们做的，我们通常就不必提出理由。只有在我们的行为是意想不到的，或是违犯了规则，我们才必须给出一个理由，可能也会有辩解或借口。与图像一样，理由也非常重要。正确合宜的理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在最后期限到来时得到延缓或是被辞退、被赦免或被判有罪、保留关系或失去关系。要想让社会生活继续顺利进行，避免给我们自己找麻烦，我们必

须知道如何提供合适的理由。

或许你会认为，“如果任何时候人们都实话实说，提出理由也就不会成为这么大一件事。真相总是最佳的理由。”实话实说可能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要更加复杂，因为真相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讲得较完整或较不完整。

假设你的一位朋友告诉你关于她或他这会儿遇到的问题，希望你能认真倾听并表示理解。但与朋友的期望相反，你将这些问题当做鸡毛蒜皮的小事不予理会，从而伤害了朋友的感情。可能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她或他会打电话要你说出你这样做的理由。你会说些什么？真相也许是你非常喜欢你的这位朋友，但是对你朋友念念不忘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你看来都不值一提）感到有些厌倦。因此，你也许会说：“我没有认真听你说些什么，因为我厌倦你老是对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麻烦抱怨个没完，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挨饿的人。”这一理由很可能会结束你们之间的友谊。如果你不想结束你们的友谊，你可能会尝试这样去说：“我确实非常关心你是怎么想的。但对我来说，有时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特定的事情会那么强烈地影响你。当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按照你作出的方式去感受时，我就会没有太多耐心，并会在你讲述它们时显得心不在焉。如果我这样做使你觉得受到了伤害，我向你真诚地说声对不起！”

就像这个例子所暗示的，并不是实话决定着一个人会对一个理由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问题的关键是理由本身——它是怎样形成的，它所暗示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它激发起的情感是什么样的。与图像一样，没有办法避开对理由的依赖，因为真相，不论它可能会是什么，也无论我们可能想在多大程度上讲述它，都是只有通过理由才可以讲述的。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获取它。

如果你在工作时穿着用本书的纸做的长袍，肯定会有人要你讲述一个你这样做的理由。如果你说“我这样打扮，因为今儿是个大热天，这本书比较凉快”，你很可能会被看做抽风，不是被送回家就是被解雇。有些理由是行不通的，并且我们要再说一遍，产生差异的并不是真相。一个理由只有在听到他的人觉得合情合理时才会起作用。一个发烧俱乐部的成员也许会认为，穿着俱乐部英雄人物所写的书里的纸做成的衣服，是种相当适宜的举动。

在理由的背后和下面

如果我们注意到理由是怎样塑造的，我们就能看到被人们视作理当如此的是什么。例如，如果你问某人："昨晚为什么你会喝醉？"并且那个人回答说："因为我失去了工作，心情糟透了。"你可能会倾向于接受这个理由。你也许会说："我能理解。"现在考虑一下这里什么被视作理当如此——工作是重要的，失去工作是件大事，应该避免坏情绪，喝酒是避开它们的有效方式。如果你没有将这些事情视作理所应当，另一个人喝醉的理由就会显得毫无道理与意义。

理由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理由的提出者和接收者共享某些特定的假定。每个理由，如果有意识地去考察的话，都可能会因之而成为一种更深人地理解共享信念的方式，这种信念将一个共同体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理由为什么会起作用？必须接受什么假定才能使这个理由显得合情合理？"要实践这种意识，我们不必寻找理由去学习。我们可以通过更多注意我们自己的理由来开始。

也许你会要求许多人——老师、老板、政客、企业主管、管理员、官僚主义者——说出他们的理由。可能你会认为，某些这样的人应该被迫解释他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为什么会那样做。并且，如果他们不能给出可接受的理由，他们就应被解雇、免职、赶出办公室、关进监狱，或是用其他别的方式惩罚他们。然而，问题是，你对理由的要求（你可以向当地报纸写封愤怒的信）很可能会被忽略。毕竟，你也不看看你是谁，竟然可以要求大臣、参议员或总统提出理由？

显然，在权力和责任之间存在一种连接。实际上，一个人权力大小比较好的标示，就是有多大的自由可以忽略他人对理由的要求。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有能力强迫他人为其行动提供理由，如果他们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的威胁。因此，意识到谁被迫对谁提出理由、谁能强迫他人提出理由、谁可以忽视提出理由的要求，也是一种看到存在于群体、组织、共同体或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方式。

制造现实的工具

社会现实部分是通过模式化和理由被构建起来的。在给出的理由中，人们说出他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或是他们想让其他人相信是真实的东西。并且，当

理由被接受时，它就像是签署了一个协议："好，我们接受这个理由作为一种实际情况是什么的描述；我们将从这里起步。"然后，或许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意识到原因是怎样模式化、作出和判断的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现实才得以被创造，而我们则都可能会陷入其中一段时间。

或许看上去就像是，图像和理由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实的。图像可能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精心制作出来以产生关于人或群体特征标志的不正确的推断。同样，理由也可能是假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忠实地对应于事情实际上怎样或曾经是怎样——也许可以通过公平和仔细的调查去发现。另一方面，在决定什么是真实的时，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是依赖于图像和理由。一个错误的图像只能由另一个图像代替，就像一个错误的理由只能被另一个理由替换。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将会看到，没有办法克服我们对图像、描述与理由的依赖，因为只有通过构建图像、描述和理由，我们才能创造共享的什么是真实和真相的信念。换句话说，我们看到，我们关于什么是真实的和真相的想法，取决于一个我们不可能逃脱的过程——一个创造和依据外表行动的过程。认识到这些之后，我们就能成为更好的分析员——分析谁创造了哪类外表、出于什么目的、会对他们带来什么结果。

具有重大意义的缺席

假设你刚好遇见一个你觉得非常有吸引力的人并想给其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你先前听说过这个人非常看重诚实，因此，当这个人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谈论你的工作，相反你答道："当没人注意我时，我会扣我的鼻子。我在洗碗槽里剪脚趾甲。我在地板上乱扔脏袜子。并且有时我会几个月都不换洗床单。"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诚实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对方也许会说："哈，很好，你说的很有趣。我很想多谈一会儿，但我这会儿必须上路了。再见。"

你做错了什么？你仅仅是想努力在某些你觉得可能会欣赏你的诚实的人的眼里，精心制造一个关于你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的图像。并且这与你承认自己是一

个连环杀手或烟草公司执行委员是不一样的。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这个比较傻的例子，指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违犯在什么场合下什么是恰当地讲述自己的文化规则，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个笨拙无能的人。换言之，在如何向他人展示我们自己上面遵守惯常的规则，是精心制作一个关于我们自己是神志清醒的、正常的和安全的图像的一部分。另一点是，外表是通过大图景中的一些事情含而不露精心设计的。当制作我们自己的图像时，我们必须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否则我们就可能会损坏图像。

毫无疑问，你曾学到，遇见他人时，通常最好是带着肯定自己的信息开始，以便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因此，一旦你让他人相信你是一个正派人，你就会逐渐露出你的缺点。如果你把关于自身不好的信息先说出来，当你后来想要创建一个关于自己的值得称赞的图像时，你很可能会有一段艰难的日子。要创造一个好印象，你必须知道怎样开始。

在创造描述时，信息缺乏很重要。例如，美国历史可以这样来描述："从前，勇敢的欧洲探险家发现了广袤无垠、未开发的土地，这片土地后来由从国王和教皇统治下寻找自由的殖民者定居下来。最终，这些殖民者发动了一场战争，挣脱了他们对腐败英国国王的锁链。在解放自身以后，殖民者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以自由和民主原则为基础。共和国不断成长，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一直扩展到海边，把一个未开发的地区变成地球上最富有、最有生产力、最自由的国家。"

这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甚而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描述，很像中学课本里公民教育课上所讲授的。然而，它是一个通过忽略一些重要事情而达到一个正面效应的描述。特别是，它没有提及生活在"广袤无垠、未开发的土地"上的土著人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被定居下来的殖民者给杀害了；它也没有提及对非洲人的奴役，或者是"自由和民主"最初仅仅是为拥有土地的白人所享有；并且它也没有提及美国通过暴力偷盗墨西哥人的土地的扩张。把这些隐藏的事情都放回大图景中，将会得出一个不同的描述。

有组织的排除和发明

群体成员的描述，也由缺席来塑造。例如，如果讲述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

作家和政治家的书籍或电影，从不提非洲或女性，那么它给人的印象就是，看上去非洲或女性没有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就的能力。然而，一项对美国历史进行的仔细研究显示，非洲人和女性作为科学家、哲学家、作家、政治家等作出了卓越的工作。但是，如果他们的工作在谁做了伟大的事情的官方理由中被忽略掉，一个不公道、不精确和有害的描述就会被创造出来。这样，群体描述——像自我的图像和国家的描述——也就通过将一些事情排除在大图景之外被创造出来。

或许你已经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的图景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和关于国家和群体的描述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当你创造一个关于自己的图像时，你是在与他人的小群体相互合作来做的，通常是面对面的互动。即使人们可能会通过背后议论影响你的图象，那也很可能是非正式的、由少数人完成的。在日常生活中，极少有有组织的努力，去毁坏或维护一个个体的图象。

相反，创造某一类型人和国家的描述，则需要更大范围的合作。例如，它要求许多人通力合作——作家、出版者、老师、校务委员会和父母——创造和维护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关于美国经过“消毒净化”的描述。它也需要大范围的合作，去创造关于黑人男人是暴力的和犯罪的；女性主义者是愤怒的对男人怀恨在心的；工人阶级中的男性是乡巴佬；女性最适合养育孩子而不是去管理；政治领导人是精明能干的等诸如此类的描述。像这样的描述——通过电视、电影、新闻、书籍、教堂、学校灌输给我们——都是制度的产物。

意识到描述是制度的产物，提醒我们需要知道谁控制着制度、谁受益于他们创造的这些描述。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要找到一个告诉他人歪曲现实的最上层的老板或委员会。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会找到一个群体的人，他们会从创造关于历史、政治、其他人等的特定描述中找到安慰或是获得好处。我们可能也会发现，许多参与创造描述的人，都是在按照习性行动，而没有想到要去质疑那些隐藏在其描述下面的假设。

看到描述是怎样制度化地被创造出来的，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描述是如此广为流传，以至于很难改变。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愚蠢地坚持相信什么是假的，而是因为他们经常被灌输一些具有误导性但却是以一种真实方式发生的描述。如果这些描述来自制度途径——大众传媒、学校、政府——人们很难逃脱或反

驳它们；它们看上去似乎也具有很高的权威。如果一个老师说“必须读这本书来学习”，我们更有可能担心会对这本书感到厌烦，而不是担心被这本书给误导。

挑战描述

挑战一个地位稳固、制度化创造的描述，要求一种有组织的努力。仅仅是一个人挺身反对说“那是不真实的！真正的事情是这样的……”，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讲出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是值得做的，因为，即使结果表明我们是错的，我们说出也会比不说出学到更多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确信一个制度化创建的描述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与他人一起努力来改变它，可能是通过创办一家报纸、一所学校、一个反诬蔑同盟或者是一个思想群体。缺乏挑战，就像缺乏信息，是虚假描述得以存在的一部分。

对图像、理由和描述具有社会学意识，意味着要将它们看做是被构建的。它也意味着怀疑（作为一种习性）一些事情一直被排除在外、我们正在看到的包括显著的缺席。如果展示给我们的全是光明的一面，没有一点暗面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怀疑这样一种一边倒的存在，并要对其保持警惕。如此谨慎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揭穿看上去好得难以相信的每件事，而是要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看到所有的事情——将其看做更复杂的，而非第一印象可能显示的那样。

如果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寻找可以替代的图像、理由和描述，并会努力创造我们自己对事情——人、地方、事件、历史、群体等——的图像，而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别人传递给我们的图像。只有这样去做，我们才能发现是否存在可替代的现实版本、这些版本是否一直被压制。按照这种方式具有意识，我们也能发现在关于现实的官方理由中重要的缺失。我们也会看见，外表是如何与权力相联结的。与此同时，意识到外表是如何构建的、由谁构建的和为谁构建的，我们将会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没有终结的对话——寻找替代描述

经常有人问我，我们怎样才能减少对主流媒体（由大企业拥有的电视网路、

收音机台、新闻杂志、新闻报纸）灌输给我们的描述的依赖。问题通常来自那些开始想知道告诉给我们的发生在美国境外的事情是否是真实的人。如果我们不可能亲自去遥远的国家旅游，亲眼看一看那里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从前，我会说“去图书馆”。当然，现在我仍会那么说。图书馆是一个你能找到许多可供选择的描述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找到被主流媒体排除在外的多数信息。我认识到这一重要性，是在我读研究生第二学期（1980年春季）。下面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了准备一个课堂演讲，我决定研究人们怎样解释在政治漫画中编码的消息。由于我需要很多处理相似主题的漫画，我选择了有关伊朗的部分。这看上去也许像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但在当年那个时候，新闻中经常提到伊朗。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时，一个伊朗学生群体，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扣压了62名美国人质。随着“人质危机”持续拖延，每天都能在新闻中看到伊朗的字眼。

在这一时期，许多政治漫画都评论了发生在伊朗的情况。在漫画和那里发生了什么的新闻报道中，伊朗人被刻画成一个被一种对美国不理性的仇恨所驱使的宗教盲信者。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描述。

实际上，一般而言，我对伊朗了解得非常少，因此我首先做了一些背景阅读。我了解到，1951当选伊朗议会的总理是穆罕默德·摩萨德，在伊朗人民中受到广泛欢迎。他受到欢迎，是因为他许诺使用伊朗的石油财富来促进伊朗的公共服务建设。为了做到这一点，摩萨德控制了石油，不再向殖民时期主导伊朗的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提供。摩萨德的行为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CIA设计了突袭行动并扶植了沙哈成为伊朗的独裁者掌管伊朗。沙哈立刻放松了伊朗对石油的控制，使石油回到美国和欧洲的石油公司。

我也了解到，沙哈维持自己的统治，是通过一只秘密的军事力量，他们会杀害和拷打不满分子；并了解到，美军CIA为他的努力提供训练和经济支持。在25年的高压统治后，沙哈深为人民痛恨并最终被推翻下台——当一只抵抗运动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霍梅尼的领导下发展起来时。

收集这些资料并没有花费很多工作。我读了半打发表在国际政策期刊和可供选择的报纸上的文章。关于摩萨德如何深受人们欢迎以及沙哈如何残酷存在一些

不一致的看法。但是，没有关于在驱逐一位当选领导和安插独裁者（主要是为美国和欧洲石油公司的利益考虑）中美国角色的争执。（如果你想亲自证实这一点，你可以去图书馆自己查寻这些材料。）

了解到所有这些内容，使我感到恼怒，因为自己被欺骗了。为什么主流媒体不提供这些信息呢？我仅仅花了几个小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可以肯定，电台和报纸记者同样能够发现。

约有两年时间——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主流媒体忽略了沙哈统治的历史和它令人厌恶的起源。没有这一历史和背景，伊朗人看起来就像是狂热的宗教分子，他们的委屈不值一听。因此，就像依靠主流媒体提供外国事件报告的多数人，我也没有真正理解发生在伊朗的事件、美国在那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或者伊朗人为什么对美国非常恼怒。在我看来，如果美国人知道整个故事，他们将会对伊朗人民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或许，对美国政府也会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了解伊朗的这一体验，教给我几个教训。一个人必须对主流媒体报道的国外事件保持警惕，尤其是在美国也参与其中的情况下（不论以什么方式参与）。另一点是，当前发生的事件不可能得到真正了解，如果不了解其历史的话。第三个教训是，寻找关于事件我不能直接检核的可供选择的描述。图书馆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吸取这些教训的地方，但在今天，要做到这一点已经变得更加容易。

在 1980 年，当我做我的政治漫画的课堂演讲时，还没有互联网。今天，我在图书馆里发现的许多同样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得到，并且在几分钟内就可得到。（当然，你仍然必须自己判断信息的质量和其来源的可信度；并且我仍会鼓励你使用图书馆去发现书本。）因此，通过我所说的提供历史、背景和关键分析，现在要比过去更容易发现可供选择的描述。如果你希望看到我近年来发觉有用的网络来源，可以去 zmag.org、commondreams.org 或 counterpunch.org。我并不是赞成你在这些网站上将会发现的所有的东西，但我有理由相信，你会发现，它们会帮助你以一种更具社会学意识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信息和分析。

关于被动语态的注解

这里是一个以一种奇怪方式讲述的小故事：

从前，一个国家被侵略了。许多炸弹被投下，上千人被杀害。侵略变得更加糟糕，因为错误已经犯下。谎言被讲述，以为入侵辩解和掩盖错误。由于许多人对一直产生的混乱很是恼怒，努力正在作出，通过在别处发动另一场战争，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在这个故事中，看上去仅仅是事件在发生；侵略、轰炸、杀害、说谎和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人全部缺席。这就是被动语态：它将其行动导致事件发生的人排除在外。一个以这种方式讲述的故事，使得他人很难说出，谁应对做错的事情负任。

相反，主动语态则可辨认出行动的来源。例如，如果我们说“乔治砍掉了樱桃树”，我们就能正确地知道谁（乔治）做了什么（砍树）。如果我们使用被动语态说“樱桃树被砍掉了”，我们也就留下了一个疑惑：谁应对毁坏树负责。

在日常用语中，当我们不太确信谁做了某事时，我们经常使用被动语态。因此我们也许会说，例如，“教室地板在周末打了蜡”，或者“一项新的分级政策得到批准”。按照这种方式谈论，必然不会有什么错；我们没有必要总是说出恰好是谁做了什么事，才能察觉谈的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当我们需要让人对违反法律或故意伤害他人负责时，被动语态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可以理解，有罪者通常更喜欢被动语态，因为它可以遮掩他们应负的责任。这也是处在权力位置上的人——其决定确实会使事情发生的人——很可能会说，当要求他们提出理由时，“错误被犯了”。

我们应该对遮蔽行动来源的事件的描述产生警觉。社会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们怎样选择一起做事。如果我们牢记这项原则，我们也就极少会被那些用被动语态讲述的故事所骗。

三思而行

1. 考虑一个活着的人，你对他的生活非常感兴趣。假设你要做一个关于他的

自传电影。它将会是一个短片，长约30分钟。为了收集信息，你要采访电影拍的这个人。你也要采访这个人的家庭成员、朋友、恋人、老师、工友、雇主等。你甚至在电影中拍下了你的主人公的一天。然后，你编辑这堆厚厚的材料，以让其能容纳在30分钟内。当影片放映时，你的主人公说："真是太可怕了！你错误地描述了我和我的生活！"但是，其他看到这部短片的人都认为，它在抓获主人公性格和生活的本质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工作。你会怎样解释对你的电影的这一不同看法？如果有人想要拍一部关于你的自传短片，你会担心什么？为什么？

2. 这是一个公理，即说社会提供我们以资源——语言、衣裳和其他有意义的对象、整体运动风格——我们用来创造关于我们自己的图像并用来打动他人。但是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那些资源来自什么地方，当人们使用它们时会出现什么后果。例如，很多青年人都喜欢选择品牌衣物、品牌啤酒或品牌香烟，作为一种展示自己的方式，"注意作为这个特殊品牌的使用者，显然我是一个非常酷、聪明、会玩、勇敢和讨人喜欢的人。"不管怎样，这里存在一个矛盾，因为使用一种为数百万人追求的被大量销售的大众品牌，并不是一个个体具有独特个性的标志。那么，人们是怎样被诱惑来使用这样的产品创造关于自己的图像的？当他们这样做时，谁会从中受益？谁来支付？有没有可供选择的替代物？

3. 通过阅读一份比较好的日报，你可以了解到许多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比你可能从电视中学到的要多）。但是，报纸只能报道一小部分当地的、全国的和国际上持续发生的事情；实际发生的事情远远多于可能被报道的。因此，报纸发行者必须决定忽略什么、报告什么。这些决定——由报纸所有者、出版者和编辑决定——确定怎样将社会现实描述给读者。看看你是否能结识一位编辑或记者，让他告诉你这些决定是怎样作出的。然后考虑一下，这一决策过程是怎样可能产生某些特定的描述而不是其他描述。报纸创造利润（通过做广告）的需求，可能会怎样影响关于报告什么和怎样报告的决策？

参阅书目

Blum, William.(2003). *Killing Hope: U.S. Military and CIA Interven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2nd ed.).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Brissett, Dennis, & Edgley, Charles.(1990). *Life as Theater*(2nd ed.).New York: Aldine.

Farr, Robert M., & Moscovici, Serge.(1984). *Social Representation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ffman, Erving.(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Herman, Edward, & Chomsky, Noam.(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Orwell, George. (1946).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Pp. 156-171 i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George Orw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arenti, Michael. (1986). *Inventing Real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cott, Marvin, & Lyman, Stanford. (1968). "Accou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46-62.

Zinn, Howard.(1980).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Colophon.

10

理解社会生活中的权力

有一次，我告诉班上学生一个想接管大学的恼怒的教授的故事。他的计划是进入校长办公室，告诉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学校，并宣称学校由他自己负责。

我的学生都笑了。

我说："是不是觉得这事很可笑？你们认为他的计划不会起作用吗？"

没人会认为它能起作用。多数人都认为这位教授最终不是被送入监狱就是被送到一家精神病院。

我说事情未必就是这样，"要是那位教授向校长解释了为什么他靠边站是比较明智的做法的话，事情会怎么样呢？那样岂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平稳的过渡吗？"

一名学生说，这不会起什么用，因为校长会叫校警把教授拖出去。

我说，教授可能会向警察解释他们为什么应该支持他而不是老校长。

另一名学生说，那也不会有什么用。她说，即使教授说服校园的每个警察都接纳他作为新校长，其他人也不会当真。

"关键是其他什么人？"我问道。"如果警察支持教授，难道这还不够吗？"

一名学生说，要想被接受为校长，教授必须得到国家立法者、州长、其他教授和职员的支持。如果他没有遵守正当程序当上校长，他可能永远不会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我说，教授仅仅需要写本小册子解释一下老校长的工作如何拙劣，应该被替换下来。然后，如果每个人都读了小册子，他们就会了解为什么现在应该进行变动，并且在教授接管时他们为什么应该支持教授。

有些学生摇了摇头；一些人在他们的椅子上动来动去。我听见了至少一声叹气。教室里充满了疑惑。

喜欢程序的那名学生说："这件事整个就是疯狂。如果人们都能照你所说的那样来接管，世界会乱套的。没有合法的权威，将会有持续不断的斗争。"

另一名学生说："这个计划一点也不疯狂——但它确实比较可怕，因为它完全可能起作用。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是怎样首先得到合法权力的？它很可能就是来自一场战斗。"

我说，"合法的权威"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创造出来，但是大范围的权力，总是依赖于共有的信仰和一起做事的人。总统或革命家都不会脱离实际享有权力；他们总是需要其他人的支持，即使最初只有一些信徒。而且，得到他人的支持，要求由一个人类共同体创造的资源：语言、想法、金钱、媒介、武器和食物。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权力来自社会生活，而非来自卡里斯马型个人特征。

在一个组织中，并不一定要成为老板才能拥有权力。能够让某些事情在某些地方发生，就是拥有权力，无论这些事情有多小。但是，这一权力同样取决于社会生活，因为这是我们的技能、知识、动机、甚至是身体来自的地方。即使我们不需要成为老板来让事情发生，我们最终仍然要依靠他人，不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力。

想法和幻觉

有句老话叫"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枪可以用来镇压人们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是真实的，因为多数人都会宁可服从不论什么秩序也不愿被枪打死。并且，当群体进行战斗时，有着较多枪支的一方通常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枪支确

实可能被用于让事情发生。这里是另一个老话："给我个孩子，让它跟我过上5年，她或他的生活就会是我的生活。"这一老说法与第一个相对立，因为它说的是，一个人可以成为什么样，取决于她或他被教的是什么。既然这样，哪一个更有影响力——想法还是枪支？

假设你有许多枪，并且你有一种推翻政府的渴望。你是否有足够的枪去做事呢？除非你能找到愿意使用它们的人，有多少枪都是不够的。除非你能说服你的追随者用枪射击他人，否则你的革命也没法进一步继续下去。你可能会靠出卖枪支来勉强度日。

假设你是一个统治者。假设你实施的可怕的政策，激起一场运动要把你撵下台。一天，5万人在首都集会游行，因此你命令你的警察、军队和宫殿护卫来保护你。当示威抗议者猛冲宫殿时，你发布命令杀死这些大胆的冒犯者。将会发生什么？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警察、战士和卫兵认为抗议者并没有错，并认为你贪污腐败。最终抗议者成功，因为他们的想法使你的枪变得一无所用。

当枪支被用来镇压人民时，权力一眼就可看到。不过，当想法被用于塑造人时，它就不是那么容易看到了。如果一个反叛的领袖说："我来告诉你政府为什么腐败，为什么总统应该对此负责。"那是一个明显的使用想法获取权力的尝试。像这样的直接方法当然会让卫兵把你抓起来，唯恐你被说服去支持暴力运动。不管怎样，这里我们假设想法被使用得更加微妙，使用得至少可以保护使用者自身。

考虑一下学校里的孩子。如果你是国家领导（或是受益于国家领导者所做事情的群体的一员），并且你想让你创造的社会安排永存下去，你也许会开发出像这样的一个计划：

- 每天早晨在每所学校的每个班级，学生都要面对国旗，手拉手，背诵团结一致的誓言，当背到"我的心都献给我的国家／当我听见我的国家的号召／上帝的祝福将会降临到我身上／首先是我的祖国"时，都把手放到他们的脑袋上。
- 小学生要求学习本国历史，从最初的定居者把野蛮人开始驱逐回边境一直到现在。目标是帮助学生欣然接受文明中的伟大成就，这一文明来自我们国家的创建者和后来的领导所作出的英雄般的努力。

- 中学生要求至少选修一门政府比较课。目的是帮助学生看到我们的政府体制提供了自由和平等之间最好的平衡。其他体制将被审查，看它们怎样缺乏这一理想。
- 中学生要求至少选修一门比较经济课。目的是帮助学生看到我们的经济体制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平等的成功的机会，看到财富上的不同来自于智力上的自然差异。
- 当不要求学校遵照这一计划时，将会有专项基金提供给学校和学校所在的社区来这样做。资金可被用于建设、教师工资、旅行、购买仪器设备和聘用职员。基金将会按照整笔拨款的形式，面向经过核准的学校或学校社区进行分配，具体支出由当地管理者控制。

这仅仅是你可能设法逐渐灌输想法鼓励人们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你是主管这一事实）的一种方式。如果你能在人们非常年轻时逐渐把这些想法在学校进行灌输，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或考虑问题。这是一种比用枪来控制人更有效、更持久的方法。

灌输需要

另一种可能性（这次你不需要去控制政府）是，用想法或观念去灌输人们的需要——那些只有你，或者你的产品，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需要。如果你能创造一种类似这样的情况，人们就会想要给你东西——金钱、崇拜或守纪，以便从你那里得到他们渴望的东西。下面就是一个这一切可能怎样发生的例子。

想象你是 BioDynaTek 的首席执行官。企业利润正在下降，你需要通过增加销售来复兴企业。因此，你告诉你的研究实验室想法制作一个能够畅销的新产品。在几年工作之后，其中一个实验团队发明了一种方法，制造眼镜片，看起来很普通，但却能产生一个像小型计算机似的屏幕，只有佩戴者能看得见，在那上面可以展示隐藏在耳机中的存储芯片中的信息。于是，眼镜的使用者便可以在他们的眼球中拥有各种各样有用的信息。

你的工程师和会计计算得出你的虚拟记忆可视（VMV.）眼镜的价格，基本与

手机价格相同——是不便宜，但很多中产阶级的人还是承受得起的。你的营销人员认为，VMV. 眼镜可能会卖得很火，并能大幅增加企业的利润，因此你决定亲自制造和销售眼镜几年，建立市场，然后把这项技术的许可证卖给其他公司。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没有人感到有佩戴 VMV. 眼镜的需要。因此，你必须做的就是，创造对你的产品的需求。你为你的广告人员付费就是为了让他们做好这类事情。因此，你把问题交给他们，他们很快就提出了推销 VMV. 的方式。他们建议打出这样一些电视广告：

- 一个男人在工作一天后回到家中。孩子或妻子看见他空手而归就说："你又忘了？"画面切换到男人离开办公室，检查 VMV. 日历；男人看到提醒他购买生日礼物；男人回到家把礼物交给满心欢喜的妻子或孩子。信息：VMV. 眼镜可以防止因为忘记重要的日子，例如生日和周年纪念，而出现的困窘和受伤的感觉。画面切入一个短语："VMV. 因为爱意味着再也不用说'我忘了'。"
- 一种职业类型（医师、律师、股票经纪人）在一次紧张的会议中被问到一个问题，笨嘴拙舌地寻找答案。画面上出现老板或客户恼怒的或急切的面容。第二种职业类型——佩戴 VMV. 眼镜——毫无保留地说出和干脆地提供正确答案。画面上出现上司或客户满意的点头和微笑。信息：VMV. 眼镜是解决看似不可能的跟上任何商业或专家领域最新知识的途径。画面切入一个短语："VMV. 它知道什么时候最重要。现在。"
- 一对夫妇站在一个繁忙的大城市街角，看上去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一个被撕碎的书中一页，上面写着："我认为它就在这里，但我猜我们错过了它。我们最好转回去。"另一边，佩戴着 VMV. 眼镜（和更加时髦的穿戴），微微歪着头说："拿着，让我看看。我看见了。它就在附近移动。走，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信息：聪明、成功、老练的人用 VMV. 眼镜处理现代生活，还有玩的时间。画面切入一个短语："VMV. 专为拒绝让生活远离他们的人而做。"

这些广告并没有努力论证人们应该去买你的产品。相反，他们激起人们对显得麻木不仁、无能或不够酷的缺乏信心——然后建议这些没有信心可以通过他们以前未曾听说的产品消除。如果这些广告能起到预定的作用，BioDynaTek 就会从

VMV. 眼镜销售中赢利数百万美元。

这里的重点，不是怎样卖出高技术产品，而是想法怎样可以被用来让他人去做你想做的。一种方式是让他人感到一种你必须给予的东西的需要。甚至更多的权力能够来自让人们想到只有你能给予他们想要的。灌输这样的想法，会使他人依赖于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从他们那里要求到自己想要的。如果需要足够强烈，人们将会有非常高的需求。

利用想法或观念来灌输需要和依赖的感觉，并不仅仅是一种广告策略。它非常常见，并不要求来自公司的资源。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在很多地方，权力都是以这种方式被创造出来的。我们也能看到，按照这种方式创造权力，将会有极大的潜在的伤害。

例如，假设处在一种关系里的一个人对他/她的外表或智力感到不自信。如果另一个人想要控制这一关系，她或他就可以这样说："是的，你是有缺陷的——缺陷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谁都不会要你。不管怎样，我愿意忽视你的问题，与你在一起。对此你应感到幸运和感恩，并且愿意满足我的需要，否则我就会抛弃你，让你自个过你自己凄惨的命运。"诸如此类的信息通常会表述得更加微妙，不会这么直白。其作用是让人感到依赖——从而使人更容易被控制。

有时这也会发生在师生之间。或许老师会对学生不断增长的知识和信心感到威胁。为了让学生处在其原有的位置上，老师也许会说："你认为你很聪明？哈哈！与我相比你仍然是个无知的人。并且你要记住，给你写推荐书的人是我，所以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自视甚高。"老师设法通过提醒学生在许多方面他都要依靠老师，再次重申是他在控制她或他。正是这一依赖性，加上学生对老师能给予他什么的期望，巩固了老师对学生的权力控制。

阻碍批判思考

其他想法，通过使得改变看上去是不可能的或愚蠢的，则可以帮助维持权力。例如，很容易说明为贪婪驱使的经济对人类和地球都是有害的，但当这一观点针对资本主义提出时，许多人却说："资本主义也许不够完善，但是唯一的替代选择是共产主义，没人想要它，因为它会拿走我们所有的财产和自由。"我经常在

教室里听到这种论调。

许多人看上去相信的是，没有好的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选择，如果试图发生极大的变迁，我们在现今社会中所享有的生活就会失去。这些想法使得很难严肃考虑需要做什么才能使大多数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通过阻碍批判思考和对话，这些想法帮助维护了当前体系和在该体系里享受权力的那些人的特权。

事情要是发生改变只会变得更糟这一想法，比资本主义出现的年代还要古老。每当人们想要设法保持权力，同样的想法就会突然出现。当前的安排可能是最好的（不论它们是什么）以及生活中每件好的事情都取决于坚持这些安排这一想法，被用来使人们害怕变动和让人们感到接受社会现状是明智的和成熟的。

但是，人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被劝阻。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认为某一安排太不公道或太过痛苦而难以承受，因此他们就会开始为变迁而奋斗。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是这方面的两个例子；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被推翻是另一个例子。我们能够列出一张长长的有着相似例子的名单。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能发现那些拒绝接受变动是不可能或愚蠢的这一想法的人。

然而，在利用观念或想法来巩固权力上，有权力的人还是经常会成功。可能它有助于展示这是怎样做到的。许多过去被用来维持权力的想法，在现在看来都已过时了，不过它们仍然很有效果，如果人们不对其进行批判思考的话。一个受到革命者挑战的政府领导人，也许会用下面这些观念或看法中的任一个或所有的来为自己辩护：

- 正在威胁我们伟大社会的、你参与其中的是一项徒劳无功的事业。你没有资源、领导、远见或广泛的支持来赢取控制。我们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是优越的。而且，上帝也站在我们一边，他告诉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进行治理的责任。因此，显然你不可能战胜我们。现在你的最佳选择就是，停止你白费劲的奋斗，乖乖地去过你的日常生活。
- 要求变迁的你是鲁莽的和愚蠢的。你并不具备能力去运转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实际上，你应该感谢我们这些优越精神和智力的代表愿意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已经做下的事情中有什么地方有问题，请告诉我们，我们会调查你

的怨言。如果我们确信它们是合法的，我们将会采取适当的行为。你必须信任我们会最大限度地顾及所有人的最大利益。

- 正在引起破坏的你，被误导了。你的领导并不真正关心你的需要或福利。他们只是想让你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担自己的风险。如果你一切都听从他们的，他们就会牺牲你来满足他们自己对权力的热情。我们的目的，不同于他们的，是通过让社会以一种平安和有生产力的方式运作来服务于你。因此，请尽快离开你的搞破坏的领导人，现在为时还不算太晚。让我们努力再次感到我们是好邻居。

就像你能看到的，政治演讲稿撰写人和广告撰稿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当他们被付钱去做时，他们都知道如何使用想法或观念引起疑义、破坏力量和希望、搅浑人们的思考。他们已经掌握了使用想法或观念的艺术，将其作为一种资源来让事情发生或阻止事情发生。

由于这类操作如此常见，你也许会想，“我不会相信任一告诉我的胡扯。它们全都在撒谎。我将怀疑一切。”这是一种激进怀疑主义的姿态，我觉得，这要比相信一切更好，或者较少危险。然而，怀疑一切是不可能的。我们总是必须从某一视点去理解世界，这就意味着要将某些特定的观点视作理所当然（如果我们真正怀疑一切，我们就没法正常工作）。比起设法怀疑一切，用受过训练的学术方式去怀疑，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显然，想法或观念经常被用来创造、获取和维持权力，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警醒。具有社会学意识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将会想到去问：“这个想法来自哪里？谁会希望我去相信它？如果多数人都信以为真并付诸行动，谁会从中受益，谁又会从中受到伤害？”记着询问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更不容易上当受骗。当然，社会学意识并不确保我们就能发现真正的答案。它仅仅是一种观看方式，可以使我们较少可能陷入那些虚假的和具有伤害性的东西里面。

控制信息

如果我问 2000 美国总统选举中有多少候选人参加竞选，你是否会说"两个"？一般人都会这么回答。某些人可能会想到第三党派，则会说有三个。其他人可能会想到初选的候选人，猜测有"八或十个"。正确的回答是"超过 200"。

听到这一数目，多数人都会感到惊奇。可能你会认为，"是的，这要远远超出我的期望，但这还不是所有重要的候选人。可能许多人提出申请付费，仅仅为了宣称他们'竞选总统'。"你是正确的；因为这 200 多参加竞选的人中，很多人都是开玩笑。不过，比两名候选人多很多的人，都能提供明智的政策声明。通常至少有 30 名左右的候选人是严肃的。

或许这些可供选择的候选人中的一个或多个，都有能够吸引你的看法和计划。不幸的是，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因为关于这些人和他们的想法或观念的信息，都是经过特定组织的过滤之后，才提供给你的。如果我们能够考虑一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就能对权力经常都是怎样依赖于信息控制获取一些理解。

替代候选人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操纵媒体的人认为他们没有赢的机会。操纵媒体的人是正确的。限制竞选规则和电视广告的高费用，使得替代候选人很难去参与竞争。但是真正注定他们失败的是媒体报道缺乏。通过这一方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被创造出来。替代候选人没有被报道，因为他们被看做没有机会最后胜出；他们没有机会最后胜出，则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媒体报道。

某些候选人的观点，也会因其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而被事先过滤掉。例如，一个想要削减四分之三军费开支并把这笔钱用于修建学校、大规模运输和付得起的住房，为每个人提供免费教育和卫生保健的候选人，并不会被媒体认真对待。为什么？因为大公司和非常富有的人会如此强烈地抵制这样的变动，以至于任何提出这些主张的候选人都会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有获胜的机会。报道一个有着这种观点的候选人的新闻工作者，将会被指责是在浪费时间。

或许你已经看出这里的问题所在。如果媒体只报道"严肃的候选人"，只有那些提出的政策不会威胁大企业权力的候选人被认为是严肃的，选民就不会听到

那些在经济怎样起作用上提出更根本性变迁的候选人的想法。那些信息都被过滤掉了。替代候选人可以说他们想说的，但因不被报道，很少会有人听见。因此，对多数选民来说，似乎大家都同意基本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并且在如何改变事情上（不论什么样的改变）没人有好的想法。

人员过滤和自我审查

你也许会认为，"啊呀，他揭露了一个邪恶的阴谋！毫无疑问，媒体老板会与其他大公司的老板碰面策划所有这些事情。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后台，媒体老板同意忽略激进态度的候选人和解雇任何同情反企业主张的新闻记者。难怪事情如此难以改变，甚至是让新的想法进入系统都很难。"实际上，那并不是我正在说的。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这样一个粗暴的阴谋为什么是多余的。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那些为媒体工作的人——作为管理员、秘书、记者、编辑、生产商或执行委员——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文化里，资本主义和极端不平等被视作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正因如此，它才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媒体工作人员去接受资本主义是完全正常的。实际上，那也正是他们找工作时自然而然显露出的可能有的想法。

媒体中的人也学到了，过多地批评政府或公司，将会使他们被人贴上一个"极端"或者更坏的"偏见"的标记。为了他们的事业着想，记者学到，最好是老老实实待在常规政治观点之内。给予一名替代候选人严肃的关注，或是就候选人欣然接受资本主义大做文章，会被看做是奇怪的做法，并且可能会毁掉自己的事业前途。上司可能会想："难道这个人不知道真正的故事是什么吗？可能这个人干错行了。"

因此，在以一种取悦于有权力的人的方式过滤信息上，并不需要有什么阴谋。所需要的仅仅是少许人员过滤：聘用和奖励那些接受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假定的人，除掉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结果就是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似乎每个人都同意什么值得报道、什么则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而走得太远。尽管这并不是阴谋的结果，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也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某些

资源（主要是钱）会被用于创造关于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协议。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媒体中的人就从没报道过关于公司罪行或政治腐败的故事。他们当然会报道。不过，这样的故事通常都是解释性的，作为个体或个体企业不良行为的例子出现。它们并不被看做系统本身和它得以运转的规则是有缺陷的证据。你大概永远也不会在一家主流美国电视网新闻节目中看到这样一类故事："今晚，首先播出一个六部分的系列，资本主义的毛病出在哪里，和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品。"

有权力的人和组织，有时确实会采用专制方式来控制信息流向公众。新闻报道有时被压在高层主管手中，如果它们可能会太过有损政治领导或公司的话。法律诉讼和推出广告资助的威胁，也可能被用来影响关于哪些故事可以报道以及怎样报道的决策。然而，事情更常发生的是，信息流动是由自我审查控制的——即通过记者和编辑去做他们知道可以接受的和可能得到奖励的，避开他们知道将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东西。

在某些时间和地点，信息流动是由武力压服手段控制的——"如果你刊出那个故事，你将被射死。"但是，武力压服需要花费很多能量，并且倾向于助长怀疑和抵抗，因此，从长远来看，它并不是一个聪明的策略。更有效的做法是，通过塑造考虑什么是好的和正确的、错误的，以及通过提供奖励，像"如果你关注什么是重要的和有趣的（在我们的判断中），你将会得到工资和职位提升"，来控制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被训练得想要去做那些能够满足更有权力者利益的事情。

如果批评政府的作家被杀害，或者，如果他们的书在大街上当众被烧，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政府采取的一种控制信息的努力。通过塑造什么能被视作理所当然及什么是有趣的和重要的观念或看法，更难看到信息被控制。当可供选择的替代视角被忽视，或是当随波逐流的工作在组织内部得到奖励，同样很难了解到信息。

作为权力和抵抗资源的信息

现在，可能已经比较容易看清楚，获取和掌握权力，大部分取决于信息控制。或许说得更准确点，权力依赖于塑造信息的内容和控制它到特定观众的流动。通

过这种方式，意识可以被成功地管理起来，以至于人们通常都是服从的，而不是难驾驭的。

这里，一个通常的原则是，信息是一种资源，可被用来促成事情发生——也就是说，信息可以是权力的来源。例如，如果你知道 BioDynaTek 公司的股票今年将会 3 倍于其价值（因为公司很快就将宣布 VMV 眼镜的发明），你就能用这一信息让自己变得富有。你可以现在大量购买它的股票，以后卖出即可收益甚丰。

或者假设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工作机会并且你刚好知道一个人在和老板面谈时应该说些什么以赢取工作。对于寻找工作的人来说，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人，你就可以用帮助或恩惠来交换你的信息，或者创造一个义务让对方日后回报。（有了信息）你可以让一些事情发生，别人则不会。

甚至在亲密关系中，人们也会通过控制信息来寻求权力。例如，如果一个人拒绝说出她或他的感觉，就会让另一人陷入猜测。这就好比一个人说："我不会告诉你我有什么感受，因为那样你就会知道我的弱点是什么，或许你会在某一天利用那一信息反对我。"或者也可能是一个人想要显得情感粗野，从而可以在任何时候出走。这也是一种维护权力的方式，因为它能使他人感到软弱和依赖，并且如此在意这一点还会显得有些傻。

意识到信息是怎样与权力相连的，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东西都依赖于背景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没有哪种资源会出现在真空——信息、金钱、枪或任何东西都不会。权力是能够让事情发生的能力，但是，可以让什么事情发生，总是取决于我们拥有的资源能或不能使用的背景。

我们可以再次使用简单的问题来意识到我们接收的信息是怎样被过滤和塑造的。例如，我们可能会问："什么使得人们相信他们的观点或想法被呈现在节目（或出版物）中？什么问题从未被谈及？政府、国家或经济的什么图像是由呈现在这里的信息创造的？什么可能是一个真正可供替代选择的观点，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略有不同的观点？"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必须寻找答案，而不是让他人灌输给我们任何他们喜欢的信息。

看到信息怎样被过滤和塑造（以及看到我们依赖一种来源时我们错过了什么）的一种方式就是，查询各种各样的来源，将其进行比较。它也有助于记得，

所有的故事都有不仅仅是两个方面。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会尽可能地掌握许多方面的情况。当人们能做到这一点时，当他们愿意批判思考时，各种各样的利用者和骗子都会失去他们的力量。

制定规则和议程

撕下这页纸的一角，大约有橡皮擦的一半那么大。现在把它快速放入你的嘴里并嚼上几下。味道如何？你是否会说它是(a)美妙的、(b)可口的、(c)令人愉快的、(d)意想不到的，或者(e)棒极了？或许你会认为，"这是些愚笨的选择！纸根本就没什么味道。如果硬要说它有，那也只不过是微微有点甜。"很不幸，你必须从上面提供的分类中选择一个，否则你的选择不算数。

你可能非常熟悉这种强制选择的情况。在学校里，你大概会在烦人的课程测验中提供的一排选项中进行选择，并且在每门课中你可能都得选择去写一篇论文、做书面报告或是参加测验。或许你曾有过一份工作，在这份工作中，你必须决定是用拖把、刷子或海绵来洗刷地板。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假设你生活在一个人们通过投票选择他们的政府代表的国家。但是假设竞选费用是如此昂贵，以至于只有那些提出富人喜欢的观点的候选人才能吸引必要的金钱展开一次有效的竞选。并且再假设，只有那些能吸引巨大金钱的候选人才会有媒体进行报道。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实际的选择范围很可能非常狭窄。只有那些其想法和计划能为富人和有权力的人接受的候选人，才会出现在选票上。在这里，事情与你使用拖把、刷子或海绵的选择是同一回事。

可能这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选择。看上去，似乎是由他人，通常是一些更有权力的人，提前决定了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如果这是它留给你的印象，那么显然你看清了事物。我们所做的多数选择都会在某个方面受到压制。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选择怎样经常以使得他人可以控制权力的方式被压制。

为了展示这可能怎样发生，把事情颠倒过来看一下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尽管这么做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在接下来的两三页中，我将把你变成一个力量商

人(Power Monger)。当我进行转变时请保持安静。一！二！三！变！好了，如果你现在没有感到头晕眼花，就请继续读下去。稍后我会将你再变回正常状态。

现在你是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并且想要一直保持这一状态。你可能会设法使用你控制的资源来迫使别人服从你，但是你所使用的强迫越多，你所激起的愤怒和抵抗也就越多。一个更好的策略是给人们一些作出选择的余地，因为这会使他们有一种控制的满足感，并会使他们较不容易恼怒和反叛。这一计谋可以确保，人们作出的任何选择对你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你怎样做到这一点呢？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创造规则和议程，操纵人们去做你想要他们做的。一旦这些规则和议程被视作合法的接受下来，你的权力就会主要是无形的和相当安全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是这样。

首要的是，不要制定像这样的规则："我将决定选择是什么，然后你来从中选择。"这样做根本不会掩藏你的权力。人们只会感到被操控和愤懑不已。

这里是一个较好的规则："选择的范围与组织的目标相一致，将由任命的执行官、一线主管和职员组成的委员会将其形式化。"像这样的规则，常被用来控制大型组织里的人。像这样一条规则真正的意思是：已经事先决定了组织的目标是什么的上司，将会挑选那些同意这些目标和作出相同的选择（如果老板亲自来做也会作出这样的选择）的人。作为一位聪明的力量商人，你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得到你喜欢结果的更好方式。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假设你所属的统治集团为控制政府而受到一些小群体的挑战，他们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你的集团可以使用对政府的控制来压制这些小群体，但是，如果你不想由此引起任何麻烦，你可以创造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下，力量较弱的群体会感到他们有机会赢取控制，当然，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例如，你可能会设想这样一个选举体系，谁获得超过 50% 的选票谁就获胜，谁获得少于 50% 的选票谁就出局。如果你能说服人们接受这一安排，你对政府的控制基本上就是有保证的，因为没有哪个少数群体能单凭自己的力量为它的候选人召集足够的选票赢取胜利。反过来，你的群体则会有巨大的资源去宣传它的候选人。因此，即使你在竞选中获胜，它给人的感觉也像是你的成功是人们自由选

择的结果。

要注意的另一项原则是，在制定规则、法律和其他政策时，要让它们看上去显得中立和客观，这样，如果人们对受控制感到恼怒，就不会责备你。对于作为力量商人的你，如果人们体验到规则“就在那里”等着使用，而不是感觉到是服务于你的利益的工具，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然后，人们就不会去想规则是怎样制定的、为什么要制定、为谁制定的，人们仅仅会想到作出遵守不遵守它们的选择。

当然，仍然需要想法来使这一切发挥作用。一些人必定会相信规则，并愿意强化它们。不管怎样，一旦有规则，通常就能很容易找到实施者，因为告诉别人去做什么，是一种在一个体系中拥有一点点权力的方式，在这个体系中，强大的权力属于处于社会最顶层的人。并且总是会有热心强制执行规则的人，因为他们担心，没有规则这个世界就会乱套。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培养这样的恐惧，一定会是你的兴趣所在。

尽管作为力量商人你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某些人也许仍会看到正在发生的并会说：“等一下，在你制定的这种规则下，我们没有办法去获胜！如果在一个政府中，胜利者拿走一切我们则没有代表，我们的需要如何能得到表达？我们的看法如何付诸实际？我们认为，是该改变这一比例代表制体系了，以便让每个群体都能得到一些权力。那才会让我们感觉更像民主的样子。”

许多力量商人都会对废除确保其权力的提案作出苛刻的回应。但是让我们假设你足够聪明，知道暴力只会滋长暴力，并且，尽管你非常贪婪并热切地追求权力，但你并不是一个怪物。因此，你更喜欢一个更软一点的策略。

你可能会设法通过散布言辞说他们是疯狂的、邪恶的或是外国间谍，给挑战者抹黑，败坏其名誉。这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挑战者是少数的和不得人心的，不过，如果有人不喜欢现有体系并认为挑战者的观点是好的话，像这样败坏名誉也许不太容易达到目的。你可能会在辩论中设法反驳挑战者的宣称。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你就给了挑战者一个宣传自身和看上去像英雄的机会，从而帮助他们得到支持。

你需要的是中立化挑战者的宣称（体系是不合理的），而无需激起对那个问

题作出许多批判思考。从理想状态来说，你可以以让人们认为现有的体系甚至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公平这样一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这样，你和你的职员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反应："在像我们这样的自由社会，周期性地再检查我们的制度确实是重要的，以确保它们正在为每个人提供公正的描述。因此，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执政成员，无党派研究委员会会评论我们的竞选程序，辨认所有问题和提出方式优化我们的体系，使它更有效地达到我们珍惜的民主理想。"

这样一个声明，使得看上去显得，体系对批评是反应积极的，对变动是开放的。它使你看上去像是一位明智和仁慈的领导，热切服务人民。这些表象，将会帮助消除挑战者引起的所有愤怒。现在你可以继续前行并按你喜欢的方式操纵你的游戏。只需往研究委员会中塞入更多相信"赢家通吃"体系是最佳方式的人。任命一个相信比例代表制的人也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做法，可以给人留下一个开明的印象。

更重要的是，你必须确信，委员会理解它的工作是要很好地协调现存体系，而不是要彻底改造它。因此，非常关键的是委员会的委员长要站到你这边。这样如果有人提议进行激进改革，委员长就可以说：提议超出了我们一致被要求去做的范围。现在，让我们先干好手中的工作。我们有最后期限要完成。"

力量商人一定要善于设置议程。计谋是安排情况，以便对已经成为惯例的事务的严肃挑战从一开始就被排除掉。与此同时，允许讨论许多不会导致质疑现存体系公平性的问题，也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如果能够一直让人们忙于应对日程表上没有风险的事情，他们甚至都不会想到有什么东西被遗漏了。

自主和自由

我为刚才把你变成力量商人向你道歉。无疑，它会使你感到有些不舒服。现在请你深呼吸，挺直身子，我将让你回到你的正常状态。一！二！三！变变变！好了，事情完成了，你又是正常人了。

那么，对权力具有社会学意识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留心资源是怎样被使用的、被谁用来使事情发生或组织它们发生。它意味着，留意想法或观念是怎

样被使用的，被谁用来塑造想法、思想和感受，创造舒服的和分散注意力的幻觉。它意味着，看到信息是怎样被过滤和被塑造的，被谁用来创造依赖或组织他人采取不同行动的方式。它也意味着，要批判看待规则和议程，设法了解它们是谁制定的、怎样制定的，以及它们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

对权力是什么及其怎样运作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它扎根于社会生活，即扎根于共有的信仰、扎根于共同合作、扎根于人们每天一起做事的方式。这一理解方式提醒我们，权力并不来自个体。如果来自个体，没有暴力，就很难抵抗权力。但是，因为权力依赖于共有的信仰和合作，我们可以通过挑战信仰和不与它所依赖的东西合作来抵抗权力。因此，通过发展新的信念和合作方式，也可以与他人一起创造权力。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也会知道每当权力被创造出来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危险，当然是某些人，甚至是那些有着最好意图的人，被诱惑利用权力使得发生的事情仅对他们自己好。不过，如果许多人都关注，并且知道如何抵制自私地使用权力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就会大大减少危险。

对权力具有社会学意识的重点，不仅仅是看到它是怎样运作的或是进行个体抵抗。更是要看到，追寻和行使权力，怎样否认了许多人创造好生活的自由。或许你会认为，“如果我能看到某人怎样并且何时设法控制我，我就可以逃避这些努力，从而为自己赢得一块属于我自己的自由。”是的，那是可能的。许多人都在尝试做到这一点。

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自由和自主之间的区别。不理会就是有自主。并且，只要我们做告诉我们去做的或是不造成对权力的威胁，我们就会有很多自主。如果你做老板告诉你的不做什么挑战性的要求，你的老板就会非常高兴，不理会你。多数政府领导人都是这样。毕竟，如果你愿意监管自己，它就会节省能量。但这很少会是自由的。

要有自由就是要能构想选择，而不仅仅是从别人给定的选择中进行选择。在这一意义上，要有自由，我们就必须与他人一起工作，创造一起做事的新方式，从而创造新的过上好生活的可能性。受益于不平等制度安排的那些人，不会喜欢这些。只有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才能看到如何抵制他们阻止变动的权力，以及

如何在我们自己之中创造权力，带来新的安排。

没有终结的对话——权力与合法

一名学生说，我关于人们想要一点权力的说法是正确的。“警察就是那样子的”，她说，“他们陶醉于拥有哪怕仅仅是一点点权力。”为了证明她的论点，她讲了一个关于抗议的故事，在那次抗议中，警察迫使她和数百人进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被设定为“自由发言区”。她说警察是恶霸，喜欢放纵自己去虐待他人。我同意有些警察可能是恶霸，但是说，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具社会学意识的方式去了解警察行为。

让我们从这一观察开始：如果没有警察（说得更广一点就是士兵）的帮助，政治和经济精英就不可能保留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否则，当多数人对精英的行为感到反感或激起义愤，他们就会奋起反抗，把他们扔出办公室，或者可能扔出窗外。但是多数警察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帮助精英阶层维持权力。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通过强制执行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

因此，需要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警察，就像其他官僚机构的官员，通常相信雇用他们的体系的合法性。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想法的重要性。不论是谁在做着维持治安的工作，也不论是任何种类的工作，必须接受发布命令的那些人的合法性和命令自身的合法性。如果这一合法性被破坏，那么维持治安也将被破坏，并且精英阶层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警察早上一起来就想：“今天我将痛殴任何敢于威胁现存秩序的人。”事情更可能是，他们早晨起来，想到要顺利完成一天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们也会担心要付账单，与家庭成员和睦相处，计划他们的假期和为退休后的生活积攒金钱。通常的内容就是这样。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假设你已当了十年警察。你有着合理的薪金，并因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而获取了尊重和地位。作为一个警察，也使你可以养活自己和你的家庭，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朋友圈子，并且它允许你维护你对自己的图像——你是社会中一名有用的

成员——这些是依赖于你的工作而来的“边际利益”。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在你内心深处，好工作比较难找。然后，某一天，你被分配到一个控制人群的任务。

你会做些什么？当然，因为你被命令去做，那就是你的工作。这也是多数人都会做的。你可能不会对你的老板或你接受的命令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至少在正常情况下。你也不大可能去想一想你要控制的人们的信仰。

因此，多数时间，那些掌握一点权力的人（从而最终保护非常有权力的人），仅仅是去做他们的工作，而不会怎么关心他们的工作所具有的更大的含义。如果他们考虑任何超出他们手头工作之外的东西，也很可能是我上面列出的那些“边际利益”。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小恩小惠，是一些不去过多考虑他们手头工作所具有的更深含义的动力。

我已说过，权力是通过诱导他人合作让事情发生的能力。这样，你就能看到人们怎样通过鼓励他们在工作中获取更多的边际利益这一体系受到控制。是的，你总是可以拒绝你的上司要你做的。但是，如果这样做可能会让你丧失你看重的许多东西，很可能你就不会这样去做。

或许你也能看到官僚机构如何放大少数人的权力。一个有着下属下属下属老板的老板，能够指挥很多人。在这样一种安排下，如果人们被教给仅需考虑他们的工作和渡过一整天——而不是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可能带来的更大的后果——即使最恐怖的计划也能得以实行。数百万人的努力，可以被精心策划去履行一位领导疯狂的想象。

一直有人问我，“一个体系的权力崩溃”是怎么回事。那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或许应该改变一下措辞。我会问：“一个体系的合法性是怎样崩溃的？”我所说的“体系”，是指已经确立的一起做事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社会功能得以正常运转。我所说的“合法”，则是指一个广泛共有的信仰，即体系是对的和好的，应该被保存。

改变这个问题的措辞，使得我们更容易看到答案。如果一个体系通过满足人们的需要来使社会正常运转，那么当它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它就会开始失去自己的合法性。人们也许会开始认为，“旧的做事方式不起作用。我们需要一些变化！”如果只有一些人这样认为，体系还不会真正受到威胁。如果许多人都开

始这样认为，体系也许就会失去自己的合法性。

人们也许会先质疑体系的道义性。也就是说，他们也许会开始询问这一体系是否真的正确和很好。“是的，这一经济体制满足了我们的许多需要”，人们也许会这样认为，“但是它也导致了可怕的危害，因此，或许它并不是那么好。”再次，如果仅有一些人这样看，系统可能并不会失去合法性。但是，如果许多人都对体系的道义性表示怀疑，它的合法性就会崩溃。

从历史上来说，一个体系的切实可行性——它怎样较好地满足了多数人的物质需要——要比它的道义性更多地决定着它的命运。一般说来，当人们一直衣食无忧、居有定所和可以娱乐（或分心的事），他们通常都会容忍产生其他可怕后果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处在中间的人”，那些感觉生活舒适但却没有多少权力的人，当体系受到需要没有满足的人的挑战时，经常会受到最大的冲击的原因。处在中间的人经常想知道，即使在体系四分五裂时，为什么竟会有人抱怨。

为什么那些在一个体系中享有权力和特权的人会努力保持其合法性，是很清楚的。如果人们继续相信这一体系是有道理的、很有用的，并且是正确的和好的，他们就会继续从中受益。但是你也能看到，为什么很多其他人（那些处在安全的、舒适的中间阶层的人）也会非常强烈地希望相信同一个体系的合法性。

但是假设质问声越来越大、持续不断和令人信服。假设人们开始认为该体系并不像它应该起作用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它确实产生了很多坏后果。除此之外，假设人们开始质疑那些控制这一切的人的能力和道德。现在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体系”出了问题，而是那些操纵它的有血有肉的人出了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当体系的实用性和那些对其负责的人一起受到严重挑战时——合法性就有可能崩溃。

在恐怖领导时期，仍然起作用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经常会存活下来。有时这会发生，是因为幕后有权力的人采取步骤逐步去除当前领导，从而创造了一种问题已被解决的印象。精英集团倾向于互相支持，但是他们不会在以毁坏他们从中受益的体系为代价这样去做。然而，事情再次是，如果在精英集团内部相互争夺权力的过程中许多人受到伤害，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去合法性的作用。在这些斗争中受到伤害的非精英集团可能会开始想：“你们统统都应下台！”

回到警察的例子上：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质疑体系及其老板的合法性，那些老板的权力就会蒸发掉。权力依赖于合作，合作则依赖于共有的信仰，后者则可以被新想法所改变。因此，再一次，权力对批判思考无能为力，只能听任摆布。这并不是说去除一个体系及其老板的合法性，是对权力具有社会学意识的重点所在。关键是要意识到，上司只有在别人允许他们的情况下才能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创造历史，普通人完全可以选择创造不同的历史。

关于非暴力的注解

反抗压迫可以采取许多方式。人们可能会参与小的破坏行为或打破规则。或者他们也许会通过开笑话或使用不恭的肢体语言表达对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蔑视。其他时候，当压迫变得难以忍受，人们可能会组织起来进行暴力抵抗。这可能意味着要毁坏物质资源，在极端状态下，则会毁掉那些实施压迫的人。

在考虑什么样的抵抗也许是最有效的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权力的本质。如果权力依赖于（一个统治者或小组）诱导他人合作的能力，权力就可以通过破坏合作使其中立化。在本章，我建议这有时可以通过挑战腐败领导者合法性的批判教育来完成。

记住合作以及隐含的不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暴力抵抗的至少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它强迫一个统治集团成员在他们自己之间紧密合作，以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另一个问题是，当这个集团努力“恢复秩序”时，暴力抵抗经常会使统治集团显得——在冲突中站在一边的人的眼里看来——更加合法。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著名的领导人，像甘地和小马丁·路德·金实践并竭力主张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原因。当统治集团采取暴力措施来回应和平的反抗者，那些集团的道德合法性就被腐蚀了。这可以帮助站在一边的人决定谁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最终，更多的人都会合作起来为平等和自由而战斗，而不是抵制平等和自由。

压迫性的社会安排和政策，总是可以通过拒绝合作被抵抗。人们能够拒绝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他们能够拒绝去工作，他们能够拒绝去购买，并且他们甚至能

够和平地打乱"一切常规"。像这些非暴力行动要求勇气，因为它们会激起那些握有权力的人作出残酷的回应。反应的残酷程度经常是一个标示，表明有权力的人明白他们的权力到底有多脆弱。

三思而行

1. 可能你对你的生活中充满讲座和测试早就感到不满，如果能够离开学校你会感到很高兴。很好，现在你可以给管理员（记录学生学业成绩的人）写一份备忘录："考虑到我在XX学校学会了什么，并且在以后在校的时间里将会学到多么少的东西，我决定选择提前毕业。因此，我请求在当前学期结束之际授予我学位，并公布一个正式的成绩报告单，以便证明学位完成。谢谢你的合作。"你是否怀疑这会起作用？为什么？假设你的口袋里有100万美元可以散发。这可能会怎样增加你得到提早毕业学位的机会？

2. 经理和管理员常被视作拥有合法的权力去招人和裁人，设置薪水和薪金，给予提升，决定工作怎样被组织起来，并且告诉工作者怎样去做。如果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哪个个体工作者会在管理者面前享有权力。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接受老板的分配。然而，再一次，事情也可以不是这样。想象一个你被雇主不公平对待的情况。如果你只是自己抱怨，你会处在一个要求有所变动的微弱的位置。但是假设你的许多工友都有你的感觉，并且都想产生变动。你会做些什么去打翻你偏爱的权力均衡？对这同一个策略，一个大学生会怎样使用？

3. Tameka和Brinne是一所重点大学的学生。Tameka是黑人，Brinne是白人。两个人都来自家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两个人都是有吸引力的、聪明的和自信的。她们都有好成绩，都有许多朋友，并且感觉她们好像可以得到任何她们想到的东西。简而言之，她们都感觉自己非常有自主权。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权力是什么、来自什么地方，我们就能看到，在感到有自主权和拥有真正的权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什么是像Tameka和Brinne这样的许多年轻女性可能看不到这一差异？这一关于权力的"虚假意识"的后果是什么？

参阅书目

Bartky, Sandra.(1990). *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Domhoff, G. William.(1990). *The Power Elite and the State: How Policy Is Made in America.* New York: Aldine.

Domhoff, G. William.(2006). *Who Rules America?* (5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Dye, Thomas.(2001).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Bush Restoration* (7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Lukes, Steven.(2005). *Power: A Radical View*(2nd ed.). London: Macmillan.

Mills, C. Wright.(1960).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enti, Michael.(1978). *Power and the Powerl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Wrong, Dennis.(1988).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

差异和不平等

一次，在课上关于不平等的讨论中间，我这样说道，有更多金钱和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倾向于比那些有较少金钱和受教育较低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口味。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论点，我不希望它会带来任何麻烦。

但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在下课后走到我跟前，带着一脸担忧的神色问道："难道你不认为应该庆祝多样性吗？"

这个问题让我很是惊讶："可能吧。可你说的是哪方面的多样性？"

"像口味和价值观"，她说，"你知道，像你说的是伴随社会阶层而来的。"

看起来，她将我的观点理解成是说富人的价值观和口味比穷人的要好。我说那不是我所说的意思。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名学生为什么会误解我。她想将社会阶层差异看成像种族差异一样。如果人们因为他们有着不同水平的收入和教育，而在谈话、穿着、吃东西上继续有所不同，她相信，这是一个有趣的情况。我说事情要更加复杂，并且我们最好是在下节课一开始就回到这一点上。

在下节课上，我们谈论了人们之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异。我们谈论了有些差异怎样使社会变得更加有趣——例如，衣物、食物、音乐、文学、舞蹈、艺术和语言上的不同样式。我们还谈论了其他差异，例如宗教信仰、政治价值或性爱好上的差异，可能会怎样具有威胁和制造混乱，尤其是在

人们不宽容和缺乏同情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又回来社会阶层这个问题上，有些学生仍想将其看成另一种有趣的差异类型。

我说，社会阶层不是差异问题，而是有害的不平等问题。我问他们，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庆祝这样一个事实——某些人工作在艰苦、肮脏、危险的工作岗位上仅获得低报酬，其他人则有着远远超出他们需要或使用范围的极大的财富（经常是通过继承）？这是否是一些值得庆祝的事情或者它是我们这个社会如何运作的一个缺点？确实，它是一种不同的差异类型，不像那些元饼[1]、墨西哥玉米薄烙饼、米饼和可丽饼[2]之间让人愉快的区别。

在我们讨论过这一情况有一阵子之后，一名学生问道："你是不是在说，来自社会阶层的差异没有什么好东西？我们拥有一些人能够在里面自由地思考和创造的这样一个体系是不是不好？"

这是一些更难回答的问题，它把谈话内容往前推进了许多，强迫我们去在更大的背景中考虑问题。

我说，是的，金钱可以买到优质教育和给人时间去完成创造性工作。并且，我也不否认，至少有人能够享受这些可能性是件好事。但是，这些可能性是否是以不平等为代价呢？在没有收入和财富上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让每个人都接受教育，并允许每个人都有时间去进行创造性工作。我也说，在如此多的人都未曾得到开发他们天分的情况下，考虑被浪费的人的能力是重要的。或许有了更多平等，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每个人都更加富有的社会，因为有更多的人可以有时间去思考、创造和相互

1 元饼（lefse），一种挪威手工煎饼，主要由马铃薯泥、面粉、奶油和牛奶制成，外观有点类似蛋饼。

2 可丽饼（Crepes），源起于法国布列塔尼，据说可丽饼是布列塔尼居民的救命粮，因为布列塔尼是个石城，土地贫瘠，有一年遇到饥荒，岛上没有任何食物，布列塔尼人只好将收藏在地窖的面粉拿出来，烤成薄薄的煎饼渡过难关，后来这一薄薄的煎饼就成了当地的主食。现在的布列塔尼仍保有传统的习俗和庆典，法国人把2月2日定为可丽饼日。每年庆典游行时，人们会在街上、小酒馆或餐厅中手拿可丽饼，唱起歌，跳起舞，欢天喜地地庆祝丰收来临。

关心。

一名学生指出，深受贫穷之苦和压迫之痛的非洲人、穷人和工人阶级的人们，已经带来了很多有创造性的适应——生存和享有生活的方式。他援引爵士乐、蓝调、福音书和乡村音乐为例。

另一名学生回应道，这些是以极高成本为代价的无意的结果。我同意：仅仅因为某些人能在糟糕的情况下创造伟大的艺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容忍这样的情况。我说，甚至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也不会缺乏激发创造性工作火花的紧张和冲突。

我希望这一讨论能帮助学生从一种社会学意识的方式看到差异和不平等。关键是有些种类的差异是好的，因为它们可以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机会去享受更多的食物、衣物、音乐等，但是，其他差异——例如，财富和收入上的差异——则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如果某些人吃不起有营养的饭，穿不起防寒的衣服，得不到好的教育或者没有时间去进行创造性工作，那就不仅是他们自己在受苦，而是整个社会都在受苦，因为它的一些成员的天分和能力丢失了。

那么，我们怎样能对差异和不平等具有社会学意识呢？我们必须追问："这一差异在哪些方面比较重要？这一差异是否允许某一集团以其他群体为代价从中获益？它是否意味着一个群体的成员得到的尊重少于其他群体成员？"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追问："这一差异是否会造成伤害？"如果差异造成剥削利用、不公平的优势、控制权，或是某些种类的伤害，它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差异。它就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并且不值得庆祝。

不平等的形式

当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差异有益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相对其他人或群体而言），就存在不平等。这一点看上去似乎非常清楚。但它仍然是一个靠不住的想法，因为它没有说出什么是"有益的"。这样，它可能就会帮助在美国存在的更具体的不平等形式。个体和群体在什么方面可能是不平等的？这些不平等有

着怎样的重要影响？下面是一些可能的情况：

- 先从一目了然人人可见的地方开始，某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财富（股票、债券、财产）和收入（薪金、薪水、利息）。金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资源，因为它可以被用来获取各种各样的事物，使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令人愉快、兴奋。当然，有钱并不一定就能保证幸福，但它对于获得能够促进幸福的事情和经验，还是非常有用的。
- 某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和更好的教育。教育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解决问题，避免差错，明确表达他们的想法，欣赏历史、艺术、文学、音乐及其他文化产品。它也可被用于建立联系和得到工作。
- 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有声望的工作。例如，法官比秘书有一个更加有声望的工作；工程师比管理员有一个更加有声望的工作。有一个有声望的工作，反过来则能帮助获得他人的尊重。在美国文化中，一个人在社区里的地位，经常取决于其工作声望。
- 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政治权力。或许这来自有钱或有关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政治权力都意味着，能使政府部门的人认真考虑你的问题和照顾你的利益。
- 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好的健康。这并不必然是人体生理上的自然结果。它也归因于可以获得更好更优质的医疗保健，较少从事有危险的工作，居住在更加干净的环境中。
- 某些人比其他人享有更多安全。他们不必担心工作上的伤害、在他们的社区被子弹击中，或是买不起他们的汽车新轮胎和保险杠。
- 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机会进行艺术、电影、戏剧、音乐和其他文化活动。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去剧院，或是参观美术画廊。即使如此，许多享受这样活动的人，可能从未得到机会亲自参与其中过。
- 某些人能满世界旅行，其他人就不行。看到不同的国家，遇见不同的人和体验到不同的文化，可以令人愉快和感到兴奋。许多人都付不起这些体验的费用。

- 某些人能买得起豪宅，某些人能买得起相当不错的房子，某些人能买得起小房子，某些人可能只能租房，还有些人则连租房都租不起。没有一个安静、安全、私人的空间去放松，很难从日常生活的压力中恢复过来。
- 某些人能付得起吃最可口、精巧准备的食物，其他人则必须凑合用他们可以设法弄到的东西当吃的。甚至最简单的健康食品（例如自然成长的水果和蔬菜），也要比在折扣杂货店卖的大量被处理的食物昂贵。因此，吃得好和吃得健康，对某些人来说是想也不用想的。
- 某些人能买得起精心制作、耐久的、时髦高雅的衣服。其他人则必须买质量较次的衣服，衣服也是钱少的一个标志。因此，一些人能够感到自己的身份会为其所穿的衣服所暴露，甚至某些人还会用衣服来炫耀他们的财富。
- 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好和更强有力的工具——不仅仅是手工工具或权力工具，而是所有使事情发生的工具。印刷机是工具；计算机是工具；航空母舰同样是工具。
- 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信息。信息这种资源，可以帮助人们制定好的计划，避免被操纵或上当受骗，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缺乏信息只能任由看上去以一种神秘方式运转的世界摆布。
- 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好的关系网络。我所说的“网络”，是指与相互支持的朋友、给予帮助的辅导者、博学的老师，以及能够帮助建立进一步联系的熟人的联系。一个更好的网络并不必然是更大的，但却是一个有更多已经拥有并愿分享有用资源（像金钱、工具、信息等）的人。
- 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技巧和更多地掌控他们的工作。有技巧，就是拥有一种资源，可以用来换取一个不错的工资或薪金。它也是拥有一种让事情发生的权力。能够控制自己的工作，比起严密地被监督和总是被告诉怎样做和如何做，也会让人感到更满意。

这些并不是美国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的唯一形式。可能你还能想出其他一些。在每种情况下，不平等都意味着，某些人拥有超过他人的优势——说得更明确点，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过上好生活。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看到这些差异

并识别出它们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可能你也会看到优势倾向于逐步积累。例如，有很多财富和收入的人，可以把这些资源变成其他事情：舒适，安全，自信，乐趣，政治力量，兴奋，信息，关系网等。反过来，这些事情也会增加一个人积累更多财富的能力。同样，缺乏主要资源（像教育），则使得很难得到更多的其他资源。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些不平等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说它们是社会的，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怎样被组织的后果，人们可以从中找到适合组织的模式。例如，只有在一个允许贫困存在的社会，一个人才会出生在一个贫困之家。同样，只有在一个很多人被迫去从事肮脏、不安全、低报酬工作的社会里，一个人才会为自己有一个清净的、安全的和高报酬的工作感到幸运。

说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并不是说每个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都会生活在持续不断的苦难中。当然，艰苦的生活是不舒适的，也是不公道的。不过，许多没有很多钱或没有受过许多正规教育、没有出门旅行、没有豪宅、没有去超级豪华餐馆……的人都是幸福的。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惊奇的。人类是机智多谋随机应变的，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况。一旦对食物、衣物、住所及亲密关系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人类就会娴熟地创造让自己舒适和从简单事情中得到幸福的方法。

考虑到这一情况，某些人可能会说："你看见了吗？这些人只有一些简单的东西就感到幸福。他们不需要太多。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错过什么，因此没必要对我们的财富感到心烦意乱。对我们来说，它是幸福的一个来源，并且它没有从等级较低者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实际上，他们应该感恩于我们一直忙着做生产性的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毁坏一个运转如此好的制度呢？"

类似这样的声明，一直在很多时间和很多场合下（像美国奴隶时期）被用来为工人遭受的苦难进行辩解。这一辩解的前提是，有些人的价值没有其他人那么多。如果这一前提被接受，也就只能是合乎逻辑地推出，应当利用等级较低的人的时间、身体和能力，来为自认为更优越的人创造幸福。这类想法通过允许某些人相信他们有资格牺牲他人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助长了不平等的持续存在。

无形的资源

有一个特大招贴广告上面这样写道："为成功而穿——Wear a White Penis"。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口号提醒我们，在一个白人男性操控的社会里，白人男性有（平均而言）更好的成功机会，而其他群体的人们则不能像改变衣服那样容易地掩盖他们的劣势。如果这个特大张贴广告让我们发笑，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建议，它是荒谬的；如果你不是天生就有一个白色阴茎，你不可能给自己弄上一个——至少是以能够让人信服的方式。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关键地方：如果一种身体比别的身体能够获得更多的尊重，身体之间的差异就不仅仅是一个差异。例如，在一个男性和男人气质比女性和女性气质更受重视的社会，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相比就是一种更有价值的资源。如果你有一个男性身体，你更可能被听取、被严肃对待和被看做一位潜在的领导。你也可能会最终被证明是个傻瓜，但在一开始，由于你的身体，你会获得毋庸置疑的好处。

同样，在一个欧洲特点——特别是浅色皮肤、直发和光滑鼻子——受到高度重视或被视为是美丽的社会，拥有一个有着这些特点的身体就会获得一定的优势。有了这些特点，你可能会被看做拥有更多天生的善良和智力，从而得到更好的对待。并且，如果那些一直拥有权力的人认为你与他们比较相像，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将你吸收进他们的圈子，从而允许你有门径获得更多的资源。

这一部分的标题暗示，肤色和体型多多少少都是一种无形的资源。这是怎么变得可能的呢？难道这些资源不是必需看得见才会产生结果吗？答案与谁看见什么有关。那些拥有被高度重视特点的那些人，经常看不到这些特征带来的优势。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对她或他每天佩带的徽章视而不见。

例如，白人经常看不到，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比起那些有着黑皮肤和非洲人特点的人，受到更好的对待。"受到更好的对待"是说，说的话有人听、作为个体受到赏识、被假定为能干或信得过、被视作有资格获得尊严和尊重。你也许会认为，"这有什么特殊的？每个人都应受到这样的对待。"当然，你说的完全正确，但这却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这一点，可能同样难以看到。

拥有一个男性身体，能够按照同样的方式起作用。在其他方面都平等的情况下，一个有着男性身体的人，更可能被假定为是可信任的和可胜任的。看上去就好像是男性身体是一个标志，上面写着"请相信我完全知道我说的，并会将其付诸行动"。然而，同为白人和有着相同肤色的男性仍然很少看到，他们的身体带给他们的相对于女性而言额外的好处。男性身体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对拥有它的那些人来说依然是无形的。

身体也能拥有在使用前一直是无形的其他种类的资源。例如，力量、协调性和肌肉控制是身体资源。对热、冷和疾病的抵抗也是。可能也包括灵敏的听力、视力、嗅觉、味觉和触觉。作为自然馈赠和训练，所有这些能力都位于身体内，并且在它们被展示出来之前，我们也许不知道一个人拥有这些资源。

这一身体资源是差异还是不平等？两者都是。例如，根据定义，力量上的差异是一种不平等，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比别的人更强壮。不过，关键是，力量是否被用来创造其他不平等。如果人们能够合法地奴役力量上更弱的人，力量就会变成一种财产。同样，如果人们根据能举多重来支付工资，力量也会变成财富上的不平等。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什么算作资源，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无形资源可见的起源

无形资源来自何处？即使是力量，乍看上去像是一件与基因有关的事情，也会受到文化和经验的影响。没有合适的营养和锻炼，那些本可长得很高和很胖的人，未必就很强壮。并且，即使是身体瘦弱的人，也能锻炼他们的力量达到超出是他们体重两倍的人的地步。通过选择或是通过偶然事件，来按照特定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塑造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

存在于身体内的其他形式的资源，甚至要更多地取决于经验和训练。不管我们的潜力可能是什么，我们总是要依靠他人教给我们如何去做事、给我们问题去解决和帮助我们改正我们的差错。因此，技巧和解决问题能力（某些人称其为"智力"）上的差异，都来自社会生活。我们喜欢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头脑能做的事情而获得奖励。遗憾的是，许多人从未得到机会学习去做为那些发放奖励的人所重

视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经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按照特定方式对这个世界作出反应。假设你从现在看的一页抬头往上看，看见一个枯瘦的老人（有着一双凸起的眼睛，下巴上有好多老年斑），一手拿刀，一手拿着一条响尾蛇向你走来。你会做什么？你也许会尖叫，浑身发僵，拔腿就跑，缩成一团或拎起书本向他扔去。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你肯定会有身体反应——你的心怦怦直跳，你的胸口绷得紧紧的——并且这一反应将会是你的身体怎样被控制着回应你解释这一威胁场面的结果。

这个奇怪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即我们的身体——不仅是我们的头脑——也会以那种来自我们一直怎样被控制去反应的方式，对这个世界作出反应。认识到这些反应是适应性的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不可能控制我们对世界的所有反应。重要的是要看到，某些回应世界的方式，要比其他方式更有价值、更有用，并且更有可能导致不平等。

假设有人邀请你做一个公开演讲，谈谈社会学意识。谈话时间为一小时，日子定在下周的这一时间。你的家人、朋友和老师，以及你生活其中的社区的多数领导，到时都会在场。你预计将会有约1500人到场，不算记者和摄影师。当你讲话时，你不仅代表你自己，还代表你所属的群体。如果你演讲得很好，你会得到更多的荣誉，并且可能会有几个工作提供给你。

做这样一个报告的远景，使得许多人变得极其忧虑。他们担心自己看起来不够沉稳自信，可能会说错话，可能会使自己和他人困窘。有这种反应的人也许会认为，“我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我的脑子都不转了。我不可能在一周时间内做好充分准备！我知道我会露馅的。一想到要站在所有那些人前面，我的心跳都要没了。我不可能成功地完成它的！”一旦出现这类反应，就会很难做好一个工作，从而也就会使得一直担心的糟糕表现成为现实。

选择做同一报告的另一个人则也许会说：“谢谢这一荣誉。一星期时间足够准备的了。我要立即好好准备，展现我最好的一面。”然后，带着满腔自信，这个人好好温习社会学意识，并研究历史上著名演说者的演讲，写出演讲初稿，进行校正，从他人那里得到评论，再校正，然后练习作报告，校正一些问题，然后，终于，当那一天到来时，他/她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工作，使得大家都为之自豪，

并为自己开启了一条光彩的职业生涯道路。

为什么两个人对做公开报告的远景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呢？说“某些人在公开演讲上比他人更自信”并没有太多帮助。那只是一个观察，而不是解释。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追问：“什么体验使得一个人充满自信、另一个人则如此焦虑和担心？一个人是怎样学会相信自己的能力的？另一个人怎么就没有？”我们会设法了解，这些人学会对自身能力和应用这些能力的挑战有不同的感觉，是怎样发生的。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回应世界的方式、我们适应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模式化的。某些类型的人，经过训练，更可能在对问题作出回应时，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着坚定的信念。如果你是白人、男性和上层中产阶级，比起你是一个在贫困中长大的黑人女性，你会有更多的体验去培养你的天分，给自己一种你能做你脑子里设定的人和目标的自信。

显然，并不是在每个例子中这都是真的。一些来自富人家庭的白人，同样可能会为缺少自信所困扰。反过来，许多有着各种背景的有色妇女，在家庭和社区的影响下，也会获得巨大的能力和自豪感。不过总体而言，在一个由白人、男性及富人掌控和享有优势的社会中，模式还是起作用的。一般说来，那些一出生就有很多可见资源的人，要有更好的机会去获取可以带来更多优势的内在资源。

重造我们自己

在听过关于内在资源的这一争辩后，一名学生说：“可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不是与适者生存很相像吗？你知道，那些生存下来并获得成功的人，是最适合的那些人——那些无论什么原因最好地适应了环境的人。”我说是的，事情确实是那样发生的，但在这里面有两个差异。

一个差异是，从本质上来说，生物是通过基因遗传成为它们所是；它们不会通过上学去学习技能、获取它们得以生存下去的习性和性格成为它们所是。然而，在社会世界，我们必须付出有意识的努力，以便完成把儿童转变成一个完全正常、有能力的成人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人就会被损坏或被阻碍。

我说，事物与人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天生就有的，

而是社会构建的。因此，适者生存的比喻是错误的，因为社会世界可以被改变，使它变得更安全和培育各种各样的人。我们没有必要牺牲一些人，好像他们就是小鱼，理当被更大的鱼吃掉。那种弱肉强食的安排，并不会生成一个非常人道的世界。

重造我们自己总是一种可能性。如果问题是缺乏自信，我们可以练习制定可以达成的目标，然后努力工作达到它们，从而促进我们的自信。我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学会新的技能、习性和想法。当然，当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和生活在舒适的习惯里时，这样做会变得比较困难。也可能是，生活轨道和我们相似的他人，会抵抗我们改变的努力。

不过有了他人的支持，显著的变动依然是可能的。如果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使得我们成为我们所是，我们就能通过与他人建立不同的关系，或是通过与不同的人建立关系，潜在地重造自己。只要那里存在这样做的可能性、形成这类变迁的可能性，我们就不需要听命自己去接受那些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形式一直灌输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总是能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向上追求成长和变化。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看到，社会生活中某些高度可见的事实——例如，财富、地位和权力上巨大的不平等——可能会怎样导致无形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古老的格言“好上加好”，是同一观点一种比较诗意的表达，意思是优势倾向于不断积累。如果我们意识到源自这一倾向的坏结果，我们就可以决定整顿我们自己，让事情变得不同，趋向更大的公正。

错误的相似

有一次，我正在谈论女性怎样为职业隔离所伤害——职业隔离是指一种惯习，即引导女性去做那些工资少于男性的工作——班上一个男士说道：“男性也为职业隔离所伤害。”

我问他为什么，他解释说他想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他一直被劝阻这样去做。他争辩说，如果女性被控制远离有着高报酬的“男人的工作”（像工程师、医师）是受到压迫，他也受到了压迫，因为他想成为一名小学老师

的愿望未被尊重。

他的这一说法，得到很多人的同情。班上多数人似乎都同意，这一被劝阻成为小学老师的事情有些不合理——这项工作通常都是由女性来担任。他的例子暗示，职业隔离对男性和女性来说一样坏。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女人并没有比男人的情况更糟糕，因为男人同样要面对这一问题。

我问这位年轻人谁劝阻他那样去做。

“我的爸爸和我的伯父。”

我问他是否被大学或公共教育系统里的任何人劝阻过。

“那倒没有，可以说他们倒是想要更多男人进入初级教育。”

我问，如果男人在初级教育中工作的未来前景看上去如此好，为什么他的爸爸和伯父还会劝阻他。

“他们说那是女人干的活，我可以去做更好的事情。”

就在这一点上，相似性给打破了。这个年轻人的体验，并不像女性找寻通常由男性把持着的工作时所体验到的。在寻求成为一名小学老师的过程中，并没有人告诉这个年轻人：“对这项工作来说，你不足够好。”告诉他的是：“对你来说，这个工作不够好。”但甚至是这一信息，也不是来自任何一个有任何一点权力能把他排除在外的人。是他的爸爸和他的伯父告诉他，他的眼界太低。想成为工程师或外科医生的女性，大概不会得到那类信息。

尽管考虑到这一点，我仍鼓励这位年轻人，如果他想教孩子或者喜欢幼教事业，他完全可以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这时他说：“我倒不是特别想教孩子。我的计划是，先教上几年，然后进入管理部门。很多学校系统都非常热切地雇用男性作为小学校长，并且从那里你可以继续成为一个主管者。”

听了这番话，我非常失望。声称被压迫的年轻人，实际上考虑的是他的性别将会帮助他的事业。这与女性被排除在高报酬工作外的体验，并没有什么相似性。

考虑历史和语境/背景

在谈论种族主义时，另一个错误的相似性也会经常出现。如果我谈论白人种

族主义，某些人就会说："是吗，但是黑人也可以是种族主义者。"我问那怎么可能，某些人就会解释："任何时候你都能看见它。像在自助餐厅。黑人他们自己坐在一起并排除白人学生。他们也会发表一些关于白人歧视的评论，就像一些白人对黑人的评论一样。那就是种族主义。"实际上，这一行为可能反映出的是偏见，而不是种族主义。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为什么指责黑人种族主义（为了保持他们自己或是为了讽刺白人）是一个错误的相似性。

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考虑历史和语境/背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看到两件事。一个是，不是非洲人、而是欧洲人，发明了种族类别"黑人"和"白人"，来为其殖民和奴隶制进行辩护。如果有哪个群体是种族主义，那就是创造并强加这一类别于他人头上的群体。声称受害者是种族主义者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也能看到，在美国，黑人从来都没有压迫或剥削白人的权力；也从来没有说在黑人占大多数的情况下让白人去忍受日常生活中的侮辱。当谈到压迫、剥削和歧视时，情况一直是，仍然是，几乎完全是另一个方式。黑人始终在承受，而非受益于"种族"这一想法，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安排。

因此，如果在美国社会中黑人仍是一个相对没有权力的少数群体，贬低白人并设法维护他们自己之间的团结，并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对种族主义的反抗。说黑人对白人不友好或是讲关于白人的笑话——就像白人对黑人做同样的事情一样——是种族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相似性。之所以说它是错误的，是因为它忽略了种族主义的历史责任；忽略了黑人和白人之间在权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并且忽略了依赖于谁蔑视谁而出现的不同后果。

如果欣然接受对另一个群体成员的刻板印象，任何人都有可能表现出偏见。因此，如果一些黑人将所有白人都看做是不值得信任的偏执者，我们可以叫这"存在偏见"。可以理解，许多白人都会对这一刻板印象感到愤愤不平。但是，因为黑人作为群体没有权力去歧视白人，黑人怀有的任何偏见都不会有什么后果。没有权力，完全不可能去"实施种族主义"。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能看到，实施种族主义所要求的，不仅是偏见，而且是那种按照伤害他人的方式去歧视的权力。

我经常通过询问，有多少学生相信要得到他们的第一份好工作他们必须取悦一位黑人雇主，来阐明关于权力和歧视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当我问到那个问题

时，没人举手。然后，我问，多少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成功取决于黑人雇主的评断。仍然没人举手。

美国种族群体间权力上的差异，也暗示说明为什么说黑人聚到一起排除白人就像白人聚到一起排除黑人一样是一个错误的相似性。如果白人控制着多数权力位置，并趋向于把这样的位置给予与他们想象的人——处在他们关系网络中的人——那么，被这一关系网络排除在外的人就会受苦受难；他们将会被关在大门外，始终处于无权状态。另一方面，黑人相对而言拥有极少的权力和财富，因此，如果他们说"我们不喜欢与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在一起"，那并不会在白人中间引起苦难。

回想一下前面那位提到在自助餐厅黑人围坐一起的学生。让人好奇的是，这一例子如此经常出现。它是一个很好的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避免看到真正发生的虚假相似性的例子。

我曾问一名白人学生——他引用了分离座位的模式来解释为什么它让他感到烦恼——"你是不是因为你想与你的黑人朋友坐一桌，可是突然当他们在一起时他们不想让你加入其中而烦恼？"

他说不是，他不是为那烦恼；他说他所想到的黑人学生甚至不是他的朋友。

"如果他们不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会想要与他们坐在一起？"

在他思考问题时，一个黑人女生举起了她的手，说道："如果有一个房间，人们会与他们的朋友坐在一起。事情是，白人学生更可能有白人朋友，黑人学生更可能有黑人朋友。"她在尽力创造和平。

这时，另一个黑人女性说道："并不是白人学生想与我们坐一起。而是白人过去一直如此习惯于有能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因此，如果有一个地方他们感到不能自由地去，他们就会愤愤不平。"

所有黑人学生和半数白人学生都点头表示同意。看起来，她的话可谓是一语中的。

错误的性别相似性

在谈论性暴力问题时，我尽力阐明这一观点，即问题（促使情境成为可能之

一）的一部分是男性的惯习——将女性视作性对象。意思是说，男人谈论和对待女性，更多是将其当做性征服的目标，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当我提出这一观点，某些人经常会说："是的，但是女性也经常在性上物化男人。妇女谈起男人经常会说谁谁谁是个'猛男'，并且有则电视广告里一位秘书色迷迷地盯着男性建筑工人。"

将女性对男性的性物化与男性对女性的性物化相提并论，是错的，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男人更常这样做，因为在美国文化中，显示对女性的性兴趣——表明你为她们的身体（作为性对象）所吸引——是成年男子异性恋符号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物化的结果是不同的，因为男人有更多权力在身体和经济上伤害女性。

一个被视作性对象的女性，不会被当做一个真正的人受到尊重。正是对女性人格这一微乎其微的尊重，成为强奸和其他形式性压服的原因。它也是工作场所性别歧视的原因所在（很难赞赏一个被视作一套身体部件的人的智力和技能）。再一次，是男人，由于他们的体力和制度化的权力，会伤害女性——伤害来自于将女性视作物体。妇女通常没有权力去伤害男人，因此，女性实施的性物化，极少会威胁到任何男性的身体、地位或事业。

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不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男性物化女性是错的、女性物化男性则是好的。物化任何人都是错的，如果一味强化忽略他人的人性这一习惯，很可能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意识到，依据谁在物化谁、在什么情况下物化，物化的后果可能会相当不同。当在权力上存在严重不平衡时，尤其是权力造成伤害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一不平衡状态，不让虚假的相似性阻止我们看到哪一物化行动更危险和更具伤害性。

真正相似性中的模式

有一次，在谈论来自与压力有关的疾病（像心脏病、中风和肝衰竭）的死亡率时我指出，黑人和工人阶级的男性，要比白人和中产阶级的男性的死亡率高。作为回应，一名学生说道："但是，也有许多高级主管，有与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我说，没错，不过关于死亡率的数据包含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教训：美国社会中的

不平等，是那些处在经济阶梯末端的人比其他人死得更快的一个原因。

与理解这个教训相反，这名学生努力呈现一种相似性，好像在说："工人有他们的健康麻烦，但是，领导也有他们的健康问题。"当然，从字面上来说，这一点不假，但是，这样提出问题会混淆现实。领导有压力，经常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持权力；工人有压力，经常是因为他们缺乏权力。期望在工人和领导之间找寻相似性来表示两个群体同等受苦受难——这一观念明显是错误的，就像死亡率上的差异所表明的。

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忽略所有的相似性。实际上，寻找它们是件好事，因为真正的相似性能够显示出有关社会世界是怎样运作的重要事情。例如，在工人阶级的男性和男性领导体验到的麻烦中，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两个群体的男人可能都很努力，按照相似的方式去控制他们的生活。这值得深入了解。但我们不应假定，一个相似性——即使是真正的相似性——必然是相等的。

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处于特权集团的人的麻烦；也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被压迫群体中人的错误行为。具有社会学意识，意味着要留意背景、历史、权力，以便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时候差异是不平等的，什么时候虚假的相似性会使不平等看上去消失了。

自我辩解和正义的一个测试

我们可能会说，人们作出错误的相似性、拒绝看到不平等，或者努力把不平等刻画成仅仅是差异，是因为他们不具有社会学意识。但是，隐藏在抵制对这些事情具有意识背后的又是什么呢？或许它是一种想要辩解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处地位的欲望。因其种族、性别、收入或性取向而享有特权的人，通常都会想法为提供其特权的社会安排进行辩解。

当人们对社会世界的看法，也支持他们对自身所抱有的非常受欢迎的观点时，要想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是很难的。一些拥有地位、财富和权力的人，很可能会欣然接受这样一种对社会的看法，即将其看做是一个公平和公开竞争的地方，因为这一看法暗示，他们通过自身的优点做得非常好。相反，一种批判社会的观点，

就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对自身的这一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说“好好想想，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要敢于面对现实”，也不是非常有用。多数享有特权的人所做的回应，都是好好去想如何为坚持他们喜欢的现实景象进行辩解。

不过，让人们去考虑一种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还是可能的，如果这一方式能被发现可以用来避免他们进行自我辩护的需要。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努力这样做的一种方式就是，做一个练习，它为哲学家罗尔斯的思想所激发，可以称为“测试正义”。它是一个集体想法实验，指示如下：

一个新的社会在正常运转。这个新社会赖以运转的分配正义原则，有待确切表达。你的工作就是认真阐述它们。你被选中来做这件事，主要是因为你对这个新社会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你在这个新社会中的位置是什么。因而，你处于一种完美的状况中，以便可以产生一个公平的财富分配。你的任务，就是按照下面所说的去做：

1. 制定这一规则或这些规则，通过它/它们，可以决定在新社会中谁可以得到多少财富。

2. 制定这一规则或这些规则，通过它/它们，可以决定每个人必须为新社会作出什么贡献。

3. 显示你制定的规则将会怎样最大化正义和平等（显然，你需要定义你所说的“正义”、“平等”是什么意思）。请务必考虑你制定的规则将会怎样产生公平的结果，甚至是在异常情况下。

对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困难的练习。首先，很难想象在一个新社会中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早已习惯于成为我们所是。其次，我们不习惯于任何人以一种正义方式要求我们分配财富。不过，隐藏在这一练习背后的基本观点，其实是很简单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将会在新社会里处在什么位置上，你就没有特权去辩解和有充分的理由去构想能够保证人人享有正义的规则。

这里是我的学生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些决定谁得到多少财富的规则：(1) 每个人按照他们对社会所做贡献的份额来获得财富的份额；(2) 每个人得到社会集体

财富相同的份额；(3) 每个人得到他们过上体面生活所需要份额的财富；如果他们有特殊困难，可以多加一些。

考虑到练习中的第三部分，其中一些规则不会运作得那么好，因为乍看上去显得公平的——像基于对社会贡献进行分配——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像当人们是残疾的，没有办法像他人那样完成同样多的工作的情况下。即便是最严格的平等规则——每个人都得到同等份额的财富——也会遇到麻烦，因为某些人（像那些养活好几个孩子的人），会比其他人（像那些单身者、没有依靠的人）有更大的需求。给每个人一个相等的份额，将会由此产生一个不公道的结果，因为某些人会比他们需要的得到更多，其他人则会得到少于他们需要的。

在设法制定一个决定一个人必须贡献给社会什么的规则时，看到出现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你也许会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规则是必要的。首先，每个社会都依赖于人们去做那些对于维持社会持续运转是必不可少的事情。某些人必须去种地，卖东西，盖房子，做清洁，照顾孩子，以及做数以万计的毫无浪漫色彩的任务。如果每个人都想舒舒服服地坐着不动，依靠他人的劳动果实为生，社会不可能持续运转下去。

制定分配规则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确保在新社会中的公正。没人应该必须做比他们必要的劳动份额更多，没人（能工作的人）应该不劳而获。那么，我们可以构想什么样的规则保证公正普遍流行呢？这里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计算出维持社会存在所必需的所有工作需要多少时间，然后将这些工作在有能力工作的人中间平等地进行分配。或许结果表明，为了维持社会运转，我们大家每周需要工作 20 小时。如果那样，规则就会成为“每个人每周必须工作 20 小时”。

像这样一个规则，仅仅是一个起点；我们仍然必须计划谁应该去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许多人也许会说：“我将作为一个脑科医师一周工作 20 小时，因为这一工作看上去非常有趣。”可能很少会有人说：“因为我喜欢恶臭和秽物，我会用我的 20 小时去做一个垃圾收集工。”因而，我们必须制定规则来解决不同工作类型中的不平等，确保宜人的工作和令人不快的工作得到公平分配。或许我们会需要像这样的一个规则：每个人都必须做脏活；没人可以一直去做好玩和有趣的工作；并且没人应该一直去做那些脏活。

有许多可能的规则，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会在解决一些正义问题的同时又创造出其他问题。但是，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总是必须继续思考怎样确保我们抽象的规则、原则和指南，能够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产生好的结果。那是人类智力所为的大部分。具有社会学意识，就意味着利用这一智力，来解决社会世界中存在或出现的问题。

测试正义练习的目标，不是得出一个单一的幻象——一个正义的社会看上去像什么——而是鼓励对正义和我们当前的社会怎样产生正义或不正义的结果进行思考和对话。这一练习似乎使得人们更容易看到现有社会的问题，因为他们并未深陷于为有益他们的社会安排进行辩解。相反，他们考虑了将会对每个人产生更好结果的社会安排的种类。

我也注意到，在这一练习中，有一个想法从未出现。没人说："要最大化正义和平等，所有我们需要的就是，使用现在治理美国社会的同样规则。"没人这样说，我认为这是因为，一旦自我辩解的刺激消失，他们就会比通常更加自由地具有社会学意识。

没有终结的对话——不便和压迫

前面关于错误相似性的部分，已经展现了许多错误的相似性。例如，我曾多次听到人们这样说："要是一个白人有一个黑人老板，那个黑人不公平地对待那个白人又会怎样？这难道不是种族主义吗？"这个主题的一个变异就是，对待男人很不好的女老板。当然，这类事确实也有可能发生；白人男性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权力使用。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下级群体成员的歧视行动相对较少，并且不会构成有计划有步骤的压迫。

要解释这一点，我应该先解释一下我所说的"压迫"是什么意思。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修辞。如果我们花点时间给它一个定义，它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术语。

说人们被压迫，是说有人对他们做了某些事情。即，当人们被压迫时，他们被贬值（其价值少于其他群体的人），被歧视性反对（即，很少有机会去开发、

展示他们的能力，并为其能力获得奖励），并且被剥削（即，他们的想法、时间和劳动没有获得公平的报酬）。因为没有人可以被更有权势的人贬值、歧视性反对或者被剥削，因此，压迫以群体间的不平等为前提。说一个群体是系统性地被压迫的，就是说它的成员在他们面对的每个方面都受到阻碍。

哲学家 Marilyn Frye 使用鸟笼的隐喻来描述系统压迫。想象一只铁笼子里的鸟。如果笼子只有一根铁丝，它就不成其为笼子；鸟儿可以在铁丝线附近飞行，是自由的。但是，想象一个许多铁丝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笼子，从各个方面把鸟儿围在其中。现在，不管鸟儿往哪个方向去飞，铁丝都会阻碍它。这就是系统压迫可能的情形。

因而，在系统压迫和情势不便之间有一个差异。前者就像完全困在一个笼子里；后者则像面对一根很容易避开的铁丝。这里有一个更长的例子（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我曾在课上用来激发对这些事情进行讨论。

> 一名年轻的白人男性，北卡一所大学的一名医学院预科生，在与家人一起在康涅狄格度过暑假之后，开始返回学校。
>
> 在华盛顿特区附近，他下了高速公路，想随便吃点东西。在几个街区过后，他发现了一家餐馆，便走了进去。
>
> 他是那里唯一一个白人。他排队等待递交他的订单，但是，轮到他时，柜台后的年轻女子忽略了他，收了别人的订单。当他认为这次该他时，年轻女子再次忽略了他。终于，在第三次时，她接受了他的订单。
>
> 吃完东西，他便开车直奔学校，回到他的大学生活。

我在班上讲过这个故事后，通常都会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年轻白人是否受到了压迫？多数学生，如果给他们一个压迫的社会学定义，都反对这样看。他们认为，饥饿的年轻人有男性特权、白人特权，并且正处在即将得到的阶级特权的路上。因此，没有道理说他被压迫。不过，也有一些学生坚持认为，他在餐馆里被压迫了。

实际上，在我看来，说年轻人情势上感到不便，要比说他受到压迫要更为合理。他并没有被拒绝服务、被欺辱或被威胁。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取到他的汉堡之前，他不公平地多等了一点时间。但是，一旦他吃完他的饭菜，他就又

回到了机会、特权和舒适生活的轨道上。再使用一下鸟笼隐喻，我们也许可以说，他必须面对，在某一刻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一根微小的铁丝。

当我在班上引用这个故事时，我会再提两个问题以推进讨论。首先我会问，如果这个年轻人决定抱怨他怎样被对待了，事情会怎样？他最终可能会跟谁说？在华盛顿特区一个黑人社区，快餐馆的老板很可能也是一个黑人。但是，因为餐馆是全国连锁店的一部分，也有可能，如果年轻人顺着公司阶梯往上追问，最终与他谈话的将会是另一个白人男性。

然后，我指出，年轻白人想要抱怨的话，很可能也会与一个做了同样事情的黑人有所不同。年轻白人可以指望最终对着某个像他一样的人倾诉，并有可能得到同情的倾听；相反，一个想要表述怨言的黑人，很可能最终会与有着较少相似性和较少同情心的人打交道。因而，如果决定说出怨言的话，一个黑人也许会面对情境歧视的导线，然后面对另一根导线——不被认真倾听或认真对待。

我询问汉堡故事的另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种族主义是否与餐馆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有关？作为回应，我可以肯定，总是会有人说："是的，柜台后那个年轻女子是种族主义者。"幸运的是，我也可以肯定，总是会有人提供更具社会学意识的分析。

不管怎样，说年轻女性是以一种差别对待的方式行动，则是公平的。当她服务黑人顾客时，她让年轻白人站在一边等待。按照我们文化里的餐馆服务规则，如果说这样做看上去显得有些粗鲁或不合理，很难不同意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她会照这种方式行为？她的行为可能会与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

没有办法确切知道在那一刻她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假设有下面这样的事情：她的最低工资工作可能不会让她感到高兴；她也许认为她的工作机会受到反黑人歧视的限制；她也许对白人理当如此的特权感到愤慨；并且，在她的生活中，她也许体验到许多次白人不尊重她的情况。换句话说，作为一个黑人妇女，在一个充满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她很可能会对很多事情感到恼怒。

现在，柜台对面出现一个年轻白人——一个大学生，她猜测——在一个到处都是跟她一样的人的餐馆里，他故意装出一副毫不紧张的样子。可能她会认为，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好的体验。可能她会认为，他正在了解一种处在少数群体中有什么感觉。可能她会认为，这是一个小小的遭报应的机会——让他等一分钟再收他的订单。

事情不可能是，她认为这个年轻人理应受到惩罚。他也许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人。但是，在她的生活中，她一直都是被白人对待，先是视作一个类别中的一员，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才会被当做一个人对待。因此，在这里，在这一罕见的事例中，她可以给统治群体一名代表成员一点感受——黑人（像她）每天的体验。可能那就是她想的。

因此，如果说她的行为有任何与种族主义相关的东西，它是在一个由白人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作为一个黑人女性生活的一个反应。在提出这一观点时，我也会说，对那些白人学生说，如果他们喜欢生活在一个类似情况不会出现的社会——在那里白人不必偶尔面对来自黑人温和的愤怒表示——他们就应做出行动反对种族主义。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追究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自己骗自己——如果人人都仅仅是面带微笑说着“祝你好”，一切事情都会变得好起来。

再一次，在餐馆的例子中，要真正理解面对面互动中正在发生的，我们必须考虑更大的情境。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可能会问：“我们相遇的人属于哪个群体？从历史上来说，这些群体怎样互相关联？是否有一个群体使用它的权力压迫其他群体？一个群体是否比其他群体现在仍有更多权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肯定会塑造我们对不同群体成员碰到一起时发生的事情的解释。

通过考虑历史和更大的背景，我们可以避免作出错误的相似性，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会阻碍我们去理解对方，理解自己，理解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最低限度，我们不应把不便（那可能的确是令人不快的）与压迫（是广泛存在的和会威胁生命的）混为一谈。根据鸟笼隐喻，具有社会学意识意味着，不仅要考查个体的铁丝，也要考虑铁丝是怎么被创造的，它们相互之间又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

关于共同财富的注解

当我第一次听到“基础设施”这个词时，我在想，一个多么丑陋的专业术语！它是一个我从未想用的词。但随后我便意识到，它有点像我以前所想的“公地”——从其本源来说，它是指土地的一块，在它上面，(中世纪城镇的）每个人都可以放牧家畜或种植粮食。因此，我逐渐将基础设施看做——虽然仍然一个难看的词——是指某种价值——维持一个社区的共享资源。

在如今的美国，已经较少有一块真正的公地，人们可以在那里放牧他们的母牛或种植花园。但是，多数社区确实有很多“基础设施”，或者用我更喜欢的用语来说就是“共同的财富”，它们以其他形式存在。这一共同财富包括，所有的建筑物、机械、地方、组织和社区的人们创造用来帮助他们一起完成事情和通常能够丰富他们生活的其他资源。

公园、运动场和图书馆，是社区共同财富的例子。公立学校、道路、桥梁和公共交通系统也都是。公立医院、消防队、警察局、健康部门、法院和当地政府也是。我可能会将水和污水处理厂、机场和其他公用事业也都包括在内。不管什么时候，当社区的人们花费他们的金钱和努力去创造大家都能受益的事情，他们就是在增加他们的共同财富。

使得一个社区的共同财富如此珍贵的部分原因在于，大家都有——或是假定应该有——平等的途径得到它。如果这一原则被遵循，人们就能通过获取不这样可能就没法获得的资源来帮助自己。每个人都有平等途径可以获得共同的财富，也会使得每个人与共同体休戚相关——即，它给他们动力去成为负责任、有贡献的成员。不过，如果某些人获取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他们可以不公正地占有共同财富将其据为自己私有，社区自身也会垮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有意识的社区，会创造那些不仅是为了确保获得共同财富的平等途径，也是为了确保它仍是一个共同体的政策。

三思而行

1. 或许你正在学校求学，希望毕业时拿到的学位，可以帮你避免从事一个糟

糕的工作——薪水少，没有什么挑战，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无法避免讨厌的上司。你想避免这种命运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可怕的工作会使一个人的生活变得非常悲惨。但是，确实有数百万人将会（不是他们自身的错）终生从事那些可怕的工作，结束他们的整个生活，而其他人，由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特权，则从事着好工作。当一个社会以这种方式运作时，谁会从中受益？谁必须为之买单？我们可以怎样重组事情，以便人们不至于永久地陷入那些不能使他们过上好生活的工作中？

2. 我曾听人说，经济平等是一个坏想法，因为那将意味着大家都是相同的。这一反对使我感到奇怪，因为有着相同金钱的人们，经常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在经济阶层内存在大量的多样性。如果你考虑什么能使人们开发他们的潜力，减少经济不平等——如果只是通过减少贫困——实际上可能会怎样增加社会中有趣的多样性的数量？同样假设我们民主地决定采取以下政策：没人拥有比他们需要的更多的财富，直到每个人都有至少是同样的他们需要的。将这项政策付诸实践，会减少经济不平等。它可能也会怎样帮助减少非经济不平等？

3. 了解我们社会中不平等带来的伤害的程度后，某些人会说："是的，那是很可悲的。"我经常对这一表示感到奇怪。这与下面的说法是不一样的："这些关于不平等的事实使我感到悲哀"，或者"看到人们怎样为不平等所伤害我很伤心"，这两种说法中不管是哪一个，都清楚地表明说话者或写作者承认自己有一个情感上的回应。在谈到不平等时，说"那是很可悲的"，使用了感觉语言，但却暗示自己与其是相隔离的。你怎样理解和解释这一表述的使用？如果人们看到不平等和不公正时感到悲哀，而非愤怒或义愤，你觉得结果可能会是什么。

参阅书目

Albert, Michael, & Hahnel, Robin. (1991).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Bonilla-Silva, Eduardo.(2003). *Racism Without Racists: Color-Blind Racism and the Persistence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Frye, Marilyn.(1983). "Oppression." Pp. 1-16 in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Freedom, CA: Crossing Press.

Hacker, Andrew. (1992). *Two Nations: Black and White, Separate, Hostile, Unequal.*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Hurst, Charles.(1992). *Social Inequality: Form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Johnson, Allan.(2006). *Privilege, Power, and Difference*(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McIntosh, Peggy.(1997). "White Privilege and Male Privilege: A Personal Account of Coming to See Correspondences Through Work in Women's Studies." Pp. 76-87 in Margaret Anderson & Patricia Hill Collins(eds.), *Race, Class, and Gender: An Anthology.* Belmont, CA: Wadsworth.

Rawls, John.(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walbe, Michael. (2008). *Rigging the Game: How Inequality Is Reproduced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llman, David.(1993). *Portraits of White Racism.*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Christine.(1992). "The Glass Escalator: Hidden Advantages for Men in the 'Female' Professions." *Social Problems* 39: 253-267.

Wright, Erik O., Costello, C., Hachen, D., & Sprague, J. (1982).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709-726.

12
研究和改变社会世界

如果我说，我的电脑中央处理机并不是一个硅片，而是一个正电子薄片，通过脉冲以两倍于光速的速度经过一个高密度的安捷伦光纤场域，以 10^3 千兆赫运行，你也许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我。可能是因为这听起来振振有词。毕竟，你是否真的知道电脑里面是什么在运转吗？可能我仅仅是通过吐出一些你不熟悉的专业术语，在自夸我对电脑的知识。

不过，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些物理知识，你就会知道我的计算机故事是愚蠢的。说事物"以两倍于光速的速度"穿行，是一个笑话。即使你不知道光速是不可超过的，你只要知道一点关于电脑的知识和收听新闻，你就仍有可能猜测故事是耸人听闻的，因为说"正电子薄片"、"高密度的安捷伦光纤场域"等都是不可信的，并且家用电脑"以 10^3 千兆赫运行"也从未被广泛报道过。

这个例子显示，我们怎样可以通过演绎推理知道事情。你只需知道一个事实——什么都不可能比光速快——就可推论我的关于正电子薄片的故事是胡话。或者你也许已经知道，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计算机技术，不可能首先出现在家用电脑上。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关键是要通过知道一件事或若干件事，小心推理，我们就能得出可以帮助排除胡说的结论。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不要查寻任何统计，凭直觉你觉得美国的穷人，是黑人多还是白人多？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因为黑人常被视作贫穷的代表，所以贫穷的

黑人要比贫穷的白人更多。但是，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大约12%。并且，即使黑人的贫困率（大约24%）高于白人（大约8%），但是由于白人的基数更大，白人仍然构成穷人中的多数。再一次，只需一些事实和一些逻辑，就可很容易弄明白事情真相。

因此，逻辑推理是一种知道事情或发现我们所知道的隐含意义的方式。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东西，都直接来自他人。它是由我们的父母、老师、朋友等人传给我们的。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个人经验或观察，从系统的研究或神秘的启示，来了解事情。同样可能的是，一些知识是本能的，例如，婴儿"知道"它应该吮吸放进它嘴里的不论什么东西。

考虑我们的知识来自哪里，是很有趣的。不过，通常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确信我们的知识是合理的和可靠的。知识的每个来源在这些方面都有局限。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就是要知道这些局限所在。

例如，逻辑推理是一个很好的详尽阐述我们所拥有知识的方式——除了一点，即如果我们的前提是错误的，我们的结论也将是错误的；我们可以通过合理推理来避开无知。不管怎样，逻辑推理的一个力量就是，他人能够核查我们的假定和我们的推理，从而在我们走错的地方进行更正。

依赖他人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必要的，并且经常是一个好的学习方式。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人告诉我们的是正确的呢？你肯定会有这样的经验——父母、老师或辅导者告诉你的一些事情，后来被证明是错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摆在我们面前来自看上去相当可信渠道的真相的不同版本间作出判断。我们怎样判断谁是正确的？

个人经验和观察是知识的好的来源，除了一点，即容易从这些来源误判和进行过度概括。例如，你自己的观察也许会告诉你，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者所有立陶宛人都是懒虫，因为你在生活中遇到的两个立陶宛人都有点儿懒，或者美国没有统治阶级，因为你从未看见它在某个地方聚集，或是认为犯罪上升，因为你被抢劫了。在这几种情况下，问题不是你不知道你所看到的，而是你所看到的并不足以支持你所得出的结论。

至于神秘的启示，它可能是一个人获取自身精神知识的一个方式。但它不是

了解社会世界一个好的方式，因为他人没有办法去核查或反驳另一个人的神秘启示。如果你声称知道——因为这一念头刚刚从你的脑子里冒出——这本书是一个恶魔的工具，我可能会怎样表示不同意？假设我说我有神秘的启示，并且，在这个依据上，我知道这本书是来自赫尔墨斯的一件礼物——并且你应该相信我，因为这是我的书。但是，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奇怪并且不可解决的争论。

系统研究的好处

仔细研究，或许是创造关于社会世界的状况，以及它是怎样运作的合理和可靠知识的最佳方式。说它是最好的，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通过使用标准的、广泛被接受的研究事情的方法，我们可以控制个人偏见。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很少会错把我们希望什么是真实的当成真正真实的。

例如，假设我相信民主的工作组织比独裁的要好，并因此而相信它们更有效率。我的偏见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些证据支持我的信念。但是，如果我使用一个估计效率的标准方法，细心和公正地使用它，来比较民主和独裁的工作组织，无论最终我发现了什么，我都必须接受。这样，我的偏见就可取消或者至少得到控制。

其次，研究可以让我们超越个人经验和偶然观察，因为去研究就是要看到超出从我们所站的地方看去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它是寻找观念和信息，它们可能会挑战让我们度过每天生活的常识。它意味着要考虑他人创造的知识的质量和正确性，即使我们发现他们的知识会激怒我们。所有这些可能都不太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的惯常习性是舒适地相信我们总是知道什么是对的。

做研究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可以互相检查。如果我们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他人就可以检查我们的结果说："嗯，你做的是正确的；这些结果也一定是正确的。"或者他们可能会说："啊，你这里有点问题，因此你的结论不太可信。"当他们提供给我们他们创造的知识时，我们可以做同样的评断。按照这种方式，通过一起工作，我们可以在消除幻觉，以及从长远来说创造合理可信的知识方面做得更好。

可能你已注意到了，我对来自研究的知识说的尽是好话。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人就应该接受在科学或学术性期刊上发表的所有东西吗？显然不是。来自任何

渠道的知识，都应经过批判质询。仔细研究仅仅是避免当知识按照其他方式创造出来时经常会有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并且，如果研究没有正确完成，它可能会产生与其他办法同样多的愚蠢的东西。

这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自己的知识来自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询问下面一些问题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怎样知道我们声称知道的东西的？某些知识是否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如果那样，我们的推理是否正确？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前提是正确的？）是否有些知识是从别人那里传来的？（如果那样，他们的知识来自何处？我们怎样才能确信它是正确的？）是否有些知识是个人经验或观察的结果？（如果那样，我们是否在宣称知道得比我们的个人经验可能担保的更多？会不会是，我们只观察到我们想要相信是真实的、或者我们的观察一直都局限在某些关键方法上？）

询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的重点，不是为了质疑我们所知道的麻痹状态，而是为了更加明智地决定，我们应该对我们所知道的投入多大的信心。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敞开自己，迎接新知识，而不用担心我们会向另一个可疑的信仰体系投降。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可以对通过了解新知识及其来自何处、会带我们走向何处得到一个更好的视角。我们也能看到什么值得去追求。

我们可以问的问题

所有创造知识的尝试，都是对问题的反应，并且知识必须是以一种满足问题的方法被创造。例如，如果你问："这本书有多重？"适当的方式就是找个称重计称一称。它包含多少个词？数一数就可知道。它是否会像飞镖那样飞行？给它一个正确的投掷方式并观察结果。这些都是经验主义的问题，它意味着通过测量、计算或观看发生了什么，就可以得到回答。

但是假设你问："这本书的封面是否好看？"事情会是什么样呢？你可以问十位艺术家他们的看法。如果七个人说它丑，两个人莫衷一是，一个人认为好看，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测量工具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你问的是一个审美问题——一个关于主观感觉的问题——并且审美问题不是数据可以解答的。我们

可以说为什么某事会作为丑恶或美丽、雅致或粗鲁打动我们，但是没有证据或逻辑可以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他人是错误的。

这里是另一类问题：考虑到我也许可以用这些时间做其他更有用的事情，我写这本书是否值得？再一次，这不是一个经验主义问题，因为没有办法通过测量、计算或观察得出答案。它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要求对什么是值得做的进行判断。我可以说出为什么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是件好事，但是我的理由很可能是基于道德规范和在我看来未来可能会怎样发展。没有我可以显示的数据，也没有标准分析可以证明我的答案是对的。所有我能做的，就是提供合理的辩论。

还有一类解释问题，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当我们面对艺术作品，这样的问题经常会出现。我们也许会在欣赏绘画或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想要知道作家或艺术家想要我们理解什么。但是，任何事实、物体、姿态、短语或行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能存在解释问题。

有时我们可以通过阐明得到答案。或许作家或艺术家能够告诉我们其创作意图是什么（虽然作家和艺术家并不总是会充分解释他们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或者可能有可利用的专家的意见，帮助我们理解事情。在其他时间，也许存在如此多的歧义性，以至于没有可以像板上钉钉那样确凿、清晰的解释。因此，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给出理由，支持一个特定解释的可信性。

可能现在你已看出，研究可以更好地回答一些问题而非另一些。它是一个回答经验主义问题的好方式。在回答解释性问题时可能也是有用的，因为我们有时可以发现支持解释的可信性的证据。并且，尽管寻找想法和信息来帮助引导我们对道德和审美作出评断是明智的，但是研究并不会告诉我们哪些评断是正确的。

意识到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的种类是很重要的。有时，因为我们不太清楚这一点，我们会陷入没有结果的辩论中。例如，对一个简单的经验主义问题的正确答案，没有什么可以磋商的。犯罪率上涨了吗？去图书馆或网上一查，就可知道。如果它是一个正在争论中的经验主义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应停止争执，承认答案。

解释对经验主义问题的回答

有时对一个经验主义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带来很多解释性的麻烦。例如，问：

“美国黑人和白人的贫困率是多少？”就是一个经验主义问题。我们可以查寻答案，因为别人（美国人口调查局）已经做过统计。就像前面提到的，黑人中的贫困率大约是 24%，白人中的贫困率大约是 8%（具体数据会因贫困的定义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这些数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怎样来解释它们？

在一次关于种族不平等的讨论课上，我曾提到这些数字。课堂上突然变得安静下来。没人想对百分比的意义发表评论。

在我不断要求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后，一名白人学生说：“我认为没人会对此说些什么，因为这些数据让人困窘。”

他的意思是否是说，这些数据因为指出了未能克服种族不平等而让人困窘呢？我不太确定这一点，因此我要求他说得更明确些。

“这些数据会让黑人学生困窘，”他说，话中透着几分犹豫。我对他所说的感到迷惑不解。

在进一步交谈之后，事情变得清晰起来：说这些数据会让黑人学生困窘的那名学生，将数据看做黑人劣等的证据。他的推测是，一个群体的贫困率是那个群体里的人的能力的显示。我将这些数据看做是种族主义和歧视的证据。在这个例子中，关于贫困率的事实一目了然，但是它们没有为自己讲话。同样的事实，却被得出了几乎是截然不同的解释。

要支持我的解释，我可能会说，在美国，有数百万人，包括黑人和白人，都是穷人，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支付不错工资的工作，或者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有时，在一个区域中可以得到的工作与人们的技能并不匹配。或者是工作消失，因为雇主把工厂搬到了国外，在那里他们可以支付工人较少的工资。因此，即使人们有能力有意愿去工作，也仍会以贫困告终，或是接近贫困。

我可能还会补充说，黑人中存在的更高的贫困率，是北部市中心工厂关闭的结果，那里聚居着很多黑人。它是学校没有很好地服务黑人孩子的结果。它是白人享有雇用和关系网优势这一歧视的结果。在有些情况下，部分问题在于缺乏自我推销技能，但那是因为获取教育和培训的门径非常有限，而不是因为人们天生能力有限。

也许前面我已说过所有这些，但它是否足以用来确保我的解释是正确的呢？

虽然我确信我的声明可以帮助一些人看到为什么那名白人学生的解释是错的，但是喜欢坚持那一解释的人则可能会（正确地）指出，我并未真正证明——通过我所说的任何东西或所有证据——黑色相比白人并不是下等的。所有我能做的，就是认为“黑人劣等”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其他事情都被考虑到，如果那些其他事情都是真实的，并且，如果没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反证被忽略。

不管怎样，我的解释并不是看法不同的问题。我的解释建立在先前被回答的经验主义问题之上。工作是否在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地方消失了？雇主是否歧视黑人？白人在获取工作时是否享有关系网的优势？学校服务黑人孩子是否像它们服务白人孩子那样好？黑人是否缺乏教育和工作培训的机会？有了对这些经验主义问题的回答，我们就能确定，关于贫困率数据的哪种解释可能是正确的。

解决分歧

为什么要争论这些事情呢？你也许会认为，“人们会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你不可能说服他们不那样去做。”遗憾的是，某些人确实是那样。他们不会被说服放弃那些可以使他们对自己感觉良好的信仰和解释。即使如此，如果我们不是太快就放弃的话，交谈可能经常会把我们带到让人惊奇的地方。具有帮助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是哪类问题让我们陷入争论之中。

如果正在争论的是一个经验主义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它。”然后我们可以决定是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继续下去，还是找到一个后再继续下去。我们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想要理解什么，以及对我们来说问题有多重要。即使我们不会终止交谈飞奔到图书馆，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笔记以后再去查寻。因为它允许我们将更多的信息带入未来的交谈，那同样是一个进步。

当我们不同意解释性问题的答案时，事情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做的，如果我们希望了解分歧出在哪里，就是设法解释我们的阐释所依据的假定。这是一个意识到我们用来说明某些事情意味着什么的看法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向他人解释“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就更可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解释会与他人不同，以及这些不同可能会怎样解决。

至于审美和道德问题上的分歧，则不太容易解决。有些甚至是永远也无法解决。或许我们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解释——尽可能充分地解释，更欣赏一个而不是另一个的依据所在。这也许不会导致一致同意，但它有助于相互间更好地去理解。并且，我们观察到，只有一个规则（让谈话继续下去），会阻止使用暴力作为结束分歧的方式。当然，在遵循这一规则上，许多人都会（较少意识到）有很多困难。

有意识的怀疑主义

有一次，在关于教育益处的讨论中，一个黑人女生说，她非常吃惊地获悉，平均而言，一个中学毕业证书对一个白人，比一个大学学位对一个黑人妇女，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截止中年）。

当她说到这里时，一名白人男生说："我不信。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她要回答之前，我说："她大概是读了为今天上课而发的文章。如果你看一下发的材料第 34 页，你会看到一个数据表，里面就有她所说的。"

他翻了翻他的材料，发现了那张表。在研究了一阵儿后，他嘟哝了一句："这有什么，谁都能编出那些数字。"

作为一个老师，我被这个反应激怒了，因为它意味着："不论我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如果它不符合我的信仰，如果它让我感到不舒服，我都不会理它，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相信我想要相信的。"如果抱有这样一种态度，就很少有接受教育的空间。如果这名学生如此坚信自己是不可改变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他还要这样麻烦自己学习任何东西，或者读任何书。

不过，我不能说他的态度就是愚蠢透顶。因为确实经常会有人或组织捏造数字来误导我们，并且数字也可能会由于诚实的误差而是错误的，因此，怀疑数字是有道理的，不论其来源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告诉我们哪些数字是正确的呢？是的，这是可以做到的，它仅仅是要求训练。然而，因为多数人并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因此他们说"我分不出谁对谁错，因此我要把所有的数据都当成是胡言乱语"，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可能会说："我分不清谁对谁错，因此

所有的统计数字在我看来都是一堆垃圾。”

这显然不是一个对情况有意识的反应。它就像是在说：“我识字不多，因此我把所有的书都看做是胡言乱语。”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可能是学着去读，并学会区分那里面什么是好的。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比较难，但却并不是不可能的。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是，有意识地，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怀疑新信息。

了解社会世界的一个困难是，我们必须依赖别人创造的和过滤的信息。即使我们知道怎样去做，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件事情都亲自去检查一遍。实际情形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注意信息（以词语或数字的形式）是怎样被创造的、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必须追问：“如果这些信息被视作真实的接受下来，谁会从中受益？”按照这种方式具有意识，可以让我们警觉不被欺骗，同时也不会阻止我们去学习。

我们也应该寻找其他看法，因为这能帮助我们看到自身知识的局限。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看上去一目了然真实无欺，直到替代选择出现：“哥伦布开启了一个对有人居住的大陆的残酷人侵。”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描述同样事件的不同方式，而是一个看见那些事件是什么的不同方式。如果我们测试这个替代看法，我们就可看到什么被当做常规知识，并可看到至少它是可以测试的。

当然，什么是常规的和什么是可供选择的，取决于你站的位置。一个在你看来是可供选择的看法，对别人来说则可能是常规的。意识到视角的相对性，是具有社会学意识的一部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供选择的视角创造了充分了解世界的可能性，因为它们给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更多角度。

或许通过寻找和认真对待替代视角——总是会有多个替代选择——我们最终将会得到离真相较近的一个更好的版本。那也正是我们想要追求的某些东西。与此同时，考虑其他看法也是明智的，因为这能帮助我们看到相互竞争的版本是怎样创建的。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人是怎样看世界的、我们是怎样看世界的；如果我们愿意多承受一些不确定性的话，我们还会看到更多。

部分真相和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那位说“谁都能编出那些数字”的学生，没有考虑到不确定性。或许他害怕那样去做——如果他放弃自己已经相信的，他就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该去相信什么。他不知道如何去有意识地进行怀疑。

我们所恐惧的一部分是，失去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然而，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从未拥有绝对、完整的真相。我们所拥有的是，满脑子人们创造的看上去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的图像、描述和理由。为什么我们不准备好创造或借用新的理解方式，看见并体验更多的世界呢？

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这个世界有比我们看见或体验到的更多的东西——并且比我们一生可能看到和体验到的更多——或许我们也可以对我们自己说：“为了了解世界更多的东西，我可以把我当前的信仰视作临时的，并探索可供选择的理解事情的方法，因为这些方式中，也许有一个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有用。”

采取这一对待知识的姿态，并不意味着从一个信仰跳到另一个。它就像是在一条河里，不慌不忙地向上游走。为了向前移动，你必须采取柔和的步伐，确保转移你的身体重量之前，先确定你的立足点。你必须保持灵活性和依靠当下。如果你往前冲或注意力不集中，你就会浑身湿透。因此，当你想要往前走时，你应该集中注意力，小心前行。

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从未获得过关于社会世界的整体真相。我们发明或借用的所有真相——我们碰巧产生的所有图像、描述和理由——只是不可知的整体的部分看法，因为它总是在以一种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方式在改变。因此，我们不必担心新的想法和信息会抢走我们手里的真相。不管怎样，它们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大、更复杂、更难驾驭的真相，而且它们还是不稳定的。

对某些人来说，想到事物永远都是不确定的，是件可怕的事。想象有一个东西永远都是正确的，则会让人感觉非常舒适。然而，问题是，其他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并且当冲突出现时，他人不会愉快地顺从让我们感到舒心的真相的版本，也不会放弃他们的知识，欣然接受我们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和与他人相安无事，我们必须愿意认真考虑他们的视角，容忍伴随这一开放性而来的不确定性。

持续不断的询问和对话

我一直建议，对待所有的知识——我们已经拥有的和打动我们的新的和陌生的知识——都要抱持一种有意识的怀疑主义。这样，我们就可避免没有出路的虚无主义（“没有真相。任何人都可能编造数据。你不妨相信你想相信的。”）和狂热（“只有一个真相，并且只有我知道！其他信仰都是错的或疯狂的！”）。说它们是没有出路的，是因为它们使得交谈变得没有意义，并且提供不了解决冲突的希望。

对知识抱持有意识的怀疑主义，则能让我们继续询问、观察和设法更好地去理解事情；它可以使我们继续设法创造更加准确、更加完整和有用的描述；它能使我们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心态；当我们设法这样去做时，它会让我们保持与他人的联系。对话不仅是一种手段，其本身也是一种目的——至少，如果我们相信设法了解他人要好过忽视或伤害他人的话。因此，应该对所有的知识，包括我在这本书中所提供的东西，都抱有有意识的怀疑。在进行过公平的考虑之后，采取并使用那些有助于理解和让对话得以持续下去的东西。

改变自我和世界

如果你能永远活下去，生活是否会变得无比乏味？某些人也许会说：“是的，因为每天都是那些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永远——想起来都让人头疼。”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即生活将会变得更加有趣，因为当一个人对这个世界了解越多，一个人就会看到更多的复杂、更多的神秘、更多的问题有待解决、更多的事情有待完成。为什么某些人会将生活看做拥有这样巨大的诺言呢？我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充满了求知欲、关心和希望。

如果没有对事物本质及其如何运作的求知欲，整个世界看上去就会像是一个单调乏味的背景幕布，必须忍受生活，直到生命结束。如果没有对一个人自身之外或自身时间之外任何东西的关心，那么担心那些对度过一天日子并不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希望，在分析这个社会世界上花费如此多的努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似乎我们需要求知欲、关心和希望来激发一种渴望，去关

注社会世界，设法按照它所是的样子去了解它，利用这一意识去寻求改变。

有时人们生活所处的状况，并不能激发求知欲、关心或希望。每天的生活都那么艰难，每天的日子都那么相像，改变的前景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人们把他们的注意力都局限在日常任务上和短暂的娱乐上。其他人也许是对现状感到如此舒适，以至于他们失去了批判考察超出自身特权之外的世界的兴趣。在这些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发展出社会学意识。然而，再一次，或许这一过程也可以被扭转。或许一个有意识的经验教训，就能触发求知欲、关心和希望。

意识到世界是一个复杂和神奇的地方，意识到揭穿这些奥秘会令人满意，应该能够激起我们的求知欲。意识到我们的行动怎样影响他人喜悦和痛苦的经验，应该可以鼓励出关心的情感。意识到人类行为怎样创造世界，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个我们可以把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的希望。显然，这都是我自己的愿望表示，不过我会设法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提出它们作为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

我已尽我所能展示了有多少好奇的地方：构成社会世界的许多联系、模式、意外情况、外表和相互依赖性；人们设法一起解决问题和导致创造文化习性的所有方式；某些人创造社会安排以他人为代价让自己从中获益的方法；以及人们创造组成我们的社会现实知识的图像、理由和描述。我们可以永远研究这些事情，并且总是能够从中学到新东西。

我也尽力展示了，社会学意识给了我们关心的理由。我们关注和理解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意外情况越多，我们就能越好地看到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如何影响他人过上好生活的机会。同样，我们也能看到，他人所想和所做的也会影响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以一种超出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方式与靠近我们的人打交道，怎样是可能的。

并且就像我们会关心离我们近的人一样，我们也会——如果我们具有社会学意识的话——关心其生活与我们交织在一起、生活在远处的人。至少，我们能因此而看到把我们与他人或好或坏连到一起的社会安排的新原因。

或许你会问了："希望又是怎么回事？看上去，具有社会学意识，仅仅使我们看到社会世界是多么杂乱无章。这怎么能激发出希望来呢？"实际上，只意识到问题——不平等、剥削、他人的痛苦——并不会激发希望。它会激发义愤和

改变现状的渴望。遗憾的是，当问题的意识与无能为立感结合到一起时，结果经常是绝望。

不管怎样，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就会知道，社会世界是——不管它看上去多么坚实——一种社会构建。所有构成社会世界的想法、习性、安排等，都是人类的创造物。我们同样知道，社会世界之所以会像它所是的那样持续运转，是因为人们共享的信念，是因为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一起持续做事。如果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些，我们就能看到，现在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会永远存在，它们都处在我们克服它们的能力之内。

当然，真要作出改变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许多有权势的人，都从这一给如此多的他人带来问题的安排中受益匪浅。而且还存在一个改变被设计来阻止改变的安排的问题。不过，变迁的可能性始终都是存在的，只要人们能够组织起来让它发生，并且那也是抱持希望一个很好的理由。

通过明了我们不可能仅凭我们自己就在一夜之间改变社会，意识能让我们走出绝望的车辙。说“这周我不可能带来一次革命，即使我非常努力地去做。这证明改革是没有希望的。我想我必须放弃自己的想法，追随众人”是傻的。不过，许多人都会落入这种陷阱。解脱的出路是，通过意识到变动需要与其他人一起行动，来挑战现有安排，创造新安排。单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独自改造世界而丧失信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可能独自改变。不过，我们可以设法发现或组织认为需要变动并愿为其努力工作的人。与他人联合起来，可以缓和从英雄主义失败的梦想而来的绝望的力量，是惊人的。

这里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与其哀叹你没有能力单独改变世界，不如认真想想让你为之烦恼的事情或问题。要尽可能地具体。或许它是过多的军费开支，或者是环境破坏，或者是你所在学校服务工作者的低工资。不管是什么事情或问题，很可能都已有人在为改变它们努力工作。寻找那些人（到处打听）并加入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中去。把你的能力和智力增添到他们中去，你就会增加你的一份力量，推动社会世界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发展。

社会学意识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独自改变社会世界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对待他人抱有更多的尊重和同情，如果我们拒绝参加创造不平等（甚至是极小的

方式），如果我们对关于现实的官方描述提出问题，如果我们拒绝在破坏性的工厂工作，我们就在作出改变。我们不必一定要加入一个群体或组织一次抗议来做这类变迁。我们可以通过决定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上作出改变。

有时，我们最微薄的努力，也会激励他人并启发他们不同地生活。或许没人会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到了但却认为我们是奇怪的。这样你也许会认为，"如果没人注意我是一个道德上更优越的人，我该怎么办？为什么要自寻麻烦去与众不同和冒着被人嘲笑的风险呢？"这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不过，具有社会学意识，则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不确定任何我所做的都会使事情变得更好，但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不至少是去尝试一下，我就不会去做我认为是正确的，并可能继续让事情按照老样子运转下去。所以我将选择做那些正确的，不管别人是否注意到它。"

最后，具有社会学意识，远不止是研究社会世界怎样运作。它也不止是启发求知欲、关心和希望做得更多。如果它是值得实践的，社会学意识必须帮助我们改变自己和我们与他人一起做事的方式，以便我们可以与其他人更加平安地和有生产力地生活，没有剥削、不敬和不平等。社会学意识是一种我们身处何地以及需要做什么的方式。它是一条在一场没有尽头的对话中获得热心会员资格的道路。

没有终结的对话——知识和行动

有几位老师建议我把第 12 章分成两章，一章讲研究，一章讲社会变迁。就像你所看到的，我并没有那样去做。一个原因是，我更愿让本书致力于如何思考信息的问题，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书都在教人怎样收集信息。不过，保持本章原封未动的主要原因则是，我不认为把知识与行动拆开是件明智的做法。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过行动创造知识。观察我们行动时发生了什么，是一个发现世界如何运作模式的强有力的方式。然后，通过少许认真思考，我们可以获得一般原则来解释我们看到的模式。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进一步把这些原则编织进概念模式。当科学家这样做时，我们就说他们是在"创建理论"。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这同一件事，我们则说他们正在获取常识。

我们也通过行动来测试我们的知识。如果常识包括我们有关世界怎样运作的

理论，为那些理论引导的每次行动就都像是一次实验。如果我们可以至少大致预测我们行动的结果，我们的知识就算通过了一种效用测试。换句话说，我们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行动指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持续接受它。但是，如果我们的知识不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行动，我们就必须校正它。

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装备读者，为他们创造更多和更好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可能来自于用更高的社会学意识去察觉世界。并且如果我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工作的话，你已经获取了一种看到你以前没有看到的事物的能力。如果那样，这一能力就会——就本质而言——导致新知识的创生。但是，为了能有一个最好的回报，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必须与行动连接起来。

关于这一点，有两种方式可以考虑。一种是说，新的想法最好是通过将其付诸实践来掌握。这就是为什么教学经常包括学生实践他们寻求掌握的技能的锻炼。不论是在艺术、手工艺或学术领域，学徒都是在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做来学。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意识。最好是通过做来学；即通过写作或谈话，用这里提供的想法去理解社会世界（或它的某一部分）。一位好老师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相当多的帮助。

另一种考虑知识与行动之间联系的方式是，我在社会不平等课上告诉我的学生的建议。我说："一个好的了解不平等怎样持久存在的方式，就是观察当你设法废除它时会发生什么。"我的意思是，通常情况下难以看到某些社会安排怎样得到维护。但是，如果我们设法改变那些安排，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谁愿意做什么去保护它们。这样一种改造世界的尝试，可以成为我们关于社会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想法一个很好的测试。

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不会形成新的挑战，并且我们也没能去寻找它们，我们的知识可能就会停止增长。如果我们在一种刻板生活中感觉生活得非常安全和舒适，我们可能会得知许多沿着一条新路走有多费劲。不管怎样，具有社会学意识，我们可以获得关于道路和我们费力前行的方式的视角。但是为了学到更多，为了看到我们自身知识的局限，为了创造新知识，我们可能需要尝试新的道路。如果我们不冒着风险去探索它，我们又怎能描绘出新的疆域？

知识就是地图这一隐喻，在解释创造关于世界的新的描述意味着什么，和我

们必须怎样去做上非常有用。但是这一隐喻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社会世界与地球表面并不是非常相像。这里就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差异：地球的表面等待我们探索，当我们画关于它的地图时它不会发生什么变动。然而，社会世界是什么则是变动不居的，因为人们怎样行动基于他们对它的理解。这就意味着，当新的理解导致新的行为时，社会世界自身是能够改变的。

因此，不同于地球表面，社会世界可以通过我们理解它的努力发生改变。我们不仅仅是通过行动来扩展我们的知识。我们还通过基于我们先前行动创造的知识，按照不同的方式行动来扩展社会世界。

我之所以一直不愿把我所说的关于研究和知识的东西，与我所说的关于社会变迁的东西截然分开，还有一个理由。简言之，它是这样的：在一个因为不平等而充满暴力和痛楚的世界上，在我看来，了解社会世界在道义上最不可抗拒的原因就是设法改变它。具有社会学意识，则是抵达那一结果的一种方式。

最后，最好是要记住，一个人的无知是另一个人的优势。换句话说，你所不知道的，可能会被有权势的人用来反对你。缺乏信息和不能批判思考，也会限制我们按照有道德负责任的方式行动的能力。因此，如果你想过上一种负责任的生活，那么我要说，你有义务尽可能多地了解关于你所存身其中以及通过你的行动帮助再生产的社会世界的东西。具有社会学意识，是一种更加清楚地看到正在持续发生的事情的方式。决定对此做些什么，则由你自己来决定。

关于教育他人的注解

在读过本书的学生问过我的问题中，最难答的一个就是：我怎样能让他人具有社会学意识？我建议他让他们阅读本书或是其中一部分，然后与其进行交谈。那名学生接受了这一答复，但我后来意识到，光这样做是不够的，因为这一答复没有承认，教给他人并不太想学的东西，可能会有多么复杂和具有挑战性。

如果再有人问我那个问题，我会说：“它取决于你想让谁对什么具有社会学意识，并且你为什么认为他们不具有社会学意识。”如果他人是同龄朋友、新的相识、亲密的伴侣，或者一个成人家庭成员，事情就会有所不同。人们倾听我们

的用心程度，取决于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对一位朋友很有用的方法，也许对父母就不会管用。

问题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对我们想要教育的人意味着什么，也会产生差异。如果某人对不批判思考社会世界的某些部分有强烈的兴趣——或许是因为那样做会威胁他所珍惜的自我构想——可能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这里我推荐耐心和一种持续的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努力。所有的好老师都知道，不论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必须以一种他人能够听进去的方式传给他人。

一般来说，我建议采取柔和的推动而不是推挤。说"另一种看问题的方式是这样的……"或"像这样去看……也许也是有道理的"，可能会比较有效。通常，人们越少感到自己是被别人推着走，他们就越是愿意去倾听。

我也建议一开始从问题而不是争论入手。通过采取这种方法，你也许会发现，一个人的推理非常好，没有一点问题，但却是从半信半疑的假定开始的（或许基于不正确或不完全的信息）。这时，可以对这些假定进行公开讨论，让它们接受检查。可能关于这些假定的一次交谈，就会导致新的理解。再一次，如果你想教给某人新东西，知道他们从哪里起步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也是一个老师必须起步的地方。

三思而行

1. 如果你比较幸运，学校部分地满足了你对知识的饥渴，同时又增加了你对知识的饥渴。如果你一直都不是这么幸运，也不要忧虑，因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所有你需要去做的，首先就是认识到：你应对你自己的教育负责。换句话说，你必须自己追寻你所想要的知识，而不是等着老师去喂你。作为起步，可以列一个你想知道的东西的清单。因为你不可能一次做完所有的事情，可以从中选出一件，利用下面三个步骤（读一本书、与专家谈一次话、上一次课）来了解它。你可能会怎样借助你的老师来帮你追求自己的教育？你可以获取什么人力或物质资源，来了解你想要了解的？

2. 某些人说，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那些

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会抵制所有改变他们受益其中的条件的努力。考虑到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了多少成功的争取社会正义的奋斗，这是一种有些奇怪的悲观看法。你认为，为什么某些中产阶级会在这个悲观的看法中感觉舒适？想想苏珊·安东尼、小马丁·路德·金、甘地和曼德拉等人领导的奋斗。他们都挑战了得到巨大财富和权力支持的社会安排——并最终赢取了胜利，尽管守旧的人一直都在反对他们。他们是怎样做到的？他们运用了什么资源和策略，来克服那些拥有巨大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的人的阻碍？

3. 就像我在本书中所教导的，社会学意识主要是一个智力习惯——一种看问题和理解社会世界的方式。可能我会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一个人可能具有社会学意识，但却仍在按照一种相互分离的方式生活；也能观察和分析，但却并没有按照看到和分析的那样去行动。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但我更希望，按照不同方式理解社会世界，可以引领人们生活得与以往不同。你认为在你自身的情况下，这一点怎样可能变成现实？如果你是那种关心不公正和不平等问题（由社会学意识发现的）的人，你可能会怎样以一种与这些价值观及你的新理解相一致的方式去行动？

参阅书目

Johnson, Allan. (2005). *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 (2nd e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ivel, Paul. (1996). *Uprooting Racism: How White People Can Work for Racial Justice.*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ress.

Kleinman, Sherryl. (2007). *Feminist Fieldwork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Lofland, John, & Lofland, Lyn H.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Maxwell, Nicholas. (1984). *From Knowledge to Wisdom.* New York: Blackwell.

McLeod, Melvin, ed. (2006). *Mindful Politic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O'Hear, Anthony.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weickart, David. (2002) *After Capital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Smith, Susan, Villms, Dennis, & Johnson, Nancy. (1997). *Nurtured by Knowledge:*

Zearning to Do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New York: Apex Press.

Thomas, Jim.(1993). *Doing Critical Ethn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Winch, Peter.(1958).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to Philosophy.* Londo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Zinn, Howard.(1993). *Failure to Quit: Reflections of an Optimistic Historian.*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